

巴林文史丛书



1-8册(全套)定价: 280.00元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编辑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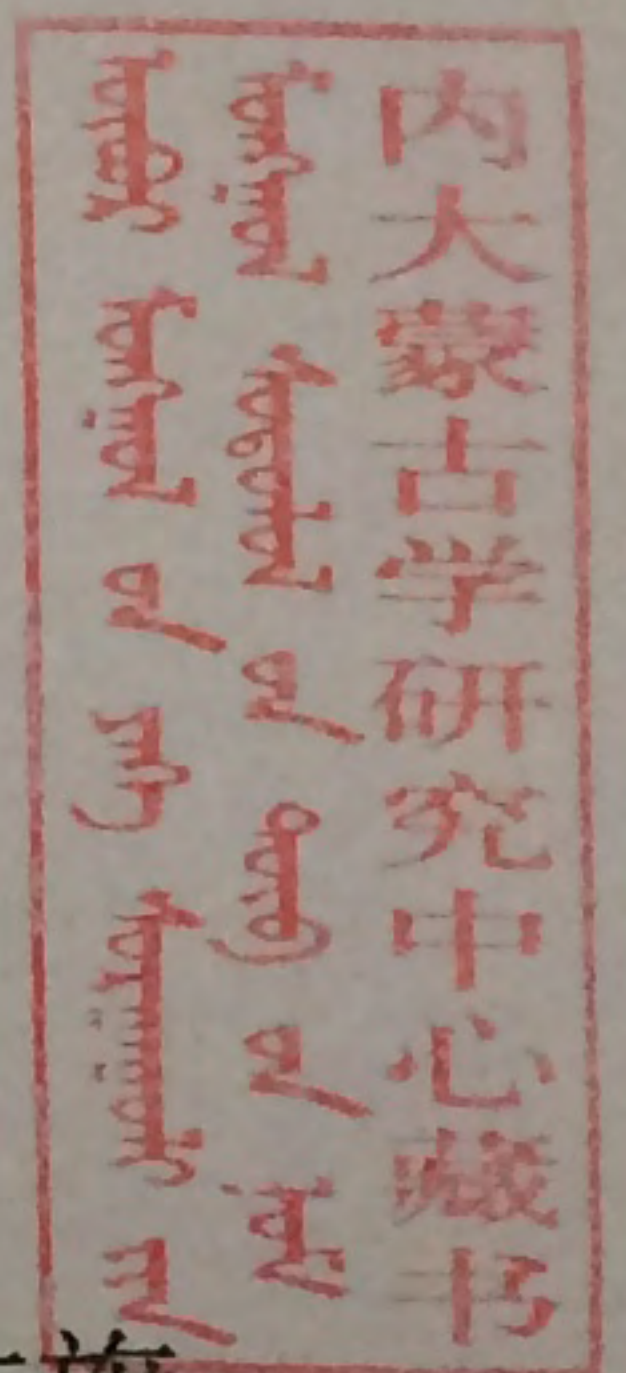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编辑出版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林右旗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五辑(汉)编委会名单:

主任:崔 义

副主任:胡日查 岳金荣 翟金柱 达林台

怀凤忠 哈斯牧仁 杨旭东 穆 松

主 编:穆 松

成 员:杨 春 马金升 于凤国 格日乐

巴林右旗政协文史资料民族宗教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穆 松

副主任:由玉海 丹 巴 张学仓

委 员:宝音朝格拉 杨晓雷 李书坤

郝建伟 花文元 胡钦毕力格

王兴贵 邸国祥 斯钦毕力格

图 亚 额尔敦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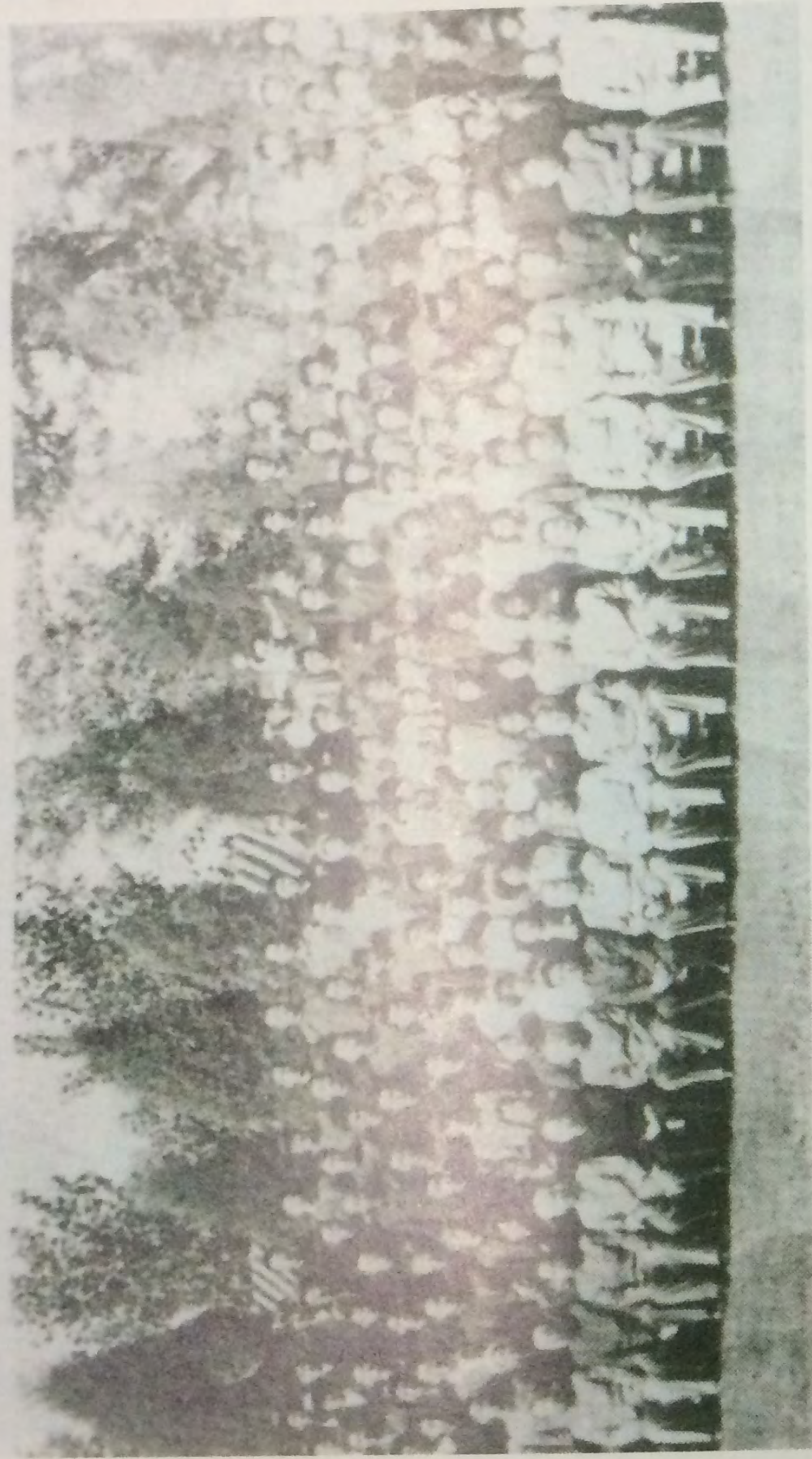


旗政协文史委获得的部分奖状和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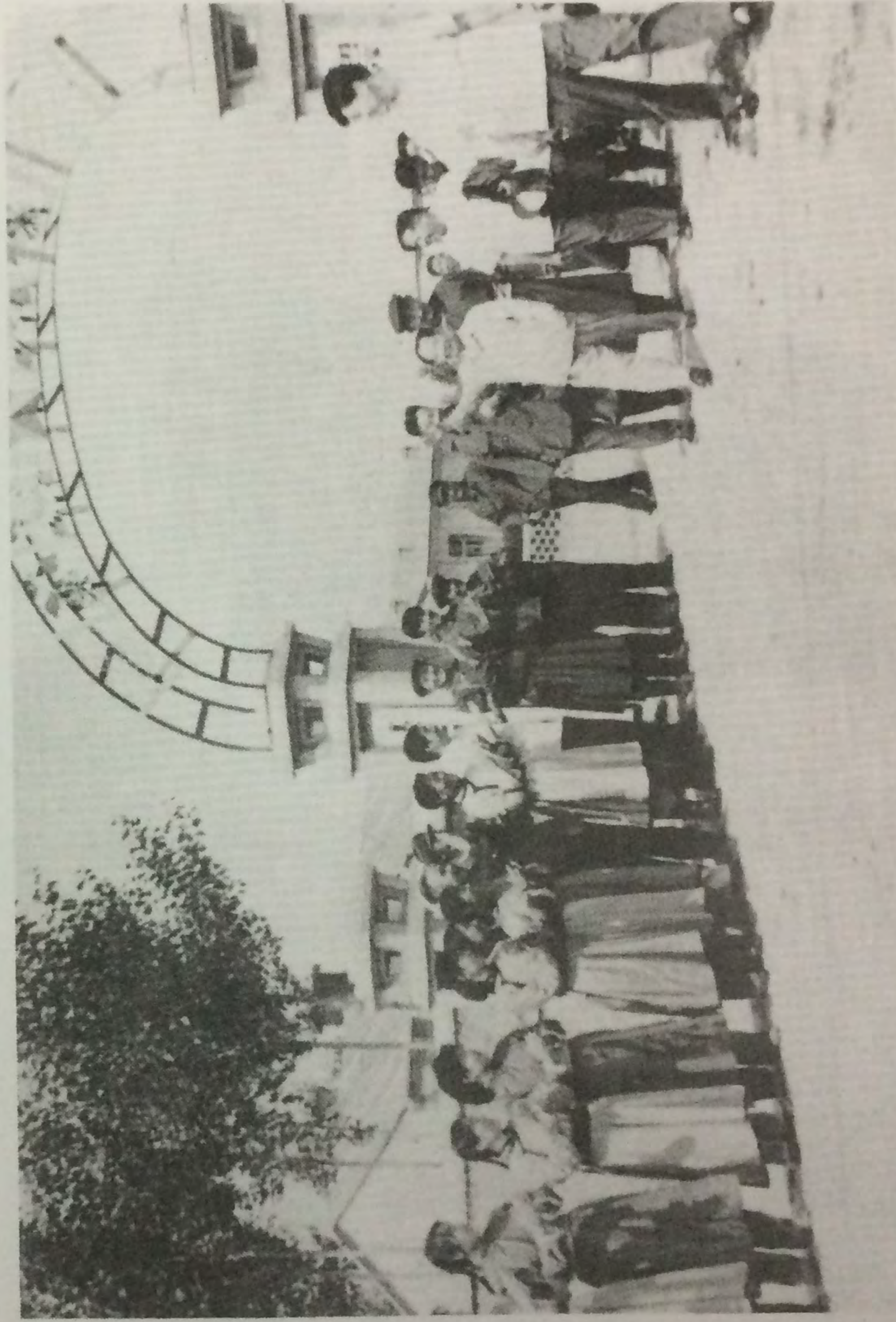


旗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巴林右旗文史资料》、《在外乡友录》、《巴林右旗人物》和赤峰市北部五个旗县协作项目《和子章与蒙骑四师》等书籍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总理朱德副总理邓小平总书记接见一九六二年国庆节各民族参观团合影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接见
1962年国庆节各民族参观团时的合影，第三排右四为参观团成员巴林右旗蒙古族
妇女干部万里花。



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1982年视察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草原（右三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右四为巴彦塔拉公社党委书记其木德道尔吉，右六为昭乌达盟盟长才吉尔乎）



阿民博和师长



蒙骑四师警通连炮兵行军途中（右二驾炮车者为警通连连长赛音巴雅尔）



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访问国营巴彦锡勒牧场（右三为旗政协副主席胡日查，左一为旗政协文史委主任穆松，右一为旗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刘军、右二为巴彦锡勒牧场调研员布仁、右四为巴彦锡勒牧场党办负责人刘守敏，左三为阿民博和长子朝鲁、左二阿民博和三女苏德）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蒙骑四师出征

著名蒙古族
影视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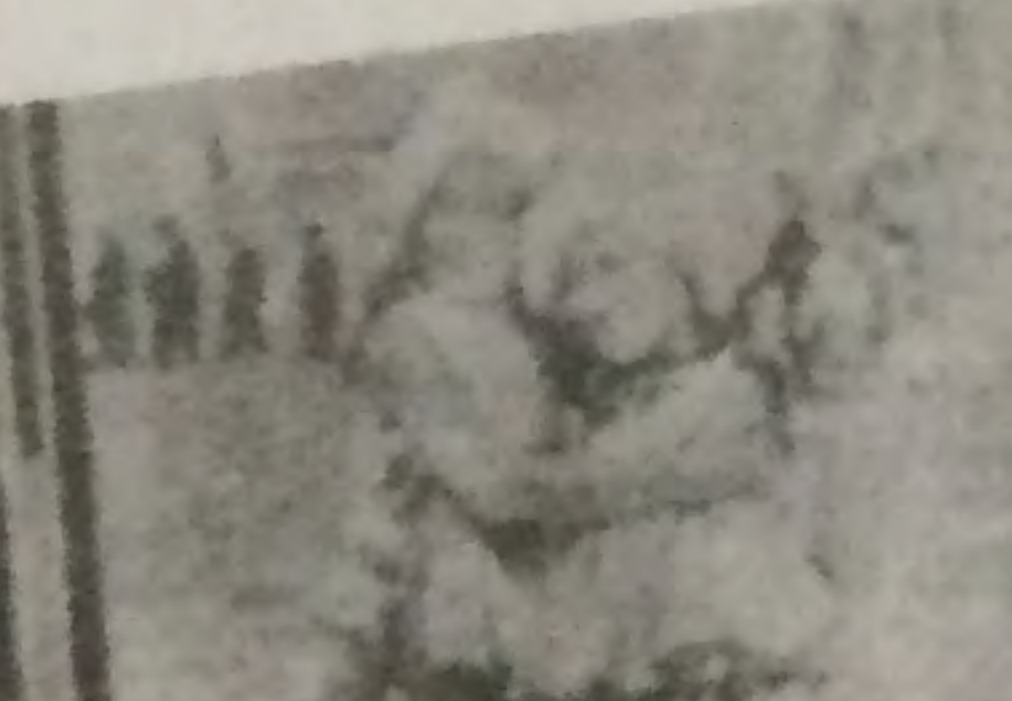
恩和森



著名蒙古族表演艺术家恩和森
与夫人新婚留影



恩和森于「文革」后首次踏上生
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巴林右旗敖日
盖，与表弟穆松、表妹高娃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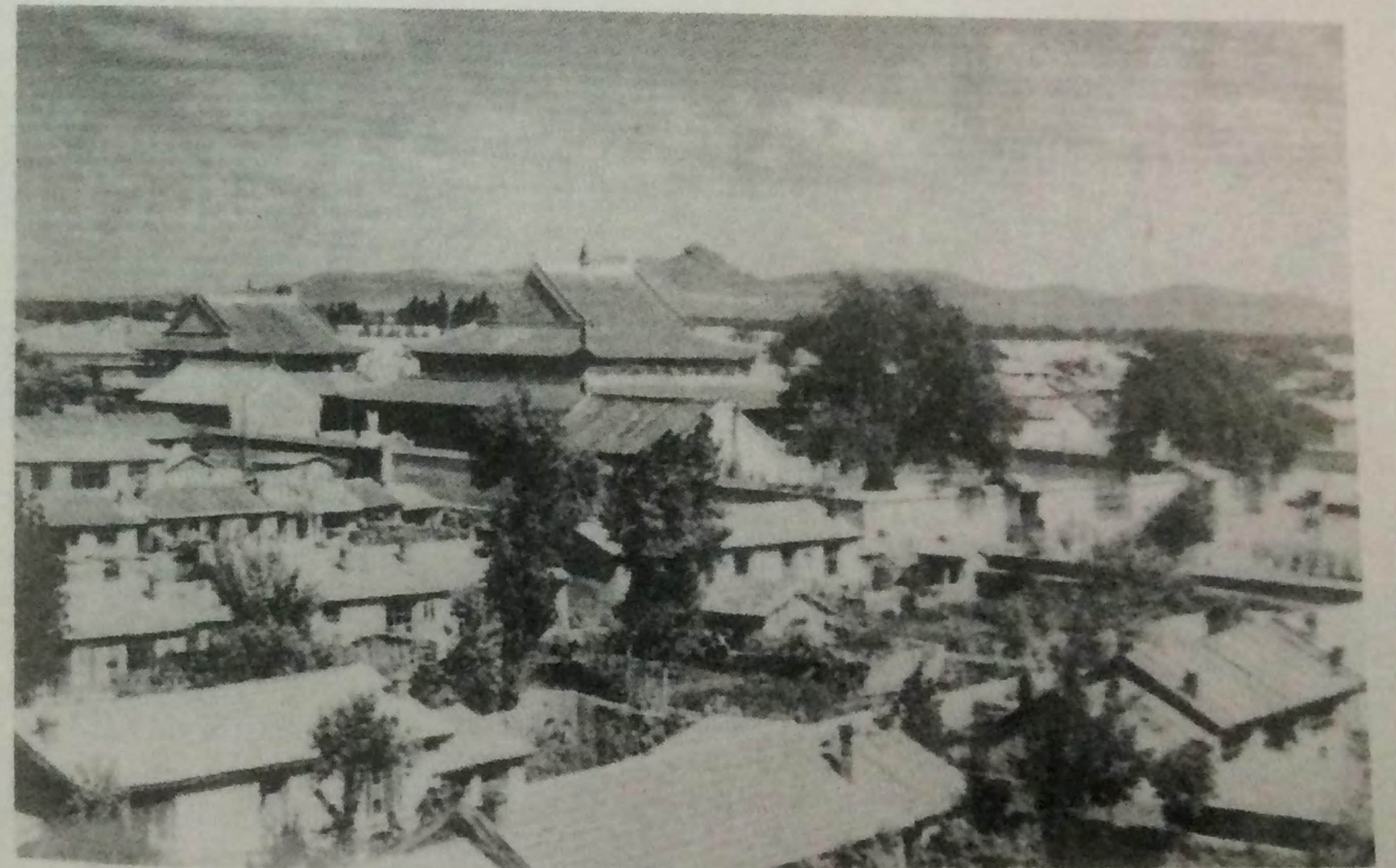
恩和森所塑造的艺术形象



恩和森与巴林右旗乌兰牧骑演员在一起



著名蒙古族作家、诗人其木德道尔吉



巴林右旗荟福寺 (摄于1984年)



巴林右翼旗末代札萨克府邸大板王府一角



巴林左翼旗札萨克府邸敖日盖王府一角

说明

说 明

自 1985 年政协巴林右旗第二届委员会出版发行《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一辑以来,经过旗政协各届领导的一贯坚持和几代文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到目前已经编辑出版了蒙汉两种版本的《巴林右旗文史资料》共 16 辑(蒙文版和汉文版各 8 辑),为地方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旗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赞誉,得到了旗党政领导的肯定、关怀和支持。

今年 9 月,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蒙古文联《花的原野》杂志社联合主办《首届中国·巴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因此,根据会议需要和广大读者的殷切期望,旗政协决定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巴林右旗文史资料》进行集中印制。《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二次校印过程中,我们在坚持“保留第一版原貌特征”原则的基础上,对一些错别字和不通顺的语句以及内容上的明显错误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但是,由于编者能力有限、

时间紧迫等原因,虽付出努力,仍不免会有瑕疵,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同时,在印制过程中由于受一些客观因素限制,对史料第四辑中的人物照片未能刊出。

在此,向始终关心支持巴林右旗文史工作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和对文史工作倾注心血与汗水的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9年9月

存史、资政、团结、育人

(代序)

穆 松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效形式之一。政协文史资料反映历史事件、人物,往往能够收到征集一篇史料,发表一篇文章,出版一本书,团结教育一大片的效果。所以,征集文史资料,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它不但影响着今天,而且影响着未来,不仅影响国内,而且影响海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它对历史研究,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青少年教育工作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敬爱的周总理倡导的这一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在古老而文明的巴林右旗经历了20个春秋,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今,已征集和“抢救”了蒙汉两种文字的史料千余篇,达500多万字。编辑出版了15卷,近300万字,印发3万多册。“史料”涉及面很广泛。选辑了巴林右旗历史上各方面内容。这些史料不同程度上,在某一个侧面记载和反映了巴林右旗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史料”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达到了征集出版一篇史料,团结教育一大片民众

的效果。同时北京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等国内几十家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研究部门收藏了我旗的“史料”。1987年以来内蒙古日报、全国政协《通讯》等十几家报刊报道了巴林右旗文史资料工作。1992年全国政协文史考察组来巴林右旗专门听取了文史资料工作开展情况汇报。1996年汉文第二辑史料和蒙文第三辑史料参加了全国文史书籍展览。200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我旗政协文史资料蒙文第三辑——《巴林风俗》专辑和汉文史料第三辑——《巴林史话》专辑分别获得三等奖和优秀文史资料奖,2002年6月在全市文史工作会议上,我旗文史委员会被评为全市文史工作第一名,文史委主任被评为优秀文史工作者,“史料”获优秀文史书刊奖。

从征集出版史料的角度来看,巴林右旗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历程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其一,自1985年开始,第二届政协征集出版了第一辑《巴林右旗文史资料》,这是在巴林右旗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具有统一战线特点的地方史料。

其二,自1987年第二届政协开始,在19个苏木乡镇进行了文史普查,走访了很多年近古稀的当事人,记录了他们亲见、亲历,使许多即将湮没的巴林史料得以保存;这对征集和“抢救”地方民族史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三,自1991年四届政协开始,文史资料工作向专题化、系统化迈进。1994年四届政协征集出版了蒙文第三辑史料《巴林风俗》专辑,在巴林右旗政协史上第一次有了自

己的专题史料。

其四,1997年,五届政协编辑出版了第三辑汉文史料《巴林史话》,记述了蒙古巴林部的渊源迁徙和世袭过程,以及解放以来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巴林草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的光辉成就和不可磨灭的业绩。这是巴林右旗政协文史资料出版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巴林蒙古族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生产生活的重要史料。

其五,1999年六届政协组成以来,编写了《巴林右旗在外乡友录》、《政协沿革》和《赤峰人物·巴林右旗卷》,是政协开展文史工作以来第一次把文史资料征集出版的重点向解放后延伸和文史为巴林右旗经济建设服务、为对外开放服务,真正纳入旗政协工作议事日程。它标志着巴林右旗的文史资料工作揭开了新的一页。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工作,通过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成就足以看出《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的出版发行,在国内外提高了巴林右旗的知名度,对党史、国史、地方志的研究起到补充空白、丰富、匡正作用,为今后的文史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文史资料工作,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有效形式之一。《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的出版发行,无疑给巴林右旗各族人民的团结、进步、教育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文史资料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的出版发行,给巴林草原的灿烂文苑增添了馨香的花杂,芳香遍地,益于今人,惠及后世。

通过巴林右旗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现状,我们得出这

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继续推进文史资料工作,是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是通过以史鉴今履行政协职能的需要,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需要,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

这辑文史资料根据撰稿人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篇幅,尊重历史,秉笔直书,不溢美、不贬损的原则和在定稿过程中,贯彻广征博采,兼蓄并存的原则编辑出版了这辑史料。史料中有人物春秋、革命回忆录、文物古迹、民族宗教、风土人情和访问记、记事篇、事件录等七个栏目,共选用了24篇史料,这些史料仍以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为主,但也有的采用调查,研究搜求整理、参校比勘的第二、三手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是对读者提供一个颇为完整的认识,也对巴林右旗的历史、人物事件和风土人情的研究,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服务以及教育后人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各界人士大力支持,本会主席副主席亲自审稿、旗委政府热情关怀,所有这些都为这辑“史料”的出版起到了决定性因素,对此,我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由于人力、时间和资料的局限,特别是编者的学识薄浅,在书中难免有纰漏,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愿《巴林右旗文史资料》将各族各界人们的友谊连在一起,愿《巴林右旗文史资料》像草原鲜花姹紫嫣红。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于大板

目 录

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代序)	穆 松(1)
人物春秋	
阿民博和的戎马生涯	穆 松(1)
中国少数民族影视第一人、著名蒙古族 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恩和森	穆 松(66)
著名蒙古族作家、诗人其木德道尔吉	穆 松(69)
回忆录	
我的一段经历	胡 克(72)
忆革命烈士蒙和舞乐极	于景泉(76)
在中共巴林右旗委组织部工作期间的回忆	都 林(105)
巴林右旗人民武装部纪略	布 和(112)
有关防治鼠疫工作的回忆	叶 喜(124)
我所知道的巴林右旗发生鼠疫情况	丛沈阳(131)
访问记	
总书记和草原牧民促膝话改革 ——访其木德道尔吉同志	王兴贵(138)

幸福的时刻 美好的回忆

——万里花访问记…………… 王兴贵 青巴图(141)

记事篇

党对草原重镇大板接管改造与新生政权建设 ……………
…………… 王兴贵(144)

韩桑杰其人其事 ……………
… 撰文:纳·宝音贺希格 译文:胡·斯钦毕力格(167)

乌日他其人其事 ……………
…………… 撰文:纳·宝音贺希格 译文:特古思(191)

文物古迹

巴林右旗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简述 ……………
…………… 朝格巴图(217)

简述巴林右旗境内辽代城址…………… 道日吉桑布(234)

清代名刹荟福寺 …………… 编译:布和那苏图(242)

巴林右旗博物馆馆藏瑰宝…………… 刘志安(247)

清巴林康熙行宫简介及建筑示意图 ……………
…………… 绘图:道尔吉桑布 简介:雷惠田(250)

清巴林右翼旗札萨克府邸

——沙巴尔台王府简介及建筑示意图 ……………
…………… 绘图:道尔吉桑布 简介:恩和巴图(253)

民俗风情

草原盛会那达慕…………… 穆 松(256)

佛教对巴林民俗民情的影响 ……………
…………… 撰文:穆松 译文:胡·斯钦毕力格(259)

蒙古民族服饰的形成和演变…………… 穆 松(269)

宗教篇

简述释教在昭乌达草原的传播与影响 ……………
…………… 王兴贵(275)

阿民博和的戎马生涯

穆松

(一)

阿民博和 1904 年出生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翼旗末代管旗章京(清代在蒙旗掌管旗务的最高行政长官)和烈惕氏(蒙古克烈亦惕部)笃固尔扎布的敖日盖家中。由于和烈惕部人以“和”为汉姓,故汉名为和惠章。

阿民博和兄弟姐妹九人中他排行为四,长兄阿尤尔(梅林)、次兄和什格陶格陶(梅林)、三兄清卓力克图(组建蒙骑四师的和子章)、五弟乌日图那斯图(牧民)、六弟清巴图(以身殉职的革命军人),三个妹妹分别是伊勒玛、巴达玛、查干(幼名敖特根)。

和氏家族并非贵族,清朝末年属巴林台吉孛尔只斤氏哈日陶高诺颜的哈里雅特(属民)。阿民博和的祖父伯和吉雅在咸丰年间随巴林左翼旗扎萨克毕齐那逊王爷,在敖日盖王府北的沙日特布曾山狩猎时,丛林中突然窜出一只猛虎向正在山上狩猎的王爷扑来,在这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英勇善战的伯和吉雅弯弓射死了猛虎,把王爷解救了,对此毕齐那逊王爷十分感激并很赞赏这位年方 20 岁的年轻人,

回府后赏赐伯和吉雅一副白顶珠世袭罔替,并委任为王府侍卫。这副顶珠荫及阿民博和的父亲笃固尔扎布,所以笃固尔扎布在那个年代被破格提升为王爷府笔且赤(文书)。笃固尔扎布曾就学于由东土默特旗请来的私塾先生,学会蒙文、满文。他当上王府笔且赤之后,更加勤勉,所以连续提升为扎兰、梅林,至旗内平民中能担任的最高官位管旗章京,但是按照清朝的规矩笃固尔扎布的腾达并没有使他和他家族的属民地位得到根本改变。阿民博和十岁时其父亲笃固尔扎布已经官升梅林,但兄弟四人还按惯例轮番给哈日陶高诺彦家干拾牛粪、扫院子等活计,尽属民的义务,特别是每当腊月二十三日到了蒙古民族传统的祭火节时,必须到主人家帮助烧锅撑子,共同祭主人的火神,然后再回家祭自己家的火神。

阿民博和四岁那年,父亲笃固尔扎布把他过继给无子女的二弟达瓦嘎尔布。七岁那年同长兄阿尤尔、二兄和什格陶格陶、三兄清卓力克图一起到父亲笃固尔扎布创办的家庭学校读蒙、满文。十二岁开始跟随三兄清卓力克图(和子章)去翁牛特旗宝日浩特(乌丹)入私塾学堂读汉文一年半。正在继续攻读时,他的叔父达瓦嘎尔布突然得了眼疾双目失明,无奈只好退学回家照顾叔父,操持家务。阿民博和从小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牧民家庭的艰苦环境中磨练成了一个懂事、能干、不怕苦、很会过日子的孩子,特别是他从叔父达瓦嘎尔布身上看到了一个普通牧民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和豪放诚实的本色、机智勇敢的形象,这一切在幼年的阿民博和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阿民博和听从父亲笃固尔扎布和叔父达瓦嘎尔布的教诲从事放牧,家里经营牲畜,不论做什么家务劳动都有条不紊而且还经常跟邻近的小孩、庙里的小喇嘛一起游玩,广交朋友,一视同仁,从不以贫穷和富贵来分三六九等,更不欺负弱小和穷人的孩子,所以在同龄人中威望最高,孩子们都喜欢找他玩耍,对此他的三亲六顾、四邻八家无不称赞。

阿民博和自幼聪明伶俐,性情活泼,机智勇敢。有一年秋天,他与贝子庙的小喇嘛义德尔扎那一起到离家较远的牧场上游玩时,伏在道旁的一群狗截住了他俩的去路,小喇嘛吓得直哭,此时年仅十三岁的阿民博和急中生智,不慌不忙地鼓励小喇嘛:小弟不要怕,在困难面前哭鼻子不是男子汉,做为英雄好汉岂有怕几条恶狗的道理?能想法把狗群引开才是上策。于是他在路旁拣来马粪用赫特(蒙古传统的打火工具)打着火点燃了马粪,又拣来牛腿骨加到火里,牛腿骨在火里烧出的油味吸引了群狗,这样他俩巧妙的引开了面临的敌人——一群恶狗,安全地回家了。

阿民博和虽退学在家,照顾双目失明的叔父和操持家务十分繁忙,但他从未扔掉所学的课程,经常在繁重的家务中间和茶余饭后挤出时间继续自学,晚间在油灯下看书练字,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找他的二哥和什格陶格陶请教,由于勤奋和用功,他很快就能读懂蒙文历史小说,此后他经常给双目失明的叔父达瓦嘎尔布和婶子以及邻居的老人们讲述书里的故事,给病中老人解闷。1922年叔父达瓦嘎尔布因长期患病与世长辞。从此这一家的生产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年仅18岁的阿民博和身上。这时他的父亲笃固尔

扎布把阿民博和叫到身边：你今年已到了成人的年龄，18岁了，人生的路就在脚下，只能自己闯，只有靠自己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去面对生活，才是真正的男子汉，靠别人都不是长远之计，靠父母兄长生活的人不算什么好汉，所以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父亲语重心长的嘱咐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此为启迪，把蒙古族牧民家庭的扶犁种漫撒籽地、在敖特尔拾牛粪、放牧、上山打柴伐木、从额吉诺尔（锡盟东乌旗盐池子）运盐等里外活计干得十分麻利，因此受到了父母、兄弟和亲朋好友以及邻居们的羡慕和赞扬。青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使阿民博和了解了社会，磨练了意志，为后来的人生道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

阿民博和 24 岁那年，经过当时在巴林左翼旗札萨克衙门担负重任的三兄和子章的介绍到旗札萨克衙门当了笔且赤（文书），后被提升为印务扎兰。1932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到了 1933 年侵占了整个巴林地区时，当时被提升为印务扎兰不久的阿民博和同衙门的其它官吏一样受到了日本人的驱使，继而日本人在林西成立警备军，当时从巴林左翼旗召去了一百多个兵丁，把这些人编成了一个连，因为阿民博和是读书人，也曾在札萨克衙门任过职，在同龄人中威望很高，所以日本人就让他当上了上尉连长，后调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伪满警备军教导队任少校教官。阿民博和在林西、乌兰浩特伪满警备军中任职时亲眼目睹了日伪欺压百姓，胡作非为，使广大人民暗无天日的情景。对这

一切，年轻的阿民博和极为不满，继而产生了对日伪的愤恨，在其兄和子章的影响下他暗下了决心，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合法身份和权力与日本官吏作斗争，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保护被欺压和凌辱的蒙汉兄弟。一次阿民博和管辖的连队中一个姓吴的蒙古族士兵遇到日本人没有立正敬礼，遭到了这个日本人的侮辱和野蛮的毒打。阿民博和闻讯带着几名警卫兵火速赶到现场，面对凶恶的日本人严厉地提出抗议，他说：从古至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有军纪，这位士兵没有向你立正敬礼是不对的，但是按照现行军队的规定，军人违法违纪应由军队自己来处理，该抓该杀那是军中之事，任何外人不得干涉更不能私设公堂欺辱军人，先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今天你私自大打出手打我的士兵成何体统？我认为这不仅是对这个士兵个人的欺辱，而是对我这个长官甚至是对我连全体官兵的侵犯和侮辱。他命令警卫兵把姓吴的那个战士带回营。日本人见这个情景十分尴尬，只得瞠目结舌，匆匆离去。阿民博和回到连队后不但没有怪罪这位姓吴的士兵，而且语重心长地说：“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的大好河山，他们的铁蹄糟蹋了广阔的草原，他们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蒙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情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但是我们现在针锋相对会吃大亏的，对这些恶棍不可力斗，要智斗，我们的民族只要团结起来，依靠共同的力量才能对付侵略者对我们的欺辱。”这位士兵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一事件教育和暗示了全体士兵，促进了内部的团结。

(三)

阿民博和是日本警备军中少有的几位蒙古族军官之一。他虽是一个带兵的有权有势的年轻军官,军纪十分严格,但他从不上奉下压,更不在上司面前卑躬屈膝,不在下级面前吹胡子瞪眼,从不打骂和体罚自己的士兵,也不允许别人这样做。他手下的官兵若患病,他会亲自找蒙医看病,后来他在军中安排了一个叫关布的蒙医大夫,从不找日本人给士兵瞧病,对此日本人很不满,甚至引起了日本人的疑心。但阿民博和坚持蒙医是我蒙古族的祖传疗法,蒙古人都喜欢蒙医治病,这是蒙古族的信仰所在,这样,前来诊病的日本医生无奈只好忍气吞声地告退。

1934年阿民博和进入乌兰浩特伪满军官学校学习,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很多蒙古族进步人士,深受他们的影响,初步意识到,广大蒙古族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压,振兴蒙古民族,这是我们成吉思汗子孙后代的神圣责任。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蒙古国和伪满边界敖门汗挑起了争端,向蒙古国发动侵略战争时准备把当时在兴安骑兵任少校团副的阿民博和派往战争的前线替日本人作战,阿民博和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把兴安骑兵派往前线与蒙古国作战,那是蒙古人消灭蒙古人的毒计,我们不能参与这场侵略战争。但他一时找不到万全之策,十分焦急。眼看战事迫在眉睫,军队就要出发了,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阿民博和急中生智,他用手枪打了自己的脚。听到军营中突然响起的枪声,惊慌的日本军官和部分警卫赶到现

场时,阿民博和装作擦枪时走火的样子,这样巧妙地摆脱了这次非正义的侵略战斗。后在1941年,不知是由于这次事件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日本人取消了阿民博和带兵指挥军队的权力,从部队调到开鲁国民高等学校任少校军事教官。1942年因开鲁国高的学生“砸伪满警察署”事件的牵连,再次调回王爷庙教导团。关于这段历史真相,根据知情人原巴林左旗政协副主席徐少春、巴林右旗政协委员阿其图等回忆,阿民博和于1941-1942年间任兴安西省省立开鲁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少校衔军事教官,伪满时期日伪统治者为了推行奴化教育,从中学开始就增设了军事训练课,使学生仿效军人的作风和制度,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教师的领导,下年级的学生必须服从上年级学生,等级观念相当严格。阿民博和教官坚毅、严肃,军人作风十足,但他在坚毅和严肃中含有慈祥感。他从不责打和训斥学生,从不和那些日本老师鬼混。学生们看得出,他的内心是存在着对日伪统治者不满情绪的,有时在学生面前有所流露。阿民博和经常带领学生在野外进行训练,在训话中经常开导学生们如何为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何为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而做出努力,如何为把我们的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他的这些宣传教育,学生们都很愿意听,国高的几百名学生很喜欢他的训话,对阿民博和教官没有一个不服从和不尊敬的。当时在开鲁国高的学生们亲眼目睹日伪警察横行霸道,打骂老百姓。学生们对此甚为不满。开鲁国高的教室在东门外,宿舍在东门外,学生们每天要经过几次东门。当时东门有警察站岗,

盘查过路群众,并有时无故打骂群众,还规定学生经东门时必须排队,但有时学生在单独经过的时候,伪警察无故盘查,经常打骂敲诈,甚至羞辱学生,学生们对这些无理举动非常不满,所以经常发生冲突,但学生不敢公开反抗。知情的阿民博和教官曾在一次的野外训话中表示:学生们不要怕这些为虎作伥的警察、日本人的狗腿子,你们内部要团结好,然后集中力量找机会狠狠地揍这些狗东西,如果你们的力量不够,可以发动驻军士兵来支援你们,那里有我的同事和老部下。因为得到了阿民博和教官的暗中支持,在开鲁发生了大快人心的“学生砸警察署”的事件。当时学生把警察署的门窗全砸坏了,然后愤怒的学生们狠狠打了平时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那些伪警察和警察署长。事件发生后群众很激奋,邻近的蒙汉族农牧民杀猪宰羊慰问替人民群众出恶气的学生们,表示支持学生们的这一正义的斗争。此后果然减少了警察打骂无辜百姓的事情,也确实打击了警察狗子的嚣张气焰。但事后阿民博和被日本人猜疑“反满抗日”,又把他调离了学校。

(四)

在开鲁国民高等学校“学生砸警察署”的事件发生后,阿民博和再次调回王爷庙兴安军教导团任少校团副。在这里他结交了很多进步人士,解放后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等都在其中。这时候的阿民博和已经意识到,在这个社会动荡、时局不稳的年代里,如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如何把挣扎在水深火

热中的广大人民群众拯救出来,这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日本侵略者残酷的暴行越来越痛恨,他盼望有朝一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于是他观察时局的日益变化,寻找机会。在思想意识上渴望民族解放的阿民博和利用日伪军官的合法身份,同几位好友经常到王爷庙北山打猎消遣,等待时机的到来。1943年的夏季一天,阿民博和独自一人在离城郊较远的森林茂密的北山狩猎时,遇见了两个陌生的蒙古人,在交谈中得知他们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渴望民族解放,向往苏联十月革命和蒙古人民革命的阿民博和从陌生人口中得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要爆发,伪满洲国将很快垮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听到革命宣传的阿民博和很是兴奋,他对那两位陌生人表露出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做些有益事情的想法。经过两个陌生人的介绍,阿民博和很快跟苏联红军情报机构取得了联系,从此阿民博和出于祖国的解放、民族的平等、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目的,给苏联红军提供了很多日伪的重要情报,直到苏联红军1945年8月出兵我国东北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为止。

1945年5月,阿民博和根据苏联红军远东情报机构的指示,为了搜集日伪军的工事情报,利用自己的日伪兴安军少校团副的合法身份以及依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位同事,一起谋划潜入日军秘密档案室找到了日军当时的工事、武器装备、攻防部署情况的重要资料后,巧妙地把档案室放火烧掉,在指定的地点顺利送走了这一重要情报。这对

1945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特别是苏联红军攻破兴安一带的日军工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情发生后,日本人感到阿民博和有重大嫌疑,但一时找不到蛛丝马迹,无奈把阿民博和调离王爷庙,送往沈阳关东军训练营控制起来,并对他进行秘密监视。

(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苏联红军和中国各界抗日力量的排山倒海之势下无条件地向中国人民投降之后,灾难深重的东蒙古人民获得了解放,获得了自由。此时被控制在沈阳关东军训练营的阿民博和同日伪军和旧官吏一道被攻战沈阳的苏联红军俘虏后送到沈阳北陵苏联红军俘虏营集中学习。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经多方寻找才从沈阳俘虏营找到了当年在艰苦的条件下为苏联红军搜集日伪情报的、苏联红军对我国东北出兵打败日本侵略军做出过贡献的阿民博和。苏联红军将在俘虏营里内蒙古籍的200多人编成一个大队,委任阿民博和为队长,集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道理。在学习中,这些蒙古族青年们首次结识中国共产党人。到这个学习队伍中前来讲课的除少数苏联蒙古红军官员外,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政工人员,也有中共高层领导人,他们讲述世界革命形势和当前我们的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等。这对早已立志革命、渴望民族平等、向往苏联十月革命和蒙古人民革命的阿民博和来说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提高的好机会。通过这次革命理论的学习和

与中共人士的频繁接触,阿民博和更加懂得了革命的伟大意义所在。这一切对他拥护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平等和祖国的繁荣昌盛,立志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打下了坚实思想基础。

(六)

1945年11月阿民博和在沈阳集中学习时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当时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日、德法西斯彻底失败,人民民主权利在全世界范围蓬勃发展,革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但是中国国内无产阶级革命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两个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国民党政府宣布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一个国民党领导的兴安省,妄图统治东蒙古各族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东北地区的军政各界和苏蒙红军及时掌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动态是极为重要的。为此,驻守在沈阳的苏联红军司令部的亚里山大·伊克那塔吉布中校当时选择了思想进步的阿民博和等几名有文化的进步青年,组成了秘密情报组织“阿米道尔拉”。该组织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力未到东蒙地区之前,如果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东蒙古地区,该组织的情报人员立即打入国民党军政内部,发展组织,占据职位,控制局势,并根据远东情报机构的要求搜集国民党军队的各种情报,如军事部署、武器装备、行军动态等。然后派专人在指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秘密传送。一心向往革命事业、向往民族解放的阿民博和当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新的任务,而且在“阿米道尔拉”组织担任了

主要领导职务。

1954年昭乌达盟公安处在调查确吉敖斯尔、额尔恒巴图等人参加该组织的情况时,当时在白音锡勒国营牧场当场长的阿民博和对于该组织的政治纲领、具体任务和组织机构、参加人员等情况做了如下的证明:“……1945年8月我在沈阳伪满陆军中央训练营以校官学员身份学习(其实被监视)时,我国东北已解放,当时我和同学们被苏联红军俘虏,内蒙古各地区被苏联红军俘虏人员二百余人集中在沈阳北陵俘虏营学习,到1946年1月15日被释放回原籍。确吉敖斯尔、额尔恒巴图等在其中,在这期间苏联红军和八路军的政工人员经常对我们宣传教育。有一天驻守沈阳的红军司令部的亚里山大·伊克那塔吉布中校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参加秘密的地下情报组织,搜集国民党军队即将侵入内蒙古地区活动的一切军事情报,然后传送给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东南边境附近塔木斯克宝力格(地名)苏联红军指挥部亚里山大·伊克那塔吉布中校本人。其组织形式是:从海拉尔至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经棚建立若干的队,每一个队都安排一名队长,1946年2月开始逐步组织和安排队长。领导关系是垂直的,只能直线(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所以各队队长之间互不了解情况,也不认识,更不知道有多少队在什么地方活动,这个组织的总负责人是我。这个组织的秘书是现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我国大使馆秘书长戈更夫。宣传员是现任内蒙古畜牧兽医院副院长的苏戈,情报员是原蒙骑四师政治部主任已牺牲的蒙和舞乐极,乌兰浩特队的队长是现任内蒙古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的嘎日

布僧格,突泉县队的队长是曾在昭乌达盟公安处任处长的宝珠热,鲁北队的队长是现任哈尔滨兽医学院教务处主任的萨音巴雅尔,大板队的队长是确吉敖斯尔。该组织的总部设在林东。了解总部情况的人只有我和戈更夫、萨音巴雅尔、嘎尔布僧格和内蒙古公安厅的徐子干(他虽然不是该组织成员,但前些年他曾调查过),另外乌兰浩特、海拉尔、突泉等三个队的具体领导人是张尼玛,他在内蒙古政府成立时任自治区公安部负责人,在1947年弃职逃亡无踪影,据说他与内蒙古地区反动组织的头目国民党反动派有联系。张尼玛参加该组织是由现任内蒙古政府副主席哈丰阿同志亲自当面介绍给我的,因此我安排他承担那一方面的工作,由于本部人员和各队的队长由我和秘书戈更夫直接发展,各队的情报人员由队长直接发展,参加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的历史档案、宣誓材料均上报本部,然后由我转送苏联红军备案。这个组织的总名称是‘内蒙古秘密军事阿米道尔拉组织’,目的是如果国民党占领东蒙古地区,‘阿米道尔拉’组织收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并尽快发展人员扩大力量帮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对国民党进行游击战争,组织原则是严格保守秘密和垂直(单线)联系,只有负责人直接交代任务并在各自的范围内联系,不允许聚会和搞其他集体活动。我于1945年末接受这个任务到1947年2月底就根据红军指示停止了活动解散了组织,由于这时候整个东蒙古地区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再没有必要搞国民党的情报。该组织的活动经费、枪支弹药、马匹、鞍具等物品经昭乌达盟盟委书记权星垣同志批准移交蒙汉联

军第四师政治部,当时经手人是蒙骑四师的政委乌力吉那仁、政治部主任刘昌。1949年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农牧部党支部书记其那哈图同志把‘阿米道尔拉’组织的人员名单、机构编制、通信暗号、具体任务和原始材料等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做了交待。想必这些材料可能在内蒙古公安部存档,可见该组织的内情。”阿民博和就这样对“阿米道尔拉”秘密情报组织做了详细的说明。

(七)

1946年1月阿民博和从沈阳集中营出来后组织了确吉敖斯尔、额尔恒巴图等部分进步青年直奔当时的东蒙古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乌兰浩特。当时乌兰浩特有伪满兴安省军政人员,有旧官吏,有蒙古族上层人士,有开明的知识分子等,他们聚集在一起寻找革命、寻找民族解放的出路。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东蒙地区擅自成立了兴安省,妄图统治东蒙古各族人民。蒙古地区的各界人士对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这一行为十分不满,所以尽快成立东蒙古人民政府,实现民族的平等自由,把民主革命推向深入,这在当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人心所向。

在这关键时刻,东蒙古开明进步上层人士宝音满都胡和进步知识分子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在乌兰浩特重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各级组织。该党的宗旨是:清除一切封建余毒,发展经济,保证劳动人民的自由平等和美好的幸福生活。蒙古地区的人民无论什么民族都要实现平等的权力,配合中国革命的政策彻底完成蒙汉

及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国家和民族政权未建立前,要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在内蒙古地区建立各级临时自治委员会,维持地方治安。在工业、交通、内务、外事、财政、文教卫生、经济建设等方面要模仿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验。继续协助好为东蒙古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作战的苏联红军,彻底清除日本帝国主义的残余,积极参加人民的解放事业。

1945年7月刘少奇同志所批转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处关于“内蒙古工作意见书”中明确阐述了在内蒙古地区实行自治,建立自治人民政府的意图。追求光明的东蒙古人民在这个思想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东北局西满分局的支持和领导下,根据东蒙古各族劳苦大众的共同愿望,由宝音满都胡、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斯根等人积极筹备,1946年1月16日至21日在乌兰浩特召开了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法》、《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组织法》、《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行政法》、《东蒙古自治政府宣言》,1946年2月16日在乌兰浩特由宝音满都胡、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为首的东蒙古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东蒙古人民政府成立时受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乔巴山和驻守东蒙古苏联红军的支持,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来电表示祝贺。只有国内的国民党政府反对成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并且煽动一些反动帮派在东蒙古地区散布谣言蛊惑人心,说什么蒙古民族的解放必须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只有国民党才能高度自治蒙古地区,只有国民党的领导,蒙古地区才能独立自主,才能民族平等,才能过美好生

活。也有的煽动与内外蒙古合并,建立一个独立的蒙古国等。在谣言四起的情况下,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在这早就行不通的死胡同里徘徊。此时阿民博和一行赶到了乌兰浩特,他当即表示了坚决反对国民党对东蒙古地区统治的政治态度。

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夕,也就是1945年9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哈丰阿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委派当时从乌兰浩特葛根庙伪军政学校起义的进步青年恩和森、老布曾普日来、胡和德力格尔三人到昭乌达盟巴林左右二旗开展工作,他们持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秘书长哈丰阿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昭乌达盟政治委员、昭乌达盟地方武装总指挥和子章的亲笔信和任命和子章为巴林左旗旗长的委任书,并传达了要求和子章在昭乌达地区尽快组建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的东蒙人民政府的指示。和子章接受命令后,立即将原来以巴林左旗为中心的昭、卓两盟联防队和巴林左旗自治军与扎鲁特、奈曼、阿鲁科尔沁、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等地联合起来,很快就组建了六个骑兵团、三个司令部直属连,扩大军事力量,组建了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暗示下,企图拉拢东蒙地区的蒙古上层人物,在昭乌达、卓索图一带影响大、威望高、手握兵权的人物和子章自然成了他们拉拢目标,于是不择手段秘密派遣特务企图拉拢和子章和他的蒙骑四师。他们派遣特务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一时情况非常紧急。

立志革命的阿民博和得知这个情况后,找到内蒙古人

民革命党和东蒙政府主要领导人宝音满都胡、哈丰阿提出了自己回老家昭乌达盟,为正在组建蒙骑四师的兄长和子章助一臂之力的请求。他说:昭乌达是生我养我的土地,那里有我的亲人,有我的同学、朋友,日伪投降后伪官吏的思想不一致,局势也不稳定,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对民族上层的极力拉拢,对我哥和子章组建部队带来一定的阻力,给那里的革命事业造成困难,所以我回昭乌达盟为我哥和子章组建骑兵队伍助一臂之力,为那里的民族解放事业做贡献。当时东蒙古自治区政府已往昭乌达盟派了工作团,准备筹建昭乌达省。哈丰阿和东蒙古政府领导人根据阿民博和的请求,把确吉敖斯尔等补进了这个工作团里,并任命阿民博和为工作团副团长。这个以萨嘎拉扎布、阿民博和为正副团长的、以蒙和舞乐极、查龙阿、戈更夫、确吉敖斯尔等人为成员的工作团持有东蒙自治政府领导人哈丰阿的信件和东蒙人民政府任命萨嘎拉扎布为昭乌达省主席、和子章为东蒙人民自卫军第四师师长的命令,来到昭乌达盟所在地林东找到了和子章。于是3月17日在林东正式成立东蒙古自治政府所属的昭乌达省和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阿民博和被任命为四师教导队队长。由此,和子章发布命令:原来的昭乌达自卫军所属各团接受东蒙古人民自治军的支配,并以旗为单位,编为六个团,即:巴林左旗为32、33团,巴林右旗为34团,阿鲁科尔沁旗为35团,克什克腾为36团,扎鲁特和奈曼两个旗的兵力为37团,并在师司令部设教导队和参谋、副官、军械、军需、卫生、生产六处,设警卫、通信、机炮三个师直属连。1946年4月1日在林东隆重召开了东

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成立大会。昭乌达省主席萨嘎拉扎布、骑兵四师师长和子章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从此昭乌达盟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骑兵第四师初建时总兵力 3386 人,有速射炮 1 门、迫击炮 2 门、重机枪 3 挺、轻机枪 10 挺,掷弹筒 6 具,各种类型的步枪 1106 支,冲锋枪 17 支,手枪 121 支,马 1878 匹,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成了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支革命的人民民族武装,也是连接东北与华北、西北重要战略要地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骑兵四师初创时期,各级军官中曾混迹于伪政权的人士和上层喇嘛、牧主甚至一些反动人物混进是难免的,有些官兵在政治思想上地方狭隘民族主义和占地为王的思想很严重,情况也比较复杂。召来的大部分新兵从没有接受过军事方面的训练。这一切对担任教导队长的阿民博和来说,如何把这支队伍建设成一个名符其实的革命队伍,如何抓好官兵的思想教育便成为头等大事。阿民博和意识到,把这支民族武装建设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首先应从抓好官兵的思想教育和全体指战员的军事训练入手。于是阿民博和分期组织了排连以上干部培训,讲述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人民平等自由的重大意义,学习政治、军事,号召全体官兵要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不怕牺牲,英勇参加革命战争。

(八)

1946 年 4 月 3 日中国共产党冀热辽中央分局在承德召开了内蒙古西部地区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

参加的统一东西蒙古的“四三”会议。会议决定了内蒙古自治区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次会议决定的问题是:内蒙古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各级组织,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同时未建立内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以前,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以发动蒙汉人民,搞好民族团结,废除一切封建制度,建立反击国民党蒋介石的后方根据地,同时宣布内蒙古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分别按地域归属于八路军各军区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国共产党冀热辽分局派党代表吴广文、徐子干等同志到昭乌达盟开展工作,他们在 1946 年 4 月上旬,同参加“四三”会议的东蒙古代表哈丰阿同志一起到达了昭乌达盟驻地林东。

1946 年 4 月中旬冀热辽中央分局根据“四三”会议的精神,往热北专署和昭乌达地区派代表,于是在林西的热北专署王逸伦和林东的东蒙古自治军的和子章两股革命力量进行谈判,获得了成功,达成了共同合作的协议。和子章同意把林西的热北专署党政军三方面领导机构迁往林东。从此,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和昭乌达省政府完全接受了中共热北专署的领导,于是把原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改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四师。

1946 年 5 月 1 日,在林东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

分会主任:乌力吉那仁

分会副主任:那斯图

秘书科长:徐子干

组织科长:义达嘎苏荣

军事科长:阿民博和

(九)

1946年由于东蒙古地区刚解放,人民生活都很困难,特别是深受民国军阀刘桂棠、汤玉麟部的掳夺和日伪糟蹋,昭乌达盟的经济极为困难,新创建的自治军第四师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相当短缺。一天,为了第四师的思想建设、军事训练而废寝忘食的师教导队队长阿民博和找到进驻林东不久的热北地委八路军党组织的领导人权星垣、刘昌等同志,把过去与苏联红军联系的情况和第四师武器、弹药、物资短缺的实际做了详细汇报,并通过热北地委得到热河省委的同意后带着戈更夫、恩和森、道尔吉等去蒙古国找苏联红军司令部求援。1946年6月,阿民博和一行到达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塔木斯克宝力格找到了苏联红军司令部的亚里山大·伊克那塔吉布,将内蒙古的革命形势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东蒙地区的破坏活动等情况一一做了汇报,并提出对昭乌达地区和蒙骑四师的武器弹药、生产生活方面的物资援助的请求。苏联红军中校亚里山大·伊克那塔吉布表示:“关于军需物品短缺的问题苏军可以援助,但这个事情关系到我们两个党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要给上级作汇报后尚能确定”。阿民博和觉得亚里山大中校的上司批回来还需要一定时间,正在这个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军官赛音布和先生邀请阿民博和一行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庆那达慕盛会,阿民博和当即很高兴的接受了邀请,于1946年7

月初到达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阿民博和在很小的时候听说过宝格德乎热(今乌兰巴托)仅是庙宇殿堂林立的佛教圣地,而今日展现在眼前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军政、文化、工业、经济、交通、贸易为中心的人民喜气洋洋的美丽都市。在蒙古国国庆典礼上观看了各种体育比赛,射箭、摔跤、赛马,还参观了学校、工业、商业和贸易市场,还会见了胸前带着大红花的英模人物和蒙古国家的领导人,这里的人民自由、平等、幸福、团结、和睦相处……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蒙古人民在英明领袖乔巴山的领导下站起来进行革命的结果。

阿民博和一行这次还见到了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陈云、吉雅泰等高级中共领导人。多年后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两位领导给我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民主革命的道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民主革命才是内蒙古人民的唯一出路,从而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这个道理。

蒙古国国庆那达慕闭会后,阿民博和一行又回到了塔木斯克宝力格,找亚里山大·伊克那塔吉布中校。他说“你们就要回国了,此次会晤是‘阿米道尔拉’组织的最后一次接触,你们保卫了地方的安全,在侦探国民党的动态协助共产党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你们的任务完成的很出色。对此我代表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政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了独立自主领导人民闹革命,现在已经胜利在望,所以你们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心全意地为伟大

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阿米道尔拉’组织已经胜利完成了一切历史使命,以后这方面的工作要听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后志同道合的两党两国在各自宪法的基础上互相帮助,我宣布‘阿米道日拉’组织解散。所以你们没有必要再来汇报情况了……”就这样宣布了‘阿米道尔拉’组织彻底解散停止活动的具体意见。

阿民博和一行动身回国时,苏联红军亚里山大中校代表红军赠送了一部分礼品,即:“三八”式长枪 10 支带着一万发子弹,手枪六支带着 1 千发子弹,全鞍战马 5 匹,革命理论方面的书籍 160 余本和一些布匹、大烟(当时用于士兵伤员),还有一些现款。这些物品代表着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对此阿民博和一行受到很大的精神鼓舞。

他们把这些物品和部分武器弹药驮在战马上,为了严防路途中遭到土匪的袭击,选择险路,跋山涉水,晓行露宿,披星戴月地赶路,七月末的一天从蒙古国塔木斯克宝力格安全到达了蒙骑四师所在地林东。

阿民博和一行回来后,昭乌达盟军政各界的变化很大。旗县都成立了自治运动联合会分会,部分共产党员或进步知识分子任分会主任,在部队从师部到连级单位都派了政工干部,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这一变化充分证明了苏联红军和蒙古国有关领导的讲解和我国驻蒙古中共领导人陈云、吉雅泰所讲述的情况已经“对号”了,这一切使阿民博和更加坚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阿民博和一行把蒙古的详细情况向中共代表权星垣、刘昌和四师师长和子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

主任乌力吉那仁等领导做了汇报,并把带来的礼品如数交给昭乌达盟分会和自治军第四师,受到了中共热河省热北专署和骑兵四师的表扬和奖励。

(十)

1946年5月18日,热北专署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机构迁驻林东,6月5日热河省政府对热北专署作了重要调整。把林东的昭乌达省改为昭乌达盟行政委员会,蒙汉分治,昭乌达行政委员会委员 18 人,蒙汉各半数,仍由热河省政府领导。昭乌达盟行政委员会盟长萨嘎拉扎布、副盟长由吴广文担任。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两党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全面进攻。10月国民党军队攻占了通辽、开鲁等地。10月8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热河省政府从赤峰迁到林东,10月10日国民党93军22师攻占了赤峰。在这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热河省委省军分区以及中共昭乌达盟委对自卫军第四师进行改造和整顿,把自卫军第四师和冀热辽20军分区合编成立了蒙汉联军司令部,协调两个部队的共同行动。把原来的内蒙古自卫军第四师改为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原来担任昭乌达盟自治运动联合会军事科长、四师教导队长的阿民博和被提升为蒙汉联军参谋长兼蒙骑四师参谋长。联军司令部及蒙骑四师的师级干部阵容为:

蒙汉联军司令部:

司令员:喻楚杰

副司令员：和子章

政治委员：权星垣

副政治委员：乌力吉那仁

参谋长：阿民博和

副参谋长：卜云龙

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

政治部副主任：刘昌

组织科长：徐子干

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改为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

师长：和子章

政委：乌力吉那仁

参谋长：阿民博和

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蒙和舞乐极牺牲后，1947年3月由刘昌继任）。

骑兵第四师辖6个骑兵团、三个师直属连（即通信连、警卫连、机炮连）和组织、宣传、保卫三个处。蒙汉联军司令部和第四师司令部成立后，10月28日在林东召开隆重成立大会。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检阅了部队，在庆典大会上，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将军、蒙汉联军司令员喻楚杰、副司令员蒙骑四师师长和子章发表了重要讲话。

1946年11月初，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和蒙汉联军副司令员骑兵四师师长和子章、参谋长阿民博和、政治部副主任刘昌等领导人去阿鲁科尔沁旗查布杆庙（今天山）召开了35团的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部署了解放开鲁的军事安排。李司令员做指示，开鲁即将解放，所以要求军

队要提高警惕，东北野战军发动总攻时蒙汉联军主力部队和35团全体士兵要立即响应参战。从此加强了防范，从蒙汉联军司令部派部分干部加强了天山35团的工作。但是在两种思想、两种命运、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蒙骑四师管辖的各旗县武装力量内部产生了一些矛盾，加之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勾结一部分仍坚持反动立场的日伪时期的警宪特人员，利用部分惧怕减租减息斗争的地主等反动上层人物，秘密勾结叛变投敌的事情也不断发生，所以，冀热辽军区和蒙骑四师部署解放开鲁的战略遭到了严重破坏。1946年10月末，首先是扎鲁特37团团团长洪富僧格、连长宝音陶格陶等人反对减租减息运动，带领部分官兵叛变投敌，这一消息传到昭乌达盟后，蒙汉联军参谋长阿民博和、第四师二支队政委义达嘎苏荣率领35团的一个连协同37团的部分指战员追剿叛军洪富僧格，全部缴械，然后对大多数的被蒙蔽人士进行教育，让他们回家乡弃暗投明。阿民博和亲自平定了扎鲁特叛乱后回林东时，巴林右旗的34团二连连长韩桑杰、副连长丁克尔扎布，驻防巴林右旗迫毛都的二连连长乌日塔带兵叛变投敌，杀害了蒙汉联军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等七名官兵。11月驻防阿鲁科尔沁旗的35团团团长额勒登格在他反动哥哥塔日巴喇嘛的逼迫和国民党特务的唆使下杀害了第二支队参谋长业喜扎拉森、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与旗公安队的孙根权等一道叛变投靠了开鲁的国民党李守信部。这时候被阿民博和缴械的洪富僧格闻风再次叛变并诱捕了共产党员潘文才，杀害了政治委员阿民赛哈其。在这两条路线你死我

活的斗争十分激烈的关键时刻,阿民博和更加坚定,响应联军号召,率领部队勇敢剿匪,对国民党李守信部队进行了致命的打击。他率领第四师官兵,狠狠打击了叛匪达日扎布、塔日巴、额勒登格、韩桑杰、乌日塔匪帮,阻击了国民党李守信部向昭乌达地区的进犯。

(十一)

“天山保卫战”是发生在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天山的一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斗。1946年冬,叛变投敌的达日扎布、塔日巴、额勒登格等在国民党反动派这个新主子的指使下,杀害了蒙骑四师第二支队参谋长业喜扎拉森、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以后,投靠国民党的开鲁93军李守信部,然后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八路军和蒙骑四师,妄图攻占天山。在这紧要关头,我蒙汉联军和冀热辽警卫团在蒙汉联军参谋长阿民博和总指挥和蒙汉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刘昌副总指挥的带领下,一举粉碎了敌人进攻。

当时通过国民党93军的指示,额勒登格笼络叛匪组建了以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天林支队”,被任少将司令,然后向我解放区进攻,在昭乌达盟天山一带经常派匪部骚扰,到处烧杀抢夺,杀害无辜,无恶不做,给一方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这次额勒登格的天林支队进犯天山的背景是:1946年秋以来,国民党中央军在美蒋的指挥下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抢占了大中城市和东北地区的大好河山。1946年10月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二师占领赤峰,国民党新建的盟军李守信部占领通辽、开鲁一线,并企图向昭乌达地区逼近。

国民党军向我解放区林西、林东派遣特务与我军争夺骑兵四师,煽动四师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保卫热北地区和昭乌达林东根据地这个交通要道,对保卫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指挥机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此,国民党反动派李守信派遣中央军一个加强营、奈曼旗叛变投靠国民党的嘎斯拉和扎鲁特旗叛变投靠国民党军队的东日布匪帮等帮助额勒登格“天林支队”作战。

1946年末国民党军队在开鲁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攻打天山的总指挥部。有国民党少将达日扎布为总指挥,天林支队少将司令额勒登格为副总指挥,李守信派国民党93军参谋长白鸿义为总参谋长,中央军还派了两名参谋担任副参谋长。进犯天山的国民党匪部分成四个团:额勒登格、阿日本嘎、乌日塔、好特勒的三个骑兵团和达日扎布、东日布的骑兵团。这样攻打天山的敌人总兵力达到1600余人。敌人把前线指挥部设在阿鲁科尔沁的双合兴,从两路攻打天山,额勒登格率领的主力从东南方向从正面进攻,阿日本嘎、东日布两个团从南方进攻,其它方面还有乌日塔和浩特勒的骑兵团协助达日扎布。其实驻昭乌达地区的冀热辽军区和蒙汉联军骑兵四师早就了解了敌人的一切动态,而且在额勒登格率37团叛变以前就做好了解放开鲁的作战部署,但由于额勒登格叛变革命投靠了国民党,所以解放开鲁的战略部署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非常时期,八路军(冀察热辽军区)和蒙汉联军第四师对天山的保卫增加了兵力,加强了防范措施。战斗要打响时,这里骑兵四师32团、天山支队、冀察热辽军区的警卫团,总兵力约3000余人,其中蒙

汉联军骑兵就有千余人,我军指挥部设在查布杆庙。时任蒙汉联军参谋长阿民博和任天山保卫战的总指挥,政治部副主任刘昌任副总指挥,他们带师直属警卫连和通信连驻在指挥部,天山支队守在庙东南,冀察热辽警卫团守在天山东南的前沿阵地。派两个连守在天山沟,向天山东边的黄羊洼又派了一个团的兵力,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果然1947年的1月5日晨,敌军主力突然聚集在黄羊洼。根据这种情况,保卫天山前线的我军总指挥阿民博和、刘昌立即对保卫战阵容进行重新调整,天山支队和冀察热辽警卫团部署在天山保卫战的前沿阵地,同时把阿鲁科尔沁旗党政机关和干部家属以及人民群众转移到天山西北的杨树林附近的安全地带。战斗指挥部设在查布杆庙,总指挥阿民博和率蒙汉联军的直属警卫连守在这里。1月6日凌晨,副总指挥刘昌和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32团团团长恩和图布新向黄羊洼一带敌后迂回。敌人见我军运动,约下午3时冲向山下,向我警卫团守卫的前沿阵地冲来,枪声一响,当时守在阵地的冀察热辽军区的警卫团战士由于缺乏骑兵部队的作战经验,急不可耐地冲出阵地,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和埋伏情况,引起了敌人的警觉,于是敌人仓惶逃走,所获不多。

阿民博和、刘昌估计敌人不会甘心,可能会向巴奇楼子方向撤去,于是,决定乘胜追击。具体部署为:天亮前把主要火力投放在巴奇楼子庙前的沙窝子里埋伏,其余部队向巴奇楼子庙后山进攻。可是,第二天冀察热辽的步兵(警卫团)还没能赶到,我军的意图被敌人发觉,敌人不战而退逃。

虽然逃跑的路线没有出乎预料,但是准备埋伏的我军步兵还在二里以外,所以没有能达到预期目的。

但是担任总指挥的阿民博和认为,敌人在这次战斗中损失不大,仍不死心,还要重新通过白音他拉一带反扑天山。于是阿民博和命令在天山后边的最高点增加了速射炮、迫击炮和重机枪等。当天下午二时许,蒙汉联军司令部从林东又派了一个加强连(机炮连),来到了天山加强了我军力量。

下午三时许,敌人果然发起了猖狂反扑。正在此时,突然从西北刮起了大风,风沙漫天飞舞,阿民博和、刘昌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命令部队从北山阵地炮轰额勒登格的军事指挥阵地,同时命令守在天山西南的恩和图布新率骑兵32团,在炮火的掩护下从西南向天山的阿日本嘎、东日布匪部进攻。命令天山支队和警卫团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东南方面额勒登格的主力部队正面进攻。这时我军向敌军发起总攻,势如破竹。

此时额勒登格指挥部军旗被我军炮火炸掉,阵地乱成一团,机关枪也停止了火力。首先在天山西南方面的东日布一股被我32团追杀得狼狈逃窜,阿日本嘎匪部也溃不成军,顶不住我32团的猛攻,抱头鼠窜。我军总指挥阿民博和、副总指挥刘昌率领部队乘胜追击,大获全胜。叛匪达日扎布、额勒登格在国民党反动派指挥下进犯天山的的不义之举,在强大的人民军队的攻势下以失败而告终。额勒登格召集部分残余,途经黄羊洼、巴奇楼子庙直往开鲁逃窜。从此,这股叛匪和国民党杂牌军逃回开鲁,一直到我军解放开

鲁,再未敢有大举进攻我解放区之举。1947年2月26日我军一举攻克开鲁,国民党守开鲁城的匪军全部被我军歼灭。国民党骑兵司令李守信化妆成商人逃命,额勒登格被我军生俘押回昭乌达盟林东,在蒙汉联军军法处关押,后在天山镇压。

阿民博和在这著名的天山保卫战中发挥了我军一个优秀指挥官作用,获得了这次天山保卫战的全面胜利,受到了党政军各方面和冀察热辽军区的嘉奖。

(十二)

1947年2月,和子章随乌兰夫同志去乌兰浩特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大会。蒙汉联军第四师派出以阿民博和为团长、刘昌为副团长的工作团,对骑兵第四师进行整顿。工作团的成员是博音陶格图、胡和德力格尔、巴彦扎布、哈斯乎、阿日斯楞等。通过整顿,一部分人被洗刷,一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被选送到内蒙军政大学、内蒙古自治学院、蒙汉联军教导大队学习。学习两个月后,把这部分进步青年派到骑兵四师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加强了连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号召全军学习乌兰夫同志在林东全体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革命理论方面的其它书籍,密切了官兵关系,加强了军队传统教育,学习文化和战争时期的斗争目标等方面的知识,学习内容比较广泛,骑兵部队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觉悟迅速得到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加增强,骑兵第四师的全面整顿工作进行了两个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阿民博和任副师长兼参谋长,5月1日内蒙古人民政府在

乌兰浩特正式成立后,和子章被调到内蒙古军政部任职,阿民博和正式代替和子章担任蒙骑四师师长并被当选为内蒙古人民政府参事。郎布仁钦担任参谋长,此后蒙骑四师的师级阵容为:

师长:阿民博和

政治委员:乌力吉那仁

参谋长:郎布仁钦

政治部主任:刘昌

供给部主任:图门恩

到了1947年9月,全师除了叛变的、牺牲的、洗刷的和原来的37团划给辽西军区以外的,只剩790人,遂将原来的5个团中的4个团编成两个团,即三十一团和三十三团,把原来的师直警卫连、通信连、机炮连合编为师直警通连。

1947年10月内蒙古军区指示,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做好参加辽沈战役的战斗准备。四师师长阿民博和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带领全师官兵还在大练兵时,接到冀察热辽军区关于“从沈阳逃窜出来的国民党一个骑兵旅旅长苏和巴特尔匪部近千人向昭乌达、察哈尔地区进犯,其中也有原四师三十七团叛匪二虎和三十四团叛匪韩桑杰匪部,因此,骑兵四师南下参加辽沈战役的任务转换为辽沈战役外围剿匪作战”的任务,所以阿民博和根据上级的命令率部在锡林郭勒、宝昌、多伦、巴彦锡勒、察哈尔草原参加剿匪战斗,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打败了国民党仁钦道尔吉匪部,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外围战役胜利,保卫了解放区,稳定了昭乌达、卓索图地区的局势。在解放宝昌战役中亲自率部队

在前线作战,在战斗中阿民博和的衣领就被敌人的子弹穿了六个弹眼,但在战场上没退一步,可见指挥员的英勇善战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1948年10月,在我军秋季攻势胜利的前夜,国民党军遭到惨败,沈阳、锦州国民党部队被我军层层包围,形成了“瓮中捉鳖”之态势。为全歼国民党反动派夺取辽沈战役的最后胜利,内蒙古军区命令:卓盟纵队和昭乌达的蒙汉联军第四师整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师,准备参加东北战役。1948年10月23日,阿民博和领导的蒙骑四师和孔飞领导的卓盟纵队在林东正式合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师,此后十师阵容为:

师长:孔飞

副师长:阿民博和

政委:乌力吉那仁

政治部主任:刘昌

参谋长:慕汝瑞

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第十师下设两个团、八个连。原第四师三十一、三十三团合编为三十一团,分四个连,兵力562人,团长为唐巴图、副团长平安、政委张华廷、副政委斯布吉德道尔吉(戈更夫)、政治处主任白英。原卓盟纵队一支队为三十三团分四个连,兵力562人,团长陶格陶、政委席达、参谋长赛音、政治处主任张继。卓盟纵队六支队也属第十师的序列。

1949年3月22日中共昭乌达盟和冀察热辽军区在林东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总结骑兵第

四师和卓盟纵队建军以来的作战经验和成绩,表彰了阿民博和等一级功臣9人、二级功臣39人、三级功臣76人。在总结中指出:这支人民铁骑是经过了两条路线斗争和战争考验发展起来的,经过了大小战斗118次,共歼敌1291人,俘敌408人,向我投降的敌人338人,缴获各种武器877件。这支铁骑兵具有灵活机动的战术和善于快速进攻,迂回包围敌人,英勇顽强,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特点。作战中行程万余公里,经受了艰难的斗争考验,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党和人民对这支队伍给予了“打不垮,拖不烂的人民铁骑兵”的荣誉称号……

1949年5月10日,根据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的命令,骑兵第十师调离家乡林东开赴突泉驻防。6月1日骑兵十师在突泉县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阿民博和仍任副师长。

(十三)

阿民博和同志在整个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戎马一生,在战场的最前线率领部队指挥作战,粉碎了叛变投靠敌人的塔日巴、额勒登格、韩桑杰、乌日塔、阿日本嘎匪部和国民党反动派李守信杂牌军,追剿了在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一带扰乱的国民党残部仁钦道尔吉、胡图林嘎匪帮,亲自指挥了解放宝昌、多伦、化德的战斗,完成了辽沈战役外围作战的任务,取得了全面胜利,所有这些对于昭乌达、卓索图地区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任蒙汉联军政治委员乌力吉那仁、政治部

主任刘昌等撰文回忆了阿民博和。文章说：昭乌达盟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时，阿民博和被任命为分会军事科长兼蒙骑四师的教导大队长，后任蒙骑四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等职。

他有蒙古人的直爽真诚风格，魁梧健壮体态，对工作充满热情，办事果断敢为，富有很强的责任心……

他是创建蒙骑四师的和子章的同胞兄弟，伪满时期虽然当过少校军官，但长期受日本人的怀疑和监视……

蒙骑四师是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以昭盟的各旗武装为基础，由和子章出面组建的，但是初建时的情况是被王公、官僚、资本家、地方上层人士掌握，干部士兵成分也很复杂。虽然以蒙古民族保卫各旗治安为目的，但缺乏坚定的政治方向，特别是各旗之间的矛盾较大，官兵思想相当混乱。和子章虽然任师长，但由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差和人员思想错综复杂，除巴林左旗的三十二、三十三团和巴林右旗的三十四团是和子章嫡系部队外，对于阿鲁科尔沁、奈曼等地的武装统一指挥有很大的难度。加之，1946年在国共两党的关系破裂，内战已开始的时候，这个部队能否为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能否坚决站在革命人民一边，能否成为听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挥的部队，这些问题当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的问题。所以在这关键时刻，如何对部队进行改造，如何进行革命和军事教育，是我昭乌达开展革命工作的每个同志面前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阿民博和同志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

后来阿民博和同志担任了骑兵四师的参谋长，蒙汉联

军成立时他担任了联军参谋长，后兼任蒙骑四师师长负责蒙骑四师全面工作。

在蒙汉联军和蒙骑四师的作战中，阿民博和每次以前线总指挥的身份带兵艰苦作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如在前线指挥了著名的“天山保卫战”，打垮了国民九十三军李守信部对昭乌达解放区的进犯，指挥了对背叛苏联十月革命和蒙古人民革命投靠中国国民党的布力亚特·仁钦道尔吉匪部的追剿和对巴彦锡勒草原、宝昌以及多伦的解放等辽沈战役的外围战斗，做出了贡献，特别是1947年2月和子章调任乌兰浩特内蒙古人民政府军政部任职以后，阿民博和以联军参谋长的身份担负了蒙汉联军第四师的全面工作。他对这支人民革命武装的整顿、教育和改造以及军事训练做了大量的工作，的确发挥了一个革命军队指挥员的作用。

两位当年与阿民博和并肩战斗在蒙汉联军的革命前辈，对这支打不垮、拖不烂的人民铁骑兵的指挥员阿民博和在解放战争的艰苦条件下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人民的翻身、民族的解放事业永往直前、英勇善战的戎马生涯做了如此实事求是的评价。

(十四)

当身负重任、身经百战的指挥官蒙骑四师师长阿民博和率领队伍出色的完成了辽沈战役的外围作战任务，从内蒙古察哈尔大草原凯旋而归在师司令部驻防的东北突泉县与战友们共庆战斗成就、陶醉在胜利喜悦的时候，内蒙古党

政军的指挥中心乌兰浩特传来了急电：命阿民博和速到乌兰浩特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命令的落款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人民政府、内蒙古军区。

无条件执行上级的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阿民博和接到命令后安顿了从战场回来的全体官兵就立即出发，火速赶到了乌兰浩特。在乌兰浩特接待他的是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王再天同志，王司令员十分亲切和蔼地传达了内蒙古党委、政府、军区三方面的命令，他说：“你对内蒙古骑兵队伍的建设作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蒙骑四师的整顿改造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和人民是知道的，尤其是在炮火连天的战斗生活中你带领队伍在解放包昌、开鲁、保卫天山等战斗中指挥骑兵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在辽沈战役的外围剿匪作战中做出了贡献，真正发挥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军指挥官的应有作用，对此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如今全国已经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自由、平等、和平的新生活，所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民主改革中去，已进入了这个革命的重要阶段……上级号召要精兵简政，加强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当前在变革时期内蒙古还很缺乏经济建设的人才，尤其是在畜牧业战线上缺能人，你生在牧区长在牧区懂得畜牧业经营，这方面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内蒙古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共同决定委派你到内蒙古农牧部组建畜牧处，由您担任处长”。

“万事开头难，内蒙古是我国最大的畜牧基地，你的任

务很重，所以说这与你在战场上指挥军队，消灭敌人份量是一样的，也是你今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施展才能的好机会，请不要有什么顾虑。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内蒙古畜牧业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听到命令的阿民博和沉默片刻后：“我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与我的队伍和战友们同命运共呼吸度过了战争时期的艰难岁月，实事求是的说，我真不愿意离开我的部队，我真离不开我的战友们，但是我开始参加革命时立志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现在首长传达的命令，是代表党和人民、代表政府、代表内蒙古军区，所以我要无条件的服从，其实对我来说任何一项工作，只要对祖国、对人民有益，我就会同样努力去做，这是我的态度。”说话之后王再夫司令员代表内蒙党政军各界摆宴隆重招待了阿民博和。这是1949年10月末的事情。

次日，接受一个崭新工作任务的阿民博和到内蒙古农牧部部长高布泽博同志办公室报到。高部长满面笑容迎上去：“热烈欢迎昔日统帅千军万马的英雄指挥官，今天我畜牧战线的战友。”热情地紧握住了阿民博和的手。

后来阿民博和常回忆起这位革命战友：高布泽博同志知识渊博、品德高贵、性格爽朗、谦虚谨慎、胸怀宽广……他总不排斥我这个党外人，而且经常鼓励我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大胆工作、大胆创新……他经常给我讲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目前国内外的形势以及现代畜牧业知识等，我们俩在一起工作时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故事……我打心眼里佩服他，尊敬他……

(十五)

1950年7月,阿民博和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7月3日农牧部高部长把阿民博和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亲切地说:“目前要建立集体经济,走集体化道路,要做出个典型实例,对此内蒙古党委、政府和乌兰夫主席指示我们在牧区建立国家经营的大型示范牧场。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主持新政府农牧工作的最高长官——你我二人身上,今天我俩交流看法……主要是听您这个畜牧处长的意见……”

自从部队转业以来在内蒙古农牧部办公室,无所事事寂寞之际的阿民博和听后喜出望外。他说:“这是党和政府信任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接受,这是我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的首任畜牧处处长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推诿。我认为集体经济大概就是苏联的〈农业合作化〉一样,但是对于国家经营的集体经济,究竟是怎样一个形式,我目前还真搞不清楚……”阿民博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高布泽博部长从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从俄文译成的汉文版《国营农场》的小册子递给了阿民博和,“老阿同志,我也是正在学习……请您参考。”

阿民博和反复学习研究这本书后,初步认识到:要办的国营牧场,是一个全民所有制经济,而且牧场的干部职工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工资按月由国家财政发放,其长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机械化的畜牧业基地,把分散的畜牧业改变成现代进步的经济,要建立一个大型的示范牧场……

阿民博和对创建牧场初步认识后立下了在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新贡献的决心。

建立一个大型的牧场,需要一定的草场,国营牧场是在内蒙古甚至当时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没有能够继承的草场和地盘,由于眼下要建的这个牧场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所以不能与当地老百姓和广大牧民群众争夺草牧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内蒙古农牧部高布泽博部长和阿民博和处长遇到的难题,而且是年轻的内蒙古政府面临的新课题。对此阿民博和通过学习和认真思考后大胆提出了在内蒙古创建国营牧场的初步设想。阿民博和在1946年全年统帅蒙汉联军深入昭乌达北部的贡格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一带,追剿叛匪的时候就熟悉了锡、昭两盟交界的广阔草原,特别是对水草丰美的阿巴嘎、好勒图草场了如指掌,解放前这里盘踞着从苏联十月革命叛逃到中国后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李守信部、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消灭的布力亚特·仁钦道尔吉匪部。当年,阿民博和带兵追剿时曾给战友们讲过: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这帮土匪糟蹋的破烂不堪,将来把这帮土匪赶出草原后这里是一个大有前景的宜牧宜农的好地方。阿民博和这个时候就想到了这块肥沃的大草原,如今正是无人区,不属于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的牧民也没有在这里放牧,所以这里创建牧场大有前景。于是阿民博和首先得到高布泽博同志的支持后向乌兰夫主席和内蒙古政府明确提出了在这里创建大型国营牧场的设想。

乌兰夫同志和内蒙古党委、政府的领导们听取阿民博

和办牧场的设想后十分赞赏,并当即召集昭乌达、锡林郭勒盟负责人以及内蒙古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之后,完全同意了阿民博和的办场方案。于是下达了在锡、昭两盟交接的巴彦锡林大草原创立国营牧场,派内蒙古畜牧处处长阿民博和全面负责建场工作的命令。

(十六)

1950年7月,以9人组成的新中国第一个创建国营牧场的工作团在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处处长阿民博和的率领下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乌兰浩特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出发了。他们当中有畜牧兽医森格、好毕斯嘎拉图、太平嘎,行政人员宝音套格套、由春等。工作团从乌兰浩特携带的物资有套四匹马的大胶车三辆、套两匹马的俄罗斯式的四轮蓬车一辆,口粮和必需物品除了小米和行李以外一无所有。俗话说:万里长征起步难。当时虽然全国已解放,但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上还有国民党军的残余为非作歹,经常在昭乌达北部和锡林郭勒一带活动,因此工作团不能从乌兰浩特直达锡林郭勒,为了安全起见只能绕道而行。路经突泉、鲁北、林东、大板、林西、经棚等地才能到达目的地锡林郭勒草原。

要建的这个国营示范牧场是直接归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所以锡林郭勒、昭乌达两盟都有义务协助,工作团的安全和口粮由昭乌达盟负责,牧场的地盘、草场、基础母畜来源等由锡林郭勒盟协助解决,这是内蒙古政府的决定。阿民博和为首的工作团在沿途地区党政部门的帮助下,仅

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来到了昭乌达盟军政中心盟所在地林东,受到了盟党政军各方面的热情接待。工作团临行时盟委首先考虑到工作团的安全,发给他们长短枪七支,还带有600发子弹,又增补了几名工作人员和马匹,阿民博和路经自己老家巴林左旗敖日盖时从自己的马群中选两匹骏马和祖传的家宝——乌珠穆沁式的银制马鞍,又招收了当年曾给他部队(蒙骑四师)当过警卫的两个神枪手朋斯格、通照二人。

当时国民党军队残部和从阿拉善、额吉纳逃出来的反动分子以及从巴林逃出来的叛匪韩桑杰等同当地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经常在锡林郭勒和昭乌达两盟交接地带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情况十分复杂,所以工作团路经偏僻地带和无人区时特别警惕。为了工作团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阿民博和决定:险恶狭路时自己一个人骑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先行半华里,神枪手朋斯格等随着车队保护队伍同行,另一个神枪手通照断后,以便防止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工作团乘坐马车,途经哲里木、兴安、昭乌达、锡林郭勒四个盟和扎萨克图、突泉、吐希业图、扎鲁特、开鲁、阿鲁科尔沁、巴林左、巴林右、林西、克什克腾、好其德、阿巴嘎纳尔等十几个旗县,经过长途跋涉,在1950年8月的一天到达了目的地,锡林郭勒盟所在的格根庙(今锡林浩特)。

在一个多月艰难的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的征途中,阿民博和每到险恶的地段时,自己总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保证队伍的安全。他关心同志们的疾苦,食宿行军都安排的有条不紊。每当队伍歇息或宿营时,阿民博和给大家讲述当年

参加解放战争中如何打败国民党 93 军李守信部,如何在锡盟草原上进行剿匪斗争,他是怎么指挥的“天山保卫战”等亲身经历,以振奋队伍的精神。跟随阿民博和从乌兰浩特前来巴彦锡勒创建牧场的干部曾格(后任牧场党委书记)、车夫董宝音等人回忆那段历史时经常提起:“我们的阿达力嘎(首长)在我们建场工作团中年龄最大,职务最高,是有丰富经验的人,他总是走在困难的最前面,对待我们如同对自己的孩子一般爱护和帮助,不但对他的部下一视同仁,而且对群众的生产生活方面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

“我们的阿达日嘎真是打着灯笼也难寻的好领导……”

(十七)

1950年8月末工作团按计划来到格根庙(今锡林浩特市),当时在这里有五座喇嘛庙,庙两侧有东西两大庭院,院里有几百间土房供千余喇嘛住宿。锡林郭勒盟党委和公署住在一个葛根仓的大寺庙内。阿民博和一行首先到公署报到,迎接他们的是叫旺钦的副盟长,他对工作团同志很热情,问寒问暖无微不至。锡林郭勒党政领导们遵照内蒙古党委和政府以及乌兰夫同志的指示精神,根据阿民博和同志在阿巴嘎、好乐图、巴彦锡勒一带办场的建议,召开党政各部门的会议专门研究和讨论了办国营牧场问题,最后盟政府各部门统一了思想,提出了一致意见,并决定:一是牧场以阿巴嘎、好乐图和曾一度被布力亚特·仁钦道尔吉匪帮占据的巴彦锡勒这个锡、昭两盟交界的无人区为中心建立;二是牧场的场名为“内蒙古自治区农牧部国营牧场”;三是

从锡林郭勒盟各牧区中筛选基础牲畜。

得到锡盟各方面大力支持的阿民博和带领工作团进驻了原阿巴嘎左旗喇嘛庙的旧址。这个寺庙过去兴盛时期是只有一百多个喇嘛的一个小庙。1946年布力亚特匪帮占据后由于战乱庙宇被毁、房屋倒塌、野草丛生,变成了狐狼出没的无人区。离这里正南60华里是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宝木台,东南70华里是克什克腾旗的白音查干苏木,往北70华里是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旗的宝木图,往西60华里是东阿巴嘎罕山,这样才能看到人烟的大荒漠。但是这里的风景优美,土地肥沃,水草丰盛。绿草葱葱的胡鲁戈壁、潺潺流水的古日本乌拉、绿树成荫的乌力雅苏台、特布曾、奔腾不息的锡林河……所有这些如诗如画的自然风景仿佛迎着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建设者和新主人——工作团的勇士们。

“多么美丽的草原啊!”“这么好的地方竟成了人烟无几的荒漠,到处是断墙残壁,破烂不堪……罪孽啊”这是呼伦贝尔巴日虎草原上长大的工作团成员畜牧兽医太平嘎和年轻的车夫董宝音的话。

“战争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当年从俄罗斯十月革命逃亡到这里盘踞的布力亚特·仁钦道尔吉匪帮,他们反对内蒙古人民革命,欺压纯朴的察哈尔、好其德牧民,胡作非为,结果使这里的牧民背井离乡逃亡四方。所以以前这里的牧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无影无踪了,1946年在解放战争中虽然这帮匪徒被全部消灭,但是这里成了没有人烟的废墟。”当年奉命指挥千军万马在这里进行剿匪斗争的阿民博

和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这些无人区新来的主人——建设牧场的工作团安营扎寨,建起了蒙古包,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迎接了新的任务。

(十八)

工作团的同志们在阿民博和的带领下全身心地投入了搭棚建房,运输木料,选择基础牲畜,找合理的冬营地等,建场初期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始了。

建房和搭棚圈急需木料,为此阿民博和亲自带三个大胶车前往林西县。工作团的口粮是从昭乌达盟的林西县供应的,所以这次到林西后得到了林西方面特别的关照,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建房和棚圈所用的部分木材、几个月的口粮和生活用品装满三个胶车满载而归,并从林西招收了叫齐瑞庭和宋珠儒的两个木工师傅。

阿民博和回去后布置了下步的工作。根据本人的特长,青年技术员曾格、曹德那木为首的一个组在打草场上准备冬营设备;有畜牧经验的青年技术人员太平嘎、好毕斯嘎拉图为首的一个组专门安排选择基础畜群等方面的工作;阿民博和自己带着工程队修建房屋棚圈等,并要求十月一日前各小组必须完成所承担的各项工作任务。阿民博和亲自分管的建筑工程队始终起早贪黑克服种种困难,把这个破旧寺庙的四大天王殿修成场部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宿舍,又建了些棚圈设施。该建筑很简陋,但是创建巴彦锡勒牧场的指挥部载入了历史名册。其它两个工作组按时按质完

成了所承担的任务。接受选择基础牲畜的全体同志在锡林郭勒盟党政部门的大力帮助下选回适龄母畜,其中绵羊500只,马200匹、牛200头;负责冬春设施的另一个工作组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也圆满完成了任务,他们合理使用从乌兰浩特带来的打草机打了40万斤青草,并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堆放起来为牲畜的过冬春打下了基础。俗话说“登峰属于有志之人”,阿民博和为首的创建牧场的十多个勇士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圆满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任务,为建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10月1日这一建国一周年的大庆大喜的日子,天气格外晴朗,在新建的内蒙古农牧部国营牧场办公室门前高杆上悬挂着的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阿民博和处长以场领导的身分设隆重的宴会并会上兴高采烈做了重要讲话,大意是:“今天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国营牧场——内蒙古自治区农牧部国营牧场正式建立的喜庆日子……”

牧场建设的初步胜利获得了上级党政部门和领导的高度赞扬,又受到了锡林郭勒、昭乌达两盟党政各界的大力支持,锡盟党委给我们赠送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要向上级党政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热烈庆祝建国一周年纪念日的同时庆祝我们牧场的正式建立!同志们、战友们,为了牧场的繁荣昌盛干杯!我们的同志们在今后创业取得更大胜利而干杯!”

在这里今日的巴彦锡勒草原上,当年阿民博和宣布了我区第一个国营牧场的成立。同时,阿民博和处长自然也兼任了牧场场长职务。

(十九)

北方的冬季来的早,牧场上下庆祝建国、建场双庆活动刚刚结束就投入了畜牧业经营,加强冬营设施。到十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雪,这给新建的牧场也带来了困难,加之当年流亡的土匪残余经常在草原上骚扰的消息通过锡盟党委传到这里后,具有军旅经验的阿民博和加强了防范,他既严密部署了牧场的牲畜安全过冬春,又加强了防匪、防盗工作。号召全体工作人员白天清理棚圈、喂养牲畜,晚间轮流站岗放哨以防万一。阿民博和场长虽然年龄大,职务高,但和工人们一起白天参加各项工作,夜间与同志们一道轮流站岗。该场老工人车夫赵振彬同志回忆:“阿达日嘎(首长或领导)同工人们共患难,同呼吸,他白天处理场部的日常工作后还巡回各饲养点检查指导,夜间同工人们一起轮流站岗放哨。那年冬天气候特别的寒冷,老首长夜间与同志们站岗,第二天早晨我们去接班时他的向上翘起的两片胡须上结成了冰块,身穿的反毛皮衣上沾满了野草,在晨光中显得特别威风,乍一看象是古书上的天兵天将下凡一样惊人……”

一个有丰富草牧场,有一定数量优良畜群的,有比较先进的机械设备,有较强的技术人才和严密的组织领导的内蒙古第一个国营示范牧场在阿民博和为首的艰苦创业者的

共同努力下终于迈出了万里征途中最艰难的第一步。

国营示范牧场安全度过建场后第一个严寒冬季和铺天盖地的暴雪灾害,胜利地迎接了第一个春天。阿民博和意识到:发展畜牧业,水源草场和有经验的牧民极为重要。于是他亲自带领几名技术人员,骑马详细勘查了就近山川、森林、草场,同时拜访了邻近地区阿巴哈纳尔、克什克腾、好其德等有经验的老牧民和老地户,从他们那里了解地型地貌、地名的来源、地名的变迁和民间传闻,甚至对各类牲畜适合那一个草场的那一种牧草等。这对后来以牲畜的种类建立分场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他还从克什克腾、阿巴哈纳尔等地招收了十余名蒙汉族工人,解决了劳力不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狠抓了畜牧改良工作。他认为追求数量不如提高质量。提高质量、增加效益,这才是牧场的发展方向,所以他派人到河北省学习绵羊的人工配种技术,同时引进了细毛种羊,从呼伦贝尔盟引进良种三河种公马,开始人工配种工作。这项工作当时来说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新技术,也是十分细致的工作,所以工作人员必须认真细致,不屈不挠才行。于是牧场的技术人员每天起早贪黑,对适龄母畜的发情情况逐个检验。阿民博和重视这项工作,他经常巡回检查,几乎每天早晨天刚亮就来到职工宿舍叫醒好睡的年轻同志。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任何困难在坚强的勇士面前都会低头让路。的确是这样,只有一座蒙古包三辆胶车的十来个人,在无人的荒野里经过短短几年建设一个大型的国营牧场并获得成功,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对此内蒙古

党委和政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把曾经给乌兰夫等内蒙古领导供应奶食品的三河奶牛和苏联进口的卡巴金马群委托给牧场经营,阿民博和亲自去当时的内蒙古政府所在的乌兰浩特接回了三头牛和卡巴金马。

以后又把苏联赠送给朱德委员长的阿哈战马和赠给周总理的良种牛也委托给阿民博和创建和领导的巴彦锡勒牧场饲养。

(二十)

牧场的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首先搞一个比较正规的规划,根据阿民博和的提议内蒙古农牧部派那达木德科长和工程师权盘道来牧场协助阿民博和处长兼牧场场长搞一个正规的全面规划。

新建的牧场不同于旗和苏木,因为这是国营场子,没有固定的草场和地盘,所以这次规划中,国家给牧场划拨了固定的草牧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的指示精神,这次从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好乐图为中心的锡林郭勒煤矿、向南至锡林河、西至闫图庙、东至好其德王爷庙,把这方圆四百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划拨给巴彦锡勒牧场。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率领骑兵队伍在这里追剿国民党残匪的阿民博和来说,这里的山山水水和广阔的草原,甚至一草一木并不陌生。但是在这个肥沃的土地上如何搞出一个切合实际的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搞这个方圆四百公里草牧场的规划,阿民博和根据战争年代的经验,带着参加草原规划的队伍,套着马车出发了。

阿民博和青年时代在兵营中曾受过绘制地图的专业技术训练,所以在这次的草原勘查和绘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对远近距离、山川高低、河流的长宽、湖泊的深浅、村落范围的测量没有一个比较精确的仪器。所以阿民博和只凭自己的手掌和五指,利用手里拿的藤子鞭(有一种带有竹柄的马鞭),用一双敏锐的肉眼测出远近距离并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不停地画着、标着别人看不懂的符号,标在每个绘出来的图纸上。根据这个记录绘制的规划,再后来国家勘察队从空中通过现代科学手段测试后绘制的图纸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对此当时的国家勘察队的专家们十分惊讶。

在阿民博和同志的亲自参加和率领下,草牧场的勘察规划工作在全体同志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下圆满完成了任务。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指示和国营牧场的近期工作目标,初步确定了建立总场和分场的地点,对草牧场的范围和如何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并报自治区政府批准实施。

(二十一)

阿民博和深知,水草是发展畜牧业的根本,搞好草原建设,保护草场,提高牧草质量是摆在牧场眼前的主要任务,于是阿民博和亲自组织带领一部分职工首先在马场打了一眼井,这眼井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水源旺盛。接着在阿民博和的带动下,在十几个分场都打了井,这些都是阿民博和亲自勘察,找水源而且亲自参加实施的,至今还在巴彦锡勒草原上流传着“吃水不忘老首长阿民博和”的佳话。

阿民博和发动牧民们打水井的同时,根据水草的资源做出规划,在公爷庙建马场,博日音敖包建牛场,在额尔很勿苏建羊场,在喇嘛庙建总场,在花胡硕建饲料基地并辅助实施。

为了防火阿民博和亲自率领 18 个职工,套两辆大胶车到野外经过一个多月在方圆 400 公里的草场边界地带都修了防火工事。在此基础上大搞棚圈的基本建设,因为这项工作范围广,建筑量大,所以阿民博和组建了工程队,派专人负责,由技术人员做规划,工程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老领导阿民博和跨上黑骏马赴克什克腾旗,得到当地党政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后,用 200 辆牛车(勒勒车)、八个骆驼驮子、四辆大胶车从克旗边远的黄岗梁山砍伐所用木材运回牧场,保证建设棚圈工程顺利进行。

这次工作大规模的建设棚圈工程是建场以后比较大的会战,所以老首长阿民博和的工作重点也自然转移到这上面。阿民博和在整個工程建设中亲自与工人们一道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什么难题老场长当即都拍板处理。

在工程施工中阿民博和很关心职工干部的生产生活,他常巡回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激发同志们的工作热情。

“记得有一次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工程队难以施工,阿民博和场长骑着大黑马冒着雨水来到了工地,给工程队的同志们送来了炒米、砖茶、雨衣等,由于连绵的雨与外界无法联系,工人们在畏难时刻领导亲自来看望他们激动的热泪盈眶。”

“阿达日嘎工作很认真,要求严格,惩罚严明。鼓励工

作认真负责,按时按量完成任务的职工。当时超额完成任务的奖赏是场部送来绵羊改善工人的生活。所以那个艰难时期,我们完成任务后,特别盼望阿场长的到来……”

“阿场长一身正气、刚直不阿,深得巴彦锡勒牧场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敬仰……”

“阿场长特别艰苦朴素,他从不搞特殊性,如果说他有特殊的地方,那就是从自己家的马群送来的大黑马和小牧羊狗,还有他嘴上长的向上翘起的两片黑胡须……”

“阿民博和的一生曾经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是朝气蓬勃,从来不曾由于委屈而表现沮丧,那原因就是问心无愧。”“……”

这些肺腑之言,都是笔者采访巴彦锡勒牧民时,那些在阿民博和的带领下为创建牧场出过汗流过血的建场功臣们回忆老首长阿民博和时说的原话。

(二十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日益强盛,牧场的一切工作也日新月异发展。到了 1954 年时,当时根据内蒙地区畜牧业发展的需要,把牧场进一步扩大范围,建成了专门经营优良品种的种畜场,并把原来的内蒙古农牧部直属的国营牧场改为锡林郭勒盟直属的“巴彦锡勒国营种畜场”。派锡林郭勒盟委常委,宣传部长额尔和同志担任牧场党委书记兼任场长,内蒙古农牧部畜牧处长阿民博和改任副场长,这个任命书上还印着乌兰夫同志的印章。

从自治区首脑机关来到最艰苦,条件最差的巴彦锡勒

荒漠创建内蒙古第一个牧场,圆满完成了内蒙古政府和乌兰夫同志交办任务的阿民博和从高职务走到副场长的位子。成绩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小,这样的现实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事情。

但早已把名利、地位抛在脑后的阿民博和说:“人活在世上就应该做实事,为人民谋幸福,艰苦创业,这就是我的真正目的,如果考虑自己的名利、地位和个人得失的话,我不会千里迢迢来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巴彦锡勒草原白手创建牧场的……”

“活着为大众,生命值千金……”

听到阿场长解释的同事们对他的做人做事,十分钦佩。

(二十三)

在种畜牧场的各项工作走向正轨,全面发展的1955年春,一场大火随着西北风的强大威力向牧场袭来。在这紧要关头,老首长阿民博和立即组织在场部的工程队30余人,指挥他们在场北边开辟了防火道,同时指挥一部分扑灭已袭进来的烈火,保护了牧场的安全,保护了牧民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初战告捷后,一部分年轻的同志没有经验,在山沟里的草堆下歇息等待新的战斗任务时,突然被上面袭来的烈火包围了,他们无法从下面顶着风口灭火。这时风力越来越大,烈火随着风力越烧越凶猛。打火的年轻职工们看情况不对头,就拼命往下面的防火道方向跑。在逃生中有个叫李志桥的青年和青年职工朱宝等三个人在滚滚浓烟中昏倒了,指挥扑灭火灾的场党委书记额尔和带领一帮

人去解危,但是李志桥伤情过重当场牺牲,朱宝等二人被大火烧成残疾。在另一个战线上牧场职工齐瑞廷在扑火中身上的衣服被烧着,人倒在地下乱滚,眼看齐瑞廷被大火吞掉。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附近带队沿烧防火道的老场长阿民博和看到了,他此时此刻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骑着大黑马快马加鞭冲进熊熊的烈火,把齐瑞廷救了出来。通过这次火灾的血的教训,阿民博和提议在场部建立一个长期性的防火组织机构,长期备好各种防火工具。于是经过场党委研究决定在牧场成立以阿民博和为首的防火团,各分场成立防火连,在连下设排和班,每个班都配备了防火工具,和其它急需品,平时进行防火训练,要求如有情况15分钟内必须集中并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二十四)

在五十年代,新创建的国营牧场以种公畜为基础的发展方向得到了多方的支持。阿民博和同有关部门商定后亲自去呼伦贝尔盟引进良种畜三河牛一百多头,对牛的改良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把锡林郭勒盟的分散小牧场归属国营牧场壮大力量,同时从包头引进优良品种的阿哈种马,从新疆引进细毛羊,从外地引进技术人才,聘请专业人员,购进新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现代机械,为把牧场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草木粮料基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场党委为了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重用各方面的人才,在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时有北

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高等学校、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和畜牧兽医专科学校等十几个中高等学校和专业研究部门专业技术人员来牧场实习,参加畜牧生产劳动,留学日本、蒙古国回来的专业人才也前来牧场进行技术指导和科学研究,对牧场的科学养畜作出了很大贡献。以额日和书记为首的场党委班子认为:知识分子是我团结党的力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畜牧建设的主力军;阿民博和为代表的党外干部和知识分子是我党搞好团结建设牧场的基本保证。所以对阿民博和同志的领导工作,场党委始终大力地支持。

每当在场党委会议或场行政工作会议上安排生产、任用干部、招聘技术员等一系列的牧场重大问题上,党委书记首先听取老首长阿民博和的意见,然后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每次召开场党代会时,都要邀请阿民博和场长,安排在主席台前排的主要位置上就座,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对于党团员如何对待党外干部,如何与他们团结共事发挥党外干部和科技人员的作用方面,场党委经常进行政策教育,这一切对于阿民博和为代表的众多党外干部和知识分子发挥积极作用起了很大作用。

(二十五)

在金秋十月的一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和煦,蜿蜒而奔腾不息的锡林河潺潺北去,广阔的巴彦锡勒草原上肥壮的牛羊成群,牧场的全体员工穿上了节日的盛装等待着贵宾的到来。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吉普车,你追我赶地开进草原深处,来到了巴彦锡勒国营种畜场。这是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同志在区、盟两级领导的陪同下亲临牧场视察工作。乌兰夫同志从吉普车的窗口就一眼认出了迎接队伍中的阿民博和并向他挥手致意。乌兰夫主席走下车后快步走到阿民博和跟前伸手“老阿,您好!人民的功臣!”紧紧握住了老场长阿民博和的双手。

“云主席,您好?您的身体好吧?感谢云主席。”阿民博和很感动,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阿民博和与乌兰夫主席相互问安后回迎接队伍刚要走出几步远时,乌兰夫同志再次叫住了:“老阿!来来!我们一起视察去”,这样把老场长叫到身边,问寒问暖特别热情。在视察中通过阿民博和了解了牧场的生产生活和牧场今后的打算等方面的问题。阿民博和在视察中与乌兰夫同志并肩地走在视察团的最前面,不停地把牧场全面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乌兰夫同志率领的视察团察看了从苏联引进的阿哈马、卡卜金马的优良品种配种的马群,从呼伦贝尔引进的三河牛的优良品种配种的牛群,从新疆引进的细毛羊的优良品种配种的细毛羊群等。

与乌兰夫主席同行的内蒙古农牧部部长高布泽博同志也喜出往外,向乌兰夫主席介绍牧场创办初的情况,也拍拍陪同视察的阿民博和的肩膀,“这些马匹饲养的真好……”“这棚圈设备符合要求……”,“这群牛的改良效果真不错……”,在乌兰夫主席面前一再赞扬牧场的建设和改良种畜的经营以及阿博和办场的成绩。

乌兰夫同志听汇报实地察看以后,对牧场的建设和短

期内取得的成绩高度评价。并对阿民博和说：“你是我们的功臣，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望你再接再厉……你们牧场是牧业战线的典范，把你们的经验推广到全区的每个牧区。”

“这一切成绩与党和政府以及乌兰夫主席的英明领导是分不开的，与我们内蒙古农牧部高部长的帮助和锡、昭两盟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我阿民博和是寸步难行的……”。阿民博和用十分敬佩的目光望着乌兰夫主席、高部长等领导同志，心情激动的说出了心里话。

巴彦锡勒国营种畜场的经营方式和工作成绩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牧业战线的典范，当时作为在锡林郭勒召开的全区牧业工作会议上研究讨论和学习、推广的主题，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扬。乌兰夫主席临行时挥笔题写了“该种畜场创建比较早，并取得了好成绩，是牧业战线的典范，为建成在短期内达到二十万头只优良牲畜的国营牧场而努力奋斗！”这个题字当时成了牧场党政机关和广大职工干部的奋斗目标。

(二十六)

如何完成好“牲畜头数达到二十万，做牧业战线的典范”的目标，是当时摆在场党政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迫切任务。阿民博和认为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首先要有一定数量的本地牲畜做基础，同时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必须有一个试验场地。他在牧场党政班子研究下一步工作任务的全场工作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通过全体与会同志

的讨论确定后，阿民博和亲自抓了这项工作。1958年把阿巴哈纳尔旗第六苏木南部的六个初级社合并为“红旗”、“巴彦门德”两个高级社，从种畜场引进优良细毛种羊改良自己的羊群并获得效益的牧民斯楞、仲乃和牧业合作社领导拉布哈、恩和门德等都成了阿民博和的常客和朋友。阿民博和经常骑着大黑马如同看望自己的亲属一样走家串户拜访当地的牧民老乡，传达乌兰夫主席和内蒙古政府所提出的有关牧业发展的政策，宣传国营牧场的优越性和走集体化道路的方针政策。阿民博和的宣传教育深入牧民们的心，牧民们经常派代表到牧场参观学习，主动找牧场的党政负责同志和技术人员探讨畜牧业的经营方面的新课题。阿民博和风尘仆仆，艰苦努力，在一个多月走门串户，充分听取牧民的意見的基础上，通过向上级汇报得到批准后，1958年冬天在阿巴哈纳尔旗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了把“红旗”、“巴彦门德”两个高级社的所有土地、草场、人口、畜群全部划给国营牧场的决议案，当年12月牧场和合作社合并正式成立了“巴彦锡勒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首先关系到牧民们的切身利益问题，即工人和牧民的差别问题，那就是打破记分制执行工资制的问题。对此阿民博和与有关部门联系后把牧场的牧民招收为国营牧场职工，成为由总场统一调动的正式职工，把原来的记工分改成工资制，同时经济上由牧场统一经营、统一规划，职工由总场统一调动使用，在此基础上把原来的两个高级社改建为两个分场并安排了领导和技术人员。

1959年冬,召开全场职工代表大会,取消了“人民公社”这一集体经济性质的组织,改建国营巴彦锡勒牧场,这是由集体所有制经济转入到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象征。

(二十七)

从集体所有制转入到全民所有制在当时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阿民博和为了实现乌兰夫主席提出的“牧场牲畜头数达到二十万”的目标,率领全场职工不怕苦不怕累,他们忘我的拼搏精神至今还在广阔的巴彦锡勒草原上传为佳话……

对牧区工作经验丰富的阿民博和深知,在冬春季节,牧业生产特别忙,困难也特别多,在这个时候应给牧民们做实事。于是他每到冬春季节就骑着大黑马走村串户对牧民家逐户检查,问寒问暖,了解困难解决问题。当时蒙古包包顶毡子特别缺,所以大部分牧民的包顶毡子破旧,冬春季都难以保暖,阿民博和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作出规定,场部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全家在牧场工作的牧民每年每户增加两条包顶毡子,解决了冬春风雪季节牧民蒙古包的保暖问题。阿民博和场长经常到工程队和牧民的接羔点,检查工程质量和了解接羔保育情况。有一次到分场察看工程质量时发现了工程队打的墙壁质量差的问题。“你们打的这个土墙外表包装好看,但里边的质量有问题”说着随手拣起一根柳条把墙壁扎穿,然后把工程队的负责人叫到跟前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说:“弄虚作假,欺骗人民,坑害国家,成何体统……立即给我推倒重建,如果再有问题,我要严肃处理,决不客

气!”边说边带领工程队亲自推倒后重建。接着又去另一个工地察看后发现他们打的土墙质量好,“这个墙打的质量很好,谁如果用木棍扎穿,我把大黑马送给他,”随手拿一根木棍让一个年轻人用力扎,结果真没能扎穿。于是老场长把分场的支部书记扎木苏荣同志叫过来,“我们必须要做到奖罚分明,这个队的工程质量很好,不但应该表扬,还要奖赏他们,从场部拿一只绵羊改善他们的生活……”表扬和奖赏完成任务有功的同志,批评教育弄虚作假的人,这是阿民博和场长的一贯做法。

他从创建牧场的那天起经常到牧场点巡回指导给牧民解决困难。1962年春季锡日他拉分场的部分牧民在锡林河以南的毕鲁图一带出场,当时连续下几场大雨,锡林河发洪水,河两岸,交通被截断,出现了春季出场敖特尔接羔的牧民们无法与场部联系的严重局面。阿民博和来到锡日他拉巡回检察春羔情况时了解到这种情况说:“接羔季节对牧民来说是最繁忙、最劳累的时刻,各级领导要深入基层,关心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因为雨水洪峰而脱离战斗在第一线的牧民群众怎么能行?”决定渡过发洪峰的锡林河去看望河南毕鲁图的牧民。锡日他拉牧场的领导和同志们听到阿民博和场长要渡河就吓的都来劝他有危险,等河水稳定后再去,但阿民博和说什么也不肯,不听众人的劝阻,骑上了大黑马,这时候分场的领导们前来说,“老场长一定要渡河去河南的敖特尔,那我们派两个年轻人保护您”,他说:“现在这么忙的时候不能白白浪费人力,谁也不能跟我去,我保准没有事的”。水火灾难谁也很难预料,分场的两个场长对

老领导的安全实在是放心不下,二人悄悄地从后面跟上了,老练的骑士的确有经验。阿民博和到了河边下马观察了一阵锡林河的洪峰巨浪的吼声,然后把香牛皮马鞭卷上去,勒紧了大黑马的前后肚带,“看男子汉的运气,看大黑马的力气,阿民博和我去看望第一线的牧民们……”幽默的说着,从河北岸的阿尔其图胡硝,向河南岸的敖包图方向顶水而去,跟上来的两个分场负责同志从岸上看阿民博和渡河恐慌万状,毛骨耸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此时此刻人马在河心中,被卷上去的香牛皮马鞭象是雄鹰的两个翅膀浮在水面上助骏马洪水中前进。老场长阿民博和安全渡过了发洪水的锡林河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敖特尔的接羔点。

俗话说,增殖的牲畜毛色一致,兴旺的人家语言一致。由于牧场党政班子广大技术人员们齐心协力,以及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该场从1950年至1965年的10年期间内发展成为国内最有名望的国营种畜场,圆满完成了乌兰夫主席提出的牲畜头数达到20万的奋斗目标,同时职工干部达到2000多名,总人口达到7000多人,从总场到各分场都建立了党组织和行政领导班子,成立了完整的服务系统,如畜牧兽医站、机械修理厂、发电站等,成立了有二十多辆机动车,五十多辆胶轮车的运输队,还有比较完整的农牧产品加工厂、产品交易的供销社和商业网点、公办学校,建立了有50多个病床和有一定设备的卫生院,也有文化站和电影院等基本具备了一个完全自立的现代化牧场的规模。同时,以单项生产经营为主的十二个分场,优良品种和改良牲畜超过牲畜总头数的50%以上,为内蒙古地区和整个华

北地区、东北地区供应种畜打下了牢固基础。同时,年产饲料达到七百万斤。这个现代社会主义国营种畜场,受到了上级党政部门的奖励。1965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创立十大示范牧场基地的决定中,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锡勒优良种畜场指定为现代草原畜牧业发展基地,并把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中心设在巴彦锡勒牧场,全国与农牧有关的大专院校和中央、自治区各部门的草原畜牧专家学者来该场进行研究和学术研讨,同时锡林郭勒牧业机械学校设在巴彦锡勒牧场,任阿民博和同志为该校的第一任校长,从此为我国开发草原资源科学养畜和进行牧业机械化的试验提供了广阔的场地。

(二十八)

1966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无数革命干部、人民群众被打成坏分子、黑帮,很多好人被陷进了人间地狱。一心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在解决战争中带领骑兵队伍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取得赫赫战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内蒙古大草原创建第一个国营牧场功勋卓著的巴林汉子阿民博和也未能幸免,真是昔日英雄成了今日囚。在戎马倥偬征战频仍中安然无恙,日本参事官对他无可奈何,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对他不敢下毒手,而如今却被诬陷为“三朝官吏”、“乌兰夫黑帮的代理人”、“远东特务”、“修政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罪名,被戴高帽游街批斗,然后带到锡林浩特、多伦等地

的“群专”关押三年,身心和精神受到了严重摧残。残酷的折磨,使阿民博和全身失去了知觉,在1973年8月含冤而逝。

俗话说:骨头可以断,名誉不可侮。阿民博和在遭受严刑拷打、惨无人道的折磨的日子里,没有因解脱自己而说一句假话,更没有出卖自己的革命战友、同事和部下……。

阿民博和与长女斯琴高娃



阿民博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使用过的办公桌,笔者去巴彦锡勒牧场采访时,此桌由时任场党委书记使用,以此作为对老场长的怀念。

他被折腾得寝食难安的垂危之际,还关心牧场、关心群众,每当见牧场的同志就不停的问起“牧场的牲畜是否还保持着20万?优良品种的阿哈、卡卜金马群没有受到损失吧?周总理的牛、朱委员长的战马怎么样?牧民的物资供应如何?……”

“快!快!给我的大黑马备鞍……”

这就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的巴林汉子,巴彦锡勒草原上的带头人,牧民的好儿

子——阿民博和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一句话。1979年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照耀下,人民的功臣阿民博和的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中共锡林郭勒盟委员会、锡林郭勒盟公署、巴彦锡勒牧场党委在巴彦锡勒草原上立纪念碑,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同志和内蒙古党政军领导、阿民博和生前友好内蒙古军区政委刘昌等发来唁电,悼念阿民博和这位草原的儿子,人民的功臣。

大会对阿民博和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阿民博和同志是我党合作共事的高级统战人物,是我党的好同志,锡林郭勒牧民的好朋友,是巴彦锡勒人民的好带头人……”

“他是较早认识和拥护共产主义的进步人士,他参加革命以来的30余年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祖国、爱人民、爱巴彦锡勒草原……”

“他在解放战争和国营牧场的建设、发展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把毕业的精神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

阿民博和的功绩载入了巴彦锡勒的历史史册,代代相传。人民的功臣阿民博和永远活在草原人民的心中。

后 记

读过蒙古族著名作家阿·敖德斯尔笔下诞生的优秀文学作品《水晶宫》的人,无不被他生动的语言和故事情节,栩

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所吸引。《水晶宫》的主人公,是对工作充满热情,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热爱草原、热爱人民群众、有胆识、有智慧、有开拓精神的胡日查书记,是当时在巴彦锡勒草原上艰苦奋斗、白手起家首创内蒙古国营牧场,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畜牧业发展拼命创业的军队转业干部阿民博和的生动事迹塑造的优秀的文学作品。

今天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戎马一生阿民博和”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这个英雄人物的全传,而是在解放战争中指挥千军万马浴血奋战,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不可磨灭功绩的人民功臣,巴彦锡勒牧民的带头人阿民博和的传略。给人类的解放事业、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奉献出毕生精力的阿民博和写一个较完备的传记,是我多年的梦想,也是我这个政协文史工作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目前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有限,未能深入细致的调查和采访所有的知情人,所以仅以目录式编撰了这个传略文章,望读者见谅。在撰写解放战争中指挥草原人民铁骑蒙骑四师把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落花流水,解放锡林郭勒、昭乌达草原等前半部分史料时,参阅了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草原神骑兵》、内蒙古政协编辑出版的《伪满兴安史料》、《和子章与蒙骑四师》、《赤峰市志》、《共和国奠基人》、《巴林人物志》等书籍和有关历史资料,同时采访了在不平凡的年代里同阿民博和一起奋战在第一线的老战友原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刘昌将军和原蒙骑四师政治委员乌力吉那仁、骑四师警通连连长阿民博和的妹夫赛音巴雅尔、指导员吉日嘎郎、仲耐,原三十四团团团长确吉敖斯尔、阿民博和老家敖日盖牧民高

京、离休干部业喜桑布,阿民博和的妹妹离休干部查干、女儿斯钦高娃、索德、儿子朝鲁、特木热等40余名知情人,在此基础上撰写的。

关于阿民博和的后半生即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创建国营牧场的情况,作者2001年同巴林右旗政协副主席胡日查同志赴锡林郭勒盟首府锡林浩特市和英雄创建的巴彦锡勒牧场拜访了知情人,并查阅了有关的档案资料。采访和征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了锡林郭勒盟政协副主席高·拉西扎布、文史委主任敖日布、巴彦锡勒牧场调研员布仁同志、现任巴彦锡勒牧场办公室负责同志刘守敏和锡林郭勒盟档案局各位领导的热情帮助。特别是与阿民博和并肩战斗在巴彦锡勒草原的老同志原场办主任旺钦苏荣同志专门写了回忆文章,退休干部特古恩布仁同志也帮助整理和翻译了有关资料,对此,我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由于历史知识贫乏,水平不高,文章中一定有遗漏和错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中国少数民族影视第一人 著名蒙古族表演艺术家 国家一级演员——恩和森

穆松

恩和森,又名和中山,1925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敖日盖艾勒一个蒙古族和烈亦惕氏清卓力克图(和子章)家中。

恩和森的爷爷笃固尔扎布系昭乌达盟巴林左翼旗末代管旗章京。幼年的恩和森就读于其爷爷笃固尔扎布在敖日盖艾勒创办的家庭学校,后随父亲和子章到北京。不久考入北京灯市口育英学校,1939年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伪育成学院读书。1944年入王爷庙伪兴安陆军学校学习,1945年8月8日起义抗日。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东蒙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领导人哈丰阿委派到昭乌达盟宣传东蒙自治政府主张。公开宣传革命道理。不久和子章创建地方民族武装骑兵四师时他参加了骑兵部队。1946年在蒙汉联军第四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1947年入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9月转入内蒙古军政大学学习,加入了学校宣传队。在校期间,参加了《两个胡子》、《晴天了》、《人民战士》等歌剧、话剧的演出,开始显示出表演才华。1948年5月,

分配到内蒙古文工团,后调入内蒙古骑兵二师宣传队。1949年8月,应东北电影制片厂聘请,参加电影《内蒙古人民的胜利》拍摄工作,成功地扮演了主角蒙古族青年顿得布。不久参加了东北电影厂《金银滩》、《猛河的黎明》等影片的拍摄。1954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担任主角桑布。该片获1949年至1955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个人获表演二等奖,并被评为电影艺术先进工作者。同年,参加亚洲电影工作者会议。195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修班进修。1958年毕业后,调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工作,参加了内蒙厂与长影合拍的第一部故事片《草原晨曲》,饰男主角呼和。后来,又到长影拍摄《冰山上的来客》、《鸿雁》、《昆仑铁骑》等影片。1961年,导演内蒙厂第一部戏曲故事片《卖碗、走西口》。1962年内蒙电影制片厂下马,恩和森调内蒙古歌剧团(后改内蒙古民族剧团)从事歌剧、话剧的演出,并导演了大型话剧《红色风暴》、《南笛》、《奥力格尔玛》等。1964年“四清”运动中,被下放到公社劳动。“文革”中,又以“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中断10余年的影坛生涯,在《阿丽玛》、《成吉思汗》、《骑士的荣誉》、《马可波罗》、《天堂之路》、《现代角斗士》等十几部影片和《嘎达梅林》等多部电视剧中,成功地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受得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高度评价。1985年在影片《现代角斗士》中饰张林宝,获得百花奖。1987年获首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颁发的学会奖。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内蒙分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学会理事,政协内蒙古

委员会委员,中国民盟内蒙古委员会文化工作组组长。

1989年12月18日,这位蒙古族艺术家恩和森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内蒙古自治区恩和森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出了卜告。卜告全文如下:

我国著名蒙古族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理事、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北京演员剧团名誉演员、我区第一辈优秀的一级演员,厅局级离休干部恩和森同志,因公致残,久治无效,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凌晨五时,在内蒙古医院保健所,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自治区有关方面的领导人李全喜、云照光、珠兰其其格、白朝蓉、苏日塔拉图等19人组成治丧委员会。

1990年1月15日在呼和浩特青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恩和森遗体告别仪式。内蒙古党政领导千奋勇、文精、刘云山、乌云其木格、沙陀、裴英武、阿拉坦敖其尔、潮洛蒙、包音巴图、乌力更、云照光等领导同志和各委办厅局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近千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文化部、广电部、中国影协等发来唁电。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阿拉坦敖其尔至悼词。

恩和森病重期间中共内蒙古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民族剧团专门为恩和森安排了内蒙古文化艺术名流参加的文艺晚会表示慰问。

2003年中央电视台六频道专门介绍了这位蒙古族艺术精英巨擘的艺术生涯,称恩和森是中国少数民族影视第一人、著名蒙古族表演艺术家。

著名蒙古族作家、 诗人其木德道尔吉

穆松

其木德道尔吉,1924年11月出生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沙布尔台艾勒一个蒙古族牧民布赫楚德氏尼玛家中。

他幼年时由于家境十分贫寒,为了谋生,尼玛把幼小的其木德道尔吉送到沙布尔台庙里。他在庙里向大喇嘛学习藏文藏语和蒙文。1935年父亲又把他送到大板国民优级学校读书,他在学校勤奋好学,成绩一直优良,尤其喜爱蒙古民间故事,特别对蒙古族古典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每当放假他就随父亲尼玛在广阔的巴林草原上,美丽的沙布尔台河畔,在这景色秀美、水草肥沃的牧区生活。他深深地爱上了丰富多彩的蒙古民歌和民间故事,尤其喜好说唱好来宝、拉胡琴,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1946年他参加革命,起初在昭乌达盟所在林东的政治干部训练班学习,初次接触马列主义教育,同时也进行文艺创作,写出了处女作,即解放初期的一首革命歌曲《八路军好》,此歌广泛流传于内蒙古大草原,当时产生了很好政治

影响。

1947年,他参加了冀察热辽军区干校骑兵一队,投入了东北的解放战争,当年他参加了冀察热辽土地改革工作团,曾到农村参加土改,期间荣立一等功。1948年在内蒙古自治学院任教员,创作歌剧《复仇》、话剧《牛疫》,由学院红星剧团演出,同时还参加了《内蒙民歌集》、《蒙民歌集》的搜索整理工作。此后调到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小学任教。写了歌剧《巴雅尔之喜日》。1950年调到昭乌达盟文工团当创作员,写了歌舞剧《蒙古马》、话剧《绵羊》等。1954年调到东部区党委宣传部编辑《演唱材料》。1955年调内蒙古文联任《内蒙古文艺》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成立后,他任常务理事兼文学刊物《花的原野》编辑。创作了抒情诗《大青山之歌》(上集)以及长篇小说《西拉沐沦河的浪涛》,这是内蒙古解放后出版发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57年,其木德道尔吉以翻译身份,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1959年写了长诗《白鹿的故事》。1960年根据200年前的清朝木刻版本整理改编蒙古族文学代表作《英雄格斯尔可汗》第一、二卷。这部长达7000行的长诗颂扬了宁死不屈的英雄格斯尔,歌颂了古代蒙古族人民坦诚、纯洁的情愫,以其语言丰富,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等特点,受到了中国著名作家曹禺等人的赞赏,由《草原》月刊连载,并由安柯钦夫翻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与阿敖德斯尔合著的大型歌剧《达那巴拉》,在《花的原野》发表,由内蒙古实验歌剧团演出。发表了儿童文学作品《带小铃铛的狗》,长诗《献给伟大的节日》、《木头姑娘》,出版了诗歌集《巴林

驹》等。还从事翻译工作。用蒙文翻译的作品有:《毛主席诗词》21首的一部分,《董必武诗词》、《林柏渠诗词》、长诗《百鸟衣》、《勇敢的骑兵》、《中国少数民族民歌》、组诗《故乡》、《山水无限好》等(均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和《花的原野》、《草原》杂志上发表)。1963年至1964年在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学习。1965年调乌兰察布盟文工团任创作员,写了长诗《琶格玛》、《白鹿的故事》,长诗《兴安岭之晨》、组诗《草原鲜花》以及一些短诗。在此期间获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一等奖和文学创作二等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新内人党”、“反革命分子”、“反动诗人”,蒙受了10多年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写了长诗《祖国颂》。在病重期间继续坚持写作整理改编了蒙古族史诗《英雄格斯尔可汗》第三、四卷,创作了长诗《马刀与手杖》。

1979年4月其木德道尔吉当选乌兰察布盟第五届政协委员,10月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全国第四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1980年3月12日,这位著名的蒙古族作家、诗人因病去世,他去世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木德道尔吉诗文集》。

1997年10月19日,巴林右旗人民政府在大板翁根山给这位作家、诗人立了纪念碑。

我的一段经历

胡克

我是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大板镇人,生于1923年1月一个普通牧民家中。1935年至1937年在家乡小学念三年书。1938年至1942年在王爷庙兴安学院学习5年(大专),毕业后1943年先后在老家大板任小学教师。1944年被征伪国兵,入伍于通辽飞行队为通信兵。当兵期间投考王爷庙伪兴安军官学校合格,第二年即1945年1月入学为预科一年生。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8月10日下午日落时,按校方命令全校师生撤退到郑家屯、巴音塔拉方向进发。8月11日早晨走到葛根庙北山附近,在王海山、巴音图、色旺扎布等蒙族军官的指挥下,按原定计划、各连分头枪杀了10多名日本军官,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2002年2月确定该事件为抗日武装起义)。然后我们走到扎赉特旗好屯扎力嘎村子,迎接苏联红军。苏军把我们二百来学生带到洮南,抢修了日本侵略军败退时炸毁的洮儿河大桥,然后把我们派专列送回到王爷庙。回王爷庙没过几天,我参加了东蒙自治政府筹备委

员会组织的工作组。

9月中旬,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以东蒙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的名义派一部分哲、昭二盟的青年回旗协助当地组建旗政府,维持地方秩序。回昭盟的有阿鲁科匀沁旗的道尼道尔吉,巴林左旗(林东)的有恩和森、老存普尔来,巴林右旗(大板)的有胡克德力格尔,克什克腾旗的包音。回哲、昭两盟各旗的有10多人。工作组总带队的是希力布曾格,科左中旗的人,我们每一个带一份“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作为宣传材料。

9月末,我回到了巴林右旗大板,了解到的情况是伪旗政府的日本鬼子和一些伪职员跑掉了。苏军进大板时街里的群众和一些头面人物迎接了苏军,苏军为办事方便,选了几个头面人物组成了旗政府,能够为他们赶来羊群吃肉。苏军撤走后,我将旗政府进行整顿,充实了工作人员,正规的挂上了“巴林右旗人民政府”的牌子。当时东蒙政府筹备委员会任赵发财为巴林右旗旗长。成立旗人民政府以后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学校也开学了,人们的心情也安静了。按照王爷庙的做法,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并成立了内防队维持社会秩序。有20多个青年加入了青年团,内防队也是这些青年。

10月末,巴林左旗的老存普尔来带着东蒙自治政府筹委会的信来大板,要我同他去林西送这个信。我俩人到林西找到热北分区有关负责人石汝霖同志将信交给了他。因为日落时到的林西,让我们在军营住了一宿,战士经营我们的马,对待我们挺热情。第二天,八路军领导同志在饭馆设

宴招待我们,有王逸伦、李望淮、愈楚杰、卜云龙等人。对待我们特别亲切、诚恳,我们很高兴、很受感动。我们送去信的内容是东蒙自治政府筹委员要求林西八路军对和子章保持克制,待王爷庙派人去妥善处理,不要发生冲突。林西八路军和和子章的地方武装自卫军发生冲突的原因是林西八路军要接收林东,部队进发到半路时,和子章认为事前不联系、不打招呼,简直是不讲理,肯定是“假八路”,便出兵迎击了去林东的八路军。

从此我与八路军熟悉了,有什么事情随时随地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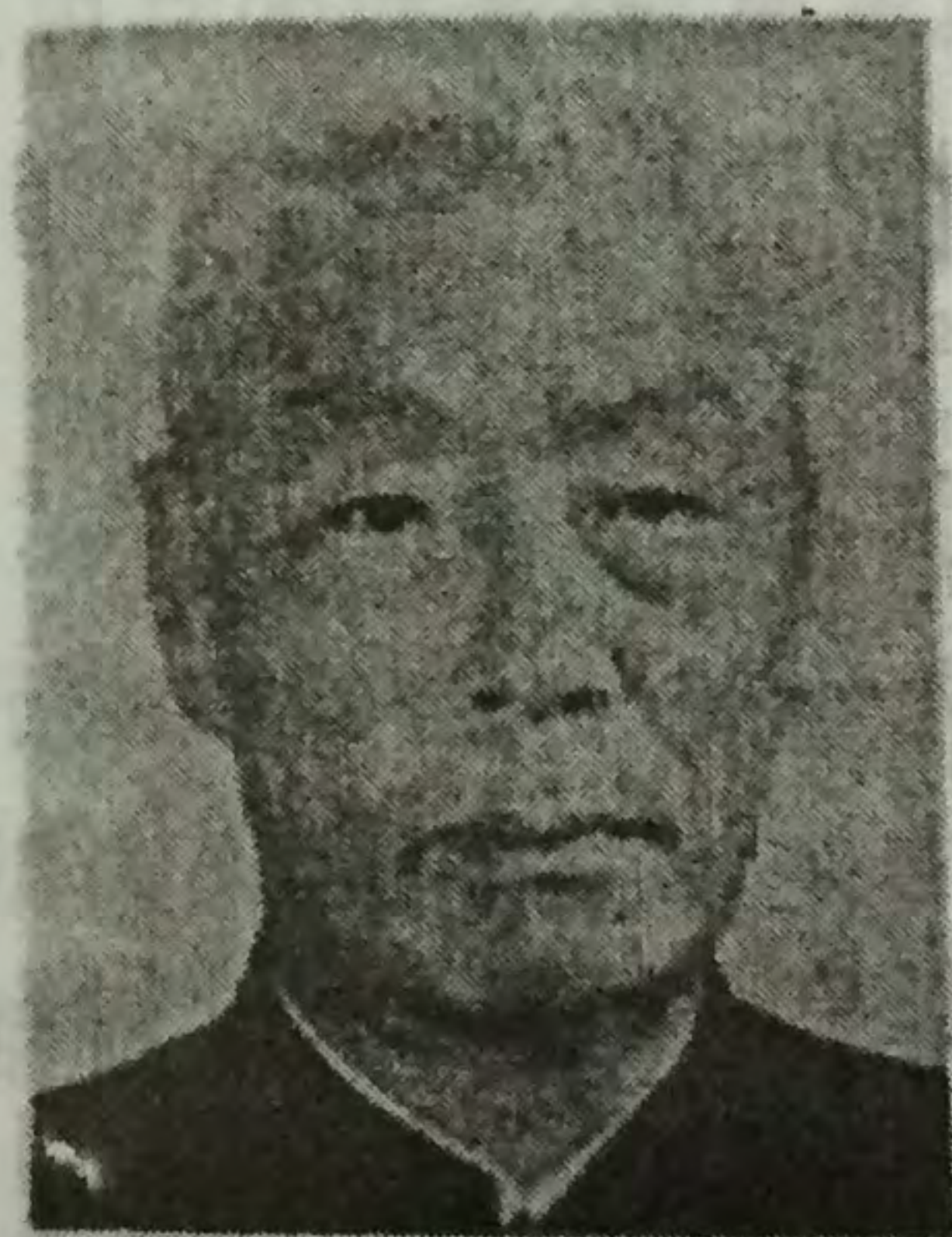
1946年4月3日,乌兰夫同志在承德市召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简称“四·三”会议)。4月末,徐子干等来到巴林右旗开辟工作,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我们很多青年参加了这个运动。9月中旬,昭乌达盟蒙汉联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同志来信调我去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从此我做编写和翻译部队战士课本,部队整训时做口头翻译。

1947年5月,组织上派我去冀察热辽分局“群众日报社”学习。当年秋,报社随着领导机关南下到赤峰。不久又派我参加土改工作团(有分局党校、建国学校、报社)搞土改,从凌源、叶柏寿、义县、北票、朝阳、建昌、羊山等地搞了7个多月的土改工作。东北四野兵团准备包围锦州时结束了土改工作。

1948年8月在“群众报社”学习完毕,回到了昭乌达盟农牧报社工作,搞编辑、记者工作。1949年5月派我去群众报社办事,正好赶上在承德召开热河省劳模大会,李运昌

主席主持领导,群众报社要我参加大会,采访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敖日盖劳动英雄旺琪格的先进事迹,写了五千多字的稿发表在群众日报上。

1949年10月1日,普天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活动结束后不久,“昭乌达牧农报”撤销,人员调到乌兰浩特在“内蒙古日报东部版”工作。我搞了30年蒙汉文二种文字的新闻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至1980年在呼伦贝尔盟语委工作,1981年至1983年在地方志工作,1983年10月离休,享受厅级待遇,机构改革中分配到呼伦贝尔盟档案局。



胡克(又名呼和德力格尔),这位早年参加抗日起义,东北解放后受东蒙古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哈丰阿等人的委派来巴林右旗公开宣传革命,宣传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主张、筹建巴林右旗人民政府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盟市级离休干部,因病于2003年10月30日在呼和浩特逝世。根据这位革命前辈的生前遗愿,骨灰运回老家巴林右旗大板翁根山安葬。

2003年11月3日巴林右旗党政各界在大板隆重举行胡克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编者

忆革命烈士蒙和舞乐极

于景泉

我作为蒙和舞乐极生前的学生、部下和亲属，曾在其身边生活、工作较长一段时间。现就我所了解的蒙和舞乐极主要生平事迹，结合我自己亲历、亲见、亲闻和相关的历史背景作一回忆整理，以缅怀先烈、告慰英灵，略表我的哀思。同时，以此献给家乡父老乡亲 and 广大读者。

(一)

蒙和舞乐极，汉名汪鸿斌(1)，蒙古族，一九一六年生于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祖父赛音巴图曾作清末土默特左旗(今阜新)扎萨克郡王衙门印务扎兰。父宝音呼日雅中年病故，家境渐衰。

蒙和舞乐极早在三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奉天(沈阳)蒙旗师范，并被分配到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一校任教。一九三八年其父病故。一九四〇年，蒙和舞乐极为照顾老人和家属搬来大板镇居住。从那个时候起，他同巴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蒙和舞乐极作为一名热血知识青年，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日伪

反动统治时期，坚持兴办民族(大众)教育，呕心沥血、辛勤耕耘，培育一代巴林知识青年，为繁荣和发展民族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祖国光复，但又因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中国人民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前途命运的严重斗争。蒙和舞乐极顺应历史潮流，追求真理，坚持进步，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优秀共产党员，担任昭乌达盟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重要领导职务，同民族民主革命最凶恶的敌人，展开坚决斗争，直到最后以身殉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三十岁。

巴林草原是他亲爱的第二故乡，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用自己鲜血染红的“一方热土”。

(二)

蒙和舞乐极出生地——阜新老家位于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西部山区伊玛图，汤图河流域及其沿岸地带，距汤图河源头仅十余华里，是诸多“河边村庄”之一。汤图河虽算不上名江大河，但它却以常年流淌、清澈见底，点缀着阜新山川大地、农家山庄，滋润着沿岸的土地，调节着周围的气候，被当地人视若“生命河”。蒙和舞乐极家住河西，叫西牛心屯——蒙族人称其为巴仁陶斯根艾里。

阜新地区自古为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居住区域之一。如从明代而论，当时是蒙古兀良哈都泰宁卫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原驻牧于河套(今呼和浩特一带)蒙古土默特部，

蒙郭勒津部,由阿拉坦汗(亦称俺答汗)之曾孙鄂穆楚琥尔台吉率领向东迁徙,最后在今辽宁省朝阳、阜新地区定居。居于朝阳地区的为土默特部,居于阜新地区的为蒙郭勒津部(2)。清初,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阜新、北票、朝阳地区分别被命名为土默特左中右翼旗,隶属卓索图盟。清末、民国、日伪时期,阜新曾几易其名,甚至出现旗内设县或旗县并立,一度归热河、锦州管辖的局面。不过,阜新蒙族人,在日常生活或私下交往中,按自己的传统习惯往往把阜新称作“蒙郭勒津和硕”或说自己是“蒙郭勒津人”,很少或基本不用它的官称——土默特左旗。可见“蒙郭勒津”这一称谓源远流长,深入人心,相延数百年而不衰,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或许反映阜新蒙族人对于自己祖先和古老部落的特殊情感——无限缅怀、憧憬和尊崇心态了。

阜新,地处辽西走廊冲击平原台地北缘,属于东部蒙族居住区域西南边缘地带。县境南端大体与清河门、白厂门即古时“柳条边墙”(界壕)接壤(3),同义(县)锦(州)及渤海湾相连。距海岸线约三百余华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于农耕养殖,是人们生产生活理想之地。

阜新蒙族数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适应和改造当地自然环,逐渐接受农耕技术——弃牧为农,跨入农耕群体行列,也不过三、四百年历史。尽管他们长期生活在不同民族杂居或交汇处,生产生活方式有变化,但他们语言文字、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基本民族素质特殊却较完整地保持下来。不仅如此,还逐渐形成具有自己(地区)特色的阜新蒙族文化——“蒙郭勒津文化”。如他们的饮食、起居、

服饰、婚姻、丧葬、礼仪、社交、文娱、体育、房屋建筑以及祭祖、节庆、宗教活动等各方面有自己习俗特色而与别的蒙旗,特别与牧区形成一定的差异。更值得一提的是,阜新蒙族在古语言文字的运用、继承和发展上,特别是蒙古文字的“规范化”、“文言化”和书法艺术上曾作出自己的贡献。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藏传佛教经由土默特部俺答汗在青海迎请西藏格鲁派(黄教)领袖索南嘉措到蒙古地方传教,并加封为达赖喇嘛(4),藏传佛教同蒙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包括阜新地区在内,呈现更具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氛围。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669年)东蒙最大寺院之一,素有“东藏”之称的阜新瑞应寺(今佛寺),以其精美高超的建筑艺术风格(规模);设置和藏传佛教基本理论和门类学科(因明学、时轮学、密宗、医药学)以及丰富的文化典籍等著称于世,曾影响旗内外乃至整个东蒙地区而闻名遐迩。清代蒙古族文化名人尹湛纳希,蒙文演义小说《唐史五卷》作者瑞应寺喇嘛恩和特古斯,《红楼梦》蒙译兼评论作者哈斯宝等人均先后出生或生活于阜新、朝阳、北票同一文化圈内。说明阜新自古文化发达,是蒙古族文明摇篮之一。

(三)

蒙和舞乐极出生于上述具有阜新文化特色和生活富裕的家庭环境。由于阜新蒙族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其父在他八岁(一九二四年)时,即以“喇嘛学子”将其送入距家只有十余华里的阜新瑞应寺(蒙语称蒙郭勒津查干葛根苏莫),拜该寺喇嘛学者占巴创柯尔为师,习文学经(蒙藏

满文)及寺庙绘画技艺。这是他幼年接受启蒙教育的开始。蒙和舞乐极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性情开朗温和,博得喇嘛教师和周边人的好评和称赞。一九二六年,其父鉴于儿子天赋、性格特长,考虑长远发展,遂改变主意,果断停止其潜心“学经”的寺院生活,送入本旗王府两级小学。这样,蒙和舞乐极又走出“佛门”进入“校门”,开始接受较为正规的学校教育。一九三二年十六岁的蒙和舞乐极进入奉天(沈阳)蒙族师范就读。该校创办于一九二七年前后,是经张学良将军批准创办并身兼董事长,达斡尔族人郭道甫任首任校长,是当时东蒙唯一一座最高学府(5)。学生多系各蒙旗民族上层或富家子弟。蒙和舞乐极作为来自阜新蒙族子弟之一,学习努力,品学兼优,民族意识强烈,热心民族教育,深得学校进步教师的赏识。毕业分配时,蒙和舞乐极作为优等生,经当时伪“兴安西省”教育总监乌恩吉雅的推荐和特许,分配于边远蒙旗——巴林右翼旗大板“公立国民优级学校”(今大板一校前身)任校长,以促进巴林民族教育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四)

蒙和舞乐极于一九三五年即二十岁那年(他亲口说过)来巴林右旗大板“走马上任”。时值日寇已武力侵占我东三省、热河和东蒙各地,成立所谓“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巴林右旗被划归伪“兴安西省”。蒙和舞乐极毕业分配到巴林右旗,在“伪省会”开鲁办理赴任“介绍信”等有关事宜,途径通辽、开鲁,再从那里转道天山、林东到大板。这是蒙和舞乐

极生平第一次千里迢迢自东向西涉足,并穿越“科尔沁”大草原,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旅行”了。那时节,日本人打进来,全国特别是东北地区陷入极度混乱动荡局面,盗贼横行,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尤其外出行路之一,事事处处感到笼罩着恐怖紧张气氛,令人忧心忡忡,惶恐不安。不过,据我所知,蒙和舞乐极此行还算“走运”,一路上几乎未遇“麻烦”,总算平安无事,走完这段路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广阔、坦荡、一望无际的绿色“科尔沁”、巴林草原,以古朴,近似原始且独具魅力——浓郁的蒙古草原风情,迎接并欢迎他的到来。蒙和舞乐极触景生情,百感交集,激动不已,仿佛来到了既陌生又亲切,同他自幼生长在阜新农家山村、田园景色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蒙族人“真正的家乡故土”。这块土地前不久也横遭日本铁蹄侵扰和蹂躏,但同地处“边外”饱受民族矛盾、盗贼侵扰之苦,民不聊生的阜新地区相比,仍不失为“世外桃源”、“塞外净土”情景。一幅宁静、祥和、轻松、生机昂然的蓬勃景象和一股草原芬芳清爽气息,令他赏心悦目,流连忘返。他似乎抚摸到了作为蒙古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广阔天地和特有的神韵轨迹。巴林草原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坎,他热爱巴林草原,决心奉献自己的一切。

巴林不仅有秀美的风光,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人杰地灵。秦汉三国时期巴林一带居住着乌桓、鲜卑民族。东晋、南北朝时期,巴林为契丹族发祥地,曾建立雄居中国半壁河山——辽王朝而显赫一世。巴林在金代属北京路,元代为全宁路,明代为无良哈地,清朝时期属昭乌达盟,民

国、日伪时期属热河特别区或伪“兴安西省”、“兴安总省”管辖。蒙古族迁居巴林地区始于一二一四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的第九年。值得一提的是在它的历史上曾出现成吉思汗时期统帅巴林部的中央万户长纳牙阿，忽必烈征服南宋王朝的著名军事统帅伯颜等历史人物。巴林部数百年来来的历代首脑——台吉、郡(亲)王、扎萨克或日伪时期的旗长，均为世袭——成吉思汗后裔子孙，姓博尔济吉特氏。自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以来先后有三个公主、二十七个格格下嫁巴林部(6)。更显现巴林古老、正统色彩和显赫地位。

巴林教育同其他蒙旗教育一样，曾经历漫长岁月。早期的王府“必且赤”书斋、私塾、学馆、民间的艾里嘎查家庭私塾以及喇嘛寺庙“收徒”学经识字“办学”等。这些王府、民间、寺院三位一体的不同“办学”形式，对于保持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和教育都曾起过承前启后“不断线”的积极作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清王朝倒台，封建礼教、愚民政策相继崩溃，各蒙旗启蒙教育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巴林右旗有识之士，于一九一〇年开办第一座较正规的“旗立大板普励学校”(7)。应该说这在巴林教育史上，是一次开创性的突破和发展。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历经沧桑，发展缓慢，且一直停留在类似“私塾”——较少有近代科学文化内容的原始水平上，加之三十年代日伪推行所谓“新学制”，向各级学校派遣日籍教官讲授日语——殖民奴化教育，使巴林民族教育“雪上加霜”，呈现严峻复杂局面。

(五)

蒙和舞乐极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担负起弘扬民族教育重任，开始他长达八年的执教生涯。

他到任初期遇到人地两生、生活艰苦、不适应当地习惯等种种不便和困难，以高度的政治热情、严谨的科学态度，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才干和组织能力，在各方支援和帮助下，采取措施，着手加强巴林右旗教育，特别是大板一校的全面建设做出了贡献。

一、扩建大板一小，改善教学和学习环境。大板一小(最初叫普励学校，后改称(伪)“公立国民优级学校”六年制的两级小学)。当时，校址位于大板街中心“经堂庙”西院，只有两排老式平房，室内摆上“炕桌”，外加数间师生宿舍和简易运动场等为全部设施。条件简陋、原始，其面积和规模均不能适应和满足实际需要。有鉴于此，蒙和舞乐极把扩建新校舍提到议事日程。他亲自选址，亲自规划设计，亲自筹措资金和施工力量，经三年的努力，于一九三九年在原校址对面百米外的(马路南侧)开阔地上，建起了能容纳数百至上千人，比较正规的新校园。我是一九四〇年(伪康德七年)在大板插班读二年级的。当时尽管新校园后期工程仍在进行，但整个学校已经在新校园内开课了。给我的印象是，新的校舍宽敞、明亮、整洁，给人以强烈的新鲜和舒适感，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学生朗朗读书声，嬉笑打闹声，不时“打铃”吆喝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犹如一座“儿童乐园”，好生热闹。记得新校园主体工程主要由办公室、教室

(五幢三十余间)、周长四百米的运动场、方圆约三华里的围墙,以及校内草坪、花池、绿墙、水井、厕所、菜地和成行的杨柳树等构成。布局合理,整齐美观,交相辉映。人们形容它是一座“花园”式建筑或镶嵌在草原深处的一颗璀璨“明珠”,别开生面。同时,它的出现,使当时仅由数百户居民、数座庙宇、行宫和数家杂货铺构成的“草原小镇”——大板街,注入不同建筑格调而异彩纷呈,不时招来人们好奇和羡慕的目光。

二、一九三九年,蒙和舞乐极提任伪“旗公署”文教股长(仍兼大板一校校长)。他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大抓全旗各类学校的增设和发展。他四处奔波,积极筹措,开辟资金来源渠道。在当时的旗长萨嘎拉扎布等人的支持下,先后开设了大板女子小学、东庙喇嘛学校、大板产业学校、蒙医研究培训班以及分布全旗各区乡的“国民小学”约十余座。原有的数座乡村小学,经蒙和舞乐极进行整顿指导,得到了充实和加强。由于蒙和舞乐极的努力,全旗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教育网点。为尽可能多吸收和容纳各族子女,特别是农牧民子女上学读书,创造了必要的场所和物质条件,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全旗教育覆盖面和普及率。

三、动员更多的适龄儿童、青少年入学,扩大教育面。蒙和热爱自己民族,热爱并忠诚民族教育事业,视教育为提高民族素质之根本。他鉴于当时不少人对教育不那么重视或“轻学重教(宗教)”,有的“宁让子弟入寺庙当喇嘛,也不愿送学校读书受教育”的陋俗偏见,决心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动员和思想发动工作。为此,他打破学校只“坐堂招生授

课”的常规,放下“架子”,开动腿脚,走出校门,深入全旗区乡村镇,艾里嘎查,走村串户,一面作调查研究,一面进行宣传动员和说服工作,足迹遍布巴林大地。他为掌握有关教育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系统进行包括全旗“文化状况”特别是十五岁以下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人口、经济状况为内容的全面调查摸底。凡符合入学条件的,经与家长商妥,当场“拍板”,限期入学,有的还附以“纪律”进行约束。对于居住分散,边远地区或家庭经济困难,无力上学的则采取“收进来”免费寄宿或发放助学金的办法加以解决,受到各方的好评。

由于受新增学校 and 入学学生激增的压力,学校经费一度发生困难,曾影响学校正常运转。蒙和舞乐极在伪旗长萨嘎拉扎布等人的支持下,发起成立民间集资办学组织“兴学会”,发动社会各界捐款献物(包括牛羊粮食),不仅弥补了学校经费不足,而且通过这一举措,进一步调动了全民办学的积极性和社会意识。

四、注重灌输或引导学生树立自尊、自强、自立意识,不图功名利禄,勇于献身的高尚情操和理想。自蒙和舞乐极上任到一九四〇年前,对过去长期沿用的《三字经》、《百家姓》等充满封建礼教,毫无生气的旧式教学内容,进行大胆改革。他自编不少教材、课本或有助于学生健康上进,讴歌生产、生活的诗词歌曲,进行讲授和组织演唱。其中一些歌曲,在我插班读书的一九四〇年,已经广泛流行,几乎家喻户晓,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和良好影响。他编写的《民众教育课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是一部绝妙的儿童启蒙读

物。它集中宣扬人类并非“上帝创造”的唯物世观。课本以生活在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如何在冰天雪地、酷寒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创造生活、生存空间、繁衍生息，与天斗与自然斗等生动事例，宣扬“人定胜天”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批驳当时颇为流行的“宿命论”、“生死轮回”等迷信宗教观，针对性、说服力很强。这说明蒙和舞乐极不仅具有民主民族革命思想，而且还能用唯物世界观——进步思想教育青少年了。这在当时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劝导青年歌》、《告诫同胞》等，类似“醒世格言”，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和“净化心灵”、唤醒民众的启蒙作用。我至今尚记忆其中一些歌词片段。其中一段大意是：“要抛弃那黑暗和愚昧，投身光明与进步，不求功名显赫，只求人间正道，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同志。”“要抛弃那自私和迷信，创造公正和文明，言必信、行必果，知行合一，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同志。”……蒙和舞乐极另一作品《牧马人之歌》更富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其中一段歌词大意是：“广漠草原，晨星稀疏东方微白，风啸尘扬，啊！我那惊散的马群不知去向何方？我跨上骏马，手持套马杆，四处漫步，寻觅”……抒情、奔放、悠扬、动听。令人百唱不厌，回味无穷。

五、蒙和舞乐极为师表，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体察民情。他的热心办学精神、深入群众发现和解决办学中实际问题的良好作风，使群众耳目一新，大受感动。蒙和舞乐极，这位年轻又热心的“巴克西”（老师）成了他们心目中颇受尊敬和欢迎的人。我当时惊奇的发现，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汪校长”或“达日嘎巴克西”（校长老师）。在一个时

期，前来登门“拜访”或请教、联系、咨询者几乎天天不断、络绎不绝。有的甚至从上百里外的边缘牧区赶来，献“哈达”送牧区特产——奶制品以及炒米一类食品，以表谢意或慰问；有的领上将要入学的孩子，带上“礼物”特来拜见“达日嘎巴克西”，并请赐“学名”以图吉利或乞求“关照”。凡此种，不乏其例。大板街著名蒙族针灸大夫鲍金荣之子，本名成邦，幼年丧母失学，蒙和舞乐极发现后深表同情，经取得鲍先生同意将小成邦收为大板一校学生并赐名要斯图。一校学生，在蒙和舞乐极的推动和号召之下，几乎都使用“学名”或本民族名姓，其中不少学生的名字还是由蒙和舞乐极亲自赐授的呢！连汉族学生刘素珍、刘贵臣姐弟二人也大受影响，先后为自己起用蒙古名而赶“时髦”。……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蒙和舞乐极为培养学生及家长民主情感和民族意识所作的努力，以及在日伪统治下坚持民族传统韵味不动摇的精神风貌。

六、学生撕毁“级训”的一场风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其嚣张气焰不可一世。翌年，大板一校来一名叫户田朝弘的日本教师。此人身材消瘦，满口“包牙”，自称是日本“在乡军人”，擅长军事体育（武士道），自命不凡。他同前任——另一日本教师朝日奈噪（日本富岗人）不同，从不上台讲课，不务正业，行动鬼祟，身份可疑。他一“上任”即鼓吹所谓“日满提携”、“建国精神”、“王道乐土”、“支援大东亚圣战”等，还在师生中散布对前任“汪校长”（蒙和舞乐极）的不满言论，激起一些学生的反感和不满。记得这一年的夏秋季节吧，我们班发生有人为发

泄不满,即而撕毁张挂于教室黑板上方“级训”横幅事件。一时震动并波及全校上下。户田更是犹坐“针毡”,上窜下跳,以“反满抗日”嫌疑,决意亲自出马,追查严办事件肇事者及“幕后指使人”。他声嘶力竭,命令全班集合站成一列,然后由他进行逐个盘问,未获任何结果。于是他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不惜诉诸暴力,严刑拷问了。我因全班中个头、年龄较小,按习惯站在队尾。不料成了被“重点突击”对象,大概他也早已觉察我是汪校长亲戚,更觉格外“眼红”,竟大打出手,连骂“八嘎雅鲁”,口露“包牙”,把我从队列中拖出,连连掌嘴,煽一顿“耳光”,还用“武士道”动作把我打翻在地拳脚相加,打得我鼻青脸肿,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我就地打滚,挣扎反抗。户田见我仍不“脱口”,无奈,住手。印象中还有一两名同学被打。现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此事到后来以停止克尔伦、赛音乌尤图等四名同学学籍并罚校内劳动一周(未曾公布任何具体“罪状”)而悄悄收场。

四名同学和我都是受害者。户田的“表演”,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伪善、凶残本性。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东北各族同胞不幸沦为“亡国奴”,任由外人欺凌压迫的悲惨历史。

(六)

蒙和舞乐极多才多艺,还表现在兼通蒙汉日等多种语言文字,擅长诗歌、音乐、绘画技艺。他的日语相当流利,是他在奉天(今沈阳)读书时打下的基础。说实在的,蒙和舞乐极所具有的“日语优势”在那个时代,无疑给他带来包括“办学”在内的一定的方便和有利条件。他正因为懂日语,

一九四一年婚后不久,在伪“旗公署”文教股长任内,奉“上司”之命,同一些人“东渡”日本进行考察,往返月余。归来时,顺便带回雕有樱花图案的“日式”茶俱等纪念品。印象中他还讲述过“东渡”——漂洋过海旅途见闻以及朝鲜日本风情。他曾说日本乃一海中岛国,科技发达,国力强盛,但靠对外扩张,其国内战争气氛很浓,普遍蔑视外人,排外情绪很重,使他大为反感等一类话,至今仍有印象。同时,出于满足我们这些“小兄弟”们的好奇心理吧,他在当时自家大门洞内西侧墙壁上,挥毫泼墨画了一幅“城市一条街”的壁画,令我们赞叹不已。画中的高楼大厦、马路、路灯、路旁树木鳞次栉次,相互辉映,层次分明。有趣的是,画中一少女模样的人从楼层阳台高处,俯身鸟瞰的神态,以及一足蹬脚踏车从少女视线下方挥手昂头而过的男青年,似乎他(她)们在进行相互传神、追逐。栩栩如生、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此外,我还见到他所画各类漫画人物像,也很多,但无一件保存下来,至今想起来,不能不是一件憾事。七十年代,我曾多次重访故里,“旧地重游”,发现那座蒙和舞乐极住过的昔日宅院,已由政府占做他用,然而那幅“门洞壁画”依旧,我喜出望外、兴奋不已。不过画面因年久脱落、褪色,变得“泪痕”斑斑,模糊不清,不免勾起对三十多年前的作者及一往“风尘岁月”的追忆、联想,陷入久久沉思之中。

一九四三年底,蒙和舞乐极调任王爷庙(今乌兰浩特)伪“兴安总省”博彦满都省长秘书官。随后蒙和舞乐极母亲妻儿一千人到王爷庙团聚。第二年,我和吉图、额尔德尼三人考入王爷庙伪“国立兴安学院”就读。这样,我又有机会

同蒙和舞乐极一家得以经常见面,相互照应了。那时,日本人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气焰受挫,开始走“下坡路”。市民、学生、一般职员包括蒙和舞乐极一家“口粮”定量配给,生活愈加艰难。我们学生伙食,被限制在每人每日三碗“玉米渣”加土豆的连汤饭,勉强维持生存。到一九四五年春,开学时不少学生因不堪饥饿等原因,自动退学。我的同学额尔德尼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形势”日渐紧张,学校很少上课,还出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进行活动。一个临时插进来自称阿迪亚的学生,因其言谈举止多有破绽行迹可疑,引起大家猜测,怀疑是日本人派进来,监视师生的“密探”。再者,那个户田朝弘的日本人,又神秘地出现在学院诸多日籍教师中间,在我们来自巴林右旗的学生中引起一阵恐慌,觉得这一下“冤家路窄”,日子不好过了。蒙和舞乐极对户田等日本人以“太上皇”自居,飞扬跋扈,早已深恶痛绝,要我们提高警惕,小心谨慎,坐待“时局”进一步变化,做好应付“事变”的思想准备。

同年五月间,王爷庙各院校被当局勒令开赴中蒙边境——大兴安岭阿尔山、白浪沟一带林区进行所谓“勤劳奉工”——割剥桦树皮劳动。户田朝弘以“工地总指导官”身份同往。我们数百名平均年龄十六七岁的一群学生,如同“苦力”、“囚犯”被驱赶在崎岖山峦、原始密林中,起早贪黑,日晒雨淋,蚊虫叮咬,受尽饥饿,劳累患病,艰难苦熬,遂怨声四起。据我后来得知,此时曾由几名高年级生,相互串连,准备在适当时候密谋发动“哗变”(干掉日本指导官)集体越过边界,投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以求避难,只是

“时机”不成熟,尚未发动。但时来运转,迎来了八月八日凌晨苏军出兵东北——向日军防线实施突击的激烈枪炮声。我们为日本人恶贯满盈“气数已尽”和红军正义的惩罚性行动,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万分激动。那个日本“总指导官”自知不妙,趁人不备早已钻入密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躲过了对他的正义处罚。

我们在蒙族教师的组织和率领下,有组织地撤离工地,踏上回归王爷庙腹地的艰难路程。

我们赤手空拳,一无所有,在上有苏军飞机轰鸣,下有阵阵炮声“伴奏”和不时与溃逃日军相遇,随时可能发生伤亡的情况下,日以继夜,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拾木耳、野果充饥),艰难跋涉。当我们离开工地第二天即八月九日下午傍晚时分,在一山脚下正欲停步歇息时,一股溃退下来的日军,向我们开炮,开发炮弹在我们近处爆炸。险些造成人员伤亡。我们惊恐一场,遂调整队形,由高年级生组成前卫“尖兵”,小心翼翼边观察边前进。大约第三天吧,我们终于走出“危险区域”,进入有人烟的平川,安全地带。我们饥饿不堪,“行军”速度大为减缓,甚至出现步履艰难,难于坚持的困难局面。幸遇好心的达斡尔族群众的慷慨相助,饱餐一顿香喷可口的“玉米饭”,得以摆脱饥饿,终获生机。大约第六天,我们进到距王爷庙以北九十华里的查日斯台村。在该村,我意外地遇上了前几日由王爷庙避难到此地的蒙和舞乐极一家及部分巴林右旗人。蒙和舞乐极母亲见我不期而归,自然喜出望外、高兴异常,说:“兵荒马乱,大难不死必定是佛爷保佑。”还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蒙和舞乐极也

觉得事情如此巧合,且大家都安然无恙,令人庆幸可贺。他对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犹如秋风扫落叶,一举击溃和歼灭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深感钦佩,由衷地高兴。说:“我们从此结束了十几年的‘亡国奴’生活,重见天日,总算有了出头之日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查日斯台村,位于南通王爷庙、通辽、沈阳的公路要冲,地势平缓开阔,是苏军向南推进或集结必经之地。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目睹苏军强大阵容,不断向前移动的“钢铁洪流”,令我们惊叹不已。苏军中的布利亚特蒙族军官负责勾通我们同苏军之间的语言“障碍”,使苏军得以了解我们的身份和处境,表示友善。

八月下旬,经蒙和舞乐极出面交涉,苏军同意让我们部分学生和蒙和一家搭乘他们的汽车到王爷庙。我们搭乘苏军汽车,终于顺利地回到了王爷庙。

(七)

“事变”后的王爷庙,到处是日本人撤退逃跑时留下的破坏痕迹——断墙残垣、满目疮痍,已非昔日之貌。我们这些学生一时成了无家可归,无处栖身,流浪街头的“无业游民”。幸而蒙和舞乐极全力设法租得两间民房得以安身。我和吉图等人参加清除街道废墟、垃圾、修复房屋、马路等劳动,换得仍在流通中的伪“满币”购来玉米面维持生活。可是偏又“祸不单行”,王爷庙竟闹起“百斯笃”,瘟疫蔓延,出现死人。有人说,这是日本人临撤退时放出带有病菌的老鼠,四散传染的结果。苏军城防司令部即实行戒严,组织

卫生防疫人员进行分区分片隔离,消毒、救护,疫情终被控制。九月下旬十月初,随着苏军在“满洲”地区军事行动的中止并陆续撤向苏联国内,进出或集结于王爷庙的苏军陆、空、坦克装甲部队,各类火炮和运输车辆,充斥王爷庙大街小巷,郊区村庄。“归流河”两侧平川、山坡上的苏军,看上去密密麻麻连成一片,望不到尽头。一队队荷枪实弹、高歌行进的士兵,肩背“转盘式”冲锋枪,手持红黄绿三色信号旗,金发碧眼的女交通兵不时举旗疏导、指挥往来穿梭、喧闹不休的“车水马龙”,以及竟在一般地形,开阔地,草坪上任意起降,并发出阵阵刺耳欲聋、外观各异的军用飞机,时而编队,时而水平或垂直,时而左右翻滚飞行,犹如扑天盖地的飞蝗,构成天上、地下、空中、陆地动静相济,浑然一体的立体壮观场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苏军雄赳气昂的强大阵容,可以说无与伦比,当属世界一流。他们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所向无敌,号称日本“王牌”的精锐百万关东军几乎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悉数被歼,这决不是偶然的。人们以感激之情欢迎他们的到来。但是,他们中发生的一些“骚民事件”,在东北各族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这是令人遗憾的。

(八)

一九四五年秋,蒙族上层人士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人,根据日本投降,祖国光复后出现的政治形势和某种“真空”局面,以内蒙人民革命党东蒙负责人的身份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同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元帅进行私访

性会谈。主要探讨内外蒙古合并的可能性及内蒙古未来发展前途等问题。据说蒙古方面强调,内外蒙古虽系同一民族,但发展阶段、历史背景不尽相同,不宜谈所谓“统一”问题。他们建议有关内蒙未来前途可同中共合作协商求得解决办法等等。会谈似无具体成果,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取得共识,博彦满都、哈丰阿遂返回王爷庙。这件事我是从蒙和舞乐极那里探听而知的。因为当时人们出于民族向心力,倾慕外蒙革命和建设,都在议论和关心博彦满都、哈丰阿乌兰巴托之行及其会谈结果。我作为其中之一曾经留意关注,最终还是从蒙和舞乐极处得到“内部消息”的。蒙和虽然未去乌兰巴托,但他同当时的上层有接触,还是比较了解内情的。

博彦满都、哈丰阿回到王爷庙后,即在苏军城防司令,还有我党先期到达那里的“八路军人士”的赞同和支持下,仍以内蒙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的名义积极活动,联络各方(包括中共方面),经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于一九四六年元月初,在王爷庙南葛根庙召开由东蒙各旗县和各界代表参加的,旨在成立东蒙自治政府的代表大会,并向全国发表通电。蒙和舞乐极、萨嘎拉扎布等人积极参与并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大会,同时担任一定的职务。

(九)

蒙和舞乐极在昭盟的日日夜夜。一九四六年三月蒙和舞乐极、萨嘎拉扎布等数十人(含家属)受东蒙自治政府委派由王爷庙来昭盟林东筹建昭乌达省政府。萨嘎拉扎布任

省主席,蒙和舞乐极任民政厅长,原在林东的和子章被任命为自治军第四师师长(8)。阜新籍的察隆阿、贡嘎等人担任“省府”相应职务。

萨嘎拉扎布、蒙和舞乐极到林东后,即奉命处理和改善和子章自治军同林西王逸伦热北分区之间的摩擦,自一九四五年冬因“假八路事件”和“地区管辖权”引发武装冲突所造成的紧张关系。萨嘎拉扎布等赴林西同有关方面进行谈判达成《林西协议》,为八路军军分区进驻林东以及林东(昭盟)方面,正式接受中共热河方面的领导等等奠定了政治基础。从我后来得知情况看,“林西谈判”所以进展顺利,并取得成功,主要与前不久召开的承德“四三”会议精神作指导,乌兰夫同志所作有关昭盟工作方面的一些指示和决定,以及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具体关怀和领导是分不开的。

我是同年四月间,自巴林右旗赴林东参加昭盟政府工作的。当时林东形势趋于稳定,各项工作开始运转,出现蒙汉团结合作的政治局面。我开始时,作为蒙和舞乐极身边工作人员同蒙和舞乐极同住一室,后与贡嘎科长等人一起工作和学习。在我参加工作前后,不少巴林右旗子弟也受蒙和影响或在蒙和舞乐极号召之下,纷纷前来参加工作,大约不下数十人之多。现能记忆起来的有克尔伦(又名宝音陶克套)、旺楚克、孟和毕力格、赛音朝格图、陶老师、刘贵臣等。至于在大板当地或别处参加工作的巴林右旗子弟,那就更多了。如后来成为著名诗人作家的其木德道尔吉,文化、艺术、教育界的布和朝鲁、呼日查、曹都毕力格等。自治军中的连队政治指导员胡春达来、赛音、乌尤图(均已牺牲)

等等。因为他们几乎都是蒙和舞乐极以前的学生或同事，深知蒙和舞乐极其人，而一心追随并团结在蒙和舞乐极及当时乌兰夫领导下的“自治运动联合会”周围。我作为其中之一觉得参加工作既光荣又新鲜。工作起来热情很高，而知识和经验的缺乏或不足，处处向蒙和舞乐极以及其他入请教咨询。

我同当时许多知识青年一样，由于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民族情感受到压抑，对当时中国命运前途，特别是蒙古民族前途命运尤为关注。对“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运动”颇感兴趣，甚至对共产党八路军也往往首先从其对这一“敏感问题”所持立场和态度加以衡量。共产党八路军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给我们以良好印象（谈不上更深的认识），后来听几次八路军首长权星恒、吴广文等人的报告和讲话感受较深，得益匪浅，加深了对党的认识。

同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军向我热辽、昭乌达盟地区逼进，八路军放弃锦州承德，撤向赤峰、林西一线，处于守势。“内战前途命运”成了人们倍加关注和议论的中心话题。许多人深表忧虑和不安。蒙和舞乐极公务繁忙，常常开会到深夜。尽管如此，他和大家一样关心“时局”，不时也发发议论，引导并启发大家端正认识，树立必胜信心。

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及其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政策的正确。他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推行大汉族主义，压迫国内少数民族，迫害进步人士是不得人心的，终归要失败，内蒙未来前途只能寄希望于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和帮助，这是唯

一的正确道路。

那时乌兰夫同志为处理“西蒙问题”等尚未到达林东，但有关他的种种传说，却早已传遍林东及东蒙各地。记得有一首颂扬他的歌谣，在蒙古族青年中间广为流行。我和蒙和舞乐极都曾主动参加学唱，对我们影响很大。乌兰夫——人们称其为云泽主席。他成了蒙族青年交口乐道的偶像和杰出的传奇人物。大家觉得共产党出了个乌兰夫这样有影响的高级人物，他还长期从事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治运动，很了不起，是蒙古民族的荣幸和骄傲。

蒙和舞乐极生前，虽未见到乌兰夫同志，但不只一次的表示拥护乌兰夫主持召开的承德“四三”会议精神及有关指示和决定。他曾说：“以往内蒙搞自治，大家都很热心，但往往想法不一，背景不同，中途流产，终不成气候，教训深刻。乌兰夫作为中共高级领导人，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又有那么多人拥护他，深得人心，我们的事业定将成功，前途是光明的。”

记得有一次蒙和舞乐极“开会”归来，显得特别激动，兴高采烈，我好奇地打问究竟，蒙和舞乐极只是笑而不答。我连问不舍，他沉不住气，一把拉我到屋外僻静处，向我耳语说：“我加入了‘这个’。”边说边用手比划“镰刀锤子”状。我不解其意（那时我尚不知中共党旗以“镰刀锤子”作标志。）经他解释我方明白，即表道贺。蒙和舞乐极说：“要不是小弟你，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你既已知道，一定替我保密，这是一条纪律。”我深深点头，表示定将做到。这是蒙和舞乐极同我的一次不同寻常也是最后一次重要对话。不料，自

后不久,他竟英勇牺牲,我也参军离开昭乌达盟“远走高飞”……对于他的上述“秘密”我还是信守诺言,从未外泄,一直替他“保密”呢。后来听说在他牺牲后,昭乌达盟(林东)各界以优秀共产党员予以追悼、厚葬,我的记忆得到证实。更甚者,事情差不多过去四十年后,我在一读物上读到原内蒙军区政治委员刘昌同志回忆其在昭乌达盟蒙骑四师工作期间,曾发展蒙和舞乐极等人为中共党员的记载,我的上述记忆又得到“官方”即组织方面的进一步肯定和证实。

蒙和舞乐极入党,对于他本人的政治生涯是关键性的一步,是党对他一贯思想进步,追求真理,拥护党的各项政治主张,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最高奖赏、最好的评价和肯定,也是党根据当时客观斗争形势需要,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实际体现和重要举措。

不久,自治军第四师奉命改称内蒙人民自卫军第四师,并归昭盟蒙汉联军建制和指挥,党为加强对这支民族武装进行必要的革命改造和思想教育,在它诞生不久,即决定设立各级政治机关,并选派政治工作干部。为此,特派优秀的红军长征老干部刘昌同志到该师作政治部副主任工作,而将蒙和舞乐极安排为政治部主任(9)。从组织上又一次体现了党尊重、扶持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思想和基本态度。

十月间,国民党九十三军及李守信匪部,分别侵占赤峰、开鲁等地。对当时昭乌达盟政治中心林东形成“东西夹击”,进而造成威胁我林西——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军区)、热河省府等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客观态势。顿时“风云突变”,人心浮动,社会动荡,“形势”变得紧张严峻起来。一些

反动的日伪人员、地(牧)主分子、封建上层、喇嘛活佛等,同国民党军遥相呼应,蠢蠢欲动,相互串连,特别是混进我军内部的各类“变天分子”趁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大有“黑云压城,城欲碎”的感觉。国民党军统特务还秘密潜入我林东进行反革命策反活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蒙和舞乐极作为师政治部主任,根据和子章师长和党组织的决定,将特务分子逮捕审讯,召开公审大会宣布罪状,就地正法。用实际行动回击和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反革命卑劣阴谋。大快人心,伸张了正义。

(十)

鉴于“敌军压境”的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林东党政军紧急动员,加强战备,组织干部下乡发动群众,以打击敌人向我解放区进犯。我和陶老师(宝音德勒格尔)被盟府派回巴林右旗催办粮草等公务。在我们下乡工作不久,即传来令人震惊、不安的消息。主要是蒙骑四师内部及其他地区接连发生暗杀、叛变投敌等反革命流血事件。巴林右旗驻大板的34团团团长仲乃在自己家中,突遭暗害身亡,该团三连连长韩桑杰(兵痞、土匪出身)、二连连长乌日他(日伪大村长、大牧主)先后率部叛变。匪首乌日他在其驻防地——巴林右旗益和诺尔牌毛道家中,以极其奸诈、欺骗等卑劣手段,诱捕前去作说服、劝阻工作,并晓以民族大义的蒙和舞乐极及其一行十余人。消息传来,我心焦如焚,匆匆赶回林东,探听究竟。在林东,从蒙和舞乐极母亲、妻子以及一些熟人那里了解到的关于事情发生大体经过,同传说中的情

况基本一致。而且可信程度大大增加。因为,其中最有力的,在差不多蒙和舞乐极到达牌毛道——出事地点的同时,负责前往策应和配合行动任务的34团(驻大板)团长确吉敖斯尔所率10人支援分队到达出事地点附近尚未站隐脚根,即被乌日他发觉,一举包围缴械,确吉敖斯尔团长本人险些被俘——全凭马力、只身逃脱等事实,说明乌日他确已叛变,蒙和舞乐极一行凶多吉少,身遭不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了。只是由于出事地点距林东尚有二、三百余华里,一时消息闭塞,第四师方面不明敌情也不了解蒙和舞乐极等人当时被俘详情,及其生死下落,弄得许多人辨不明真相,蒙和舞乐极母亲、妻子日夜悲伤,焦躁万分,束手无策,把蒙和舞乐极生还希望寄托在侥幸“脱险”或“佛爷”保佑平安归来上面。至于我,从感情上讲,即埋怨又愤恨,充满绝望情绪。埋怨蒙和仅凭一时热情,企图说服劝阻对方改邪归正,不切实际、“轻举冒进”,以至落入敌手,为此深感遗憾,连连叫苦。同时对乌日他匪帮倒行逆施,勾结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罪恶行径愤恨无比,激起满腔怒火,恨不能立即带领人马前去讨伐,以解心头之恨,解救可能的幸存者。然而当时我乃一普通工作人员,手无寸铁和一兵一卒,欲战不能,欲救不得。只能“望星长叹”,无可奈何了。我彷徨困惑,一愁莫展。正在此时,有人告诉我,林西县城已驻满八路军大部队,还招收、培训蒙骑四师方面的蒙族青年的消息。我大为振奋,决心前去投奔。于是同好友刘贵臣商议取得共识,我们去找当时蒙汉联军蒙骑四师乌力吉那仁副政委请求帮助。乌当即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样我们拿到

第四师政治部介绍前往。我们满心欢喜,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由林东起程途经大板(家里),第二天到达林西县城。在指定地点报到后,即被收留,参加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开办的某训练队学习。该队学期规定三个月,有学员四十余人,是短训性质。在我们到达之前训练队已开课数日,并已接受来自林东四师蒙族青年七人,加上我们二人,共九名学员了。九人中除二人年龄稍大,文化、汉语程度较低外,多数为十八九岁上下,具有中小学文化的小青年。我上过伪“国立兴安学院”,读过蒙汉日语,大概属于其中“佼佼者”之一了!

八路军首长对于我们蒙族学员颇为重视。据说在我们到达前为接纳和安排我们这批“特殊学员”,曾由领导动员,特意腾出条件最好的有“两间通炕”的大房间(民房)让我们居住。尽管那时物质条件生活水平很低,但训练队食堂仍设法购进“民族风味”——炒米、奶制品供我们享用。从生活上给予额外照顾。

三个多月的军中生活学习,充满团结友爱和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我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部队同志的热情和温暖,思想感情发生进一步变化和飞跃。

一九四七年四月训练队宣告结业。根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分配”的原则,我们每个人都作了回原单位工作的思想准备。不料,我和宝音德力格尔(又名谭福)二人被决定留在军区机关工作。我很激动,为自己能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而高兴。但又觉得,从此不能回自己家乡,更有悖于向乌日他匪帮讨还血债(不久前已

得知蒙和舞乐极等被害的消息),以报“一箭之仇”的初衷,心情十分矛盾。于是,去找训练队政治协理员提出自己的想法。协理员是一位三十岁上下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八路”,他听完我的陈述之后便解释说:“组织上决定留下,主要考虑工作需要。不久,军区部队准备发动夏季攻势,收复失地,解放敌占区,可能还出入蒙族同胞居住区域。”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你想回去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仅凭个人力量很难实现,这要靠整体力量,大家努力,即我们的部队多打胜仗,一个个的消灭他们,他们(指乌日他)自然也逃脱不了被歼灭的命运。因为他们和国民党是联在一起的,他们是一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的‘去留问题’本质上并不矛盾,只是岗位上的不同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协理员一席话,使我豁然开朗,坚定了留下来工作的信心和自觉性。第二天,我愉快地到军区机关报到并脱下“蒙装”——棉长袍,换上了八路军灰色军服,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从此,我的一切同八路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地联系在一起。它决定了我一生命运——人生道路。

蒙和舞乐极等先烈,在五十年前英勇地倒下去了。“壮志未酬身先死,血染巴林五十年前,弹指一挥间。”然而,他那生前的音容笑貌,潇洒、非凡的举止风度,不时浮现在我脑海中。他的牺牲是光荣的,也是值得后人永远纪念的。抚今追昔,他们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终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经亿万人民、各族儿女们的共同奋斗,随着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而得以实现。中

华各族人民从此真正站立起来——进入平等发展,共同富裕,欣欣向荣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蒙和舞乐极等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于北京

注:

- (1)均系蒙和舞乐极生前为自己名姓所选用汉字。
- (2)《阜新文史资料》第一辑。
- (3)当地蒙族人将“清河门”习惯的简称为“哈拉嘎”,(意为“门”)。据老人讲历史上曾以“清河门”及其他“门”为界,划分为“边里”、“边外”。“边里”为汉族区,“边外”为蒙族区。
- (4)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第92页。
- (5)《阜新文史资料》第七辑汉文版第82页。
- (6)《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一辑汉文版第108页。
- (7)《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一辑汉文版第47页。
- (8)《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第746页,“内蒙人民自卫军兴安军区骑兵第四师(1946.3月组建)师长和子章,政治委员乌力吉那仁,政治部主任‘孟和乌力吉’(按应为蒙和舞乐极)。”
- (9)《民生报》1946年11月18日消息载“蒙汉联军宣告成立,孟和乌力吉(按指蒙和舞乐极)为政治部主任,刘昌为副主任。”

本文作者于景泉简历

于景泉,又名金泉、阿拉坦宝勒格。1928年出生于内蒙古卓奈图盟土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家中。12岁就读巴林右旗大板国民优级学校,1945年毕业于乌兰浩特王爷庙兴安学院。中共党员,1946年4月在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参加工作,同年12月在林西冀察热辽军军区受训。1946年8月,在冀察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工作。此后,在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五十四军、兰州军区、陆军第十一师、西藏军区边防四团、日喀则军区江孜军分区、西藏军区政治部、西藏拉萨军分区、河北保定军分区等单位担任工作员、干事、助理员、师保卫科副科长、军事法院院长、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军区军事法院第一审判庭庭长、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等职,1983年10月离休。参加热辽地区的夏秋攻势、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解放广西战役、剿匪作战、守卫广东沿海、抗美援朝、西藏平叛作战以及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守卫西藏边防等。少校军衔。曾获东北、华北、中南、华中、华南解放奖章,抗美援朝军功章,胜利功勋荣誉章。



在中共巴林右旗委组织部 工作期间的回忆

都 林

从1953年到1966年,我在中共巴林右旗旗委组织部,负责统一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智慧,集思广益,研究探索,建设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的方面的工作思路,试点总结行执可行的工作经验等工作,初步获得了一些工作成绩。

一、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逐渐形成

又红又专是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在五十年代中期向全党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出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的号召。它的精神实质是强调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强调摆正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全党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右旗旗委在这一伟大号召的指引下,坚决贯彻了又红又专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针,积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大力宣传又红又专的方针。以组织报告会、开办培训班、教师冬训班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又红又专的力度,

明确指出‘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红必须专。使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对于又红又专的价值取向明确起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宣传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创了有知识光荣、知识分子可尊重、知识分子有前途的政治氛围。并号召党员主要领导干部，以同知识分子，尤其非党知识分子谈心、交朋友、赤诚相待之方法，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大力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用请进来送出去的方法，从先进地区交流调入，接受大专院校毕业生来右旗工作。把原来的文化程度低有实践经验的干部送出去，到各级各类学校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业务，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十多年中送自治区、盟(市)文化学校学习的约 300 多人次、专业学校学习的约 400 多人次，党校(行干校)学习的 500 多人次，以这些方法不断改进和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结构成份和政治业务素质。

3、大胆使用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干部。用‘德才兼备’的标准，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积极大胆的选拔那些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于党，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守纪律的干部，将他们提拔到党政领导岗位和业务骨干，如：宁志超、和什格图等百余名知识分子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促进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的结构，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活力。

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逐渐壮大

党从来十分重视和关心培养民族干部。毛主席早在 1949 年就指示我们：“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一英明指示不仅肯定了民族干部在党的事业中的特殊作用，而且指出了共产主义化对一个民族干部的决定意义。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深刻意义。右旗旗委在培养、提高、使用民族干部工作中采取了以下措施：

1、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大力宣传培养民族干部重要性。民族干部问题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民族工作的关键和核心。旗委主要领导都很重视和关心民族干部的培养、进步和成长，如在右旗历任旗委书记黄华、阿林、哈斯巴根等领导同志，坚持不懈地遵照党在民族地区的干部路线，坚定不移地培养、教育、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促进了民族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民族干部队伍的迅速成长壮大。

2、积极培养民族干部，大力提高民族干部素质，旗委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有计划的抽调少数民族干部到各级党校、干校、专业技术学校，轮训各级各类干部 1995 人次，同时在 1958 年办了在职干部文化班、师范班、卫生班，培训了 1443 人次。注意加强广大干部在职学习，利用业余时间学政治理论，学业务技术、学文化知识。从 1950 年以来参加业余学习的干部达 1558 人次，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民族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

3、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大力提拔民族干部,多年来旗委遵照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干部工作路线,注意在群众运动和工作实践中,培养大批的民族干部,让他们担负了各方面的领导工作。在土地改革、正党正风、农业合作化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群众运动实践中涌现出来 585 名积极分子,有计划的充实到各个部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中去,还从一般干部中选拔 70 名民族干部担任了科级以上领导职务,这样在各部、各系统中都有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到 1963 年,全旗 1444 名干部中,有少数民族干部 694 名,占 48.1%,比解放初期的 95 名民族干部增长了 7.3 倍。这些民族干部中共产党员占 41.4%。同时本着“普遍而大量地培养民族干部”的方针,采取了“提拔起来,继续培养提高”的原则,放手选拔提拔本地民族干部,在全旗当时的 694 名少数民族干部中,县处级 4 名,占该级的 36.3%,科局级 15 名,占该级的 53.6%,公社书记、社长 36 名,占该级的 62.1%。在各部、各系统中均有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这证明我们不仅注意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民族领导核心,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有觉悟、懂业务的专业技术人材,逐步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民族干部队伍。

三、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逐渐增强

加强党的建设,就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强调思想上建党,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我们党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断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右旗旗委遵循这一伟大教导,狠抓

党的思想建设这一重要环节。

1、坚持常年办党校、提高党员思想素质。在旗、社两级常年办党校、支部办业余党校、旗训练支部骨干、社训练一般党员、支部坚持常年学习,所有党员一年轮训 1-2 次。根据党员群众的思想状况和文化程度,有针对性的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思想理论教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从而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如巴彦尔灯公社党委总结出了“领导亲自办校、形势灵活多样、狠抓活思想”的办校方法,坚持常年办党校教育党员。据 1959 年 11 月的统计,该公社一类党员由 76 名递增到 106 名,增长 39.4%;二类党员 71 名,下降到 43 名,下降 39.4%;三类党员 9 名下降到 2 名,下降 77.7%。并在各项运动中涌现出了五好党员 110 名,占 73%,标兵党员 18 名,占 11.9%,从而全面提高了党员的思想素质和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2、开展党支部的评比活动,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在全旗范围内开展了比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评先进支部、选模范党员的评比竞赛活动。十几年来全旗每年大约评选出 20 个先进支部、100 名模范党员,奖给先进支部锦旗和模范党员奖状,并总结推广了他们先进模范事迹,进一步掀起了学、赶、超的评比竞赛活动。树立了标兵(旗帜),推动了全面、提高了全体党员的思想素质,从而增强了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力。

本文作者都林简介

都林,男,蒙古族,中学文化,1932年12月出生于巴林右旗查干诺尔,祖籍翁牛特旗巴彦汗。



童年时在本村读一年私塾,在黄花庙国民小学读书至1945年。1946年在查干诺尔楼子小学任教。1948年7月参加工作,1948年入团,1950年3月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7月在林东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巴林右旗查干诺尔区搞土改,1949年任青年团查干诺尔区委书记(期间1950年6-11月在乌兰浩特内蒙古团校学习;1951年、1952年分别在林东昭盟党校学习二次,每期三个月;1952年参加巴林右旗整党工作队),1953年1月调任巴林右旗旗委组织部干事。1956年-1966年任中共巴林右旗旗委组织部副部长,为中共巴林右旗第三、四、五届党代会代表,并连续三届当选为旗委委员(期间1959年1月-12月下放古力古台公社挂职担任党委第一书记一年;1965年-1966年参加四清工作队,担任查干沐沦分团副团长)。在巴林右旗旗委组织部工作的十五年中,研究探索了对党的组织思想建设、干部党员的管理教育,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方面的工作思路。在巴彦尔灯公社数年搞点,

总结推广了坚持办常年党校教育党员,开展先进党支部评比活动的方法,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的工作经验。1967年调任巴林右旗幸福之路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致残。1970年调任巴林右旗革委会农牧组副组长(期间1976年-1977年参加学大寨工作队,在幸福之路公社敖尔盖大队蹲点。在西热阿鲁生产队搞双千亩林网草场、林网饲料基地,试搞生产承包责任制,农牧林结合发展的工作模式)。1978年调任昭乌达农牧学院畜牧系校长(主任)。1979年末畜牧系、农学系、林学系合并建立赤峰农牧学校,任赤峰农牧学校副校长,后任盟种牛站站长。1981年初调任赤峰市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期间1982年3-7月在农牧渔业部干部培训班内蒙古农牧学院班学习)。1985年因文革致全残,担任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党委督导员,于1992年12月离休。

五十年来的工作中获奖:1954年-1956年连续三次被评为模范党员,受到巴林右旗旗委的表彰奖励。1977年被评为巴林右旗学大寨工作队先进队员,受到巴林右旗旗委、旗政府的表彰并获晋升一级工资奖励。曾工作、蹲点过的单位也多次获得自治区和盟(市)两级政府的表彰、奖励。

论著:1958年-1984年在自治区及盟(市)级报刊上发表文章9篇(省级报刊7篇、市级报刊2篇)。

1958年、1965年曾被内蒙古《党的教育》编辑部、《内蒙古日报》蒙编部、内蒙古《实践》杂志社聘为特约通讯员,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的特约记者。

巴林右旗人民武装部纪略

布 和

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全民皆兵，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号召，内蒙古军区派往各旗县一部分军队干部，创建人民武装部。巴林右旗人民武装部始建于1951年。当时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巴林右旗人民武装部”。

于1951年，巴图、布和、贵柱、占布拉、布日古德等五人，根据上级军区的命令从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二师来到巴林右翼旗创建人民武装部。一行五人初到此地，人生地不熟，不了解当地牧区风俗习惯。他们几个人都是哲里木盟人，来到巴林右旗后有些普通话都难懂。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调查了解一些本旗的划分阶级情况、青壮年的社会关系、身体素质和各阶层的思想动态等。当时，旗政府安排了土改时没收的三间房子，我们就在这里宣布成立了巴林右翼旗人民武装部。他们的工作分工是：副部长巴图主持全面工作；秘书布和协助部长负责办公室的全面工作；干事贵柱、占布拉、布日古德也有各自的责任。那时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很艰苦，办公和住处都在一处小院：正房三间，

小耳屋两间。正房是办公室，部长一间，其他人一间。两间小耳屋是宿舍，部长一个屋，其他人一个屋。那时我们都是单身生活。由政府拨给了普通办公桌三个，部长一个，秘书一个，其他三人一个。办公用品纸张墨水等，每月向政府要点。那时，政府的经费也很困难，不能满足所需要的用品，为此大家尽量节约过日子。办公室和宿舍搭了四个小土炉，都烧牛粪。那时冬季取暖费标准很低，有时经费超了停火。伙食在政府食堂，分小灶和大灶，部长吃小灶，其他人吃大灶。那时部队实行供给制，根据军令不同，他们的伙食费每人每月12.50元至14.50元，部长每月20多元。有时伙食费超了就在食堂计帐吃，下月补交。那时的每月津贴每人只有5元，除买洗刷用品所剩无几。吸烟的同志买不起纸烟，都吸旱烟。当时因没有卷烟纸，只有到庙里拣经卷纸在水里泡开后拨开两层当作稿纸、笔记本和卷烟纸。

那时没有交通工具，下乡扛着步枪背着行李步行走。

武装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了解农村牧区青壮年的年龄、身体状况、社会关系等。为组建民兵打好基础。同时，协助政府做好征兵工作和复员转退军人的安置工作。那时武装部与地方的关系是：武装部属旗委的一个部。武装部政委由旗委书记兼任。武装部与旗委政府及旗直有关部门搞好关系，基本掌握牧区情况。如：武装部成立当时，右旗社会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武装部所有同志日夜武器不离身，保持戒备状态。对社会上的（牧主）富分子进行监督管制教育外，由匪首韩桑杰的一股武装土匪在巴林右旗和翁牛特旗到处横行、杀人放火。在这两个旗杀害了共产党

员、土改干部和贫下中农牧民 61 人。这个血债累累的土匪头子韩桑杰、敖占林(他家住在查干诺尔努图克)隐藏在社会的阴暗角落搞破坏活动。由于公安局的积极追捕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终于在 1952 年把匪首韩桑杰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回来后土匪敖占林在 1952 年 5 月 1 日,巴林右旗、翁牛特旗两旗合开公判大会执行枪决。又如:杀害右旗 15、6 人的土匪连长宝音套格陶(家住大板努图克)在社会上搞破坏活动,于 1959 年被抓获,执行枪决。土匪格白朋斯格(家住查干诺尔努图克)不老实受管制,跑到边远地区大搞盗窃活动,于 1970 年被抓获,判无期徒刑。这些复杂环境,经过镇压反革命,肃反等政治活动,社会状况基本稳定。从而,各级机关转入正常工作秩序,广大农牧民得以安心搞生产。

1953 年-1954 年后,上级军区派来干部、战士和党团员,加强了旗努图克两级人民武装部的力量,同时在旗里建立了兵役局。兵役局与武装部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又称巴林右旗武装部兵役局。它的任务是:协助政府作做征兵工作和复员转退军人安置等。1953-1954 年间,由于武装部人员增多,政府把法院的五间土房安排给我们,作为武装部办公室,把经堂庙作为武装部宿舍。1954 年以后,我们的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于 1958 年由上级拨款盖起了七间瓦房。从而,工作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初建武装部那几年虽然在工作和生活上十分困难,但在上级军区和旗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当时,巴林右旗行政区划为五个努图克,两个区。于 1953 年,内蒙重新调整各旗县行政区划,把我旗的两个区划归阿旗、左旗,把左旗两个努图克划归我旗。从而,我旗在为共有七个努图克的牧业旗。根据上级有关批示精神,在各努图克成立了人民武装部。

当时的基层人民武装部人员编制情况是:

白塔子努图克,部长魏国兴,助理丹必忠乃;敖尔盖努图克,部长巴特尔,助理月宝、达木仁;查干沐沦努图克,助理占布拉、吕坤、忠恩敖拉;大板努图克,部长本布日其格,助理敖其巴图、刘色旺、东力布;巴彦汉努图克,部长额尔敦白音,助理毛义很,朝伦巴特尔、关布;查干诺尔努图克,部长塔斯、助理仁钦扎木苏;翁根努图克,部长景德,助理色布格扎布,达木仁扎布。

旗武装部下设三科一室:政工科、动员科、民兵科、办公室(办公室兼管后勤)。1954 年以后,旗武装部前后增配几名副部长,他们是:那存德力根、丁克扎布、苏力木。当时的正部长还是巴图、秘书布和。三科科长有:特木其乐图、那存勿尔图、僧格仁钦。干事有:玉山、巴布、白山、金山、特木尔宝力道、布日古德、天虎、色冷道尔吉。协助各努图克武装部工作的有:旺其格、朝格吐桑布、丹巴仁钦、贺喜格白音、贵柱、尼玛东力布、关其格、巴特宁布、扎木斯冷。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旗和努图克、公社、苏木两级武装部工作过的人数累计率达 85 人。但人员不稳定、流性很大,调入调出的,有转业退伍的,当时长期稳定在旗和努图克、公社、

苏木两级工作的也就三十人左右。

1952年11月间,根据政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兵员基础和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群众的武装组织”的指示精神,在全旗范围内普遍开展了民兵组织建设。那时加入民兵的条件是:除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弟、社会关系不纯和聋哑盲人外,凡是贫下中农子弟,18-35岁的适龄青年均可参加。以嘎查村为单位组织民兵连,其中分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普通民兵18-35岁,基干民兵18-25岁。人口多、适龄青年多的嘎查村,组建普通民兵连和基干民兵排。每个连队均设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文书等五名连干部。基干民兵设正、副排长(一般都是普通民兵副连长或副指导员兼任基干民兵排长)。在健全民兵组织的基础上,发放了武器弹药,武装了全旗民兵。为了提高民兵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由旗武装部每年对嘎查村民兵连排干部训练一次,每次15-20天。对基干民兵由努图克武装部和嘎查村武装委员会组织集训。对民兵各技术兵种由旗武装部和军分区集训。培训内容主要三个方面:(1)搞国防教育,加强战略观念,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2)搞军事训练,掌握武器要领,提高军事本领;(3)号召全体民兵在巴林右旗生产建设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等。

各连队根据每个嘎查村的生产季节和气候条件等具体情况,普通连每年保证半个月的训练。每年搞一次实弹射击。此外,旗、努图克召开那达幕大会时组织民兵步兵和骑兵方队入场,并搞实弹射击表演。

于1958年撤销兵役局。在努图克成立了人民公社,第二年成立了各公社武装部,并把原努图克武装部的现役军人全部撤回。当时大部分人员转业、退伍。旗武装部编制只有20多人,设两科一室。各公社人民武装部的干部由地方任命,由地方干部主持武装工作。当时的民兵集训的主要内容转为劳务结合,训练方法结合农牧业生产和水利工程建设,有的集中民兵一边生产,一边训练。如:我旗民兵在草原建设和水利建设大会战中都以民兵建制参加。我旗历史上头一个修筑大益(大板一益和洪尔)灌渠时,各苏木乡镇动员民工都以民兵组织为骨干,均成立了民兵小分队突击施工。在这期间,武装部领导经常深入工地,动员和号召广大民兵要积极参加艰苦作战,为巴林右旗水利建设做出了贡献。从而在两年时间完成了左、右两个干渠60公里长,解决了大板镇、白音尔灯、良种场等三个单位一万亩农田和草原的灌溉问题。因而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效益,农牧业增产增收,群众生活得到明显提高。

再如:我旗第一个大型人工水库草原水库的建设,以民兵组织为骨干,进行全旗动员,搞大会战。当时武装部副部长额尔敦朝鲁同志在水库作阵指挥,组织民兵搞大会战。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水面达3000亩的一个小型水库,并撒进各种鱼苗。这个水库年平均捕鱼20-40吨;养鱼两年以后,初步解决了当地人民吃鱼难的问题。

经过几年一系列的工作,巴林草原呈现出军民团结、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提高的好局面。右旗各族人民在这个大好形势下以十分喜悦的心情跨入了七十年

代。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间,在武装部前后任职的干部有:部长苏力木、龚玉恒、郑文书;政委曹德宝、刘学平、宝音贺喜格。任副部长的有:额尔敦朝鲁、布日古德、姜南歧、昭日格图、王金山、白玉深、杨宝全、毛铭荣。副政委色冷道尔吉白已拉。科长德钦、曹德宝仁钦、那顺勿日吐、刘金普、刘约、宋功、毛敏勇、刘德、巴图、仁钦关布、白小、苏歧、双龙、特古斯。参谋有:贺喜格白音、鲍连文、色冷道尔吉、金山、达木仁、刘金普、刘约、宋功、毛敏勇、特木热、宝音代来。

在上级党委和军分区的正确领导下,这些同志上下融洽、团结一致,开展各项工作有计划、有秩序的进行。各民兵连队积极学习政治、军事。不断提高军事素质,因而出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好局面。

回顾巴林右旗武装部的历史,在民兵工作中多次受到上级党委和军区首长的表扬和奖励。如:于1959年军分区在我旗召开现场会议,在全分区中我旗骑兵被评为模范骑兵受到奖励。1956-1966年间我旗武装部被内蒙古军区评为民兵工作先进单位。于1959年白音他拉苏木古日古勒台嘎查民兵连连长拉喜斯冷同志被评为全国模范连长,并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获奖半自动步枪一枝,子弹100发(此枪是那时右旗历史上第一次被奖赏的枪,至今在武装部保存)。于1964年,我旗武装部科长刘德同志被评为全盟武装干部标兵。于1966年,内蒙古军区在我旗白音尔灯苏木宝力格嘎查召开全区民兵工作现场会议除全区各军分区领导和各旗县武装部领导参加外,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黄

厚同志、群众工作部的阿其尔部长以及总参谋部的两位处长参加会议具体指导。在这次会议上我旗武装部汇报了宝力格民兵连的政治教育、战备训练和民兵工作“三落实”等情况。在会议期间,宝力格民兵连表演了紧急集合、乘马射击等军事科目。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听取汇报,观看表演后一致认为宝力格民兵连是过硬的好连队,并号召全区民兵向宝力格民兵连学习。

1975年根据辽宁省军区的命令(当时赤峰市划归辽宁省管辖),我旗民兵执行一次军事演习。在军分区和旗武装部的直接指挥下在吉不吐沟门搞一次伏击战,在白塔子朝鲁坝搞一次阻击战。这次演习很成功,达到了上级的战略要求。辽宁省军区杨大易司令员(中国共产党、九届中央委员)观看以后对我旗民兵的军事素质予以高度评价,他说:“我们全省民兵都象巴林右旗民兵这样的话,我军在后备力量问题上放心了”,并号召各地学习巴林右旗的民兵工作经验。在这大好形势下人们万万没有预想到,60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击了巴林草原,严重冲击到党政军各个机关团体和农村牧区。武装部工作一度偏离了方向,组建民兵小分队抓“阶级斗争”。从此,全旗范围内造成社会混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严重矛盾。旗武装部根据当时社会环境,为防止意外,立即把武器弹药全部收回,由旗人武部统一保管。全旗当时的形势是,运动步步深入和扩大蔓延到各个角落。同时把武装部主要领导都打成“走资派”、“新内人党”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隔离审查,一般干部大部分也被成为怀疑对象。武装部工作

一度发生混乱状态。同样各公社武装部和民兵连队主要干部也被打成“新内人党”罪名挨斗受审。幸福之路公社武装部长优秀干部宝音德力根同志被活活打死。白音尔灯公社宝力格大队民兵连长达木仁同志是全旗模范连长，他被打残后经医治无效而死亡。此外，很多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折磨。当时巴林右旗一度出现了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和上下关系不融洽、思想不统一、工作不协调和互不信任的混乱状态。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人民得到了解放。1978年具有伟大历史的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是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会议否定和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决定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对被误伤的各级干部群众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巴林右旗武装部同全国一样，在上级党委和军分区的正确领导下，对被误伤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从此，武装部的工作逐步转入正常轨道。由于延续几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劣影响，一时难以消除思想上存在的一定隔阂。经过一定时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具体工作，逐步得到了解决。从而，武装部有秩序的开展了各项工作，对民兵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建立健全了连排干部编制，开展民兵组织法的正常活动，各项工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

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军分区根据巴林右旗武装部人员的年龄状况和身体条件，进行了整顿，从而调动了一部分同志，转业一大批，前后调入以下同志到武装部任职。

部长：那达纳、道尔吉拉布坦、龚普英；
政委：哈斯、王金山、胡日查、吕永真、刘建民；
副政委：赵先德、胡俊清、吕俊珍、白乙拉；
副部长：高俊峰、赵成英、杨宝林、毛铭荣、苏岐；
两科一室人员：
科长：赵成英、冠有财；
办公室主任：高俊峰
参谋：苏日嘎拉图、张振东、董占林、钟振杰、王忠文；
干事：双龙；
秘书：杨占财。

从此，武装部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在各项工作中互相配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根据各嘎查村的具体情况，对民兵进行了全面整顿，配齐连排干部，使民兵工作走向正常化，发挥了广大民兵在我旗四化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

（武装部的成立和50年的过程及重大历史变革都发生在努图克和公社化时代。地方划分苏木、乡、镇以后没有发生历史性大变革。社会环境稳定，工作秩序正常。因此，本“纪略”没有反映这段历史）现在我旗武装部正以更加积极的工作姿态，为实现新世纪的伟大任务而努力奋斗。

后 记

本“纪略”基本反映了从武装部成立到九十年代的工作任务,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等情况,简要介绍了武装部成立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状况。

参加审核本文的有:

原武装部部长道尔吉拉坦、政委胡日查;现任武装部部长吕广治、副部长孟建荣、王书秋;现任武装部政委王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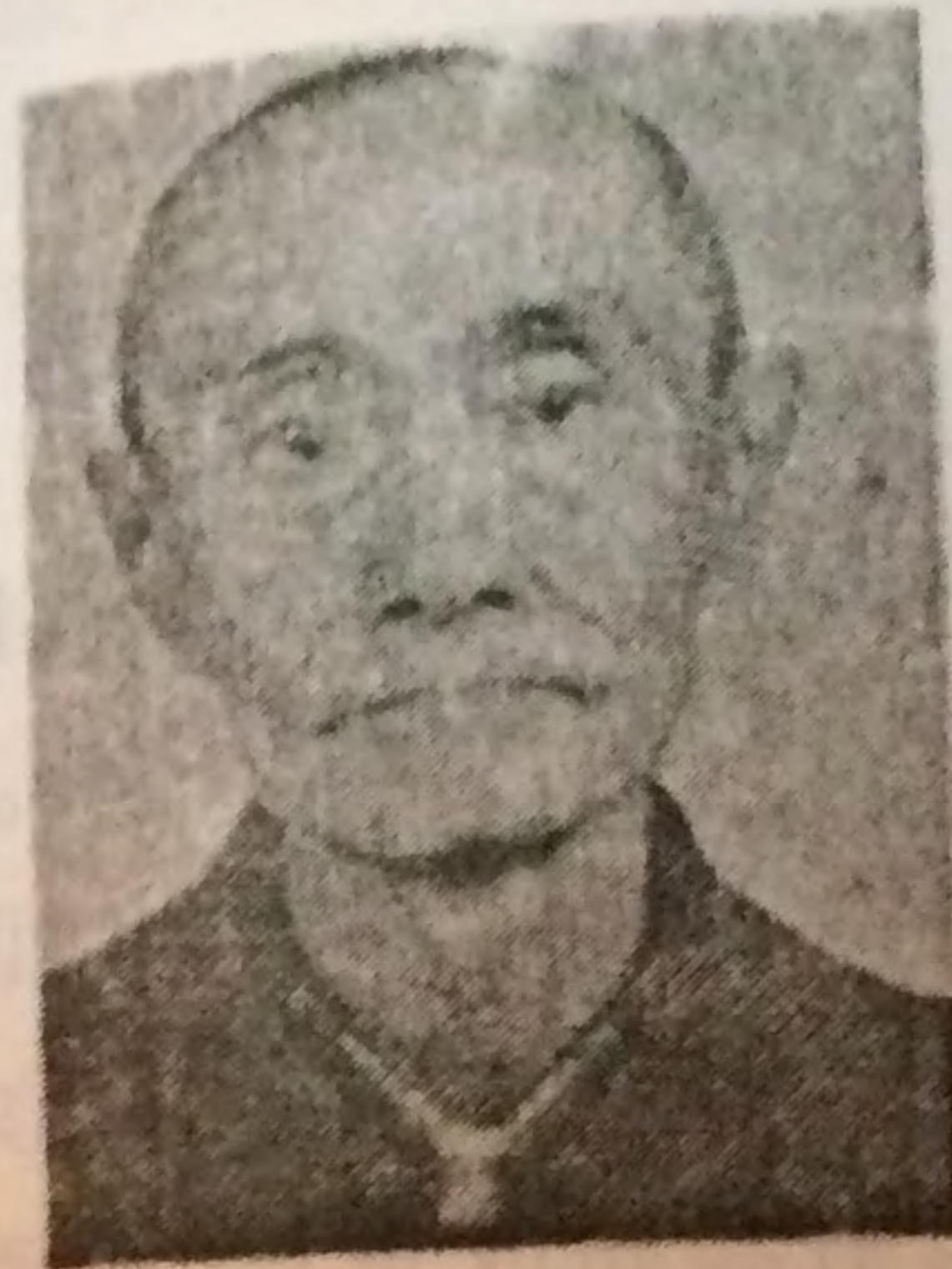
为撰写本文提供资料的有:

旗武装部原政委曹德宝;旗武装部原科长巴图;旗政协文史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穆松;旗法院原副院长其木德敖日布。

旗党校曹都进行文字审定。

2002年初稿,2003年6月修定

本文作者布和简历



1929年1月布和同志出生于内蒙古库伦旗额勒顺镇一个蒙古族牧民家中,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内蒙古骑兵二师四团二连当战士。1951年调到巴林右旗人民武装部,先后担任统计干事、秘书、管理员等工作。1958年转业地方后任巴林右旗巴彦他拉公社秘书、副社长、社长。1960年10月任中共巴林右旗委纪检委秘书。1962年5月任旗民政人事科副科长。1963年4月任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1966年6月任中共大板镇委员会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6月任旗革委会民事信访组组长。1980年任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常委、秘书长。1984年5月任旗民族事务委员会调研员。1989年离休。

1950年在部队练兵评比中立功一次。1958年被评为巴林右旗模范干部,受物质奖励。1959年以来多次被公社、旗、盟先进工作者,曾出席过昭乌达盟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有关防治鼠疫工作的回忆

叶喜

在巴林右旗除四十年代初期在系巴彦包特(今属阿鲁科尔沁旗)发生人间鼠疫死亡三百余人外,没有疫点记载。

解放当初四十年代末,在原热河省北部敖汉、赤峰地区发生过鼠疫,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威胁。在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省委、省政府引起高度重视,加强领导,采取果断措施,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积极组织相应指挥机构,派出防疫队伍,大打防治鼠疫的人民战争全面展开。使上下一条心,有力地推动了防鼠灭疫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在昭乌达地区也在林西县五十家子,右旗白塔子突然爆发了疫情,死了很多人。因为,当初群众对防鼠认识并不高,边远地区交通不便,封锁性机制不严等,于一九四八年六月林西五十家子镇发生人间鼠疫死了不少人。当年七月间巴林右旗索博力嘎区(今朝阳)朱家敖包营子发生鼠疫病人。该小营子户数人口并不多,只有六户人家32口人,29人患病全部死亡,占32口人的90.6%。从而相继扩大蔓延到附近村太本爱里、庙前营子和城墙营子等,发病30人死亡100%。一九四九年七月,又在索博力

嘎区海清河、和硕芒哈发生鼠疫2人,死亡1人,城墙营子2人,死亡2人。

在这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昭乌达盟人民政府组织抢救,预防鼠疫,派出由博彦陶格套同志带队,深入现场办公,暂缓控制疫情再蔓延。防疫队伍大干一个多月后,疫情在八月中旬才基本终息。在这期间自治区、盟两级政府为了加强防疫队伍建设,从各旗县招收防疫人员进行培训充实防疫机构。当时由自治区卫生部具体筹办,共办三期,昭乌达盟去的人员属于第二期学员,每期为一个大队,四个分队,八个班,大约150多人。大队长由白玉山、孟希文、拉西宁布等同志担任。卫生部具体安排教员进行授课,课程并不多,只有四门有疫情处理、预防注射(接种)、捉鼠灭鼠和疫源检验。

巴林右旗先去的有:丹巴苏荣、叶喜、老布僧、布仁巴图、那木斯来。

巴林左旗的有:敏珠尔、达林台、扎木苏、赵航贵、德钦、金玉珍。

阿鲁科尔沁旗有:王玉山、韩国祥、宝音图、朝伦巴根、何文奎、焦贤等。

以上学员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份由内蒙古自治区所在地乌兰浩特一起返回昭盟林东不久,由热河省根据昭乌达地区的卫生防疫人员力量薄弱、技术骨干短缺、仪器设备简陋的实际,选派由王九惠同志为站长,苗吉有同志为副站长的,有白清云、王继森、刘大庆、董希超、马清河、包秀英、王的、九州、谈英等二十来位同志和我们会合在林东建队。后又

热河调入防疫力量,昭盟也从地方抽调干部和在社会上招收了很多人共分三期进行培训 200 余名防疫骨干,而形成了一个浩浩荡荡地庞大队伍。在这基础上建成坚强有力地卫生防疫机构:热河省防疫总站林东防疫分站牌子正式挂在大门口。后来热河省被撤销后改为昭乌达盟人民防疫站。

防疫机构健全,防疫力量的增强相继要向疫区进军的时候,内蒙古自治区对昭盟十分关注,一九四九年春季,派来以拉西宁布同志为队长,指导员防疫队伍协助疫区领导工作。力量大了,任务明了,白衣战士分赴各疫点联合作战,保护人民消灭鼠疫的战斗打响了,取得可喜的成绩。使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极为重视,消灭鼠疫有信心、有决心,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有了保证。因此,由昭乌达盟委书记权星恒为主任委员各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成立昭乌达盟防疫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在全盟内大张旗鼓地在各旗县、各疫区范围深入开展防鼠疫工作。在委员会的领导下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要上情下达,下情上报。

这支坚强防疫队伍,有着严密的纪律,有着严格的制度有着严肃的作风。行动军事化、工作专业化,一切都统一指挥,由盟防疫委员会总指挥,分管领导一线指导的形式,以疫区与非疫相结合,点面相结合的方法,把队伍分为两条战线开展防鼠疫工作。如将把骨干队伍分两条战线,奔赴疫区工作,其它防疫人员分赴各县旗,在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同有关部门紧密配合,放手发动群众展开面上的防鼠工

作与卫生运动。

白、五防疫队(指右旗白塔和林西五十家子):由王九惠同志任队长,下设若干防疫工作组,辅开各点工作。指挥部设今朝阳乡太本庙。

道、德防疫队(指阿旗南部的道德区、德布勒庙区):由苗吉有同志任队长,下设若干防疫工作组。指挥部设在登吉格庙。

与此同时,根据各旗县实际出发,在要害地区重点交通要道设立防鼠疫检查站。林西川都昆都,右旗巴林桥大令、左旗蔓撒沟、阿旗清河子、巴彦包特等地,每个站配备 2 人,其任务和防疫队伍相同。

防疫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地方党委、政府和队长的指挥下,高度提高警惕,坚决切断鼠疫传染途径为目的,彻底消灭鼠间鼠疫为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要务,深入细致开展防鼠工作。

首先,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对鼠疫危害性、生命安全的重要性的认识,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协同防疫人员共同作战,消灭疫情;

其次,要大力开展灭鼠灭蚤的群众运动,有效地控制媒介传染;

三是要切实加强外围防微,作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院、屋外圈挖宽 80 厘米,深 120 厘米的防鼠沟,防止家野鼠间串跑,并下鼠药、放鼠架子、捕捉老鼠外,还采取烧燎晒汤等土法进行灭蚤工作;

四是要同当地党组织和行政司法部紧密配合,在病区

设岗设哨,严防进出来往,警惕防疫内部,扩大蔓延;

五是要在农忙季节前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鼠疫疫苗注射,增强免疫力,确保人民群众的体质健康及生活不受损失;

六是要大搞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到屋内外、院内外的卫生,实现室内干净屋外整洁,并勤洗、勤换、勤晒、勤消毒等,使食具到住行都要讲卫生、讲防病、讲灭鼠、讲健康;

七是要建立健全群众性防疫组织,每20户为单设一名卫生组长,村有卫生委员、区有卫生助理,任务到人、落到实处,分片包干,层层负责,任务明确,责任清楚一抓到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八是要建立督促检查制度,防止漏洞出大事。外出必有注射证,人进必有防疫证明等疫情报告制度,报告有时间性,快报早报特别是发现死鼠或可疑病绝不无报缓报漏报,如违者追究责任,严重者依法惩处。

更重要的是制度的施实和执行是防治鼠疫工作的基本条件,也是防治鼠疫工作的有效保证,同时,约束群众的可靠依据。因此,由于制度的实现,各级政府的支持,主管业务部积极努力,防疫队伍主动作战,使防鼠疫工作上取得了卓越成绩。因此,一九五〇年来,巴林右旗除局部地方发现鼠间鼠疫外,特别老疫区白塔子和朝阳疫情没发生,这样鼠疫被我们消灭了。这是巴林右旗卫生防疫站,建站以来,全体卫生防疫人员对重点疫区坚持常抓不懈的开展防鼠拔源、预防接种、鼠疫检验等综合性防治措施的结果。

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在白、五疫区工作两年多的

时间人民防疫队伍踏遍了村村户户。总之,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防疫人员足迹;牧民放牧出场点,“敖特尔”放牧地带就有防疫人员的脚印。那时候人民解放军为了解放全中国,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小米加步枪,在前方打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而我们也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背着行里、提着药包在后方消灭劣性传染病——鼠疫。全中国被解放,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昭乌达地区鼠疫被消灭了。

我们回忆起那时的岁月时光,非常非常鼓舞和骄傲。如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作艰难,当时广大防疫队伍的热情与干劲,是深感高兴、乐趣的。我们防疫人员背着行里,提着药包从盟所在地林东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草原深处的白塔子、林西五十家子疫区,在队长王九惠同志直接指挥、领导下,战斗了二十多个日日月月,为昭乌达盟,特别是巴林右旗的防治鼠疫、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发展文化卫生以及经济建设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者叶喜同志简历

叶喜,男,蒙古族,1932年3月生于巴林右旗沙布尔台苏木塔布花嘎查塔布花艾勒。中国共产党党员。1948年12月1949年3月8日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学习归来就参加昭乌达盟防疫站工作。1954年在巴林左旗人民委员会卫生科任科员。1955年-1956年任林东昭乌达盟鼠

疫防治站统计,林西县卫生防疫队统计。1957年在内蒙古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学习。1958年-1959年巴林右旗卫生院、宝日勿苏苏木(公社)卫生所任所长,公社行政秘书、公社党委秘书等职。1959年8月任中共巴林右旗委员会农村牧区工作部干事。1960年任巴林右旗人民委员会卫生科任科长、旗卫生防疫站站长。1961年-1975年3月任中共昭乌达盟盟委农牧部干事、昭乌达盟革命委员会农牧组生产组干事。1975年-1977年巴林右旗巴彦尔灯苏木(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1977年-1978年间任巴林右旗卫生防疫站党支部书记、站长。1978年-1983年任巴林右旗革命委员会(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1984年-1992年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期间获中共巴林右旗旗委和旗人民政府的多次奖励。1992年3月以县处级待遇离职休养。



我所知道的巴林右旗 发生鼠疫情况

丛沈阳

一、鼠疫发生概况

鼠疫是自然疫源性鼠传染病,也是人鼠共患的疾病,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我国把鼠疫列入地方病管理,并组织防治实施。

巴林右旗地处大兴安岭新华夏体系与阴山山脉截接复合亚区,在鼠疫自然疫源地的构成上,是东北黄鼠疫源地的组成部分。

我旗在一九四七年曾发生过人间鼠疫,发生在当时索博力嘎努图克,朝阳弯朱家敖包、太白艾里和火烧满汉营子,面积达62平方公里,共死亡62人。

解放前右旗各族人民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使他们处在灾难深重的深渊之中。面对鼠疫瘟神,他们既无医又无药,更无防治知识,求神拜佛烧香磕头,大搞封神迷信活动也无济于事,只能任其肆虐,当鼠疫大流行时,疾苦惨叫,其悲惨景象目不忍睹,给当地人民遭受极大的灾难和威胁。

一九四七年,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不仅巴林右旗各族

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也开始了向鼠疫瘟神进军。尽管当时处于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仍把防鼠疫摆到同打仗、生产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将打仗、防鼠疫、生产这三件大事定为当时的三大任务来开展。

二、巴林右旗防治鼠疫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同赤峰地区一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四年主要集中全力,扑灭人间鼠疫。解放当时,面对人间鼠疫地大流行,党和解放区各级政府、军队积极组织力量,建立防疫队伍和机构,并在盟防疫队的帮助下,采取紧急防治措施,对疫区进行封锁隔离和严密地处理,制止了疫情地扩大蔓延,迅速扑灭了人间鼠疫的大流行,而后在盟的大力支持下,派进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的援助下,经过六、七年的大力防治,终于使人间鼠疫在一九四七年发生一次疫情后,终息至今,再未复燃。

第二阶段:主要是查清疫源,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二年。组织和调进技术人员;购置设备,发动群众灭鼠,控制鼠间疫情。防止鼠间疫情向人间蔓延。基本上查清了鼠疫疫源,实现了把鼠疫紧紧地控制在鼠间,并逐渐的控制了鼠间鼠疫发生频率,流行范围和强度。

第三阶段: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开展灭鼠拔源,稳定控制鼠疫,六十年代以后鼠疫防治工作的重点开始转移到防治成果稳定控制鼠疫上来。但后来由于十年内乱的影响,灭鼠拔源工作被迫停顿了一年,后于一九七四年又重新开始。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巴林右旗同全盟各地一样进一步加强了对鼠疫防治工

作的领导和业务技术建设,不断取得防治鼠疫成果。

三、鼠疫防治工作开展情况

1、人间鼠疫及其处理

一九四七年解放当时,正是赤峰地区及其周边旗县鼠疫大流行最猛烈的时期。原乌丹县、原翁牛特旗、敖汉旗、喀喇沁旗、赤峰县、巴林右旗、阿旗、林西县、克旗等地流行都很严重,到一九五四年一共死亡二万一千四百四十人,其中肺鼠疫死亡三百八十五人,其余均为腺鼠疫。党和人民政府迅速组织力量,并在军队支援下开展防治。当时的军队任务特重,除支援防鼠疫外,还得保卫解放区,经常和国民党逃窜的残余部队,地方土匪打仗。即一九四九年末,赤峰及其所属各旗县的防疫技术人员也都发展起来了。基层防疫组织也有了较大发展,疫区内设区卫生助理,非疫区村屯都设有卫生委员和卫生组长。由于党政军民集中全力开展扑灭鼠疫工作,当时也是众志成城防治鼠疫,使疫情迅速得到控制,发病频率和范围急速缩小。

(1)武装封锁:由武装部队和民兵,对疫区和交通要道均设立武装岗哨。凡从疫区出入及交通要道通过,都要封锁检查,除持防疫司令部许可或紧急军事命令者外,一律禁止通行,并设临时隔离所二处。

(2)消杀及疫区处理:在疫区范围内全面开展灭蚤和环境消毒。凡有人居住或活动的场所,都用百分之五的来苏尔喷雾消毒,患者及其家属的衣物、用具都进行药物或蒸气消毒;用石灰或烟火等方法进行灭蚤;对死亡鼠疫尸体,均在防疫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消毒处理,再深埋八尺以下,周边

挖上一米深的防鼠沟。

(3)预防接种和检疫:凡是疫区或进入疫区的所有人员,都必须进行鼠疫菌苗紧急预防接种,提高了人群的免疫能力。同时在病区开展巡回检诊,防疫人员经常到各户去查看,基本作到及时发现病人,及时进行处理、治疗,减少扩大蔓延。

四、鼠间鼠疫及其疫区处理

自一九四八年开展检菌工作以来,曾多次从老鼠身上解剖培养分离出鼠疫菌,从病原学上科学的证实了鼠间鼠疫。鼠间鼠疫的流行赤峰及赤峰周边地区,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七九年,几乎连年不断。野外灭鼠工作也由疫区扩大到城镇外周边地区及交通要道两侧。

1、鼠间流行病学调查

搞好鼠间流行病学调查,也是把防治鼠间鼠疫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流行病学调查对判定和处理疫区,鉴别自然疫源状态,制定防治规划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1)病源学调查: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二年对鼠疫的检验手段,主要是图片镜检的方法检查鼠疫菌,从一九五三年开始使用四步检验的方法检查、培养、分离鼠疫菌,从一九七三年以后主要用被动血凝试阶方法检测鼠疫疫情。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八五年,一共剖检各类鼠族材料五千五百五十九份。其中黄鼠材料四千八百零伍份。检验结果均为阴性。

(2)鼠疫自然疫源地和贮存宿主生态调查:对全旗啮齿动物开展生态调查,并对九种重点鼠类的生活习性、活动规

律、冬眠、繁殖、消长等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结果发现巴林地区的啮齿动物(复齿亚目除外)共有十八种,隶属五个科十五属,在数量和分布上看,其优势种是达乌尔黄鼠;其次为黑线仓鼠,长爪沙土鼠和五趾跳鼠等;居民区之鼠类则以褐家鼠占优势,其次是小家鼠。

(3)疫情监测:在对鼠疫稳控工作中,开展了对鼠疫疫情监测工作,同时也直接验证稳控的效果。对每一经过处理的疫源地,连年坚持病源学检查,剖检了各种鼠类及跳蚤,未发现阳性结果。

(4)考核验收:巴林右旗稳定控制鼠疫工作的考核验收,统一按照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及国务院在不同时期颁布的“灭鼠拔源考核验收办法”和指标要求,由下到上逐级验收。在开展拔源的当年由旗自己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第二年由市里组织验收,再行报自治区或中央进行检查或考核验收,自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六年先后接受并经过了中央北办(一九六五)辽宁省(一九七九)自治区(一九八三)中央地办(一九八五)卫生部(一九八六)稳定成果专家组(一九八六)的多次考核验收和鉴定,一九八六年九月由国内一些知名鼠防专家教授组成的赤峰地区稳定控制鼠疫成果鉴定委员会,在鉴定定书上写道:“赤峰地区包括巴林右旗大面积稳定控制鼠疫工作,组织严密、方法科学、数据可靠,在除害灭病上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国内先进水平,适于国内同类型疫源地推广应用,是一项技术推广成果。”

巴林右旗同赤峰市其它旗县区一样,经过四十年的努

力已经取得了稳定控制巨大防治成果,白塔子和朝阳弯三个鼠疫村屯于一九八五年被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和内蒙古党委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授予“灭鼠拔源工作先进旗”称号。

背景介绍:巴林右旗发生人间鼠疫是在一九四七年。本文撰写者是在一九五六年由热河省撤销建制从承德热河省防疫大队调往赤峰和巴林右旗在巴林右旗从事四十多年鼠疫防治和卫生防疫工作,但发生鼠疫的当时还没有调进巴林右旗,介绍的资料是作者亲身工作经历和参照历史资料及论文和专业总结而汇集的。有关一九四七年当时的防治情景,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原秘书长业喜,老卫生局长五九会和旗医院老药师王玉山同志是当时防治鼠疫的工作者和领导。

本文作者是一九五六年当时以支边防治鼠疫调进来的。由于在少数民族地区防治鼠疫三十多年,在灭鼠拔源工作中出了一定力量,取得了一定成绩,于一九八三年七月,被国家劳动人事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者”荣誉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三十年”的勋章一枚和物质奖励。

本文作者是政协巴林右旗二、三届常委委员于退休后的二〇〇三年七月又接到政协责成撰写巴林右旗发生鼠疫防治情况的一封信,我很荣幸的接收了任务。但由于时间久远、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纰漏。

参加巴林右旗鼠疫防治工作有一定贡献的还有郭应

亮、张国忠、那木三、尹海文、陈加广、巴雅尔图、张凤山、王九会、业喜、王绍贤、东力布(拉西东力布)、乌力吉、鲍玉丰等同志。

作者丛沈阳简历

丛沈阳,男,汉族,1936年4月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瓦房镇丛仗子屯。1944年—1948年在本镇私书小学读书。1949年在家放牛。1950年—1952年读小学和中学。



1952年5月1日—1952年8月3日由学校征抗美援朝卫生兵到安东(现改名丹东)培训三个月,当时美国在朝鲜战场失败,于朝鲜板门店和三八线谈判停战后,我们这批兵没过江,返到原热河省,机动防疫大队(在承德),由防疫大队送承德医士学校防疫专业班学习。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热河省卫生防疫站工作,任科员。1956年,因撤销热河省建制调到原乌丹县防疫站工作。1957年5月1日调巴林右旗卫生院工作。1958年建制卫生防疫站时被分配到防疫站工作。1983年晋升主管医师,同年5月任防疫站站长。1996年6月退休。

曾任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二、三届委员、常委。

总书记和草原牧民促膝话改革

——访其木德道尔吉同志

王兴贵

这一日是其木德道尔吉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

1982年7月23日上午,天空明朗,草原碧绿,一架银白色的飞机徐徐降落在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草原。走下飞机的是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随同的还有李鹏、胡启立等。总书记到巴林草原视察来了!看望草原牧民来了!牧民出身的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时任巴彦塔拉公社党委书记的其木德道尔吉走上前去,向总书记以高贵的民族礼节献上洁白的哈达和醇香的奶酪……

“这个穿蒙古袍的就是我。”老其兴奋地指点着照片说。20年过去,如今老其年愈花甲,但对当时的情景却记忆犹新,每当回忆起来总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总书记下了飞机没有休息,就让我引导他视察草原站附近的阿木京塔拉3万亩草原建设工程。总书记走进齐肩深的牧草中间,高兴地说,我喜欢这样的草原,这才真正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啊!”

“视察完草场回到草原站,便到蒙古包里休息。总书记盘腿坐在地毯上,边喝奶茶边同我和草原站的牧民谈话,还

让旗党政领导都参加。总书记不断地询问:牧民们都能喝上这样香甜的奶茶吗?牧民们都能吃上炒米和肉吗?牧民们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总书记还笑眯眯地瞅着我穿的蒙古袍和靴子说,牧民们都能够穿上这样的衣服吗?我回答说: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牧民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生产积极性很高,蒙古袍和蒙古靴只是在节日或迎接贵宾时才穿着。总书记听了后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坚定改革的信心,没有改革,生产力就不会提高,就不能很快实现现代化,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建设草原……”

老其说到这里又翻出相册,找出总书记来视察时拍摄的几帧珍贵照片,其中有总书记与巴林右旗党政领导和牧民的合影。老其指着说:“这位是当时巴林右旗旗长现在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凤歧同志。总书记视察完临上飞机时,王旗长说,欢迎总书记再来。总书记挥着手说,等牧民致富了,我一定再来看望牧民们!”

老其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沉思着说:“党关怀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关心我们牧民,党中央和我们草原牧民心连着心啊!当时我们巴彦塔拉公社牧业年度普查,牲畜首次超过10万头只,正在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举办那达慕活动。牧民们听说总书记莅临草原视察,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改革和生产干劲倍增。牧民们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关怀和总书记的期望……”

雨露滋润牧草旺盛,党的关怀暖在心头。此后,巴彦塔拉的各族群众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在自治区率先实现了“畜草双承包”责任制,建立了以家庭小草库伦为主要形式的草

原建设与管理的双重经营体制,为畜牧业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幸福的时刻 美好的回忆

——万里花访问记

王兴贵 青巴图

1962年10月6日上午9时30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健步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同等候在那里的国庆节各民族参观团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照片上在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央国防委副主席叶剑英后面第三排右起第四人就是参观团成员巴林右旗查干沐沦人民公社塔本花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万里花同志。

“那年我33岁,我头一次进北京,能够进中南海,能够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是一个普通的牧民,能够跟中央领导合影,太幸福了。我当时激动得热泪直流。我的眼睛盯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看,但是泪花蒙住了眼睛……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你们看……”

万里花今年74岁了,前几年得了中风病,腿脚不很利落。但是听说我们来采访,她兴奋得直起了腰板,竟能在地下走几步。她虽然头发全白,但脸上洋溢着光彩,两只眼睛射

出异样的光芒。看得出这位当年的女干部是位俊俏、泼辣而能干的人物。她在家人的帮助下取出珍存 40 多年的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是卷着的一帧很大的照片，一张金红色的请柬，一个代表条。代表条写着“十月一日西四台 568 号”，这是万里花在国庆节天安门庆祝大会观礼的座位。请柬上写着“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定于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在天安门举行群众庆祝游行大会，届时敬请光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三周年筹备委员会”。照片上的万里花位置较突出，看得出她当年的风采：她穿着蒙古袍，匝着腰带，一副很丰润的面孔，两条油黑的大辫子……

因为照片是黑白的，和我们一起采访的旗政协文史委主任穆松问：“当时您穿的蒙古袍是什么样的颜色？”没等问完，万里花的女儿娜仁其木格便将珍存 40 年的当年参加观礼时穿的衣服和腰带——一领湖蓝色镶边蒙古袍，一条桔黄色绸腰带，取来给大家看。

“我这个女儿娜仁其木格是抱养的。我参加观礼团那年她才 3 岁，我是抱着她坐牛车到大板，而后到北京去的。住的地方记不好了，大概是民族文化宫，11 层大楼，我和女儿住在第五层，大会还为她安排了临时保姆。我一共见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两次，一次是在天安门城楼，在观礼台上能清楚地望见，一次是合影。那一次昭乌达盟的代表有克旗的巴特尔同志、翁旗的宝音套格套同志、敖汉旗的韩秀山同志，是代表内蒙参加的。在北京 20 多天里参观了故宫、颐和园、天坛、十三陵等文物古迹，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

革命博物馆和在民族文化宫展出的我国少数民族建设成就展，其中就有我旗幸福之路公社发展远景沙盘……这是我一生中不能忘记的，感谢党的培养与关怀……”

万里花 1929 年出生于沙巴尔台河畔，195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积极工作，在牧区合作化运动中走在前列，担任过嘎查级妇女干部。1960 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她担任查干沐沦人民公社塔本花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职务，是当时全旗 38 个牧业生产大队中唯一一位女书记、女队长。她做事泼辣、勇于负责，在各项工作中多次获得荣誉，得到过旗级劳动模范奖励，是牲畜改良先进工作者、先进妇女工作者、先进妇幼保健工作者。曾经是盟旗党代会代表。“四请”时被错误的批判过，后来，又当过基层领导。

这天是晚秋季节少有的好天气，空气清新，阳光明媚。万里花老人应邀穿上当年参加观礼的蒙古服装，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拍照。

党对草原重镇大板接管 改造与新生政权建设

王兴贵

一、接管工作的准备与实施

(一)大板城镇的形成

从清代开始,大板便是巴林右翼旗札萨克的旗治所在地。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逐步发展成为草原城镇。清初清庭分封蒙古诸部牧地,大板被指定为旗札萨克的驻地,开始形成屯落。清顺治康熙两朝,皇室固伦淑慧、固伦荣宪公主相继下嫁巴林,带来数百户满汉人口,居住大板。这些人破土烧窑,建造房屋,立街辟巷,聚集商贾,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聚落。此后随着札萨克府邸的修筑,康熙行宫的修建,佛道寺观的出现,使大板成为远近闻名的重镇。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将大板更名为“大板上”,建伪旗公署,还一度作为伪兴安西分省公署的候补地,在大板设立军营、警察署、监狱、稽查所、大板村公所等机构,大板沦为日本侵略者在巴林右翼旗实行殖民统治的中心地。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大板一直是塞北军事要塞和交通枢纽。大板北依连绵起伏的大兴安岭南段山脉,南靠

蜿蜒曲折的西拉沐沦河,是依山傍水的天然要地。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旗札萨克色布腾和福晋固伦淑慧公主在西拉沐沦河上修建巴林桥(公主桥),使大板成为南通京都北联锡林郭勒草原、北接科尔沁草原、克什克腾草原的交通枢纽。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军为消灭葛尔丹,康熙帝率领大军扼守巴林桥,以控制这一重要的交通要道,防止葛尔丹部向东南进军。此役大胜,作为军事要塞巴林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伪统治时期,为控制大板和西拉沐沦河以北广大地区,修公路建机场,将大板作成侵略者的战略要地。

大板从清初开始,由于是札萨克所在地,又有公主下嫁带来的陪房人口,长年居住在大板的不下数百户。以后随着寺庙的兴建,喇嘛人口的增加,逐渐形成了三个大型的聚落,按其座落习称上大板、中大板、下大板。据1936年的有关资料统计,大板有304户,其中日本人6户,其余为蒙、汉、满户。人口1045人,其中日本人13人,蒙古族723人,汉满人309人。到解放初期的1946年,大板有350户1500人。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在以游牧为主的巴林草原上已经初步形成草原城镇。

这一时期的大板不但是全旗政治中心地、人口聚集地和交通枢纽地,还是宗教重要活动场所和商品集散地。从清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全旗13个大庙的喇嘛都到大板举办一年一度的六月悠热鲁庙会。期间大板热闹非凡,远近信徒成千上万地来参谒佛祖,旗衙门也利用这个机会召开旗会、清点户口、征收税赋、审理案件等。王府的乐手、

歌手及民间说唱艺人来此演出,甚至还招来东北和关内唱京戏的、跑马戏的、拉洋片的、玩杂耍的。蒙古族那达慕则是高手竞技的场所,来自锡、察、昭、卓、哲等盟旗的赛马手、摔跤手、射箭手在这里一比高低。庙会期间形成了大规模的物资交流场面,有来自热河、察哈尔、多伦、张家口,以及京、津等地的商人来旗做买卖,给旗内带来工业品和生活日用品,买走牧民的牲畜、绒毛和皮张。有的年份成交万头牲畜以上。

(二)大板的解放和我军接管大板的准备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第十七集团军,在锡林郭勒草原王盖庙集结后越过大兴安岭,长驱直入巴林草原。苏军经大兴安岭乌兰坝时,因道路狭窄坦克、汽车不能通行,便由工程兵轰炸岩石抢修路面,以利各种车辆通行。8月11日,在大板,以伪巴林右翼旗公署参事官多田正美为首的20余名日本侵略者,纠集伪职员伪警察自卫团员烧毁伪旗公署办公地址大板康熙行宫及伪兴农合作社的部分房屋档案物资逃出大板,日伪政权土崩瓦解。8月12日苏联红军开进大板,以赵化民为首的大板街300多民众出迎。逃跑到阿贵庙的伪职员和伪警察杀死日本参事官和特务股长,将尸体运回大板送交苏军。苏军在大板赵化民的院内设大板城防司令部。8月下旬,由苏军主持成立了以赵化民为首的巴林右翼旗维持会,维护社会治安。据时人道尔吉回忆,约在8月24日上午,苏军驻城军官把赵化民、乌尔图、博彦图、突博等人召集到一起,向他们说明,日伪政权已经垮台了,但地方得有人管,驻

军不能管地方上的日常事务,只是协助地方清除日伪残余分子、保卫胜利果实,所以,应由你们组成地方维持会。同时还叫大家选一名会长。当时大家一致推选赵为会长,巴林右翼旗地方维持会就这样成立了。以后不久,苏军只留下尼古来少校、扎木萨上尉、仁钦少尉等十几名人员组成大板城防司令部,其余苏军在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撤到林西去了。

维持会按照苏军城防司令部的指示,为苏军留守人员征集给养,维护社会治安,弹压土匪强盗,稳定地方局势,同时着手组建地方武装巴林右翼旗自卫团。其时,巴林右旗的部分努图克嘎查已由当地实力者建立了自卫队。自卫队的头目拉巴哈扎木苏、沙尔夫等人公推扎噶尔亲王的女婿仲乃担任总指挥。仲乃遂将各地的自卫队编为一个团,称大板自卫团,下属4个连,人员五六百名,自备枪马。

9月中旬,受党派遣,王逸伦、张焕然等来到赤峰成立八路军热北地区司令部。他们从苏军手里接收部分地方武装和招降的匪股,将盛世恩、张振发、王瑞贤等地主武装和张振山、姚占山、石荣等匪股编为18个支队。当时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没有到来,而这些收编武装因没有来得及整顿和改造,遂造成指挥上严重失控。为尽快接收林东、大板,9月下旬,支队长陈荣久奉王逸伦司令员之命,到林东找巴林左翼旗维持会长和子章欲接管林东大板。和子章以陈原是伪兴安西分省的一个雇员不是真八路军为由给以拒绝。10月中旬又有张振山支队百余人接收林东大板,被和子章率部包围缴械。11月初,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及热河

省人民政府在承德成立。省政府对热河的军事辖域进行划分。将平泉、赤峰、建平、乌丹、新惠划为第二军分区，将包括大板在内的林西、林东、昆都、开鲁、鲁北、经棚划为第五军分区管辖，并下派干部，接管这些地区。热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五专员公署）在林西成立。党派卜云龙、周跃山、谢滋群等带领一二百名干部来到林西。中共热北地委、热北军分区和林西县政府成立。王逸伦任热北地委书记，张盘新任热北专署专员，卜云龙任热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师军任参谋长，邱英华、刘昌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11月上旬，盛世恩所领的第十三支队、第六支队取道乌丹接管大板和林东。到大板街时其部纪律不好，抢劫民户百余，缴了大板警备中队的马匹枪支，还将牧民捐资兴学的马匹当作日伪财产没收。巴林右翼旗维持会会长赵化民立即同巴林左翼旗的和子章联络。和子章立派巴林左翼旗自卫队第一大队在大板与林东之间的老道板警戒，并与前来接管林东的盛部接火。盛部死亡3人，余部撤回林西。其部在大板的五六十人被巴林右翼旗自卫队扣留。事件发生后，热北方面立刻派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刘昌前往大板。刘昌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干部，又参加过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发扬我党民族工作的好传统，向赵化民和仲乃转达了地委负责人的致意。赵化民以当地蒙古人接待上宾之礼安排酒宴接待刘昌。席间互相谈心，通宵达旦。刘昌取出在延安时中央党校发的证件给大家看，还详细介绍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情况，用长征中的经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八路军的性质、任务和纪律，同时也不否认一些干

部战士违犯群众纪律的错误行为，表示凡拿走的，有物退物，无物赔偿。赵化民和仲乃表示同意送回热北方面的干部战士。这个事件，虽然在和谐的谈判中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是此次接管大板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由于这些接管部队没有得到整顿和改造，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因而接管失败。

此后，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12月初，按照东蒙古自治政府博彦满都发布的《兴安总省公署地方政治建设纲要》的规定，和子章出任巴林左翼旗旗长，赵化民出任巴林右翼旗旗长。巴林右翼旗建民警总队，各努图克区建民警分队，大板街建中队，总队队长仲乃。警备队员120余，枪械80余，武装力量扩大。12月下旬，和子章因地域管辖问题亲自驱兵500余人开近林西县城，要求共产党八路军退出林西经棚等地，并在新林镇区抓八路军下派干部副区长张治中，民政助理李涛。为了解决此事，林西县县长苏雷请示热北地委同意，仅带一警卫员来大板与和子章、赵化民谈判，双方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和、赵释放了张治中、李涛。苏雷邀请和、赵去林西。和、赵委派那苏图、查干楚伦去林西，此次谈判获得成功。中共热北地委热北军分区热情地接待了客人，并向他们赠送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整风文献。并要求和部退出林西县境。1946年2月，八路军主力三十旅第六十八团开进林西。在热北地委热北军分区的喻楚杰、谢滋群的主持下，对18个支队的武装人员进行了清理，裁汰包括盛世恩在内的1000余人，仅留下100余人。2月下旬，热北方面以和子章没有遵守协约退出新林镇和五十家子等

地为由派六十八团驰击,在五十家子接火,和部伤亡很大,遂退出。

3月,东蒙古自治政府工作团来林东成立昭乌达省,并赴承德参加会议时,要求和、赵赴林西和热北军政方面谈判。和、赵虽未成行,但是派员参加。时逢“四·三”会议在承德召开,宣布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主,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成功。这就为接管大板提供了前提。为贯彻“四·三”会议精神达成了“林西协定”。这个协定结束了党在接管包括大板在内的昭乌达地区长达半年之久的摩擦。“协定”中写明,昭乌达省政府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平等政策,愿与共产党八路军实行合作,实现蒙古人民民族自治和民主改革的要求。热北方面表示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全力支持蒙汉人民的民主和自治的愿望。1946年4月15日,热北代表和昭乌达省代表在林西召开正式会议,本着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关于昭乌达盟行政军事及蒙汉关系诸问题的决定”精神,制定了《暂行办法》,决定包括大板在内的昭乌达地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发布《关于林东大板两旗目前工作形势办法》。至此,党接管大板的准备工作结束。

(三)接管大板的实施

针对民族地区的特点,党对大板的接管是分步实施的。首先按照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出的关于昭乌达盟行政军事及蒙汉关系诸问题的决定精神,和《暂行办法》中制定的“大板、天山、鲁北设汉民自治区,旗政府内设汉民自

治科,一切汉民工作由八路军去做,负责人由八路军内指派,一切民主政府选举要迅速进行”之要求,在巴林右翼旗东南部汉族聚居区建巴林右翼旗汉民自治科,由雷代夫任科长。在全旗设置3个汉民区,为隆昌汉民区、白音布统汉民区、大板汉民区。建立区级政权机构,其中隆昌区区长牛鹏飞,白音布统区区长于全,大板区区长阿木古郎。不久,巴林右翼旗人民政府成立,旗长察隆阿,副旗长雷代夫。旗汉民科迁至大板,由雷代夫兼任科长,继续领导全旗汉民区的工作。以后随着旗支会的建立,汉民科的工作被旗支会取代。

按照“四·三”会议的决定精神,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巴林右翼旗支会建立。旗支会是半政党、半政权、半团体组织,其任务是全面发动蒙古民众开展民主改革运动。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组织机构,1946年6月下旬,自治运动昭乌达盟分会在林东开办民族干部培训班。培训班规定只要有决心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奋斗者,有决心为内蒙古人民服务者,不分贫民、贵族及喇嘛均可参加。右旗输送学员40余名,主要是蒙古族青年。7月,以这些学员为骨干,在大板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巴林右翼旗支会。额尔恒巴图、曹都毕力格、高力布尼玛、罗布桑任旗支会常委,额尔恒巴图任旗支会主任兼组织股长。此后,旗支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清算斗争等民主改革运动和组建军队工作。到1947年10月,旗支会按照上级有关精神撤销,完成了它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1946年7月下旬,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派出以秦香玉

为团长、崔泽林为副团长的工作团来到昭乌达盟。工作团分4个工作队分赴各地。其中由崔泽林带领的一个工作队来到巴林右翼旗，在白音布统区成立中共巴林右翼旗委员会（当时对外称政治处），雷代夫任代理书记，王庚申任旗委委员，崔泽林任组织部长，方驰辛任宣传部长。巴林右旗的各项工作有了党委的直接领导。旗委首先在蒙汉民众中发展中共党员。8月份，于隆昌区乌兰套海村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以后继续在各区发展党员建立区委。1947年4月，中共巴林右翼旗委员会迁至大板，公开党的组织，取消政治处的名称。从此，巴林右翼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旗委的领导下进行。

1950年2月25日，按照内蒙古东部区党委《关于召开党员代表会议的决定》精神，在大板举行中共巴林右翼旗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3月7日召开巴林右旗首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旗党政领导机关。同年召开巴林右旗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第一届第一次社员代表会。大板遂成为巴林右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

二、民主改革、镇反和肃特

（一）大板的民主改革

党的纲领明确规定革命的目的在于首先铲除封建压迫制度，将各族人民从苦难的阶级压迫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解放初期，中共热北地委为逐步实现这一目标，在民族地区慎重地开展民主改革运动。1946年4月15日在昭乌达省政府和热北地区协商的暂行办法中，提出“在政权工作中，目前即开展清算运动，摧毁敌残余势力和坏分子，以发动群众

的政治觉悟”的任务。

热北党政军机关由林西迁往林东后，即贯彻东北局关于内蒙古工作为要彻底发动广大农牧民群众，就必须通过训练培养青年干部入手，以解决内蒙古自治的问题。于是刚刚成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分会，便在林东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巴林右翼旗40余名蒙古族青年参加学习。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学习了有关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路线、民族运动工作、军事工作和时事政治等，了解了我们党的民主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增强了搞好地区民主革命的决心。训练班结束后，他们以民族解放的精神和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于民主改革中去。他们首先从大板城镇开始进行民主革命运动。当时大板有4个村（嘎查），近400户，人口不到2000人，蒙汉各半，杂居相处。工作队发动大板街的蒙汉群众，清算斗争了三喇嘛葛万普乐。当时的民主改革方针是团结改造民族上层人物，积极争取和放手使用民族青年，坚决依靠劳动牧民，广泛宣传民族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改革。按照这一方针，内蒙古自治运动昭乌达盟分会的工作队在大板首先发动蒙古族青年，以传达会议精神和文艺演出等形式宣传“四三”会议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清算斗争的意义。当时斗争形势很复杂，很多群众对共产党和党的民主改革政策不够了解。八路军为接管大板同和子章、赵化民的冲突虽然解决，但留在人们脑子里的民族隔阂的阴影还存在着。国民党反动派出于政治需要，肆意挑拨民族关系。据当时担任清算工作团团长的确吉敖斯尔回忆，1946年七八月间，突然飞来一架国民党

飞机,在大板北郊空投一个包裹,工作团派人取来打开一看,内容全是极其反动的诬蔑党中央领导人的漫画和丑化、攻击共产党的传单,借以妄图达到破坏我党和广大蒙古族人民关系的目的。这样一来给工作团发动群众搞清算斗争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工作团团团长确吉敖斯尔和副团长徐子干分工负责,确在东庙发动喇嘛和蒙族群众,徐在大板街发动汉族群众。当时的斗争对象是葛万普乐。他是旗公爷业喜敖尔布的弟弟,他掌握大板街乃至全旗政教两方面的权力,民愤较大。斗争会因为准备充分,当场展示热河军阀汤玉麟给他的委任状,发动群众揭发他的压榨手段和欺骗行为,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普的威风为之一扫。

正当牧区民主改革运动蓬蓬勃勃开展的时候,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向人民解放区大举进攻。巴林右旗党政军民投入保卫解放区的斗争中去,自治运动昭乌达盟分会和巴林右旗支会的大批干部由建立政权和群众工作转入军事工作,但并未停止牧区的民主改革。1946年12月14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发布《关于热河蒙民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指出:在蒙古民族的内部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和民生改善,对于城乡勾结敌伪,压迫蒙汉人民的罪大恶极的必须坚决清算;在民主改革中只是消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大板是草原集镇,工商业不很发达,只是聚集了一些牧主地主。按照“一二·一四”指示精神,大板开展了以减轻封建剥削为内容的“新苏鲁克”运动。1947年春,昭乌达盟先后两次向大板

派出工作队抓试点。他们培养积极分子,广泛地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在较短的时间实行了“新苏鲁克”制度。这个制度是将牧民为牧主交纳“苏鲁克”繁育的仔畜由过去的正“二八”分成,改成倒“二八”分成,即牧民从中得到八成,牧主得二成。农民租地主的地租实行“二五”减租。这一办法,使大板的农牧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们看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自觉地投入到民主改革运动中来。

在牧区以放“新苏鲁克”为主要内容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1947年下半年全面开始牧区民主改革运动。七八月份,旗委在大板召开旗、努图克(区)干部会议,批评了一些同志对民族上层斗争不力,犯了“右”的错误,决定对旗区两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12月份,贯彻《土地法大纲》,训练土改工作队。至此,一场贯彻执行《土地法大纲》,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群众运动在巴林右旗城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板镇区为搞好土改运动,首先发动群众成立了贫牧团、农牧会等组织。当时大板贫牧团由15人组成,其中贫牧11人,赤贫牧4人。农牧会12人,其中贫牧11人,赤贫牧1人。妇女会4人,其中贫牧3人,赤贫牧1人。民兵22人,其中中牧1人,贫牧14人,赤贫牧7人。自卫队28人,其中中牧2人,贫牧22人,赤贫牧4人。接着进行整党。当时党组织没有公开,发展党员秘密吸收,有的没有填表也没有举行仪式。由于斗争情况复杂,党组织中出现了严重不纯,为了搞好民主改革运动,对全旗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大板共有11名党员,其中赤贫1人,贫牧4人,中牧3人,富牧3人,通过整党被清洗出党的有8人,

仅保留了3人。然后划分阶级成份,挖浮财,开斗争会,实行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牧者有其畜,平分牧畜。当时没有考虑到民族地区特点、畜牧业经济的特点和草原城镇的特点,出现了一些问题。土改中在牧区采取了同农区一样的政策,违背了党在牧区执行的“三不两利”,即“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成份”、“牧主与牧工两利”的方针。违背了畜牧业发展规律,由于“分、斗、划”造成牲畜大量损失,牲畜头数锐减。在大板街忽视了草原城镇工商者的特点,使民族工商业受到冲击。

(二)大板城镇镇反肃特

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在承德召开。在会议做出的决议中,提出“建立各盟旗民选政府,分别接受各解放区民主政府的领导和帮助”,“蒙汉杂居区、实行蒙汉分治……,深入蒙地之汉县,八路军得在该地发动群众,改造政权,维持治安,以防特务活动”。决议还将防特列入当时中心工作,指出“为大量的放手发动群众,参加民族自治运动,发展会员,建立分支会,选举盟旗政府,严防特务破坏活动,给国民党反派及一切反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行动以打击”。

这一时期,大板地区的反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肃清消灭土匪。1946年12月,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在林西召开高干会议。会后面对杂复的斗争形势,盟委决定在包括大板在内的昭乌达盟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大力肃清土匪。巴林右翼旗党政军民积极投入清匪支前斗争。1947年1月,驻守在大板的三十四团以三个连的兵力在西拉沐沦河北岸,

围剿以嘎尔布为头目的数百名匪徒。1948年1月,中共昭乌达盟委发出关于“挖匪根”的指示。为彻底消灭韩桑杰匪部,大板地区干部群众积极投入剿匪斗争。由于各地军民的共同努力将土匪歼灭,韩匪只身逃往蒙古。11月,在民主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国民党溃匪苏和巴特尔率部窜入大板,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大板军民奋起抵抗,并奉命组织撤退。反革命分子塞音吉亚等4人趁机残害我革命工作人员。为打击匪特的嚣张气焰,昭乌达盟人民法院判处塞音吉亚、义德尔朝格图死刑,判处其它犯罪分子有期徒刑。

1949年5月2日,中共巴林右旗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部署加强除奸反特剿匪工作,并把除奸反特列为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7月,旗公安局对包括大板地区在内的全旗反动党团特进行登记。为贯彻从城市到乡村的方法,大板被列为重点,于旗直属机关中召开了动员大会,各单位积极报送材料,检举揭发。经过这次登记,除弄清了原有的包括国民党三青团、“国民党棒子队”和家里教8名分子,还新登记了三青团员、家里教4人,还解决了敌特分子所制造的凶杀、破坏电线、搞迷信等犯罪活动等社会治安问题。在大板居民中建立了治安公约。其主要内容为:积极参加妨奸防盗防火工作,民兵晚间站岗放哨检查坏人,保护治安,不包庇坏人,不受坏人拉拢,积极监视地富反坏,不和地富勾结,不造谣不窝匪,不贩卖毒品,不入迷信会道门,听到谣言和地富翻把等坏事,及时报告村公安委员等。12月,在建政工作中,对大板区的6名反把地主富农牧主牧富

进行了制裁。

1951年,按照全旗的统一部署,大板地区开展镇反工作。干部群众利用各种形式宣传镇压反革命的意义和办法,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大搜捕。发动群众,以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控告检举反革命分子。在镇反运动中为贯彻上级肃清土匪挖匪根起黑枪的指示,以大板为中心建立了联防队,成立了武工队,深入群众掌握敌情。

1953年4月,罪大恶极的巨匪、反动分子韩桑杰归案。4月18日,旗委发出在大板公审韩犯的通知。为使受害群众伸冤诉苦,发动有冤有苦的都来参加,共有万余人参加公审公判大会。5月3日韩匪在大板南葛根仓伏法。

三、贯彻党的城镇经济的政策,改造城镇经济

(一)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贯彻党的城镇工商业者的政策。

摧毁日伪反动势力,城镇回到了人民手中。为管好城镇,改造城镇,迅速恢复发展城镇经济,在伟大的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始终贯彻党的城市经济政策,纠正一切偏向。1949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云泽(乌兰夫)在《纪念“七七”努力完成我们任务》中指出,内蒙古人民在政治上已取得平等与自治之后,如果不在经济文化上大力提高,停滞在原来的状态,那么内蒙古民族就没有获得真正的完全的解放,因此,经济建设任务,应在当前的工作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其它工作,都应该而且必须是围绕着完成经济建设的任务来进行。对于处在急风暴雨民主改革中的城镇经济,中共内蒙古工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不失时机

地制定方针政策,发出《关于切实保护与发展工商业的决定》,要求各地不得侵犯工商业者,不得关闭和任意没收工商企业。热河省政府也一再重申保护工商业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的政策。冀热辽财经会议确定,在民主改革中,城乡要大力贯彻发展棉毛纺织业、农具、运输工具和造纸、编织、运盐及其它工业与副业的政策。

当时,作为草原城镇的大板,虽然户数人口不多,工商业户仅有2家,也不具备一定规模,但是大板在千里草原上已经是一个城镇,是手工业生产基地和工农牧业产品的集散地,它的经济状况对于整个地区的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牧改的冲击,也由于我们的干部多数是农牧民出身,历史上汉商对草原牧民的盘剥,使他们对一些工商业者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工商业在城镇经济的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甚至把工商业者当作唯利是图投机倒把的奸商,因而,出现了只重视农牧业改造,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甚至有的把他们作为“取缔”的对象。因此,工商业者感到没有发展前途,大多数弃商经农经牧,到1950年有73.3%的工商户兼营土地牲畜,据统计共有土地247亩,有牲畜70余头只。家庭收入主要靠农牧业,有的已不营商业。

土改以后,如何发展城镇经济,纠正牧改中出现的问
题? 1950年4月,昭乌达盟委召开城镇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对工商业和工商业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很好的总结经验教训,帮助工商业者发展城镇工商业,并建立工商联,由他们与政府联系搞好工商业。此后,工商业情况好转,工

商业者开始逐步以工商业为主,在发展城镇经济中起到一定作用。旗委不断加强对工商业的领导,纠正在工商业上放任自留的思想倾向,不断加强对新民主主义的“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重要性的认识,从而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教育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工商业者,不许对商人抱歧视和不搭理的态度,重视合作贸易,使城市商业在国营经济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并且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政策教育,加强管理。1951年初,旗委决定在大板设工商助理,成立工商部,加强城镇工商工作管理,定期召开城镇工商界代表会议,加强工商界人士的政治教育,沟通国营、合作、个体工商户的工作,以实现繁荣城镇经济的目的。

民主改革消灭了封建势力,落实城镇工商业者的政策,从而随着中共巴林右翼旗委员会迁至大板,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二)适应牧区特点,发展多种形式的城镇经济组织。

巴林右旗大板城镇解放初期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
因,工商业基础薄弱,只有2家买卖,3家药铺,1家旅店,还有一些临时性的成衣、铁匠、烧饼等作坊。他们大多在家中营业,称家里买卖。有时外地大城市的旅蒙商来旗做买卖,都是临时搭摊,随来随走。解放初,政府在保护和鼓励城镇私营工商业者的同时,为了巩固新生民主政权,推动民主改革支援前线,1947年旗政府在大板成立了生产部。建生产部主要是为解决旗区干部吃穿用和政府开销费用,也面向城乡农牧民群众做买卖。生产部建在城镇中心地带,归旗

政府财粮科领导,主营商业,也兼营手工业和短途运输业。经营布匹、百货、烟酒、日杂等二三百种商品,承印各种表格、信纸、票据,制做轧杠皮、笼头、马鞭等黑皮革制品。运输业主要是采购商品和运盐。有勒勒车八九十辆,骆驼100余峰。

旗政府除了筹建生产部,还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由社员入股建成的大板大众合作社,是一个合作的商业机构。其宗旨是尽量满足社员需要,不以营利而以为社员服务为目的,起到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做国家经济得力助手的作用,其经营原则是城乡群众需要啥,合作社就到外地采购啥,群众卖啥,合作社就收购啥。建立之初,由旗长察隆阿倡议称人民合作社,牧改时,分得果实的农牧民入股增多,合作社规模扩大,称人民大众合作社。大板总社还在一些努图克区建分社。此后,根据基层供销社网点增多的状况,旗政府决定成立旗联社。1950年召开巴林右旗供销合作社第一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旗政府对供销社给以扶持,对其经营的粮、盐、棉布、煤油等生活必需的6种商品给予优待,对农牧民群众出售的毛绒皮张、生猪、菜牛羊、耕畜列入国家收购计划,实行预购合同制。

合作商业的发展,使市场购销扩大,繁荣了城镇经济,也成为城乡连接的纽带。供销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当时讲究适销对路,买卖公开,有销路就收、没有销路就不收。许多人回忆说,1951年右旗粮食丰收,在大板街一车黄土有人要,一车粮食没人要。1949年、1950年顶好大犏牛不过一石二斗米,一斗小米换一只大绵

羊。城镇经济的发展安定了人民生活。

50年代初,为了推动城镇经济地发展,还大力发展手工业,组织五小农具下乡,搞活集市贸易。旗政府在大板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和评议资金委员会。为了保障工商业者的利益,还成立了商会组织。

四、建立和巩固城镇人民政权,扫除社会垃圾,提倡新道德新风尚

(一)建立和巩固城镇人民政权。

巴林右旗解放以后,经过急风暴雨式的民主改革运动,摧毁了封建制度,扳掉了三座大山。为了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1946年建大板努图克政府,将大板城镇划为4个村。大板街区划为大板一村和三村,包括如今部分大板街区和郊区套白、巴汗宝力格,东庙、麻斯塔拉划为二村和四村。以后在旗区委的领导下,在包括大板城镇在内的全努图克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复仇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下半年,努图克村选建政工作已经成熟,中共大板努图克委员会、大板努图克政府在本努图克益苏毛都村进行村选建政试点,然后在全努铺开,大板城镇一、二、三、四村的村选建政工作开展起来。在建政过程中,实行如下的方法和步骤:首先开干部会,然后以行政村为单位开大会,区领导传达建政的政策,说明村选建政的重要性。发动广大干部群众讨论,为什么要村选建政,政权的性质是什么,由谁来掌握权力,依靠谁,教育谁,对谁专政,什么人拥有公民权,什么人拥有公民权。使群众明白村选是为保护土改的胜利果实,维护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真

正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新政权。提高群众认识后,成立村选举委员会,设宣传股、总务股、选举股、秘书股等工作机构,开始村选的具体工作,即登记选民,列榜公布,召开选民大会,选举代表。选举时,由村党支部推荐村政府主席及委员名单,经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村政府主席1人,副主席1人,秘书、民教委员、牧农委员各1人,组成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就是村政府机关。村委在村民大会上制定各项制度、生产计划和村民公约。至1949年末,大板城镇各村政权全部建立起来。

村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为了巩固这个新生政权,保持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950年开展了整党和“三查”运动。大板城镇在村级整党中学习和贯彻《中共内蒙古东部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整风指示的决定》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深刻领会整党整风的必要性。建党建政期间,在复杂的斗争中,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使党得到了发展,但也出现严重问题,主要是新建的党组织能力弱,经验少,思想政策水平不高,加之民族地区情况复杂、任务繁重,领导机关对政策思想教育不够,产生了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错误作风,出现了不负责任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有的发生了一些贪污腐化堕落等违法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在旗委统一部署下,大板城镇各村发动群众公开整风。整风的主要方法和内容是“五查一开定”,即查阶级、查历史、查思想、查工作、查作风,定成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脱离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清除了一些不合格的党员和干部,纯洁了党组织和干

部队伍,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党的力量。

1951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和中央内蒙古分局发出的《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指示。大板地区党政机关召开党员大会和干部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宣传开展“三反”运动的政治意义,发动群众开展“三反”运动。在城镇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运动,组织工商业者学习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地坚决彻底地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的指示精神,检查“五反”问题。因为大板工商业户不多,资本少,经营的多是零杂商品,仅查出一些偷税行为。运动中,对私营工商业户进行了清产核资、登记发照工作。“三反”、“五反”巩固了城镇政权,使城镇的各项建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二)清除旧社会垃圾和丑恶现象,提倡新道德新风尚

巴林右旗民主改革时期,旗委和旗政府十分重视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肮脏的东西和丑恶现象,取缔卖淫嫖娼、赌博和一切反动会道门。1949年5月,内蒙政府严令解散一切会道门组织,责令所有会道门之首要分子,立即向当地盟市公安机关登记,同时申明所有被胁迫被诱骗而参加会道门的一般信徒,一经脱离组织停止活动,一概不加追究。巴林右旗因为是牧区,大板城镇以蒙古族人口居多,卖淫嫖娼于日伪时期只在“六月庙会”由外地来设妓馆赌馆,庙会结束即撤。没有成立过什么反动会道门组织机构,只有个

别的会道门信徒向旗公安机关登记。

1946年12月热河省政府发出《关于开展1947年大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迅速开展改造“烟民、二流子、懒汉”活动,时称反“烟、二、懒”运动。右旗政府和大板努图克政府发动儿童团拿懒汉、抓烟鬼、改造二流子。吸扎鸦片烟,是当时的一大公害,是建国前后清除旧社会丑恶现象的首要问题。大板城镇连续多年进行清除烟害的斗争。1948年巴林右翼旗政府和大板努图克政府认真贯彻热河省政府提出的禁止种植罂粟的决定和禁止生产贩卖鸦片的决定,在大板城镇进行检查,对种植和贩卖者,分别情况予以处理,直至法办。1948年,按照热河省政府《关于戒烟工作的指示》的五条规定,在大板城镇开展群众性的戒烟运动,号召全镇烟民立即戒绝坏嗜好,重新作人,形成人人劝戒、个个监视的群众运动。戒烟办法是戒烟与生产,说服与强制相结合。大板区成立戒烟所和戒烟委员会,把烟民集中起来强制戒烟。杜绝烟源,毁掉烟具,督促检查,奖罚分明。加强宣传,利用喇叭和墙报大造戒烟舆论与声势。规定凡45岁以下的青壮年烟民一律于1949年4月底前全部戒掉,其余的秋收前戒掉烟习。同时贯彻《热河省戒烟禁毒奖惩条例》,规定凡嗜烟者,一律就地向政府登记,并限期禁绝。对所有的烟民一律不发给地照。对其家庭财产由村政府和农会管理,不得自行典当。直到戒烟后方发给地照取消管制。对屡教不改种毒贩毒吸扎毒者,给以法律制裁。大板各村都开展了“禁种、禁吸扎、禁贩卖、禁存贮、查种毒、查吸扎、查贩卖、查存贮”的“四禁四查”运动。到1950年,

大板烟民全部戒烟。戒烟运动取得胜利,烟毒彻底消除。

包办买卖婚姻和女子裹足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个重要丑恶现象。旗政府、大板努图克政府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大力宣传婚姻法,广泛发动群众,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无视妇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保护男女婚姻自由,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移风易俗,废除裹足恶习,给妇女以生产劳动、家庭婚姻等一切平等权利,提倡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新风尚。

为了在干部和群众中提倡新道德新风尚,1948年在生产自救运动中,旗政府机关和大板努图克机关,精减杂勤人员和车马,取消干部小灶,禁吸纸烟,开展节衣缩食和募捐救困运动。群众反映说“八路军真不赖,保护生产联系群众那叫快”!

为了有效地建立新道德新风尚新秩序,大板各村在村选建政后都订立了村民公约,从社会到家庭,从教育到卫生,从生产到生活都有约定。主要有贫雇中农牧团结监视地富防特务,维护村政府。坚决执行村民会议决议,勤劳生产,改善生活,奖励劳动模范。加强改造烟民、二流子,使之参加生产。成立冬学识字班和读报组,开展文化学习。卫生清洁要讲究,屋里屋外常打扫。打柴拾粪多劳动,开荒种地多打粮,拥军优属工作要抓紧,保证军烈属不困难等。建国初期,由于区村干部脚踏实地贯彻上级指示,保护新政权,使树立新道德新风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韩桑杰其人其事

撰文 纳·宝音贺希格

译文 胡·斯钦毕力格

公元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巴林右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板镇以南,查干沐沦河岸刑场上,随着“叭”的一声清脆的枪声,一名捆成一团,五十出头,中等个头的男子汉背着他的滔天罪行一去不回。他就是在昭乌达、卓索图、锡林郭勒等三盟十几个旗县横行霸道,抢劫屠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以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双手的死敌,反革命武装土匪头目韩桑杰。

公审枪决反革命武装土匪头目韩桑杰的大会举行在大板镇人民广场。庄严肃穆的人民广场主席台上边横挂着“枪决反革命首犯韩桑杰公判大会”的横幅;参加这次公判大会的来自巴林左右两旗、阿鲁科尔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等地赶来的报仇雪恨的人们超过万余,形成人山人海,震天动地,怒火朝天的气势。其中有的手拿着剪刀、锥子、梳篦,他们高喊着“政府决定对韩桑杰实行枪决是解不了我们的怨恨!应该用千千万万锥子戳死他,把他的皮肉绞成肉丝我们都不解恨!”、“将他如何处死也解不了平民百姓的心

头之恨”等口号此起彼伏，震天动地般的怒吼着。

在他的枪口下失去父母儿女者，在他的迫害下离开亲人，战友的广大人民群众愤恨声讨场面为整个公判大会增添了强大的气势。

在公开审判韩桑杰的当天，由学校教师、机关干部组成的“宣传”队向满腔愤怒的各族人民群众，广泛宣传党和政府的法律、法规，依法枪决韩桑杰的重大意义等内容。这一天由全副武装的骑兵在山岗上站岗戒备，在会场上由步兵、警察维持会场秩序，此时犯有滔天罪行，祸国殃民的土匪头目韩桑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正义攻势之下认罪服法。

二

韩桑杰全名叫桑杰扎布，系蒙古部落“哈日怒德”氏。把蒙古姓依音称“韩”；将桑杰扎布简称“桑杰”，故称为韩桑杰。韩桑杰于清朝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出生在昭乌达盟敖汉旗卓哈图艾里（现翁牛特旗阿希根苏木乌兰敖都嘎查），后来曾住过下乃林高勒艾里。

韩桑杰弟兄共五个，有个妹妹。老大韩桑杰、老二拉西、老三纳卡然萨（也叫韩老三）、老四宁布、老五民柱儿，韩桑杰之妻名叫金仪，系纳卡然萨之妻亲姐。现敖汉旗康家营子乡周家地村人，韩桑杰、金仪夫妇生育四子一女。

长子——班萨拉嘎查，一九二四年出生，属鼠的。

次子——拉玛希，一九二八年出生，属大龙的。

三子——道布吉尔，一九三三年出生，属鸡的。

四子——浩特劳。

女儿——达古拉。

韩桑杰自八岁就开始在家里放羊羔牛犊，稍长大后放牛马，务农。也当过喇嘛到二十五岁。是年当保家兵。三十岁时成为热河省游击队队员。后来在东北骑兵独立旅旅长崔兴武手下当排长，后升任为连长。

“九·一八”事变之后离开了东北骑兵独立旅部，单独招收伍佰余名兵马，进驻林西。初期他不愿意投降日本，后来无奈之下投降到伪满部队，并担任排长。四十二岁时退役。因为他在伪满部队当过排长，也称他“韩排长”。韩桑杰在服役期间，白天在营部待命守候，夜间就偷逃断道抢劫。日本军官发现后怕他闹出大事，就以超过服役年龄为由劝其退役。但退役时给他长短两支枪和一把马刀，并以优惠的待遇特殊照顾，按月发薪水。

韩桑杰退役之后住在大板东庙（荟福寺）东街，当时他经常挎上手枪、马刀，骑着马横行大板街。大清朝有明确规定，任何人路经王府前街时无论有什么情况都务必下车牵畜、牵马步行路过，否则受罚，但唯独韩桑杰一人敢能违规，挎枪骑马横穿王府大街，从无人敢阻挡他。

韩桑杰住大板街期间，在巴林右旗查干诺尔努图克旧庙艾里（现查干诺尔苏木巴日图嘎查诺尔独贵龙）依一座古墓修建一处宅院。他的这处宅院的地形相当特殊；西边是墓修建一处宅院。他的这处宅院的地形相当特殊；西边是白茫茫的大沙漠，南边的勃思会湖好象一片明镜，再以南是波浪滚滚的西拉沐沦河，而后边是茂密丛生的草坪滩。东边是慢慢潺潺的娄子河奔向西拉沐沦河。他在这座古墓的山包上朝四方安置以花岗石雕塑的两对狮子和一对绵羊

(现在这两对狮子和一对绵羊雕塑品已由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据传说,这一古墓是辽代的一个皇太子在这里狩猎时摔下马因故而安葬此地,并在此古墓里埋藏着七大缸黄金等说。有一个名叫伊马图喇嘛的人,雇用阿贵庙的两个喇嘛挖掘此墓,从表层挖几丈深时有几块大石头,无法再往下挖了,瞬间从石头缝中蹿出一条大蟒蛇,刹那间伊马图喇嘛一惊吓,把念珠丢进大坑里,此时那大蟒蛇叼着念珠又钻入石头缝下去了。从此伊马图喇嘛觉得很吉利,停止挖掘且填平土方,回家之后不久去逝。

韩桑杰决定就在这里定居,便动手修建七间瓦房,八十余丈院围墙。修建这处宅院时韩桑杰几乎没投入工酬,全部以摊派差役的方法,叫附近老百姓来修建的;修建竣工后便传出一些奇谈怪论。为此韩桑杰马上就在此宅院北山(即古墓山包)顶上修建一座龙王庙,祀奠“龙王”。从此不知从何而来的长短不一,各种各样的蛇群遍地都是。于是韩桑杰认为与祀“龙王”有缘,便从外地引进两只仙鹤(丹顶鹤)喂养,从而蛇的灾难逐渐消失。

韩桑杰退役后为何不回其原籍敖汉旗卓哈图,而定居在巴林右旗查干诺尔努图克的问题,当时说法不一。有的说,他认为查干诺尔这个地方水草丰美,宜牧佳地。也有翁牛特旗阿希根苏木的丹巴喇嘛迁居查干诺尔旧庙艾里已久;韩桑杰是奔他而来之说。韩桑杰和丹巴喇嘛因住邻居,韩没少折腾丹巴喇嘛,不久丹巴无奈迁回原籍。

伪满时期,韩桑杰是天不怕、地不怕,趾高气扬的混汉子。有一次他的次子拉玛希上山找马群,深夜回来时路经

大坝艾里,当地警察因不知何人,便开枪打伤了他的马,韩桑杰知晓此事,立即赶到现场,将开枪的警察治到大板,逼迫警察署开除其职务。从此警察署发现他的恶霸行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作为。

在查干诺尔努图克,韩桑杰的固定资产除房地产以外,还有二百多匹马、四十多头牛、四百多只羊,他经常挎着长短两支枪,轮换骑着快、走两匹马,外出时带着两个贴身保镖,蛮横无理,举目无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苏联红军从赤峰、乌丹撤退之后,韩桑杰带领其一百多名土匪驻扎在翁牛特旗巴彦汉王府,准备趁机攻打乌丹县,可是驻守乌丹县的我军分队及警察戒备的相当严密,所以韩桑杰打了几枪城墙后撤出此地。

三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组建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时,任命仲乃(巴林右旗扎葛尔王爷女婿)为三十四团团团长,鲍金昌(添红也叫添夫)为副团长,由四个连组成,团部驻在仲乃大院。

一连连长:拉巴哈扎木苏

副连长:达日扎布

二连连长:乌日塔

副连长:双喜

三连连长:韩桑杰

副连长:呼图仍嘎

四连连长:希日呼

副连长：敖奴勒图

当时师部里已有打算提任韩桑杰为三十四团副团长。可是他在未被提任之前已背叛革命，后来很多官兵们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假如韩桑杰真当上副团长之后背叛革命，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我们都肯定会背着黑锅，失去生命。”

一九四六年十月，韩桑杰以重新组建自卫军为由，带领其三连二十多名士兵，逃离三十四团，彻底背叛革命，韩桑杰叛变之后，三十四团任命巴布道日吉为三连连长。韩桑杰叛变后立即跑到赤峰，投靠国民党部队，被任命为有职无权的“团长”。后来他从赤峰回来，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很快就招收兵马四十多个，并进行全副武装。当时（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有十一名八路军士兵（其中一名是干部）来到查干诺尔努图克羊场村，韩桑杰闻讯后立即赶到杀害了这十名干部战士。

案件的经过是：

隆昌区（也叫乌兰套海，现巴林左旗隆昌镇）一名姓祖的干部带领十名士兵来大板联系买军马事宜后返程中住在羊场村富农王德昌家里。关于他们在王氏家住宿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姓祖的去王德昌家目的是为与他的女儿商谈办理婚礼事宜；二是，夜深无法赶路为过夜住宿；于是王德昌得知他们买军马一事，便说“我的马群里有一匹好马，如果价格妥当，可以卖给你们”，祖说：你去抓回马来，我得看看，看中了可以买”，王德昌便抓马而去，事实上王德昌根本没有可卖的马，主要目的就是采取缓兵之计，让这帮官

兵留住此处。王德昌以去抓马为由，直奔额尔根乌苏艾里富牧丹钦扎布家，安排丹钦扎布速去翁牛特旗胡日哈庙，告知韩桑杰，八路军官兵十一人来羊场买军马，并住在这里的情报。

王德昌回来后谎称：“我的马让他人借骑去林东了，明天就能回来”；就这样又让他们等了一天。韩桑杰得知情报后，次日一大早，和他的手下丁和尔扎布（在韩的手下当过排长、后被镇压）一同带领一帮土匪火速赶到羊场村，围攻王德昌家院，经过一昼夜的交火，双方谁都不胜不败。在这一局势下，韩桑杰派人进院谈判，说：“交枪不杀，可以放人”。其实他们都不肯交枪，但考虑到现有子弹所剩无几，急来抱佛脚不可取，不如见机而行。他们便把枪支弹药全部交给土匪。此刻，狼心狗肺的韩桑杰当即变脸，给手下土匪下令，将这十一名官兵全部绑架，押到小大川山沟边进行屠杀，其中一人未被击中就带着绑绳，翻滚到沟底。当时韩桑杰命令土匪们下沟查找，由于山沟里的草丛有哈拉海、大蒿、野生大麻等长的又高又厚，不知掉在哪儿，无处可找，就用刺刀挨个捅一遍，都没有发现，就这样一名战士有幸逃难。

羊场村血案后，处决涉案罪犯共五人，其中有王德昌、郭连生、丹钦扎布、羊场村一人（不知姓名）罕大坝一人（不知姓名）。从此韩桑杰彻底背叛革命，成为无恶不作的人民死敌。在这次血案中韩匪帮死亡一人，叫玛嘎扎。他不是韩的手下土匪，而是巴林右旗翁根努图克富牧甘珠尔扎布的差人（玛是毛根达德日达嘎之子，伪满时期曾当过翁根努

图克达。)。甘珠尔扎布安排玛嘎扎到韩桑杰那里拜见,代他问候,其实是侦探了解韩的动态而已。玛嘎扎奉命前往韩桑杰驻地时,韩匪一帮正准备动身,要攻打在羊场村的八路军官兵。好事者玛嘎扎到那后,低三下四地拜见韩桑杰,问寒问暖之后随同土匪直奔羊场村。土匪赶到羊场之后向被困在屋里的八路军士兵开枪射击,八路军战士顺窗口、屋门向外反攻扫射。枪声隆隆,此时把战火当成儿戏的玛嘎扎爬上人家草垛上,向屋内射击时,从屋里飞来一枚子弹正中他的头部当即丧命。

四

一九四七年一月,韩桑杰跑到开鲁投靠李守信,并在他的手下担任警卫队队长,在此期间韩桑杰看出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再溃败的态势之后便趁机带领匪兵,流窜通辽,彰武(彰古太,卓索图盟苏鲁格旗,现辽宁省彰武县)、阜新、朝阳、叶柏寿、锦州、沈阳等地掠夺抢劫,当年农历三月翁牛特、敖汉联合旗(一九四七年五月将老哈河以北的敖汉旗高日罕,玉田皋,老府又称乌敦套海,阿希根,高日苏等地归属翁牛特左翼旗后称为翁牛特敖汉联合旗;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按照东北行署之令撤销翁牛特敖汉联合旗;与此同时把翁牛特左翼旗的“左翼”予以取消,始用“翁牛特旗”之称)政府商务分队的斯义、高福才等三人去巴彦他拉时被韩桑杰、华来、班萨拉嘎查(班是韩的长子)在途中杀害。是年腊月韩桑杰带领一伙土匪到扎鲁特;和二虎(宝音陶格陶,原三十四团四连连长)汇合(共三百余名匪兵)后南

下阜新东南一带进行抢劫。在返程中碰上部分八路军士兵,于是韩桑杰指令班萨拉嘎查,甘珠尔扎布二匪共杀害五名八路军战士,并抢夺七支枪两匹马。韩桑杰、二虎一帮匪兵北上到翁牛特旗胡日哈庙住宿的当天晚间又杀害在这里执行任务的三名八路军士兵,并逮捕一名士兵,第二天押到西拉沐沦河岸枪毙。

翁牛特敖汉联合旗分队得到韩桑杰、二虎土匪在胡日哈庙住宿情报后,飞速赶来围攻。这是农历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深夜之战。围攻之前由分队队长兼政委的邓颖指挥作战部署。

一连从南进攻逼迫北上;

二连要在西拉沐沦河南岸开始突击。

一前一后夹在中间围攻消灭。这时阵营按部就绪,双方就开始交火;此刻一连已经围住大庙大院,往里猛烈扫射。土匪看阵势无法应对便攻破围剿,往西北方向窜逃;一连紧追不舍,不料,在别处住的又一帮土匪闻讯赶来。攻打一连;这时一前一后两帮匪兵前后呼应,枪林弹雨,情况十分危险。在这一紧急关头二连飞速上来救助一连,脱离危险。一、二连汇合后继续追击,半夜时分韩桑杰扔掉伤亡匪兵尸体,无影无踪逃离了战场。在这次急战中,翁牛特敖汉联合旗委组织部部长陈明,旗分队二连副连长浩斯巴音等八名官兵英勇牺牲。

七月,韩桑杰和二虎一帮土匪在逃往乌珠穆沁旗途中攻打巴林右旗党政机关所在地大板区,当时在大板地区的机关干部及驻军部队较少,所以能够及时采取积极措施前

往昭乌达省所在地林东避难，土匪攻进大板后焚烧党政机关文件资料及泰华商店之后当天下午就北上。

党政机关干部前往林东时，旗政治部伙夫王海全，服务员潘昌福，部队通讯连伙夫沈军，巴彦汉努图克小队队员张连元等四人因未能及时动身而落伍，到老道板艾里，借骑赛音吉雅图，阿拉坦宝力高，东日布的三匹马，追赶先前人马。可是老道板艾里的赛音吉雅图，东日布，阿拉坦宝力高，伊德尔朝格图，伊德尔莫日根，伊德新旺吉勒等人听到土匪攻进大板的消息后误认为已经“事变”；便以护送王海全等人为由，跟随到巴林左旗六区德日苏艾里（现幸福之路苏木查干勿苏艾里）以此，嘎格查希里山坡上打死，案发后赛音吉雅图，伊德尔朝格图被镇压。其他案犯被劳教。

韩桑杰、二虎一伙土匪北上到巴林右旗查干沐沦努图克围攻珠腊沁艾里，杀害艾里达敖力玛斯楞，民兵负责人丹参敖日布，五名八路军战士和一名老百姓共八人。

这一流血事件的经过是：

一九四七年腊月十四日，按照政委李子福的指示，由中共巴林右旗委员会派两名战士，给查干沐沦努图克送一封函；函中写道：“韩桑杰一伙土匪有可能突然袭击查干沐沦努图克，一定要加倍警惕。”十六日，查干沐沦努图克土改干部召开有关人员会议，按照上级指示安排部署当前具体工作；主要有：（一）防范土匪敌人突然袭击；（二）防范地主、牧主相互勾结搞破坏；（三）严加保护基层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的生命安全等。十七日，从林西过来一位干部领着五位战士说：“要拿走官地一个地主在朝鲁家隐藏的一头牛”；碰

巧，艾里几位负责人和前来的干部战士坐在一起刚要研究解决这一问题时，韩桑杰一伙土匪已经把珠腊沁艾里从东、北、南三方围住，开始攻击，在这一紧急时刻，与会的干部群众和八路军官兵飞速横渡查干沐沦河，奔向林西。但因冷冬数九、天寒地冻、河冰光滑如镜；嘎查干部敖力玛斯楞和丹参敖日布骑的马摔倒在河冰上，不幸被土匪抓俘。从林西过来的五名战士，因人伍不久，没有经验，毫无抗击当即被俘。十八日在树北艾里北沙漠凹处找到五名士兵尸体，十九日在珠腊沁嘎查以北葱根沟莫日格其格山西南沟里找到了敖力玛斯楞和丹参敖日布的两具尸体。从林西来的那位干部在艾里草垛里藏身脱险。被韩桑杰这次围攻袭击中丧命牺牲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一共八人。直接经济损失也相当严重。

韩桑杰及其土匪原打算逃往西乌珠穆沁旗，但在巴林与西乌边界大坝山脉积雪相当严重，无奈返回。

五

一九四八年二月韩桑杰委派其亲信额尔很巴亚尔去敖汉探听他家里情况。额到敖汉后通过他人探听韩桑杰家里的情景之后顺便路经翁牛特探望自己家回到匪帮驻地。额与韩桑杰见面当即就说：“我身后有两个牵骆驼的人一直跟着我，很可能是八路军的耳目”。韩桑杰听完之后立即安排华来，拉巴哈二匪迎面到翁牛特旗六家营子杀人越货。其实他们两是赶路的小商贩。

额尔很巴亚尔给韩桑杰汇报所探听到的情况时说：“额

勒苏太(汉语叫美林地)的王连才,孙德二人组织发动卓哈图蒙汉群众,把韩桑杰家里的所有家产包括牲畜、粮食、房产物资、金银全部分给贫穷民众,并且把往来债务账本手续全部焚烧,斗争治死其妻子和女儿”等情况。韩桑杰听后气的火冒三丈,便掏出手枪,在空中一挥大喊大叫道:“如果他们真有尿,可以过来和老子较量吗!为什么要杀害我的老婆孩子,我不报这个血仇,真是活着万般无用”。当即指令拉萨嘎,金亮二匪打扮为找牲畜的牧人去卓哈图,杀害了嘎查达朝格都楞。二月韩又指派华来去翁牛特旗六家营子枪杀嘎查达尼日巴。

三月份,土改运动工作队将一名活佛(不知哪个大庙的,叫什么的喇嘛)抓来监禁,韩桑杰又派希日森扎布等十多名土匪前去翁牛特旗×××嘎查枪杀土改工作队员,嘎查达和贫协会的三名成员。

四月韩桑杰到翁牛特旗乃林茫汉后,额尔很巴亚尔、希日森扎布二匪告知韩桑杰“翁牛特敖汉联合旗政府驻地玉田皋的两个骑兵连已外出执行任务;如今当地无一警卫部队等情报”。韩桑杰得知后立即前往玉田皋准备进攻。途中路经大营子时抓俘了在此处执行任务的五名八路军士兵。夺获五匹马、三支枪。这五名士兵中的两名是韩桑杰的熟人。所以威胁逼迫留住队伍当土匪,一名士兵伤势严重中途死亡。准备打死其余两名士兵时,由内部人悄悄放行。

韩桑杰一伙土匪围攻大营子过程中,旗工作委员会书记邓颖英勇攻克土匪围剿,提前赶到玉田皋报告敌情,并安

排旗分队三连速去玉田皋迎战。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晚,韩桑杰一伙土匪攻击翁牛特敖汉联合旗政府所在地玉田皋制酒烧锅大院,当时政府副旗长王云等四人正在政府大院,他们发现情况甚危,火速跑上炮台猛烈反击,土匪果然未能攻破,便拿一大堆干柴烧了大门。邓颖发现这一险情后指挥三连(步兵)飞速赶来,距离敌人一华里之处就开始一边吹军号、一边开枪,大造阵势往前冲;这时韩桑杰以为支援部队已到,往西紧逃。在这次交火中两名八路军战士牺牲,一个由韩桑杰使手枪打死,另一个是由匪兵古勒格打死的。攻打玉田皋的主要指挥者是助手韩桑杰的得力助手曹敦扎木苏和希日森扎木苏二匪。

韩桑杰、斑萨拉嘎查等一伙土匪从玉田皋跑到额勒苏太,要杀害王连才,直奔其家,这时王连才已得到由邓颖传送的消息后及时隐避。韩桑杰一伙土匪赶到王连才家时他已无影无踪,为了解恨将其妻子用刺刀捅了十几下,逼供王连才的去向,这期间班萨拉嘎查顺手拿起刺刀刺穿了王连才女的脖子,母女俩被折磨的死去活来。韩桑杰从额勒苏太抓了两名土改积极分子后安排拉萨嘎,华来二匪押到沙漠中执行枪决,可是把他们俩押到地方后华来开枪打死了孙德,拉萨嘎假装开枪打了一棵树后放跑了一个人。华,拉二匪回来后韩桑杰质问道:“你们俩打死一个,放跑一个,华来打的是人,拉萨嘎打的是棵树,对不对?!”便哈哈大笑。真是笑里藏刀,这一下让华、拉二匪吓的魂飞魄散。韩桑杰班萨拉嘎查等一伙土匪退出额勒苏太后,东奔

西窜,占领有利地势;到处屠杀革命群众,平民百姓。这帮土匪到阿希根后,杀人如麻的华来、都仍毕力格二匪又杀害了三名无辜百姓。

四月中旬(大概是十四日),韩桑杰询问希日森扎布得知额勒苏太嘎查达王连才的侄子家具体地点及情况后,指令其长子班萨拉嘎查同华来一起去翁牛特旗,打死王的侄子觉得解了恨。本月韩桑杰去翁牛特旗乃林芒汉时路经沙日他拉,正碰上赶着勒勒车的四个人(卓哈图农会会员等人),就当场打死,焚烧车辆,并且宰了牛得意扬扬烧吃牛肉。

四月二十九日,卓哈图纵队一连连长陶格陶(现巴林右旗幸福之路苏木人)率部追击土匪,在老哈河岸消灭了韩桑杰手下以希日森扎布为首的二十三名匪兵。五月韩桑杰在翁牛特敖汉旗联合旗无辜绑架一个马倌,押到大沙漠中打死。本月他又在海利金山大沙漠中打死四个小商人。分掉其商品货物。

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在阿鲁科尔沁旗南部无辜打死在野外赶着牛车赶路的两名老百姓。本月他又在翁牛特旗春都布河岸碰见骑马的过路人,就为了要他的马,就地开枪打死。此后不久,他跑到阿鲁科尔沁旗格萨尔召打死两名执行任务的八路军战士。紧接着又指派杀人不眨眼的华来,那木吉拉二匪打死侦探他们动态的田仓(查干诺尔努图克旧庙人)。

韩桑杰所到之处都大喊大叫道:“我只要看到,见到我的仇人非杀不可”。这时他彻底表白他的黑心肠。的确,为

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站起来的广大革命干部,人民群众是他的真正的“仇人”。

六

一九四八年秋,韩桑杰派其手下参谋查干伊很等三人,兵分三路,侦探动态,索取情报。其中给查干伊很一个特殊任务,即“专程去翁牛特旗先杀害古如,尔后侦探真情速回……”等等。于是查干伊很忧虑重重:慢行思索,直接到古如家。巧合,这位“贵宾”光临之机古如正好在家呆着没啥事儿。

古如原来是韩桑杰手下的匪兵之一,后来他为改邪归正,离开了匪邦回到老家安稳渡日;在这期间骑兵第四师曾几次让他带路,追打进攻韩桑杰一伙土匪,打的四散五裂,一度刹了他的嚣张气势。从此他对古如恨的咬牙切齿,发誓与古如不共戴天,这次韩桑杰安排查干伊很有两个目的,一是让他外出侦探情报;二是以搜索情报为由专程去古如家谋害他。韩桑杰以下令的口气给查干伊很说道“你这次出去搜索情报之机一定要酌情处理古如这个人”。

查干伊很和古如是拜巴子哥们,所以按着韩桑杰的意图谋害古如从良心上过不去,而且他已得知古如已经顺从其在八路军当兵儿子的劝说有意改邪归正。再说古如给查干伊很多次作工作,劝其早日改头换面随大流,因而查已有意顺从古如的劝说。并且查干伊很已拟定活捉韩桑杰父子一窝匪,立功赎罪的行动方案。从另一渠道搜索情报的华来得知查干伊很到古如家,与其直接见面并没有采取行动,

反而已有叛变之意等情况后；当晚回来立即报告韩桑杰；这时查干伊很也回来向韩桑杰汇报侦探情况，韩桑杰赶紧指派长子班萨拉嘎查“出去”。这是韩桑杰作案惯用手段。安排人“出去”。一可以防止意外；二可以里边作案外边保安。这时查干伊很已发现韩桑杰要动手；一边大声叫班萨拉嘎查回来，一边掏出手枪准备较量，这时站在查干伊很身边的韩桑杰三子道布吉尔使马棒打断了他的手腕，韩桑杰用手枪朝着他的胸膛连发数枪，流血如注。于是杀人不眨眼的韩桑杰说：“人该死，枪不可扔掉。”“急忙收下其手枪和弹带逃离”。

正在这期间，在韩桑杰手下当连长的丁和尔扎布率领其手下七十二名土匪已向八路军投降。当时巴林右旗人民政府经研究决定，“按照土改运动的有关规定，给投降的匪兵分享给部分牲畜和物品”。韩桑杰听到这一消息后未能来得及谋害丁和尔扎布，后悔不及。后来韩桑杰听到丁和尔扎布被镇压的消息，高兴得拍着大腿大声骂道：“没尿的小人物，如此尝到了投降的甜头，该死的”；并向手下的土匪们训道：“以后谁要交枪投降，也会走向丁和尔扎布的绝路的”。虽然在韩桑杰的逼迫下背叛革命的丁和尔扎布被镇压，其实其余七十多名匪兵早就考虑到了离开匪帮改邪归正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晚，韩桑杰率领其一伙匪兵到翁牛特敖汉联合旗香水村，解出被监禁的地主张树庭的同时打死该村农会主任张洪春父子三人，将尸体扔进老哈河冰层底下。

还有值得一提的的是韩桑杰的副官拉萨嘎(巴林右旗益和诺苏木布敦花嘎查人)潜逃一事。查干伊很被害后，拉萨嘎便怀疑韩桑杰早晚会杀害他。他想跑，知道他骑的马跑不过道布吉尔骑的马。怎么办？想来想去想出一个高招，便在马鞍屈间故意夹一条树杈儿，将把马髻甲破皮，声称我的马髻甲破皮，不能骑为由牵着马赶路，这时一直跟着他的道布吉尔把自己的马给他骑，道布吉尔牵着他的马步行。拉萨嘎换完马之后以小便为由，让道布吉尔先走。道布吉尔牵着马走下沙包之后，他迅速跨上马飞速往回跑，跑到半道后他的马也跑不动了。于是他把马鞍解下来，挂在树上，撒马放跑后装上枪退步行走(倒行)到翁牛特旗巴彦和硕山顶上。这样退步行走一来能看到追踪的人；二来佯留踪变迷惑人的绝招。拉萨嘎在巴彦和硕山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回到翁根努图克巴彦查干，交出一支枪和一百四十发子弹投降。当时在《农牧民报》(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刊登了题为《土匪拉萨嘎得知我们从宽处理政策的宣传单后交枪投降》的报道。

一九四八年秋韩桑杰到翁牛特旗海日苏庙时，该庙尼日巴喇嘛告诉他：“在打草的人群中有一个干部假装来打草，打听你们的动态”等等。于是韩桑杰把那个人叫到嘎查罕赛汉敖包，让华来、曹敦扎木苏二匪枪杀。这个人叫巴达朗贵。

到一九四九年，韩桑杰一帮土匪已无路可逃、无一藏身之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已成定局”；无可奈何，五月份他们逃往乌珠穆沁旗；赶到巴林和乌珠穆沁边界大坝山时对

面过来两个陌生人,于是韩桑杰怕他们俩过去之后与身后追来的部队见面告知他们踪影而打死将尸体踢进深山沟里。

七

韩桑杰是一个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不管任何人,他觉得有点不顺眼就亲自打死或指使他人谋害。据不完全统计,韩桑杰一帮土匪于一九四七年腊月与扎鲁特二虎匪帮汇合后仅仅一个月的期间就在四个自然村里掠夺抢劫八十六匹马(其中鞍马二十六匹)、四头牛、十六只羊、布料九百余尺、两张狐狸皮、丝绸上衣三十六件、棉衣四十一件、大绒布料十九尺、五床毛毡子、马鞍十四套、皮缰绳二百零六条,奶食品三百余斤,除此之外弄坏牧人猎枪三十多支。韩桑杰在这里抢劫时三十四团正驻守在巴彦包特(现阿鲁科尔沁旗巴彦包特乡),他们就借这一空闲机会,同扎鲁特二虎二百多名匪兵(当时韩桑杰的匪兵共六十多名)汇合后,顺翁牛特旗海日苏渡过西拉沐沦河,路经巴林右旗巴日图艾里直奔大板。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攻击大板。他们腊月十四日下午来到大板后就开始纵火焚烧旗政府大院,紧接着抢劫泰华商店;后来察觉到追击部队已临近,便离开大板。顺胡图路,吉布图赶到查干沐沦努图克珠腊沁艾里。追击部队赶到珠腊沁时已经发生了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流血惨案。土匪帮也已逃窜到林西东八筒。追击部队火速赶到东八筒时已经深更半夜,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无法知晓匪帮是否在这里。但是干部战士们下决心彻底消灭

韩桑杰一伙土匪,在 -40°C 的寒冷天气中毫无畏惧坚守高地,准备战斗。

他们发现三星已偏西时也有的家里亮着灯,有的院子里咔嚓咔嚓劈柴;干部战士们断定土匪就在这里。这时一部分官兵建议马上采取行动。而另一部分建议为慎重起见待天亮开始行动。最后决定先侦探实情,立即派全副武装的七名精兵强将进村侦探。可是这支侦探队根本不了解地形地貌,摸黑抓瞎进入胡同后碰巧与站岗的匪兵正面对撞,这一惊吓双方都开枪走火,侦探士兵们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堵住胡同口往里扫射。

可以说韩桑杰是一个相当狡猾的惯匪。他每到一处进村住宿都提前找算卦先生算卦,准备好应付措施。包括拆墙开口,或使猪鬃拧成的绳子把土墙锯出豁口,以备外逃。果然,他们顺房后已备好的豁口逃出,让老布曾(巴彦沙那人)带路,顺山沟低头冒腰牵着马往沟坎爬,实在爬不上时垫着马鞍再爬,爬到山顶后顺着东八筒,狼狈逃命,终于逃出围剿圈。追击部队士兵沙日和贲布尔其格紧追土匪大凶手韩桑杰,交叉开火,终于打中了他的马。这时韩桑杰吓的魂不附体,左右挎着两支手枪,深一脚,浅一脚拼命跑,这一紧急关头有两个匪兵飞速赶来,腾出脚镣给韩,挎在身后逃命而去。追击部队追得他们根本没有喘息机会,追击到葱根沟、乌兰,最后追到林西统布为止。这次他们打算逃避到乌珠穆沁旗,但因巴林右旗和乌珠穆沁旗边界的大坝山积雪相当严重,无法行程又返回巴彦沙那。

第四师这次追击土匪战斗一共持续四十五个昼夜。但

战果很不理想。因为他们有时提前占领有利地形,有时逃到地形十分复杂的山岗、沙漠、山沟、林区等。有时追击部队掌握好他们的隐蔽之处或可靠消息,从速布兵围剿时他们烧的火还未灭,马粪蛋还没冻,可是他们逃得无影无踪。他们一贯不管白天黑夜绝不在一个固定地点住宿休息,所以从未能长驱直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终未歼灭。

韩桑杰的叛变,对巴林右旗土改运动以及人民群众早日得以解放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几个土匪恶霸阻挡不了历史发展进程,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股反动势力终究会以失败而告终。

八

为了巩固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成果,彻底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于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依法枪决了反革命武装土匪头目韩桑杰。是年他五十六岁。他虽然出生在敖汉旗卓哈图艾里,但伪满时期迁移到巴林右旗查干诺尔努图克旧庙艾里定居。

在敖汉,卓哈图纵队与韩桑杰匪帮交火中韩桑杰的三弟被打死。人们叫他韩老三,父母给他起名为纳卡然萨,关于这次战役;在《卓索图风暴》一书中写到,一九四六年夏李海涛(希日布扎木苏)率领的卓索图纵队第十二分队和新兵团分队一个连队在头分地村西头的一个大院里围住了韩老三及其随行土匪十多人。然后从炮台外边往院里扔手榴弹;此时院里大喊大叫道:“请你们住手,不要扔手榴弹,我们要投降!”有十多名匪兵双手举枪,顺大门口乖乖地出来

投降,但是韩老三没有投降,反而蹿进大石头槽子底下继续顽抗被击毙。这次战斗整整持续一天。

一九四九年在锡林郭勒喇嘛海敖包战役中匪兵逃的四分五裂,这时韩桑杰在因大炮弹引起的烟火草丛中;爬在马上,领着三子道布吉尔,跨境逃到蒙古国。他的次子拉玛希未能穿过大火之后,单枪匹马夜以继日,不吃不喝往回赶。赶到巴林右旗哈日毛道巴彦和硕艾里巴图老头家;他进屋前牵上马,把枪藏在外边,便进屋谎称过路人,弄点饭吃充饥。没过多久他就动手翻箱捣柜,顺手拿了其儿媳妇和女儿的衣物和首饰等。此刻巴图老人已怀疑他是逃亡土匪,便出去了望外边情况,得知他是个单枪匹马,孤独一人;就趁其不备,拿起犁铧狠劲打了一下他的头部打昏了;此时巴图老人的儿子吉林巴亚尔也正好回来,父子二人急急忙忙将其绑好立马交给政府。获得奖赏是一头带犊的乳牛。

一九五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将韩桑杰、道布吉尔父子二匪抓捕归案。

据不完全统计,韩桑杰自背叛革命后与革命军打了大小战役二十七次之多,他本人或指使手下土匪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无辜平民百姓达六十一人。他所抢劫掠夺的物资牲畜不知其数,无法统计。

一九四七年腊月三十晚,韩桑杰、乌日塔、甘珠尔扎布等土匪帮汇合在巴林右旗洪格尔庙住宿;第二天,即大年初一,天亮时分,由阿民布和率领的骑兵第四师警卫加强连进行围攻。这时他们火速突破围攻圈逃出。他们在此处住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抓获翁根努图克能骑马的所有男子,给

其充当匪兵。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时打跑敌军，挽救了天大灾难。假如他们预谋得逞，后果不堪设想。

深受韩桑杰一伙土匪抢劫掠夺侵害的八路军战士、革命干部、平民百姓怀着愤恨怒火之心编词唱道：

滔滔大江水哟
澎湃汹涌奔向前哟
大坝山的土匪哟
抢劫侵害何时哟

沧海桑田有一日
人民安宁必会有
无恶不作的韩土匪
无归而去我家乡

威武雄壮的高山哟
为了我们得解放
彻底消灭韩匪帮
捍卫家乡保和平。

从这一普通的歌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人民群众对韩桑杰一伙土匪的极端愤恨。

韩桑杰——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以恢复自卫军为由，逃离内蒙古自卫军第三十四团的统一领导，背叛革命；于一九四九年从锡林郭勒喇嘛海敖包战场上和其儿子道布吉尔一同跨境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九五二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决定》精神，中央人民政府通

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将韩匪押回国内，移送司法机关。于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依法枪决。

金仪——韩桑杰之妻，在土改运动中被斗死亡。

韩老三(纳卡然萨)——韩桑杰三弟。一九四六年夏由李海涛(希日布扎木苏)率领的卓索图纵队十二分队和新兵团某分队的的一个连在翁牛特旗头分地被打死。

班萨拉嘎查——韩桑杰之长子，一九四八年在由杜和新副队长率领的翁牛特敖汉联合旗分队围剿中投降；后被判死刑。

拉玛希——韩桑杰次子，于一九四九年在锡林郭勒喇嘛海敖包战场上离开同伙，路经巴林右旗哈日毛道艾里时被抓俘；后来在乌兰浩特乌兰朝鲁图国营牧场服刑劳动改造。后被释放，定居在巴林右旗查干诺尔苏木巴日图嘎查。于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四日采访时已有七十三岁。

道布吉尔——韩桑杰三子，与韩桑杰一同从蒙古国押回国内后被劳动改造，而后被释放。据拉玛希说他已从吉林省泰来县四方垛子五队退休。

达古拉——韩桑杰之女儿，嫁到翁牛特旗八家村，已去世。

浩特劳——韩桑杰小儿子，据拉玛希说他七岁时夭折，但在韩桑杰的档案里写到韩桑杰叛乱时因他年幼，无法带走，也舍不得留下而摔死。

参考资料：

一、纳·宝音贺希格采访录和一九八一年老干部座谈会回忆录。

二、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七年和二〇〇〇年先后三次采访拉玛希的记录，并进一步核对有关事宜。于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四日采访时拉玛希定居在查干诺尔苏木所在地。

三、《卓索图左的风暴》(汉)、一九九三年十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四、《和子章与蒙骑四师》(汉)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由政协赤峰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内部资料。

五、《农牧民报》(汉)赤峰市档案馆存。

六、《翁牛特旗志》(汉)一九九六年六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日他其人其事

撰文 纳·宝音贺希格

译文 特古思

—

乌日他，蒙古族，汉名叫包秀峰，包景瑞，包金山。一九一二年农历九月十八日生于巴林右旗牌毛都村大地主包和台家中，排列四。他长兄包振荣，他弟弟叫包金生(蒙古名叫嘎拉斯楞)，乌日他的祖父叫土默特喇嘛(原名不详)。从辽宁省朝阳县迁来巴林右翼旗牌毛都村定居。

当乌日他出生时，其父包和台已经放牧种地均有雇工并有全套农具，还向外放“苏鲁克”的富户。乌日他从小就挥霍浪费，放荡不羁地生长起来。自乌日他十二岁那年，其父包和台从外地请来先生在家里办私塾叫他学习蒙汉两种文字，使他读完《五经》、《四书》基本蒙汉兼通后从十八岁开始根据父亲和叔父的指导从事收地租和清点外放的“苏鲁克”，初次尝到了压迫和剥削贫困老百姓的“甜头”，继而就开始与官吏们勾结。就在牌毛都地方乌日他就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

1931年胡兴、扎木彦二人因为散布了对乌日他横征暴

敛不满言论而此二人被抓了壮丁。后来胡兴终生未归死于兵营、扎木彦全身致残而归。1932年乌父包和台去世，乌日他在叔父包恒台的栽培下管家理财。

1934年，乌日他担任牌毛都村村长。乌日他当了村长后更加变本加厉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给日本人抓壮丁，并利用此机会，对不顺眼的人给予打击报复，在乌日他家有个老牛倌儿，他有五个儿子其中四个儿子均双目失明唯独二儿子具有劳动能力，所以他成了全家人维持生活的命根子。但乌日他因为收贿，赦免了摊在富裕户子弟头上的壮丁任务，而派他老牛倌的二儿子顶替他人去当兵送死后，这老牛倌一家人无依无靠生活没有着落而全家饿死。被抓去的二儿子也未归失踪，这一家就如此断了香火。

乌日他当了村长之后，常年在他家做零活的佣人就达十五名之多，并且，乌日他还规定，凡居住在他的管辖之内的具有劳动能力的户，都必须为他家无偿从事修房、打草、堆积牛粪、放牧、经营牲畜、牵骆驼、饲养马匹等长期性劳动。如果有人胆敢违抗乌日他，就不让他在牌毛都生存下去。有一次，叫昭那斯图的因为他家有事未能按时去抹房而从牌毛都被赶走。到了秋季，哪里的草长的茂盛，哪里就便成为乌日他的打草场。谁的耕地好他看中了就任意强占它。有个叫拉希的农民开了几亩荒地种了庄稼，当年风调雨顺获丰收。乌日他看见后就红了眼，到第二年他就采取了恶劣手段霸占了那块地。每逢春节牧民们都按自己的家景尽力给乌日他奉送礼物，谁人如不送礼品，下年就遭殃。所以群众宁可自己节衣缩食奉送给乌日他春节礼品。就连

那些上无片瓦，院无牲畜的贫困户也得送去一背篓牛粪或者柴禾。乌日他“苏鲁克”的畜群只许增多，不许减少，如果丢失或遭到狼害就必须以二岁牛赔三岁牛，以牛犊赔二岁牛。他还扬言这就是他对穷人的莫大的恩惠。

乌日他由于四年多的村长期间，苛苦百姓、媚上压下、行贿受贿，而且在抓壮丁等方面尽力，在二十九岁那年被提升为伪满德勒区区长。此时他知道对自己的民愤很大，以防被暗算而身边设置了两名持枪警卫形影不离进行保护。随着他的权势的扩大而财产也日趋增多起来，他已拥有牛三百多头，马二百多匹，骆驼三十多峰。小畜五百多只，驴十多头，不动家产有设备齐全的土房十五间，蒙古包一座，耕地三十六项和农具等生产工具应有尽有。

乌日他野心日趋膨胀，他狠狠地抓壮丁和劳工，他为日本人积极效劳，搜刮粮食和牛马羊以及皮毛等畜产品，另一方面，他还同隆昌区区长邢万春等人拉帮结伙，互相利用，以“家中缺粮”为名从乌兰套海(隆昌)国库粮中私自借去卅七担五斗原粮，在下年春耕之际，他以偿还上述公粮为借口，向当地农民以每头牛四石粮的租价租出十二头耕牛，而到秋后他把出租牛的粮食又全部装进自己的粮仓内，未还从国库借的公粮。

二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当时乌日他只有一支三八式步枪，他为了保护财产把这四支枪视为珍宝，继而他还拟图想方设法去搜罗枪支，组建地方武装。为防

狼灾,当年巴林右旗发给牧区村一支三八式步枪,乌日他乘机把枪归于私有,这样乌日他拥有了五支枪,在当年七月份乌日他从白音布统警察所长宝音和希格手里以牧区治安的名义拿走三八式枪九支,从此拥有了十五支枪。正拟组建地方武装之际,有一天伪满第九军管区四十八团机枪连连长嘎达苏(路军上卫)带领十一名士兵路过牌毛都,一路劳累到乌日他的弟弟嘎拉曾斯楞家休息时乌日他等三人包围了嘎达苏住处鸣枪威胁“交枪不杀!”于是十一人没有还击全部交了械,乌日他得了二号手枪一支,马三八式十一支,这样,乌日他共弄到长短枪二十六支。

当年秋季乌日他组建了30来名人马的地方武装,并将它命名为“保安队”,自己任队长,任双喜为副队长,下设两个小队,任敖占林(奈曼旗人,蒙古名叫却色仍扎布,1953年49岁的敖占林同土匪头子韩桑杰一块被镇压)为第一小队队长,任额勒布格仓为第二小队队长,这个“队”的主要成员,乌日他、双喜、敖占林、额勒布格仓、色业、陈子玉、白清林、小曹德宝、仁钦敖日布、仁普乐、马尼扎布、胡顺、希杰扎布、吉日嘎拉、德格、达木仁……等。该“保安队”名义上维护地方治安而实际上是保护乌日他和他的财产而已。从乌日他组建所谓“保安队”起对人民群众增加了极大的负担,他们常叫喊“我们是为了保护你们而抗枪卖命……”逐家逐户吃光、喝光,无所不为”。在这期间,乌日他的保卫范围放在东西两个西热爱里、高力爱里、牌毛都、东西两个苏吉爱里为重点,有时候还去乌兰套海、白音布统一带威胁农牧民吃喝而归。当年十一月间,乌日他率领手下人马以警巡为

名在邻村吃喝中在王振东的烧锅遇见了阿旗地方武装的艾日布并从他的口中得知和子章准备乌日他缴械的消息。于是他立即回牌毛都同双喜商量对策。乌日他说“如今我旗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来武装我们,和子章真不好说,他现在真要让我们缴械,那我们就吃大亏啦,与和子章对抗更不行。”为此乌日他亲赴林东找到许振东(许是乌日他的亲戚,和子章自卫军的连长),通过许振东,乌日塔与和子章见面,和子章问乌日他“开鲁和乌丹等地方有没有八路?”乌日他说:“开鲁和乌丹(宝日浩特)离我们远,不知情况。”和子章说:“今后多联系,你来的正是时候,不久我去白音布统时也到你们那儿看看”。乌日他在林东住三天后返回牌毛都。

十二月上旬,和子章率领儿子恩和森,大队长博力哈、许振东等全副武装的70余自卫军战士来到了乌日他家住两天,观察了地形后对乌日他说“你这儿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可以说是林东的南大门,你也已归属于我们自卫军管辖,今后如有什么重要情况一定要立即和我军部报告,要进一步加强你的武装力量,对此我们自治军也可以帮助你。”乌日他听后乐得合不上嘴。和子章返回时乌日他向他儿子恩和森赠送了一匹全鞍马。

三

1946年正月下旬的一天,和子章通知乌日他:“哈丰阿,萨嘎拉扎布等东蒙领导人从乌兰浩特来到林东,要检阅我们的部队,你要立即率部前来林东参加检阅”。乌日他接到通知后,率领四十余名人马前赴林东参加了检阅,检阅结

束后乌日他去见了新的昭乌达省省长萨嘎拉扎布,萨嘎拉扎布说“内蒙古已接收了共产党的领导与八路共事。今后互相帮助,不许与八路军对抗,八路军在政治上帮助内蒙古,我们用物资方面帮助八路军。内蒙古实行自治、八路军不插手,内蒙古自治有何困难八路军尽量给予帮助解决”。

1946年4月末,东蒙自治军骑兵第四师正式在村东成立。和子章任师长,下设六个团,巴林左旗为三十二团、三十三团,巴林右旗为三十四团,阿鲁科尔沁旗的为三十五团,克什克腾旗为三十六团,扎鲁特旗为三十七团。三十四团团长为仲奈,副团长为包金昌(田丰,又名田虎)。

4月中旬,仲奈、包金昌、甘珠尔扎布、韩桑杰、乌日他、胡吐荣嘎等人在洪格尔庙聚会商讨整编部队事宜,在这次会议上将乌日他的“保安队”正式编为仲奈三十四团二连,将韩桑杰的“保安队”编为三连,甘珠尔扎布已被任命团副官,把甘珠尔扎布手下由古力格指挥的三十多人马编入乌日他的二连,当时由团部派去一部分工作人员,到哈木吐巴彦家(原翁根努吐格沙布嘎嘎查,今益和诺尔苏木团结小组)对古力格等30余人进行归属二连的工作。这次整编后,乌日他把古力格手下的那部分人马与自己的七十多人编成四个排,乌日他为二连连长,双喜为副连长,敖占林为一排排长,额力布格仓为二排排长,古力格为三排排长,白清林为四排排长,王占明为连部文书。陈子玉、吉木彦、德宝、胡喜、德格、老布曾旺其格、曹达那木斯楞(宝音德力格)等人分别担任各班班长或掌管粮草的司务长。乌日他将本连部和驻军兵营安置在自己的家院东侧,把警戒区重

点放在西从拉新西力庙,东至牌毛都,沿西拉沐沦河岸地带,将其四个排分别住守几处,但无固定驻地而经常处于流动巡逻状态。

1946年5月末6月初,三十四团指挥部来通知叫乌日他到大板,乌日他接到通知后带领吉如木德、白清林、色布吉德道尔吉到团部后才得知团部并无要事,只代表巴林右旗参加乌兰浩特会议的他木传达了在乌兰浩特,1946年1月16日在乌兰浩特召开了“建立东蒙自治政府”会议精神,会议在巴林右旗大板的东大庙举行。参加王爷庙会议的巴林右旗代表有四名,他们是,他木(牧民代表),色旺拉西(教育代表),阿旺东日布扎木苏活佛(宗教代表,阿贵庙东葛根)、额尔恒巴吐(干部代表)、三十团政治委员,会议精神大概“内蒙古自治政府即将建立,现正在筹备……”,此次参加会议的有仲奈、韩桑杰、甘珠尔扎布、拉布杰、三喇嘛、小公爷(阿他格诺彦比和那存)汉名叫包孝宗,赵发财、李儒担、宝音和希格、色布格扎布等人。乌日他返回途中路过哈鲁艾勒时拜见了住在娘家的门楚格葛根(奈曼旗门楚格庙活佛)。并向他祈求活佛的保佑。门楚格葛根向乌日他赐给了挂在脖子上的一尊铜制的护身佛和自己骑的大白马,安抚他“你只要身不离这两件宝物,它就永保安然无恙,所向无敌”。

1946年秋,党和政府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将原东蒙古自治军和驻在林东、天山附近的冀察热辽二十分区合编为蒙汉联军,并把联军司令部设在林东八路军代表俞楚杰为司令员、东蒙自治军代表和子章为副司令员,将原东蒙古

军第四师各团编两支队，第一支队驻巴林右旗大板，仲奈为支队长，掌管巴林左右两旗和克旗（三个旗）部队。第二支队驻在天山，额力登格为支队长，经管阿旗和扎鲁特旗的部队。

在当年九月中旬，三十四团指挥部通知乌日他去大板，这次去时包金昌被害，仲奈提升为名存实亡的支队长，而由却吉敖斯尔当了团长，乌日他在团部与却吉敖斯尔会面，却对乌说：不久从团部派去一个工作队对你的一百五十人进行整顿，要精简到八十二名，为此你协助工作队对士兵宣传新的工作精神。接着又说，我既没有当过兵，更没带兵的经验。以后的工作只有依靠各连连长，这次团部给你们连派去一名政治指导员，协助你连的工作……，还给了乌日他九九式步枪六支，说“你先回连队过几天我们也去你那儿”。

乌日他从团部出来到仲奈家见了面，仲奈说“我现在不管团部的事，有事与确吉敖斯尔团长联系。”接着又说：“在林东召开的师部会议上有些人说如果国民党打进来的话，三十四团团内部的有些人有叛变的可能。”乌日他听完后觉得此话与他有关。1946年八月查布嘎爱里的李九骑着驴从奈曼旗出发来到乌日他家传递了奈曼旗王子曹达那木的亲笔信，其内容是“国民党已经占领了库伦旗，不久要占领整个东北地区，占领昭乌达盟不在话下等。”乌日他立即派福顺给林东的蒙汉联军副司令员和子章做了汇报。

乌日他从大板返回时新派任的政治指导员赛乌优吐也一起来到了二连。乌日他又路过门楚格葛根家住一宿，向活佛请教“您是先知未来的活佛，赐教我当前形势下如何是

好？”活佛说“前几天我召见了奈曼的一个朝拜者，我叫他送你一个信，大板（34团）、林东（蒙汉联军司令部和31、32团）对你不利，你要小心，最好与阿旗（指35团）联系，他们的军心如果不稳定，对你更有利。”

乌日他回来后立即从翁根努图克各富户征集军马，向哈木吐征七十匹，向德日达格征四十匹，向米格苏莫征二十五匹，向门楚格葛根征二十五匹，总共征上了一百九十四匹军马。同时与双喜商讨，研究关于传送和子章的信以及仲奈和门楚格葛根所说的话之后统一了观点，“听说国民党已到开鲁，谁胜谁负很难测……，先与阿旗联系为上策……”乌日他派双喜去阿旗查干诺尔的敖斯尔（伪满巴其鲁子村村长）取得了联系。敖斯尔说“我去问协理（额力登格），如果额力登格不稳定，我通知你们。”

九月下旬确吉敖斯尔带领工作队前去第二连，他首先将二连精简到二人，把其余的人全部刷掉。这样二连的人马远远超出所定人数，武器方面三分之二的人有了枪支。按整编后的实际人数留给二连每人一匹马，将其余的部分送回大板团部，这次整顿二连的工作比较顺利。而后确团长从牌毛都经白音布统去林东，临行前对乌日他说，“你要密切注意开鲁国民党的行动，如有情况及时报告。”

当确吉敖斯尔刚刚离开乌日他之后邢万春派来的人向乌日他报告，有一部分地主，牧主要来乌日他处避难。没过几天，原籍朝阳（今辽宁省朝阳）的商人李景阳和林东的商人珍价典，大板的牧主杨正雅等来到乌日他家。

10月份有一天，乌日他收到阿鲁科尔沁旗旺吉乐给他

的信,次日乌日他同白清林、斯叶、德宝、吉如木德五人前赴阿旗敦达查干诺尔敖斯尔家,与额力登格,他日巴二人单独会面,从那里出来之后,乌让吉如木德赶快回连部,并说:如果指导员问起我们你就告诉他,我们去查看畜群的。乌日他回来当晚,将赛乌优吐逮捕并投进土崩崩里关押起来,第二天他日巴的士兵前来传达他日巴的话说“你们如果跟我们,就立即照办,否则要缴出你们枪械和军马。”对此乌回答说“我若不愿跟你们的话,怎么会把指导员逮捕呢?”士兵说:“那么,明天你必须去卫苏巴彦家。”次日乌日他同白清林,吉如木德等前去卫苏巴彦家,当他们到达时,在那儿翁旗的拉王(拉钦旺其格王爷)同好特老(伪满警察)、吐喇嘛(土布登喇嘛伪满警长)等也正在那里,他们见到就问:“我们跟了他日巴,你怎么办?”乌回答“我也跟他。”

三十五团额力登格,他日巴率全团叛变革命,投靠了国民党不久,派敖斯尔、苏和二人向乌日他传达了这个消息,“我们说额协理已经投靠了国民,请你自便。”乌日他、双喜获此消息后同敖占林、额力布格仓、古力格、白清林、斯叶、陈子玉、德格、扎木彦、仁钦敖日布、六十二、王占明等人召开连排长会议,继而召开全连官兵大会,会上乌日他将三十五团情况向大家讲明之后,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怎么办?大家说“连长怎么办,就怎么办。”乌日他就这样叛变革命投靠了国民党李守信部,而后与叛匪好特老,吐喇嘛勾结参加了国民党的天林支队。

几天之后,他日巴派敖斯尔给乌日他送去天林支队第十五团团长的委任状,额力登叛变革命后委托国民党党代

表王安田与东北军区吴古廷(国民党少将)的批准组建了天林支队司令部。他日巴任支队队长,额力登格为付队长,天林支队下设三个团,两个直属连,骑兵十三团,骑兵十五团,骑兵十七团。乌日他为十五团团团长,双喜为副团长。

乌日他叛变后把自己原来的排升格为连,并且把四个排长都提拔成连长,把四个排改成四个连。乌日他叛军在名义上虽然称呼团,但实际上他所谓的团只有一百二十多人和八十来支枪,乌日他叛变后为侦探蒙汉联军第四师的情报,以“汇报情况”为名派通信员毛小儿送去假汇报。

十一月九日天林支队派去敖斯尔、旺吉乐给乌日他传达了“十五团、十七团当前坚守岗位待命行动”的命令,乌接到命令后,一面执行命令坚守岗位,一面积极进行反动宣传活动。乌日他在沙布嘎敖包的哈木吐巴彦家召集了五十名财主开会,向他们鼓吹,“我们已决定同阿旗的额力登格,翁旗的好特老联合起来,投靠了中央军。你们大家有什么事要和我们取得联系,不准同翁根努图克接触,如果打起仗来,就把畜群赶入翁旗大沙漠……”。正在此刻双喜派来的人向乌日他报告,“蒙汉联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等人已到,怎么办?”乌日他说:“我们已经叛变了,所以这事你们看着办!”

四

乌日他派遣的斯叶回来的时候,双喜已把蒙和舞乐极等十一人全被抓了起来。事件始末大概如下:
1946年10月,林东的第四师领导们获知三十四团驻

牌毛都二连政治上出现反常现象,于是师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亲自率领警卫确吉曾格,参谋乌恩其等和乌日他派向四师送假情报的毛小儿共十一人前往牌毛都。蒙和舞乐极从林东出发时,派通信员去大板,给三十四团团长沙斯尔送信,通知他率部火速去牌毛都乌日他二连处。

蒙和舞乐极一行于十一月十一日15日到达西牌毛都之后,派毛小儿进行侦察,当毛小儿到二连时因乌日他不在,他找到双喜,向他报告了蒙和舞乐极一行人来到西牌毛都的情景,双喜听到蒙一行人马武器装备等情况后,当即决定将他们抓起来。毛小儿说,“如抓他们,把蒙和舞乐极的手枪和确吉曾格的黑马给我,我就去领他们来……”双喜答应并派鲍金祥同毛小儿去迎接他们,与此同时准备在西牌毛都至东牌毛都的途中将他缴械,双喜亲自率领两个排的兵力埋伏在险路上,等待蒙和舞乐极一行落网。毛小儿、鲍金祥二人前来向蒙和舞乐极谎称,“乌日他不但没有叛变,而且听到你们的到来,他非常高兴,还派我们两个人来迎接你们。”双喜一伙在险路几次准备动手,但又怕做不到一网打尽而没有动手。况且,当时毛小儿和鲍金祥二人始终走在他们的两旁。所以也未敢向他们开枪射击,这样双喜一伙只好按预定暗号,利用地形进行隐蔽,火速返回连部等蒙一行到来。蒙和舞乐极一行到达二连时,双喜从容不迫地将他们迎接在马桩子跟前,但蒙和舞乐极觉察到他们鬼鬼祟祟,戒备森严的可疑动向。蒙和舞乐极问到双喜时双喜谎称“在当前局时不稳,土匪横行的情况下,不能不加强警戒。”蒙和舞乐极又问乌日他和指导员赛乌优图在何处时双

喜回答说“去打翁牛特旗过来的一股土匪还没回来。并将客人按官兵分开安排了两个屋内,然后上茶,紧接着上了荞面条。客人们尚未吃完第一碗面条时,叛匪左柱儿按他们的安排在当院大声喊,“盛饭”。这时早已做好准备土匪们个个持枪冲进两个屋子枪口对准蒙和舞乐极等,大喊“不许动。”安排蒙和舞乐极、确吉曾格、乌恩其的屋子冲进的是双喜、古力格、却斯楞、福全、白清林,冲进耳房的有额力布格仓、仁钦敖日布、新杰扎布、胡喜、老布曾旺吉勒。就这么未放一枪,将他们十一人捕了起来,把他们的两支手枪、一支俄式冲锋枪、十一支步枪全部缴获。

当乌日他派斯叶不久西热爱里的丁和尔扎布赶来将旺吉勒梅林的信交给了乌日他。乌日他看完信后“告诉旺吉勒,把马群往北放。”又嘱咐,“你告诉斯叶,仁钦敖日布,却斯楞、古力格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确吉敖斯尔接到蒙和舞乐极的信带领部队,仅仅率领九名警卫人员来到牌毛都。当晚黄昏时刻乌日他返回途中,沙尔曹德宝乘骆驼前来在途中向乌日他报告了确吉敖斯尔一行十人来到宝冷爱里,在叶希家歇脚的情报。听到这个情况后乌日他没有回家直接赶到仁钦敖日布家不久接到这个消息,当晚天黑之后,确吉敖斯尔来到旺吉勒梅林家。旺吉勒家离仁钦敖日布家只有二华里,乌日他派人侦察后叫沙尔曹德宝,仁丕勒二人换衣化妆并发给每人一支二号手枪,交代他们执行任务,“你们二人进屋看情况如果确吉敖斯尔独身在屋,就地逮捕。”二人赶到旺吉勒梅林家门口时放哨士兵说:“没有任何急事就在明天再来。”就这样被放哨所

阻拦而未得逞而归。乌日他一计未成,又想了一计,他担心白清林的一个连的兵力对付不了确吉敖斯尔一行,于是连夜通知在牌毛都的三个连,叫他们立即出发,务必在黎明前赶到东西热爱里,乌日他从仁钦敖日布家去老格鲁家途中对仁普勒,曹德宝二人说:“我们已经叛变,乌日他到苏格老家后得知蒙和舞乐极一行全被捕的确切消息。”从东牌毛都出发的三个连(其实原来的三个排)来到东西热爱里还未到天已经亮了。确吉敖斯尔一行已发觉身临险境,鸣枪出逃,其随从人中的八人在西热爱里被捕。确吉敖斯尔同警卫员突出包围圈,向大板方向逃走,在紧要时刻确吉敖斯尔换上警卫员的快马,没有被乌日他追上,而警卫员成了乌日他的俘虏。

乌日他押着确吉敖斯尔领来的九个人返回途中向旺吉勒梅林问:“确吉敖斯尔怎么发觉的”,旺吉乐回答说:“苏格德尔那木吉勒通报了消息。”于是乌日他命令古力格立即枪毙他,因当时苏格德尔那木吉勒不在场,次日把他抓来押到西热爱里以东的哈日杰三口井处古力格亲手枪杀。

1946年11月16日乌日他,双喜将二十一名俘虏(蒙和舞乐极的十一人,确吉敖斯尔的九人和赛乌优吐共二十名),用大胶车把十八人押送到翁牛特太本爱里,奈仁他拉爱里,查布干爱里等地分别关押。在此期间,乌日他牵着两匹马做礼物去双合兴找土匪头子达日扎布(汉名叫包树玄、敖汉旗人,伪满时期兴安西省警卫队驻林西第三团团团长),并从达日扎布那里听到李守信,乌古廷均在开鲁,国民党很快就会占领天山、林东的消息,乌日他从双合兴返回途中路

过德布勒庙会见额力登格向他报告了抓捕蒙和舞乐极等人的事情。并请示如何处理等问题,对此额答复“现关押在当地,至于怎么处理以后再说。”当乌日他回到家时从翁牛特来消息说蒙和舞乐极,已被杀害。这时大板东庙的敖其尔喇嘛(是乌日他的拜把兄弟又叫排长喇嘛)来乌日他家。

一天夜里蒙和舞乐极从翁牛特查布干爱里被看守的与那木吉拉、莫色扎布一起逃跑,当时看守他们的土匪宝音达来,六十二鸣枪追踪,这时叛兵仓日布找到了蒙和舞乐极压来后当时叛匪宝音达来,六十二便叫还逃不逃?便开枪打断了蒙和舞乐极的大腿并用枪托猛砸了蒙的脑骨蒙当场死亡,腊月中旬韩桑杰领一股叛匪来到西热爱里附近时乌日他去见他。于是,韩桑杰向乌日他说“你会同他日巴好特老叛变了?”乌日他说属实。韩说“师部和团部蒙和舞乐极,确吉敖斯尔等人来你处目的何在?”乌回答说“不知详情,但已把蒙和舞乐极逮捕,确吉敖斯尔没有追上。”韩桑杰说:“他们从两处来目的在于收拾你,敖其尔喇嘛这时候来看你干什么,他是确吉敖斯尔派来的奸细,来看你就是你的朋友了,我看不能留此人。”

1946年腊月廿三日在他木道尔吉家,乌日他同双喜、敖占林、古力格、陈子玉、斯叶、王占明、德格、额力布格仓等人研究决定枪决却吉曾格、乌恩其、赛乌优吐、敖其尔喇嘛、昂斯格尔、斯钦格日勒等六人,这时候额力布格仓出来请求昂斯格尔被幸免,他又说赛乌优吐岁数小,再说独生子,请求乌日他不要杀他,乌说“却吉曾格、乌恩其、赛乌优吐、敖其尔喇嘛非杀不可。”于是当日派仓日布去翁牛特把要杀的

人员押回他木道尔吉家,而后双喜、德格、敖占林、却斯楞,却德尔、恩和阿木尔、仁钦敖日布、宝音达来等把俘虏押到乌日他家的西北沙窝子里,此时此刻额力布格仓听到后为了救赛乌优吐快马加鞭赶到现场时,他们已把除要杀的四名外,古力格还杀了斯钦格日勒。其余十六人被当场释放。被杀害的五人的尸体,连捆绳都没有解并就埋在沙漠里。

五

血腥镇压后乌日他叫双喜留驻牌毛都看守家庭和财产,亲自带领一股匪徒从牌毛都去窜沙布嘎敖包、拉西西乐、巴彦查干、楼子、洪格尔庙等地抢夺牧民的牛马财物,后在甘珠尔扎布家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

1947年春节,初一清晨乌日他听到和子章率兵往这里赶来的情报,他还获悉天山、林东的八路军经牌毛都前往哈木吐那里的消息,乌日他将此情况同韩桑杰进行研究,并连夜赶到沙布嘎敖包爱里,得知八路军昨天住在这里,今早已奔向西热爱里,于是乌日他率领部下深夜渡过西拉沐沦河,跑到翁牛特旗克尔曾。在此他听到吐喇嘛在克尔曾南沙漠里隐蔽渡过春节的消息,便派人与他取得联系。正月初二早晨岗哨向乌日他报告八路军正在西拉沐沦北岸活动,乌日他立即率部迎到西拉沐沦河南岸隔水向八路军开枪射击,这样双方虽然交火互相射击了半天,但双方无一人伤亡。此后乌日他窜入克尔曾以南沙窝子里,在那里见到土匪好特老和拉钦旺其格商定联合投奔了开鲁。

乌日他决定去开鲁的途中,袭击驻守在马宗山的李春

来率领的八路军以报乌叛变后李攻打过两次的仇恨。于是乌日他同阿旗的敖斯尔和翁牛特的好特老联合起来,以三个旗的二百多名匪兵包围了马宗山的李家大院(拉斯仁扎布家)并进行了袭击,当时李春来大院里只有蒙古骑兵第六分队新建立的五连连长巴吐等七个人,共有步枪七支,以及李华亭持一支手枪外别无其它武器。李华亭指挥他们对抗,向土匪射击,一名土匪利用地形就近炮台时巴吐连长一枪击毙,土匪们在营子东边抓捕几个平民为盾牌在他后面隐蔽,接近时战士东日布一枪打死了一名土匪打退了匪群,李化亭虽然胸部受了伤,但坚持战斗,继续作战。在这个紧要关头卓纵的乌兰和白石凯率领的十三分队和包奇泰带领的卓盟纵队第一分队赶来打退了匪帮,此时乌日他手下的德宝率领十多名土匪向我军投降。

乌日他第一次袭击没有达到报复的目的。正月初五会见了好特老前往开鲁,正月七、八日到达了开鲁,到开鲁的当天乌日他、他日巴、达日扎布、乌布登、吐喇嘛、好特老、双喜等人一同进城会见了额力登格司令,并在他率领下会见李守信、乌古廷。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在开鲁住十来天,此时额力登格下达命令十三团担任阻止八路军向西拉沐沦河岸进犯的任务。第十五团和第十七团担任向西老哈河岸的警戒任务。从此,乌日他离开开鲁,经由双合兴、下伙房、查干套海,路过奈曼旗的八仙筒时遇到了八路军。于是乌日他指挥众匪和好特老的大部土匪进行一天的战斗将遇到的十三名八路军全部击毙,并烧毁他们的一辆汽车。乌的土匪中死亡两人。乌日他等土匪经过查干套海

到达敖包图时又遇到八路军打了一天仗,这次战斗中乌日他土匪中被打死一人。第二天从敖包出发奔向西北到达翁牛特旗韩布庙时凑巧碰见从乌日他家来的人,来人向乌日他告急,在二月初四蒙古骑兵第六纵队第五连选派二十名士兵组成的小分队来牌毛都乘虚而入,抓获了十多人,并赶走了八百多匹马群的情景,乌日他气急败坏,他向好特老和阿鲁科尔沁的苏清嘎求援,合伙从马宗山夺回马群,而后三人拉开土匪部队起程,渡过西拉沐沦河,当夜赶到乌日他家宿营,次日,乌日他第二次攻打马宗山。在战斗中,李春来部下死亡一名姓罗的战士,而且在兵力上寡不敌众,迫不得已撤离马宗山。乌日他夺得八十多峰骆驼,五十来匹马,枪杀了平民的若干牲畜,得意洋洋地返回自己的老窝牌毛都时叛军十三团已派人送来开鲁解放的情报。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即时渡过西拉沐沦河。乌日他匪帮这样驻进翁牛特旗的达尔罕庙。十三团的匪帮进驻德格吉德家,好特老匪帮进驻新庙以北。在这期间确吉敖斯尔派投降的叛匪德宝捎信给老格鲁,把师部里被害的四名官兵和教导员赛乌优吐的尸体送到白音布统。于是,老格鲁派德格吉尔胡去翁牛特将蒙和舞乐极的尸体找回的同时,还把被杀后埋在乌日他家后沙窝里的五名受害者的尸体取出后装进乌日他家的木柜和木箱里派两个人送到了白音布统。

1947年2月26日,开鲁解放额力登格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三个旗的土匪头子们聚会研究,把土匪阿日本嘎推举为他们总管。二月中旬匪头们再次聚会商定后去通辽投靠李守信的参谋长刘智广,当月下旬到了通辽,那时候土匪们

已经变本加厉,到处抢夺财物,欺辱妇女……已到疯狂的地步,他们到了通辽后很快见到刘智广和他日巴汇报了情况。他俩说“现住下,我们与通辽方面联系过,你们不要打骂百姓……”至到四月份通辽解放为止在这里,仅在老哈河北岸蒙古八路打过一次仗,刘智广给这些土匪每人发一身军服和药品,以安定军心。并且交给他们任务、警戒通辽的八路军。

1947年春通辽、开鲁被解放,乌日他同刘智广、他日巴、达日扎布匪部会合后躲到科左中旗彰武县和阜新北部一带。在那里乌日他击毙一名八路军。一天刘智广召集会议,下达了乘火车去赤峰攻打八路军的任务。于是这部千余名土匪由阜新乘火车到达朝阳以西公爷站下来,正准备西进叶柏寿的时候事与愿违,八路军早已在叶柏寿以东摆开阵势,并连续追击迫使土匪撤回北票。

五月上旬乌日他与额力布格仓、白清林两个连长率领七十来人,会同阿旗的参布拉扎布的二百多人从北票土匪窝里逃出来返回昭乌达。这样乌日他手下仅剩下二十几号人,结束了八个月的国民党李守信杂牌军团长职务,乌日他在北票度过十几天再次返回朝阳进驻西大营子,此时,天林支队总五十多人开始非团非连的地步,但他们一天也没停止土匪活动。

在这期间李守信把热河人民保安军改为新三路军。李守信、刘智广等人住在朝阳街,所以乌日他、他日巴、达日扎布和他们的部下进驻朝阳郊区。九月朝阳解放为止,这些土匪在这里进行抢夺人民财产,奸污妇女做绝了非人非鬼

的勾当。

六

朝阳解放后天林支队在被我蒙汉联军第四师和八路军追击分散,乌日他逃窜到锦州北山,夜间抢劫,白天拦路,维持一段绿林生活,不久好特老、他日巴、达日扎布等匪帮会合进驻锦州街里,驻锦之后他们先后组建了所谓昭乌达盟办事处和各旗办事处。奈曼旗王爷曹达那木担任“昭乌达盟驻锦办事处”主任。乌日他任“巴林右旗驻锦办事处”主任。邢万春、周凌云、嘎拉曾斯楞(乌的兄弟)也进驻锦州街里。1947年9月下旬,乌日他、邢万春、周凌云、嘎拉曾斯楞、白民元进一步勾结,伪造了选举蒋介石为国大总统的假人民选举册。在该选举册里为了讨好国民党蒋介石,任意扩大选民人数,他们将自己所能够编造的蒙古族人,随便拼凑了几万人给蒋介石效劳了犬马之力。驻锦州期间昭乌达盟办事处主任曹达那木不时召集各旗办事处主任会议鼓吹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并向东北地区各蒙旗负担“驻锦办事处”分发办事经费每月三十万纸币。还向乌日他和奈曼旗的乌布登二人授予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剿匪有功”四个大字的奖状。

当乌日他基本捏造完假人民选举册的时候接到去沈阳的命令,他将办事处移交给邢万春,带领手下二十多土匪和奈曼旗匪兵于十一月份开进沈阳,而后以保卫沈阳的名义在铁西、铁岭、辽阳一带活动。在此期间他在铁西同八路军打过一次仗,但在战斗中双方都无伤亡。

1948年4月份,乌日他与布力雅特·苏和巴特尔两股土匪在辽阳合并,但乌日他手下的二十来名土匪被编入吐喇嘛帮内。吐喇嘛帮却被一名姓许的旅长掌管。乌日他为骑兵第一旅的副官。在这里乌日他领兵攻打解放军,打死三人,洗劫了仓库。就在这个月中旬,乌日他在沈阳乘飞机回到锦州办事处,此时锦州的解放迫在眉睫,所以这帮叛匪的伪昭盟驻锦办事处和各旗办事处正拟迁北平。

六月中旬伪昭乌达盟办事处迁驻北京,进驻太平街十二号一个院里。而后昭乌达盟办事处主任曹达那木任命各旗办事处的主任,奈曼旗办事处主任乌博登,扎鲁特旗办事处主任为希吉旺苏木,巴林右旗办事处主任为乌日他,巴林左旗办事处主任达日扎布,翁牛特旗办事处主任为好特老,赤峰县办事处主任为朴俊升,敖汉旗办事处主任为于大头。

七月中旬乌日他经张秉更口头介绍加入国民党(在乌日他的个人检讨书上有这样记载,究竟是否国民党党员没有其它证据),伪昭乌达盟办事处主任曹达那木从国民党国家救济总部领来一部分美国支援的物资,乌日他分得了六袋白面,两麻袋大米和两套服装。这个时期乌日他一方面以月薪三十万元的伪币勉强度日,另一方面他为北京解放后逃往何处怎样活命而绞尽脑汁。在这期间乌日他同扎鲁特的希吉旺苏木、日其格、奈曼的乌博登、嘎萨尔、翁牛特的特的好特老等人持包贵廷的介绍信曾去乌古廷家两次,打听留在沈阳的残匪消息,走投无路的乌日他有空即窜的准备。

1948年11月乌日他同嘎萨尔、乌博登前往张北找包贵廷,企图通过包找到一个安身之地,因为北京解放就在眼

前,办事处靠不住,包看到介绍信后说,几天后研究决定,但张北就要解放也在紧张了,包贵廷来不及研讨就从张北逃到宝昌。几天后乌日他见到率领骑兵一旅逃往张北的苏和巴特尔、孙明海也来到宝昌合并了,这时乌正处在既不能迁移驻京办事处,又回不去北京的境地。可是,留在沈阳的古力格率领的二十来人与孙明海土匪一同来到张北一事却符合了乌日他的心愿。

包贵廷与苏和巴特尔的土匪会合后进驻宝昌度过十来天后改称为骑兵师,包贵廷为师长,苏和巴特尔、孙明海为副师长,下设三个团将原天林支队编为一个团,任乌彦平为团长,原苏和巴特尔部下一帮编为一个团,察哈尔部队编为一个团。

这群土匪武装腊月开始从宝昌西行到武川过春节。1949年2月中旬,在武川合并于原驻呼和浩特孙兰芳部队。此后乌日他率部队在都日布德(四子王旗)一带与八路军打了一次仗,打死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并缴械地方干部的三支枪。对其中一名妇女干部进行了残无人道的折磨,使她几次死去活来。

三月中旬西行到达陶南江。六月中旬达日吉雅从阿拉善赶来(阿拉善旗扎萨克王爷)。后商谈德王(德木楚格东鲁普)在阿拉善旗筹备成立蒙疆政府时,各旗派代表参加成立会的事宜。德王和马洪奎与宁夏省主席商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昭乌达盟会议代表由巴林右旗乌日他,巴林左旗王占明,阿拉哈巴彦、扎鲁特旗希吉旺苏木,他们找一名阿拉善牧民引路出发。

1949年7月末召开“蒙古政府”成立大会,各盟、旗代表一百余人参加。其中的骨干有“德木楚格东鲁普、达日吉雅、李守信、乌古廷、他日巴、罗·巴吐孟和(阿拉善旗协理)、罗永树、金·巴吐道尔吉,金·巴特尔、包国民、吐布信、旺钦扎布、乌尔根、包贵廷、韩世忠、吴思”等人。会议进行了八、九天,德木楚格东鲁普被选为主席,达日吉雅为副主席,李守信为司令,乌古廷、包贵廷二人为副司令。在会议期间德木楚格东鲁普讲“各盟、旗要协助蒙疆政府工作”。李守信作了关于更进一步加强和扩建军队工作方面的演讲。散会后乌日他赴宁夏的陶立县找到自己的匪部。

八月初宁夏,阿拉善的解放已定局,这时德王带领一部分政府官员窜入定远营以北的大沙漠。乌日他率领自己的残匪潜逃,他路经盐池、陶立、平罗等地,抵达登口见到李守信,几天之后李守信率领匪兵离开登口逃入大漠。乌彦平带领所属匪部东逃。九月份乌日他在阿拉善北部的巴彦乌拉附近见到德王。在此,乌日他与旺钦扎布合伙率领手下土匪对阿拉善牧民进行一次大面和抢劫,赶来牧民的骆驼、马群、牛、羊、抢夺蒙古包、衣服、肉食品、粮食、油盐以及锅碗家具等。

七

1949年10月份,德王在吐库庙将其军队重新整编为两个师,德王亲自担任蒙古军司令,李守信为副司令,包贵廷为总参谋,都楞仓(白海峰)为副总参谋,原骑兵旅编为第一师,任苏和巴特尔为师长,孙明海为副师长。察哈尔、乌

珠穆沁部队为第二师，葛力吉格泰为师长（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他日巴为副师长。

十月中旬，德王从吐库庙搬迁到沙尔扎庙，德木楚格东鲁普说：“我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系。他们供给我们粮食和食品，不要畏惧，要放心。”十一月迁居阿拉善旗西北蒙古边界高日乃（拐子湖）附近进驻。1949年腊月29日德王策仍道尔吉，吐门德力格尔等人从高日乃湖越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有一天蒙古人民共和国派一名高个子人坐汽车来传递德王的信说：“商讨重要事”接去李守信、包贵廷、苏和巴特尔、都楞仓、敖门巴特尔和达希等六人（一九五〇年二月廿七日德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被捕，九月十八日送回中国。其它人员被接走尚无音信）。

1950年1、2月份宁夏省政府主席潘自立和达日吉雅派吐布信向在逃的土匪传达当时的政策，“全国已解放，你们往那儿跑啊？赶快回来，不要怕。”

德王，李守信等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蒙古自治政府”军政要人孙明海等人提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向人民政府投降的提议，但当时，绝大部分人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而在此情况下吐布信去阿拉善旗定远营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副司令曹友三汇报了情况。曹友三副司令给他们传达了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指示。此次，吐布信带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给德王的信。这样，大部分人听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后接受和平解放的人日益增多。在党的政策感召下，1950年3月份孙明海、他日巴、乌日他等人弃暗投明率领千余名土匪

投诚。中途中宁夏省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粮食、蔬菜和驼肉。四月上旬他们到达了定远营（今巴彦浩特）。

投诚队伍遵照解放军的命令排队入镇。随后，吐布信、孙明海带头的一千多人缴械投降。从此将这批投降人员，按起义投诚人员编入花名册。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分区曹副司令讲了话，并具体交待，传达了党对起义人员的宽大政策和具体措施：一、对愿意回家者，发给路费；二、愿意留在当地为民者允许安排居住；三、愿意学习新政策理论的送内蒙古学习；四、愿意参加工作的予以安排工作；五、愿意入伍当兵者编入保安队，并发给了服装。

1951年1月份，乌日他成了国家工作人员，开始在阿拉善自治旗工作。1954年6月份被调回宁夏省人事厅待分配，十月中旬被分配到登口县后二区协助搞合作化。1955年5月份，参加了组织常期性合作组，常期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

1958年9月份调到登口县新郊区批发部工作。次年调到巴彦高勒煤建公司工作。

1961年1月份调到胡力苏台煤矿商业局服务部工作。当年八月份由于该矿停产而又调回巴彦高勒煤建公司工作。

1962年，在登口县旧郊区供销社工作，1966年10月份调新郊区供销社的铁路运输货物部门从事收货、卸货、运输工作。

1967年3月9日起，乌日他按“历史反革命分子”、“土匪”、“地牧主分子”被批斗，当月十七日开始被人狱关押。

1969年7月31日巴林右旗军管会通过巴彦淖尔盟煤建公司将乌日他以“历史反革命分子”押回原籍，并将他带到各公社、街道，游斗后关进监狱，1974年10月23日，由巴林右旗组织部将他按退休干部处理，并安置到良种苗圃工作。乌日他于1977年4月18日病故于巴林右旗大板镇。

巴林右旗境内 新石器时代遗址简述

朝格巴图

巴林右旗这块土地古老而文明，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和生活。如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以及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就在这里聚居，繁衍生息，不断分化，融合，发展，变迁并留下了他们的遗迹。创造了举世瞩目，具有独特风格的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一脉相承，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

这些新时期时代的遗址，为研究巴林右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编年，有着重要意义。

一、古日古勒台遗址

古日古勒台遗址，位于巴彦塔拉苏木古日古勒台嘎查西北约100米的黄土坡上。距古日古勒台河1公里，西北距巴彦他拉苏木所在地8.3公里，西南距大板镇17.4公里。正处在嘉佑寺遗址的北边。遗址地势北高南低，为古日古勒台河二级台地，高出河

床约三、四十米,面积近 5000 平方米。由于近年来在山坡上挖沟防洪,掘坑植树,致使遗址遭到严重破坏。部分遗物散失,遗迹扰乱。遗址上部有几条不甚明显的南北顺坡黑土线,宽约 1 米,性质不明。下部有一组呈东北,西南方向排列的圆角方形房址,可分辨的有三座,边长 4 米左右,半地穴式,边缘轮廓清楚,无门道迹象。房内堆积为黑褐色土夹杂零星的红烧土块。遗址的东北隅发现一座圆形灰坑。该遗址出土和采集到的文物标本主要有:石器中有磨盘、磨棒、石斧、石刀、石耜,锄形器、饼形器、柱状研磨器、石核、石叶、刮削器、凿、钻、尖状器、石镞等。尤其磨棒为多见,磨棒两端的手柄为磨成四棱形的与手宽度相近。陶器中艳色大多数为泥质夹砂褐陶,夹砂黄褐陶,泥质红陶三大类。这类陶片陶质粗松,火候较低,器壁较厚,器底尤厚。陶色不匀,近内壁部分多呈黑陶色,近表部分多呈黄或红褐色,内壁有黑色烟炱。可辨器形主要是罐。纹饰种类繁多,图案丰富。主要以凹弦纹带,交叉纹,折线纹,网格纹,“之”字纹为主,其次是指甲纹,戳印纹,“管”印纹及器底席纹。纹饰组合有明显的规律性。主体纹饰凹弦纹平行施于口沿下,组成纹带,一般在 3-12 条之间,沟槽宽窄疏密不等。其下或辅以压印短线交叉纹,或者压划网格纹,横竖排“之”字纹,成为组合纹饰。也有凹弦纹带下施“回”字纹或“管”印纹的。平行折线纹系压印而成,施纹方法类似弧线“之”字纹。弧线“之”字纹陶片仅见 4 例,为线纹或 U 篔点纹。骨器中有兽肋骨刻槽做成的复合工具。遗址四周未见围沟,灰坑在遗址的东北隅。该遗址应属“兴隆洼文化”类型,是新石器时

代中早期的遗址,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二、哈日巴沼遗址

哈日巴沼遗址位于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东北约 15 公里,与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旗三旗交界处的一较高沙岗上(当地牧民称此处为哈日巴沼)。沙岗中部高出周围地面约 15 米,一条季节性小河在沙岗东自北向南流过。

哈日巴沼西北高,东南低,遗址位于哈日巴沼东南坡的浅洼地上。四面均为农田,遗址大部分被沙丘覆盖,一部分由于长年风沙侵蚀,水土流失严重,文化层受到了破坏和扰乱,大量的石器、陶片暴露于整个洼地。靠东南侧的斜坡上,已暴露有十多座半地穴式房址。从地表上观察房址平面为圆角方形,有的略作长方形。未见门道,房址大小不一。

整个遗址东西宽约 500 米,南北长约 800 米。该遗址出土和采集到的文物标本主要有:石器种类较少。分打制、琢制、磨制和压制等。其中打制石器数量较多,器型也较大,石器分为,锄形器,铲形器,饼形器,研磨器,磨盘,磨棒,环状器,石核等。锄形器似丁字形,上半部凸出,下部横长有刃,打制不甚规整,周边两交互打击而成,这类器物较多,形态有大有小,靠刃部的地方有使用磨擦痕迹且与刃锋垂直,它们的使用方法基本一致。用时刃锋接触被加工物皆垂直。铲形器,器体半数有亚腰,并明显窄

长。处凸弧刃大致相同，做正锋。刃部经使用已磨擦很光滑。

陶器陶质为夹砂粗陶，夹砂细陶两种，其中以夹砂粗陶最多。夹砂粗陶具有较多的粗砂，器表显得较为粗糙。陶器颜色有灰褐、红褐、黄褐等，而同一件器物上的陶色多不纯正，陶器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大部分器物的陶胎较厚重，陶器内壁多经磨光，主要是压印纹。可辨器型有筒形罐，钵等。罐外表口沿下施凹弦纹和压印横线，二者之间有一周附加堆纹带，带上施细密的压印纹，其下为交插纹和网格纹。该遗址应属“兴隆洼文化”遗存。是我国北方地区最早的原始文化之一。在遗址中采集数量较多的生活用具和农业生产工具，说明当时西拉沐沦河以北的原始农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

三、敖包恩格日遗址

敖包恩格日遗址位于幸福之路苏木王爷府嘎查龙音宝冷独贵龙东南 1.5 公里处的敖日盖河和塔拉宝拉格河两河交汇处的向阳台地上。此台地南距塔拉宝拉格河 2000 米，西临敖日盖河 150 米，高出河面约 20—30 米。台地南北长约 350 米，东西宽约 250 米，台地北高南低，坡度平缓。由于水土流失，台地东部有一条被山洪冲刷形成的宽约 15—20 米的南北向断沟，在该沟西侧断层内暴露出烧土，灰烬层及陶片，石器。遗址的分布面积南北长约 200 米，东西宽约 50 米。遗址区内西南角有清代烧砖瓦窑址。

在该遗址上采集到的遗物有石器、陶器两大类。

石器有打制、磨制、琢制、压制四种制法。分大型和细石器两类。大型石器有磨盘、磨棒、石斧、石楔、锄形器、石耜、饼形器、石刀等。

细石器原料多为燧石，颜色有乳白、青灰、黑色、赭黄色。主要器型有石核、石叶、刮削器等。

陶器均为夹砂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大部分陶胎较厚重，尤其是器物的底部。陶器的外壁多呈褐色，内壁多经磨光，一般呈黑灰色、黄色、红褐色，内壁有黑色烟炱。所有陶器均为手制。纹饰以压印线形“之”字纹为主，其次是网格纹，附加堆纹，篦点“之”字纹，平行凹弦纹等。陶器类型较单调，采集的陶片可辨器形主要是深腹筒形罐、钵、盆。罐形体积较大，胎厚重，口沿处多有一道凸棱。纹饰有三部分：口沿下有 3—12 道凹弦纹，有的在凹弦纹带下缘或口间有一周附加堆纹，之下是横向压印，划“之”字纹或单向压印斜线纹等。

敖包恩格日遗址采集遗物比较丰富。石器有锄形器、磨盘、磨棒、石斧、石耜和少量的细石器等。石料多采用本地所产的青灰岩、乳白色燧石、黑色燧石等。石器打制为主，还有少量磨制，琢制、压制等。陶器以压印线形“之”字纹筒形罐为主，也有少量的圆腹小罐等器类。只有夹砂陶，没有泥质陶器，均手制。陶胎较厚，烧制火候较低。陶色以灰褐黄褐色为主，斑驳极多。器表素面者极少，多数由二至三种纹饰组成复合纹，有竖压横排“之”字线形纹，网格纹，篦点“之”字纹，附加堆纹等。

从遗址中采集的陶器和石器特征看多数遗物具有兴隆

洼文化特征。

四、那日斯台遗址

那日斯台遗址位于巴彦尔灯镇的大青山东麓余脉“密绿大坝”的南侧，西拉沐沦河支流查干沐沦河西岸的高台地上，南距西拉沐沦河约14公里。

遗址中间被宽约20米的乌兰沟隔断，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是台地，西部是斜坡地。

遗址东部上现已盖了民房，即那日斯台村所在：又由于风沙侵蚀，水土流失严重，文化层受到了破坏和扰乱，陶片、石器暴露于整个台地。靠东北侧的斜坡上有七、八处非常清晰的窑址：有的地段还发现有土垒和沟壕痕迹。

遗址西部，在那日斯台灌渠乌兰沟渡槽的附近，文化层保存东侧为好。已暴露出来的房址和灰炕依稀可辨。从地表观察，房址为圆形，或略呈方形和长方形。

整个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1000米，总暴露面积大约在150万平方米左右。该遗址上出土和采集、征集到的文物标本甚多。主要有：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蚌器和石雕刻器等。石器计有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三种工具或武器，还有容器，以及石雕人像。

磨制石器主要有耜、斧、镑、凿、刀、圆饼状器、三角形器、折斧、钺形器、棍棒头，磨盘和磨棒。

打制石器锄形器、镰形器、铍形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用天然石块修打的敲砸器等。

细石器原料多为燧石、玉髓和碧玉等，颜色有乳白、暗

红、橙黄、淡绿和暗灰色，主要器形有石镞、石钻、尖状器和刮削器、石叶、石核等。

陶器彩陶陶质有泥质红陶和夹细砂红陶，以及少量的泥质灰陶。陶质坚硬，火候较高，表面磨光，多施黑色，间或也有紫红色彩。纹饰有：平行斜线纹、菱形纹、三角形纹、竖线纹、弧线纹、鳞纹、三角涡纹和条带状花纹等。此外还发现有“了”字形的似符号纹饰。

其他陶器的陶质有泥质红陶，夹细砂红陶，夹粗砂褐陶和泥质灰陶等，其中夹砂褐陶的质地粗松，火候较低。纹饰以各种不同形式的“之”字纹为主，其他有指甲纹、网格纹，“回”字纹、凸形纹、乳钉纹、凹弦纹、斜线纹、附加堆纹、点状纹、螺旋纹，以及凸弦纹施“人”字纹，凹弦纹伴“人”字纹等。器底多见编织纹和少量的螺旋状绳纹。这些纹饰，是用拍、印、划、刺和堆等方法加工而成。

制法皆为手制，有盘筑和套接之别。器物内壁多经磨光，有的尚见擦划的条状痕。口沿修饰比较规整，有些器物的口沿下有钻孔。器型主要有：罐、钵、碗、盆、瓮、斜口器、器盖、壶、盅、纺轮、纺瓜和饼形器等。

骨角器有角椎、骨椎、骨镞、骨刀柄等。

玉器共征集和采集到一百多件。质料大都分为软玉，多为淡黄绿色。雕刻品有蚕、鸟、鱼、钩形器、三联壁饰、龙形块和云纹饰件等。此外，尚有坠饰，玉管以及纺瓜和玉斧等。

石雕刻品，遗址中共采集和征集到石雕刻品六件。主要有石人雕像、鸟形块、兽面形器、翅状器、石兽、兽头饰等。

在那日斯台遗址所采集的陶器中,有大量的夹砂灰褐“之”字纹陶器,泥质彩陶器。它们的纹饰及器形,都同赤峰红山后遗址发现的十分相近。在石器中柳叶形石耜、石磨盘、磨棒、桂叶形石刀以及平底和凹底三角形石镞等。也是赤峰红山后等地所发现的典型石器。因此,那日斯台遗址应属红山文化遗存。是目前西拉沐沦河以北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原始文化遗存之一。

五、查日斯台遗址

查日斯台遗址位于旗所在地——大板镇东南约 23 公里,南距巴彦汉 10 公里,查干沐沦河自东向南流,在村南 15 公里处与西拉沐沦河交汇。查日斯台嘎查距查干沐沦河西约 2 公里,遗址在村西北约 500 米处的山岗东侧向阳扇面台地上,高出河面约 30—40 米。西南距巴林桥 24 公里。

遗址南、北、西三面由群山环绕,向东南视野开阔。南濒一条东西走向的长约 1500 米的无名泉水沟。遗址所在台地呈北高南低斜坡状,大部分遗址已封闭为草库伦,草库伦里滞留着很厚的流沙。在草库伦以外的地方,地表覆盖一层黄沙土约 10—15 厘米左右,下为黑砂土层。由于多年风沙侵蚀,水土流失严重,文化层受到了破坏和扰乱,陶片、石器、蚌器等暴露于台地上。遗址西北部有呈东西方向排列的圆角长方形房址,可分辨的有 8 座。从地表观察都是半地穴式建筑,无门道迹象。房内堆积为黑色土夹杂红烧土块。整个遗址东西长约 300 米,南北宽约 100 米。

遗址内前后采集和征集到的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等。

陶器陶质分泥质陶与夹砂陶两种,泥质陶居多,占陶片总数的 52% 左右。泥质陶多为轮制,火候较高,器型规整,表面多经磨光、素面、器壁较薄、陶土大部经淘洗,陶色较为纯正,泥质红陶居多,灰陶次之。主要器型以钵为主,其次还有罐、盆、瓮等。

夹砂陶以褐色、灰色、黄褐色为主,尚有少量的红色夹细砂陶。夹砂陶多为手制,以泥条盘筑成形,夹砂多、砂粒大、火候低、陶色不匀、器表粗糙、质地疏松、器体内壁多呈黑色,部分黑褐相间。夹砂陶器类少,可辨器型主要是罐。

纹饰主要有划纹、压纹、指甲纹,还有彩陶器,器底多压印席纹。

查日斯台遗址中采集的陶片纹饰组合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多在器表呈连续的横或纵的“之”字形纹,亦有少量的篦点“之”字纹。指甲纹多饰于有划纹的夹砂陶器的口沿下部,划纹多饰于夹砂大口罐的腹部,还发现一彩陶陶片,为泥质红陶、施黑彩,饰平行条带纹。

石器有打制、磨制和细石器。分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

大型石器有磨盘、磨棒、石耜、锄形器、斧、刀、镑、柱状研磨器和环状器等。

细石器有刮削器、石叶、石镞、尖状器等,打击压琢而成。

玉器兽形玉器 1 件。这件兽形玉器,近似虎形。采用

黄褐色青玉雕成,长条形扁平体,周边由两面磨成钝刃,中部厚通体磨光,无细部加工,粗雕成兽形,腹上部正中有一个钻圆穿孔,直径0.2厘米,下有四道斜凹线纹,下为两道弧形凹线纹,另一面为三角形凹线纹,尾端较扁宽,头上有一扁耳。

查日斯台遗址出土的遗物虽为调查采集的标本,但是器类极为丰富。遗址中采集的烟叶形石耜,舌形石斧,桂叶形石刀,以及细石器标本石叶,指甲形刮削器,三角形石镞,陶器中的泥质红陶钵,折肩罐、盆,“之”字形线纹,篦点“之”字形纹、划纹、席纹器底,饰平行条带纹彩陶等,均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据此查日斯台遗址似应属于红山文化遗存。

六、黑德宝龙遗址

黑德宝龙遗址位于大板镇德日苏宝龙嘎查黑德宝龙村西北约300米处。遗址南约500米处有查干沐沦河自西向东南流。遗址东、西、北三面环山,地势北高南低,为查干沐沦河二级台地,高出河床约40-50米。遗址面积近2000平方米。由于多年风沙严重剥蚀,致使遗址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层直接暴露于地表,部分遗物散失,遗迹扰乱。遗址东南表面大部分为沙丘覆盖,东北部和中部暴露在地表的陶片和石器到处可见,我们在此采集到部分陶器残片和石器。从遗址东北黄色耕土面上可以看到一片片灰土痕迹及半地穴式圆角方形房址2座,边缘轮廓清楚,无门道迹象。房址内堆积为黑色土,另外,还有几个红烧土灶炕痕迹。

采集的遗物有陶器和石器两种。

陶器均为陶片。陶片主要为夹砂陶,泥质陶两类。夹砂陶占陶片总数的90%,泥质陶占10%。夹砂陶片火候较为泥质陶低,砂粒大,器壁较厚,器表粗糙。陶色不匀,内表呈黑色,近表部分多呈黄或红褐色。纹饰主要有压纹,附加堆纹、划纹、篦点纹、制法皆手制。夹砂陶器制坯时,大多器底部留有编织的印痕。我们从印痕观察,编织物有两种,一种是用禾木科植物的叶和茎编织的,以叶或绳为径,以植物茎为纬。另一种是用绳子编结而成。

泥质红陶,器型规整,火候较高,陶色均匀,陶质坚硬,器表光滑。器表内壁隐约可见平直的加工压磨痕迹。遗址中采集的陶片大部分为陶器腹部残片,有少量口沿和器底残片。可辨器型主要有钵、罐、盆等。

石器主要有磨制石器、打制石器、细石器三种。分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

大型石器有磨盘、磨棒、石斧、石铲、砍砸器和石凿等。细石器有石镞、石叶、刮削器、石钻等器,打击压琢而成。

黑德宝龙遗址出土的大量典型器物虽为调查采集标本,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本遗址中采集的陶片以夹砂陶为大宗,泥质红陶具有典型的红山文化特征。它们的纹饰及器型,都同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发现的器物十分相近。遗址中出土有凹弦纹与“之”字纹的厚壁筒形罐和方格纹罐等遗物残片,但却不见红山文化器物群,值得我们注意。黑德宝龙遗址包含年代长久,所见遗物除红山文化外,

当分属于不同年代,不同文化。

七、馒头山遗址

馒头山遗址地处查干诺尔苏木达坝后营子村南约 300 米处的一个台地上,其西为山丘。有两座低缓的山冈,南距西拉沐沦河 300 米。

遗址地势北高南低,为西拉沐沦河二级台地,高出河床约四、五十米,面积近 6000 平方米。遗址大部分被沙丘所覆盖,一部分经长期雨水冲刷和风力剥蚀,文化层和一些零星的遗迹露出于地表,大量的文化遗物散落于地面。遗址下部有一组呈东、西方向排列的圆角方形房址,可分辨的有 5 座,半地穴式,边缘轮廓清楚,无门道迹象。房内堆积为黑褐色土夹杂零星的红烧土块。

采集遗物的种类有陶器、石器。陶器的种类有钵、罐等。陶器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居多、少量夹砂灰陶,纹饰有压印“之”字纹、菱形纹、弧线纹,附加堆纹以及由凹弦纹,附加堆纹、菱形纹,之字纹组成的复合纹等。

石器多没有使用痕迹,种类繁多,有斧、锄形器、耜、凿、刀、铲、铤、磨盘、磨棒、轮碾器、饼形器、刮削器等。

馒头山遗址采集的器物,以石器为大宗,少量陶器残片。遗物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上有差异。锄形器是兴隆洼文化的标准器,在兴隆洼文化遗址和查海遗址都有大量的发现,馒头山出土的陶罐上的凹弦纹、菱形纹、之字纹组成的三段式复合纹亦是兴隆洼文化独有的特征:而大量出土的横之字纹、弦纹、弧线纹陶罐,折腹钵及磨制的石斧、铤、

凿、烟叶形石耜及磨盘,磨棒等与红山文化诸遗址所出基本一致。

房址内出土遗物丰富,但文化属性较单一。房址为方形,陶器均为手制,泥质陶多为磨光或素面,器型有钵、罐等,彩陶颜色为黑红色彩。陶器的纹饰以横之字纹和弦纹(直线纹)居多,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存,以上特点与赤峰红山后遗址特点相同,据此馒头山遗址似应属于红山文化系统遗存。

八、苏达来遗址

苏达来遗址位于巴彦他拉苏木,苏达来嘎查北约 500 米处的向阳山坡上,共有三个遗址区,中间遗址区,除出土有红山文化所共有的石器和陶器外,较重要的是在遗址的偏南西侧,发现一处小型土炕墓葬。墓葬中出土了一组玉器这是红山文化遗址中不多见的发现。遗址南北宽约 350 米,东西长约 600 米,总面积 21000 余平方米。整个遗址北高南低呈斜坡状,由于多年的雨水冲刷和风沙侵蚀,水土流失严重,文化层受到了破坏和扰乱,陶片和石器等暴露于整个台地。靠西北侧的斜坡上有 10-11 处非常清晰的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址,现存坑壁不甚规则:东南侧地势低破坏较多,边缘不甚清晰,中段似略处凸。房址内仅见一层堆积,普遍遗有含草茎的烧土块,应为房屋倒塌堆积层。

在该遗址上,我们先后采集和征集到的有陶器、石器和玉器等遗物。

陶器陶质可分为细泥红陶,泥质红陶,夹砂褐陶和夹砂

红褐陶四大类。细泥和泥质陶多为红陶,夹少数呈橙色,夹砂褐陶占有一定的比例,夹砂红褐陶少见。泥质与细泥红陶,烧制火候高,质地非常坚硬,打磨也精细,夹砂褐陶烧制火候也较高,夹砂红褐陶质地不及夹砂褐陶坚硬。采集的器物残片多为素面或磨光,少数可见纹饰的有线纹、弦纹、附加堆纹、凹弦纹,“之”字形纹,篦点之字纹、压纹、指甲纹,还有少量的彩陶器,器底多压印席纹。陶器制法除少部分器物口沿慢轮加工外,多数为手制。

从采集的标本看,器形主要有盆、钵其次是罐和壶等。

石器计有磨制石器,打制石器、细石器三种。

磨制石器主要有石斧、石刀、石耜、石铤、石凿、石圆饼形器、石磨盘、磨棒等。

打制石器锄形器,尖状器和用天然石块修打的敲砸器等。

细石器主要有石镞、石钻、刮削器、石叶、石核和尖状器等。原料多为燧石、玉髓和碧玉等,颜色为乳白色,橙黄暗红、淡绿色。

玉器共征集到九件、质料大都为软玉,多为淡黄绿色。雕刻品有人面饰玉坠饰和云纹饰件,管形玉珠等。

我们通过在苏达来遗址的多次调查分析该遗址出土的遗物多属于红山文化常见的遗存,因而,我们认为该遗址应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有少量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时期的遗存。这种现象与赤峰地区中北部的原始文化遗存很相似,与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更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出土的玉器,以及陶器纹饰的特点,很多与红山文化

和兴隆洼文化相像。这在赤峰地区中北部遗址中是比较少见的,说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苏达来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以赤峰地区中北部红山文化遗存因素为主,多种文化交错并存的特殊类型遗址。此类遗址的出现,与巴林右旗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九、胡日哈遗址

胡日哈遗址位于胡日哈苏木胡日哈嘎查,胡日哈山西侧土丘的南坡向阳台地上。遗址东距胡日哈苏木所在地10公里,西距红剑峰4公里,北是胡日哈嘎查,南距西拉沐沦河20公里。高出河面约30-40米。

遗址南有许多无名水泡子,遗址所在台地呈北高南低斜坡状,大部分遗址已封闭为草库伦,由于多年风沙侵蚀,水土流失严重,文化层受到了破坏和扰乱,陶片、石器、骨蚌器等暴露于台地上。遗址东北部有呈东西方向排列的圆角长方形房址,可分辨的有6座。从地表观察都是半地穴式建筑,无门道迹象。整个遗址东西长约30米,南北宽约200米。

遗址中我们采集的遗物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

陶器陶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陶质多为夹砂褐陶,泥质红陶次之,还有少量的彩陶。陶片上的纹饰有:横竖“之”字纹和篦点“之”字形纹,平形划线纹、压纹、指甲纹、附加堆纹,凸弦纹,凹弦纹和器底多压印席纹。泥质陶多为轮制,火候较高,器型规整,表面多经磨光,素面,器壁较薄,陶土大部经淘洗,陶色较为纯正。主要器型以罐、钵、盆、

瓮、壶等。

石器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三类。打制石器有条形石铤、亚腰形石锄、舌形石斧、石球等。磨制石器有：条形磨盘、磨棒、石耜、石斧、石刀、柱形研磨器、石铤等。细石器有：三角形石铤、指甲形刮削器等。在与该遗址相连的西北方，有一面积约为 300 平米的石料场，石料场内出土了大量的半成品石器，器形有斧、铤、凿、铲、刀、钺和铤、球状器等。

胡日哈遗址虽未作大面积的清理和发掘，但从我们调查中采集的标本来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陶质方面，该遗址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少量彩陶出现，由于烧造火候很高，质地亦非常坚硬，陶色也较均匀、纯正。但也有少量陶器、器表出现红、褐相杂的现象。在制法方面，多为轮制，但手制者也占有一定比例。造型方面，多数为钵、罐、盆和平底器。器表装饰仅见有镂孔，“之”字形纹、弦纹、平形划纹等。这些都是红山文化较晚期遗存的特征。

十、小林厂遗址

小林厂遗址位于巴彦汉镇小林厂西北山岗西侧向阳扇形台地上，东距旗所在地大板镇约 5 公里，南距巴彦尔灯 3 公里，查干沐沦河自北向南流，距遗址 200 米，高山河面约 40—50 米。东距小林厂居民区约 500 米。

遗址向东南视野开阔，所在台地呈北高南低斜坡状，大部分遗址由于多年风沙侵蚀，水土流失严重，文化层受到了破坏和扰乱，陶片和石器等暴露于台地上。整个遗址东西

长约 150 米，南北宽约 100 米。

遗址内我们先后采集到陶器、石器等遗物。

陶器残片分泥质红陶与夹砂褐陶、彩陶三种，泥质陶多为轮制，火候较高、器型规整，表面多经磨光，素面器壁较薄，陶色较为纯正。夹砂陶多为手制，火候较低、夹砂多、砂粒大，陶色不匀、器表粗糙、质地疏松、器体内壁多呈黑色、部分黑褐相间。泥质红陶居多，夹砂褐陶次之。主要器型以钵为主，其次还有罐、盆、瓮等器物。

纹饰主要有篦点之字纹、之字形纹、指甲纹、划纹、压印纹，还有彩陶器，器底多压印席纹。

石器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三种。

打制石器有亚腰形石锄、石斧、圆饼形器、砍砸器、尖状器等。磨制石器有磨盘、磨棒、石斧、石耜等。

细石器有指甲形刮削器、石铤、石叶等。

小林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长期水土流失，多数无可靠的地层作为文化分期的依据。只能以采集标本的文化特点与遗址的文化遗存作比较，揭示其文化内涵。

小林厂遗址中的泥质红陶钵，彩陶罐，“之”字纹罐、石耜、石斧、指甲形刮削器、石铤、石叶等，在赤峰红山后遗址中以及我地区红山文化遗址中常见的红山文化遗存，因而我们认为这遗址应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为研究我旗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发展，民族起源史和社会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简述巴林右旗境内辽代城址

道日吉桑布

巴林右旗是古代契丹民族繁衍强盛之地。契丹部落联盟首领耶律阿保机在公元十世纪初率领大军吞并毗邻的奚、室韦、女真等部落,占领渤海地区,建立契丹王朝辽国。继而辽太祖向东攻破今吉林、辽宁地区,向南占领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的北部,并从攻占地区俘虏大量的汉族人和渤海人,迁移到西拉沐沦河以北适宜种植地区,分设州县安置,从事耕垦种植和手工业、商业等事业。同时,辽朝还仿照中原汉制令俘民营建皇都及许多州县治所城邑。辽国帝后及贵族大臣也把所掠民众据为己有,建立私城或私人“头下州”。因而,辽代在巴林草原上一时兴起了诸多城镇。在这一契丹民族古乡北疆大地建置诸多州县城郭的原因之一是辽太祖阿保机出生在今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因而,辽太祖在契丹皇族发祥之地今林东镇南建造盛大皇都上京临潢府,府周围设置十个直辖县。在哈达英格乡兴建祖州,州附近建三个下属县,每个县都有一千至四千俘虏汉民或渤海人户居之。在祖州西北祖山安葬阿保机,建祖陵。由此,在巴林左旗境内辽代有一都、一州、一皇陵、十三个县。由于巴林右旗位置与辽上京临近,而在旗境内辽代有四个

州、两个皇陵、五个县(?)。由此,巴林草原在辽代成为辽国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也是巴林故乡古代史上最繁荣时期。但是,在公元十二世纪初辽朝灭亡以后,那些辽代城郭建筑全在长久的历史潮流中泥灭终结,而当今留下了无法认定的许多遗址。据有关史料,对巴林右旗所辖境内的辽代遗址作一简述如下:

在索博力嘎苏木政府所在地白塔古城遗址是辽朝庆州城。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庆州原称为黑河州,由穆宗筑城,圣宗更名为庆州。对此考古学家们有一种推测是今索博力嘎苏木北毕图嘎查西侧古址是原黑河州旧址。此址东西宽为440米,南北长为335米,东西两侧有城门,内有几排石墙及许多宫房基迹。据辽史记载,圣宗于公元990年废弃黑河州后,在今白塔子之处筑城,称庆州。此后由道宗和天祚帝进行扩建,使成为守护、祭祀圣宗、兴宗、道宗皇陵城邑,又是辽帝“座夏”议政及夏秋游猎活动的重要地点。

庆州是“回”字形内外双层城郭。外城周长约14华里,内城周长为8华里,东西南北均有一城门。据《金史》记载,“庆州有行宫,为辽主常此驻蹕”。《金史·地理志》中曰“圣宗皇后曾居此守陵”。经考古学者考察,城内有游仙殿、大安殿、御金鸾殿等许多主殿、后殿、前殿及东西配殿建筑群遗址,附近有人工池塘和假山遗址。内城内西北有寺庙佛塔址,附近有人工池塘和假山遗址。内城内西北有寺庙佛塔址,附近有人工池塘和假山遗址。内城内西北有寺庙佛塔址,附近有人工池塘和假山遗址。内城内西北有寺庙佛塔址,附近有人工池塘和假山遗址。在外城内也有大片建筑和街道遗址。

庆州当年有“蕃汉户口三千,所属有玄德、孝安、富义等三个县”。其中,玄德县治所位置有些考古学者认为就在庆

州城南门外。据《临潢府附近》地图中在庆州城旁边有“玄德”二字,但无县城符号来看,玄德县原在庆州城门附近是比较吻合的。孝安县治所在《临潢府附近》地图中画在今林西县北部,富义县的位置尚不清楚。

庆州以北 30 华里处有辽朝永庆、永兴、永福三所皇陵,统称庆陵。是安葬圣宗、兴宗、道宗皇帝和皇后的陵。这三所陵都是辽朝极度兴旺时期的建筑群,其“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地面建筑豪华华丽,随葬物品极其丰富”。但辽朝灭亡之际,庆州城和庆陵内的金银财宝统统被金兵抢劫一空,陵园地下建筑当时虽然受到金朝的保护,但到清朝末期、民国初期由东北军阀、地方土匪和日军大肆盗掘陪葬财宝,并把陵下建筑破坏殆尽。

在岗根苏木所在地的遗址是辽朝怀州城址。据《辽史·地理志》载,怀州在唐代属归城州。辽朝从太祖始筑城,于公元 947 年太宗死后安葬于怀州北床金山谷,称怀陵。次年辽世宗从燕、蓟和渤海地区迁来俘民扩建为怀州。此后怀州成为辽帝每年祭祀怀陵的落脚地,又是夏秋季射鹿的游猎点。于公元 969 年 2 月辽帝穆宗前来怀州狩猎,当晚回行宫饮酒沉醉,是夜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六人趁机叛变杀死穆宗。穆宗由于“嗜酒”、“嗜杀”,并经常残酷欺压或杀害近侍和牧鹿人、养鹰人、制酒人等为皇室服役的奴才,久而久之引发了诸多奴才的心头之恨。杀害皇帝的“小哥等人直到五年之后才被捕获”。由此,将被害的皇帝遗体安葬在怀陵太宗陵近侧,“建凤凰殿以奉焉”。在怀陵的两所陵均有寝殿、祭殿、配殿、门殿等齐全的庞大建筑群。

怀州是约一平方公里的方形城,“有南北西三门,城东有山无门”,“城四角有角楼”,内有许多宫殿。居民多数为渤海、燕州、蓟州地区的俘民,下属有扶余、显理二县,扶余县有 1500 户,治所在州城北门外。显理县有 1000 户,治所位置尚不清。

在都希苏木(今大板镇)友爱村西南毕赤格图山左脚下的古址是辽国黑河州。宋朝大臣沈括《使虏图抄》记载:“黑河州在庆州之南,二州相距约 200 里”,“从保和馆北行数里……即黑水,沿水有百余家,泥瓦相半,筑垣周之,曰黑河州”。关于保和馆《薛映记》中载:“自潢水北行五十里至保和馆。”在此所述的黑水、潢水是今查干沐沦河和西拉沐沦河原称。保和馆是从上京至中京(今宁城县大明塔)之间往返的辽、宋朝官吏中途歇息的十二馆站之一。旧址在今巴彦汉镇前进村东 500 米,查干沐沦河西 200 米处。遗迹东西 200 米、南北 250 米长。里边的宫庭遗址已模糊不清。黑从保和馆北上二十多里即达查干沐沦河北岸的黑河州。黑河州遗迹约东西宽 500 米,南北长 500 米,是一个小集镇规模的州邑,今除遗址之中北部有四个大殿基以外,其它房屋遗迹均被埋沙或由耕种而消失。

在益和诺尔苏木布敦花嘎查的古遗址是辽代松山州。辽朝时在赤峰地区有两个松山州。在今松山区城子乡的松山州是属辽朝中京路(今宁城县大明塔)的国家行政州,下辖有一个县。在布敦花的松山州是属上京路(今林东)的头下州。据辽代建置形式,头下州和头下军州是奴隶主管理或者控制下的私人城。即“头下州多为皇族、诸王、后族、外

戚、有功大臣建立州城以居之”，辽皇族“横帐、国舅、公主等贵族允许以征伐俘户建州城居之，其余不得建城郭”。关于布敦花的松山州在《辽史·地理志》中载：“松山州，本辽泽大部落，横帐普古王牧地。有松山，北至上京一百七十里。户五百”。《读史方輿纪要》中曰“松山州，辽志云：在上京南百七十里，俱金废”。关于上述横帐，在有关史料记载，辽朝皇族分四房，即横帐、孟父房、仲父房、季父房，“简称一帐三房，总称四帐皇族”。“作为横帐，就是皇室，是太祖阿保机的后裔，即自阿保机后的九代（九帐）皇族，地位最尊。”其余孟父等三房是太祖阿保机的伯父和诸弟后裔。关于布敦花嘎查古址，考古学家冯永谦在《辽志十六头下州地理考》中说：“这座城址在林东之南一百五十里，按《辽史·地理志》：松山州‘北至上京一百七十里’辽里较今里为小，再加上实际里程迂曲，则此城方位、里距正合；而且在这一带经过考查，附近再无辽代城址。因此，笔者考定……布敦花城址即为辽代头下松山州”。此古址位于西拉沐沦河北岸，益和诺尔湖西。据考察城址规模为“回”字形双层，外围东西 520 米宽，南北 595 米，东西北三面有城门，南面迹址已模糊而无城门不清。内城东西 199 米，南北 178 米，南面有一门，其余宫房遗址全已消失。

除上述之外，在全旗境内目前还未鉴别名称的辽代小城及村落遗址有许多。其中，较大的有：在索博日嘎苏木毕图嘎查西北距 2.7 公里处，即在赛日木山南麓有东西宽 450 米、南北长 360 米，东西两侧正中有城门的旧城遗址。在该苏木阿尔山高勒东北距 5 里有东西 355 米、南北 390

米长，南面有城门的小城遗址。在巴彦和硕镇下要力吐村西北有南北 196 米、东西 175 米宽，东西南三面各有一门的古城遗址。在沙巴尔台苏木额尔敦塔布嘎东北有东西 200 米、南北 120 米长，西面有城门的古城遗址。在查干诺尔苏木小城子村有南北 200 米、东西 195 米，西面有一门的小城遗址。除此之外在宝日勿苏镇李家园子村、沙巴尔台苏木塔本花独贵龙、查干沐沦苏木东百兴图山后、巴彦他拉苏木所在地东距 6 里、胡日哈苏木西马鬃山等地都有辽代遗址群。除上述以外有辽代砖瓦碎片的村落散居遗址，即常说的“高丽居住地”在巴林右旗境内的山川、平原、流域多的很。这些古址中规模较大的有庆州、怀州和所辖的位置尚未清楚的几个县治所，还有的是站馆或军营，多数为贵族官僚财主居点遗址。据宋臣沈括使辽记载，他渡过潢水石桥至保和馆，从保和馆北行过黑水途经黑河州、燕王城废垒、牛山毡帐馆、锅窖毡帐馆，至庆州之东大黑河帐馆之后进入今巴林左旗，路经牛心山毡帐馆、新添帐馆、顿程帐馆，至道宗皇帝夏捺钵所在地单于庭。对沈括路经的上述帐馆位置考古学家们认为，牛山毡帐馆“在今查干沐沦苏木沙巴尔台”；锅窖毡帐馆“在今巴彦和硕镇白音敖包”；大黑河帐馆“在今索博力嘎苏木东北距二十里阿尔山艾里”；牛心山毡帐馆“在今巴林左旗白音乌拉北部”；顿程帐馆“在今左旗浩勒吐杖房营子附近，再西北行二十里即达单于庭。”据上述行程路线，概括说沈括自保和馆所在地前进村北行渡查干沐沦河，经今沙巴尔台、巴彦和硕抵索博力嘎，折东经今巴林左旗白音乌拉、毕鲁台、浩勒吐行至道宗驻地单于庭。其

中,关于“燕王城废垒”位置,在《临潢府附近》地图中标志的燕王城方位是从大板正北稍微偏西,距离大约从大板四五十里左右处。但是,古代地图的方位有的不够准确,且没有依据判断燕王城的位置,具体所在尚需考察。关于“燕王城”的燕王究竟是何人,查阅有关辽史发现有四个燕王。一是在公元951年辽世宗率兵南征,返回行至归化州,耶律察割发动叛乱杀害世宗和皇后。其中,察割的同伙之一牒葛是一位燕王。当即跟随世宗南下的耶律璟(即穆宗)率兵捕杀察割及其同党,平息了叛乱。从而可以推断的是沈括在公元1075年使辽时燕王城已为“废垒”,是否城主是燕王牒葛并因参与杀害皇帝被捕杀而他的私城也被朝廷没收成“废垒”,既然有这种可能性,但尚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而不得以推测予以断定。二是辽王朝大臣韩匡嗣于公元970年被封为燕王,于公元979年在交战中有失误,被降封为秦王。三是韩匡嗣的孙子韩制心也获燕王衔。可是在《辽史》中载:“以秦王韩匡嗣私城为全州。”全州遗址在今巴林左旗白音乌拉苏木四方城。据此可以判断燕王城不一定是韩匡嗣家族私城邑。四是淳钦皇后述律平之弟阿古之五世孙萧孝穆于公元1023年被封燕王,1043年病逝,被追赠大丞相、晋国王等。由此,于1075年时已成“废垒”的燕王城也不一定是萧孝穆的城。除以上四人之外在辽代被封燕王功勋者可能也有他人。

总之,在辽国建朝至灭亡的218年间,这一契丹民族游牧的北疆大地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十分兴盛发达。但是,在公元1114年女真部的阿骨打起义反辽,首先攻克女真境

内的江宁州(今吉林省五家站),继而南下攻克辽东京(今辽阳市)地区。于公元1120年向西进军攻破上京临潢府。随即上京附近的祖州、怀州、庆州等州县一时全都被金兵攻占。从此,那些在辽代劳动人民营造的浩大城郭建筑经过金、元、明、清朝的多次战祸,全部被焚烧的焚烧、废弃的废弃,各州县平民百姓也逃避战乱纷纷外流,而当今在巴林草原上只有庆州白塔完好无损成为历史之碑。

清代名刹荟福寺

编译 布和那苏图

在草原明珠大板镇内,有一座庙保存完好,迄今为巴林草原喇嘛庙,那就是驰名古今,蜚声国内外的“荟福寺”。

荟福寺,原名“巴日斯苏木”。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由巴林右翼旗第四代札萨克多罗郡王乌尔袞和清朝康熙皇帝次女固伦荣宪公主初建,初称“巴日斯苏木”,意为“虎庙”。据传建庙的头一年,康熙皇帝巡幸巴林时,曾在大板南部的巴日图山松林中(现为巴林右旗查干诺尔苏木巴日图嘎查)猎获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后来被内充白草,眼嵌玻璃球,栩栩如生的供在庙中,这就是虎庙一说的来历。

该庙不断增修,至雍正四年(1726年)在固伦荣宪公主的主持下,扩建殿宇26间,雍正皇帝赐金字“荟福寺”。从此,将“虎庙”更名为“荟福寺”。

清乾隆十一年(1786年),在殿前的朝克特诺尔湖边增建了80间楼阁式殿宇和钟楼、鼓楼以及四大天王殿。

清乾隆十六年(1791年),巴林札萨克从卓索图盟喀喇沁旗请来了一部蒙文225卷“丹珠尔”经,供奉大殿宇中。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从西藏出家的该寺葛根罕宾活佛罗布桑丹毕旺其格从西藏请来了一部108卷藏文“甘

珠尔”经,从此庙会规模日益扩大,当时昭乌达盟各庙每年轮流出五十名喇嘛来荟福寺念经。

荟福寺主佛像为“三世如来”,主要经卷为“甘珠尔”、“丹珠尔”经。荟福寺有巴拉其如德葛根(转世四代)和罕宾葛根(转世四代)两个活佛。还有一个呼毕拉干喇嘛(转世五代)。该庙喇嘛最多为清嘉庆年间,七百余名喇嘛。

据史料记载,该庙喇嘛乌兰嘎布其编撰过“万年历”一部。

1913年1月18日,在癸丑年战乱中荟福寺后大殿毁于火灾,殿内供奉的108卷“甘珠尔”经,225卷“丹珠尔”经和初建以来保存下来的各种经卷、典籍、经幢、佛像以及御赐的“荟福寺”三个大字的金匾均被焚毁。

1916年在原后大殿的旧址重建楼阁式殿宇49间,西则建陪殿三间,供奉“护法神”像。还向旗内牧民摊派白银5000两,在多伦塑三世佛、三圣佛、十八罗汉等供奉庙内。

1930年9月,九世班禅大师来巴林右翼旗传教,十月在荟福寺传经,闻讯来叩拜的远近王公贵族、平民百姓达万余人,班禅大师临走时将自己的像片和靴子留给荟福寺以示纪念。

荟福寺占地面积七千一百平方米。建有一个广场和两进庭院,整个建筑群以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形成一个封闭性建筑群,广场由照壁双狮、双旗杆和围墙构成,庙内布局为“山门”、“会经殿”、“供奉殿”三个主体工程组成。整个庙宇雄伟壮观,庄严肃穆,其规模和建筑技巧实为早清年间所罕见。

天王殿五间,楼三间。殿内两侧停立着高大泥塑的四大天王力士像:东北方为“东方持国天王”,手抱琵琶;东南为“南方增长天王”,手持宝剑;西为“北方多闻天王”,左手提银鼠,右手持伞;西南为“西方广目天王”,左手握长蛇,右手拿多宝。四大天王的脸谱分黄、绿、白、红,或足踏毒蛇猛兽,或脚踩妖魔鬼怪,个个甲冑森严,横眉怒目,大有逼人姿态。古艺人们用巧夺天工之手,把人物形象塑造得维妙维肖。

走过山门便是钟鼓二楼,两座楼左右对峙。高大的铁钟,外铸环纹,立书“康熙五十七年万岁万岁万万岁”阴文,两座楼均为四角攒尖,卷棚飞檐式。

荟福寺,占地面积 7100 平米,拥有一个广场和两个庭院、两个大殿。

一进大殿为“会经殿”,殿高二十米,占地面积为六百七十六平米,纵阔共四十九间。殿内有高大龙井柱四棵,矗立殿顶;彩虹抱柱三十四棵,盘绘着彩色蟠龙,殿外环廊米红抱柱二十八棵。整个会经殿的建筑风格是“重檐歇山式”,飞檐翘角,重梁柜档,方椽横栋相承,精雕门窗相连。大殿的正上,座落着鎏金宝顶,远远望去,在阳光的照耀下灿烂辉煌。正脊两端高卷鸱尾,垂兽、蹲兽、立兽、卧兽立于脊端角。重檐四角挂着掠雀铃,每当清风吹来,就会“叮冬、叮冬”地响起悦耳的铃声,更增添了庙宇的古香古色。“会经殿”的前檐上,还精画着三十六幅《西游记》故事的彩绘,画面生动逼真,笔意传神。正前门上悬挂着木制匾一块,匾周精雕金龙九条、匾上立书汉蒙藏三种的“荟福寺”三个大

字,格外引人注目。

二进大殿为“供佛殿”,殿高十八米,占地面积为一百二十平米,后殿及东西配殿的建筑结构与“会经殿”大体相同,大殿的藻井架上,倒悬着深蓝色的轩辕镜——御笔之匾三块。中为康熙帝书:“金枝衍庆”,左为乾隆帝书:“懿徽堂”,右为嘉庆帝书:“佛光普照”。“供佛殿”北墙木雕的佛龕上供着三尊铜像,通称为“三世佛”。这座殿东西墙的木架中藏经满架,每本经卷全由黄绸黄布包裹数层。东墙架上的二百二十五卷为《丹珠尔经》,西墙架上的一百零八卷为《甘珠尔经》。彩绘壁像和刺绣佛像,遍布殿中,更兼有传材、史材,列满桌架。殿内法器有锣、号、喇叭等不胜枚举……。

大板荟福寺是清代早期著名的建筑群,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宗教研究价值,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1966年“文革”中被造反派、红卫兵破坏,山门等殿堂被拆除、大小佛像被砸毁,各种经卷、画像、木匾都被烧掉,数百只铜佛被卖掉,一切法器被破坏殆尽。但是在今巴林右旗范围内清代大小十六个庙中,它在“文革”中仅存,而且是保存最好的一座庙宇。它对研究古代建筑艺术和佛教广泛传入巴林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1982年以来,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进行维修,1984年11月修了山门殿。

1986年被内蒙古自治区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巴林右旗旗委、旗人民政府从保护和抢救历史文化遗产,开发和利用人文旅游资源的角度出发,顺应信教群众的呼声,通过民间募捐、招商引资、政府投入等多

种融资渠道筹措资金 420 多万元,对荟福寺进行了全面修复,这次新建山门一扇、钟楼和鼓楼各一处,风格一致的殿房三间。两大殿外檐、六座配殿内、天王殿、钟鼓楼、山门外檐全部进行了彩绘。寺院内大小五个宝顶用特制的桐光油用含金 98% 的金箔贴制而成,使这座曾经享誉区内外民族宗教圣地——清代名刹荟福寺焕发青春活力,重新矗立在美丽富饶的巴林草原上。

巴林右旗博物馆馆藏瑰宝

刘志安

巴林草原从古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至今给我们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尤其以“红山文化”和“辽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北方文化最具特色。重要遗存有新石器时代那日斯台遗址、古日古勒台遗址、苏达勒遗址和以辽庆州庆陵及怀州怀陵为龙头的辽代遗存也十分丰厚。境内分布辽代城址十余处,和布特哈达、布敦花等契丹贵族墓地数十处。在这些遗存中出土了大量各类历史文物,其中不缺文物瑰宝,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介绍几件馆藏品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物。

辽凤衔珠银鎏金舍利塔:1988 年维修辽庆州遗址内仅存的释迦佛舍利塔时,在塔覆钵中相轮椽置五室之中室内出土。

据塔内密藏的银板陀罗尼咒“上京善友记”题记,推知此塔出自辽上京工匠之手。是用 0.3 毫米的银板分段捶揲,篆刻及铆固、焊接后又插接相联,由塔座、塔身、塔檐及塔刹等组成。塔表分别采用了错金或局部鎏金工艺,通高 42 厘米。塔座圆形重台式,底径 10.8 厘米,篆刻荷叶覆莲纹饰,上焊有六边形勾栏并篆刻花纹。塔身六边形,每面宽

2.6 厘米,正面刻饰塔门,门楣上祥云缭绕,两侧四面对称镌刻供养人,侍女各二,背面刻一赤足力士。镌刻线条流畅,人物形象传神。塔檐,塔顶覆钵联体,塔刹与其铆固。檐出瓦当排列有序,滴水以线条刻饰显示,瓦垄脊饰细微。塔刹以仰覆莲台作刹座,上置露盘,刹杆串以三珠三盖。刹顶饰一昂首展翅,双爪着于花盖之上的凤凰,喙衔 24 颗珍珠编缀的瓔珞。自第一华盖下分六根刹链与塔六角垂脊前端相连。华盖,塔檐转角和刹链上都悬系风铎。风铎方形,小巧逼真,共 32 件。塔座前单独嵌置一镀金立像,右手扶杖,左手托钵。

该塔造型典雅,工艺精湛,尤以塔刹结构作法与庆州白塔塔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一件珍贵的文物瑰宝。

辽观世音菩萨立像:1988 年维修辽庆州白塔时,在塔覆钵中相轮椋五室之南室内出土。塔内藏纸本雕印经咒 1 卷。由木雕覆莲,筒状薄壁像座和像身组成。通高 19 厘米,像高 7.1 厘米。像身由紫红色琥珀雕制,身修长、赤双足,双手托捧莲蕾于胸前,额中镶珍珠 1 颗。像雕琢工艺精细,惜发现时像身已断裂。雕饰在柏木像座外表的 1 条行龙栩栩如生,充分体现了辽代高超雕刻艺术。

酱釉莲池四鱼碗:宋代定窑珍品。辽庆州古城遗址内出土。该碗敞口、圆唇、斜腹、圈足、薄壁、体轻、瓷胎、纯白中闪黄、施釉晶莹柔润、无开片,釉薄处能看出胎上旋轮痕,隐现黄绿色,碗口为紫口,当为覆烧时所留之芒,其余部位满饰酱釉,釉色中闪现红斑,覆烧时流向足部。壁外光素无纹,碗内口沿稍下施两道与口沿平行的弦纹,余皆饰工整雅

素的印鱼莲主体纹和水波纹。印纹绝大部分为凸起的阳纹,线条纤细柔和。盛开的莲花,翻卷的荷叶,蔓茎缠绕,又有三叶三花互生于莲茎,间以飘蓬的浮萍,水波翻滚,鱼不相融。三鱼溯水而上顺向追逐。在漩涡中莲花下游弋,一鱼沉入水底,在荷莲中静息。布局充实,层次分明,密而不乱,静中有动。碗口径 16.5 厘米,底径 5.5 厘米,高 6 厘米。

酱釉莲池四鱼碗,无论在造型,釉色,还是印花等方面都十分精美,是我国瓷器业高度发展的杰作。

牡丹花长颈瓶:1985 年巴彦尔灯苏木和布特哈达辽墓中出土。该瓶杯形口,微卷沿、侈唇、长颈、丰肩、腹至底直收、圈足、缸瓷胎、淡黄白色,颈上中部有一道凸弦纹,腹部采用剔地法刻出一对牡丹花图案,花叶分明,美丽逼真,腹下直收部分有三道平行凹弦纹,器表通体施白釉,釉先润明亮。通高 52.8 厘米,口径 13.8 厘米,底径 10 厘米。

牡丹花长颈瓶,不仅造型优美,工艺独特,而且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表现出辽王朝各民族崇尚自然的美好意境,同时也反映了辽代制瓷业的蓬勃发展。也充分体现出这件器物是世上非常难得的精品。

以上介绍的四件出土珍贵文物,对研究宋辽时期的政治生活,文化交往及银瓷器制作工艺等都有重要价值,同时也表明了西拉沐沦河流域在历史上草原广阔富饶,河网密布,资源丰富,是游牧民族栖息,生活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域。

清巴林康熙行宫简介 及建筑示意图

绘图 道尔吉桑布

简介 雷惠田

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秋季。位于大板镇中部,现巴林右旗人民政府院内东部。

当时康熙皇帝为达到其“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又能为远驰塞北看望其下嫁巴林的次女固伦荣宪公主,所以建筑了这座“大板行宫”,以备巡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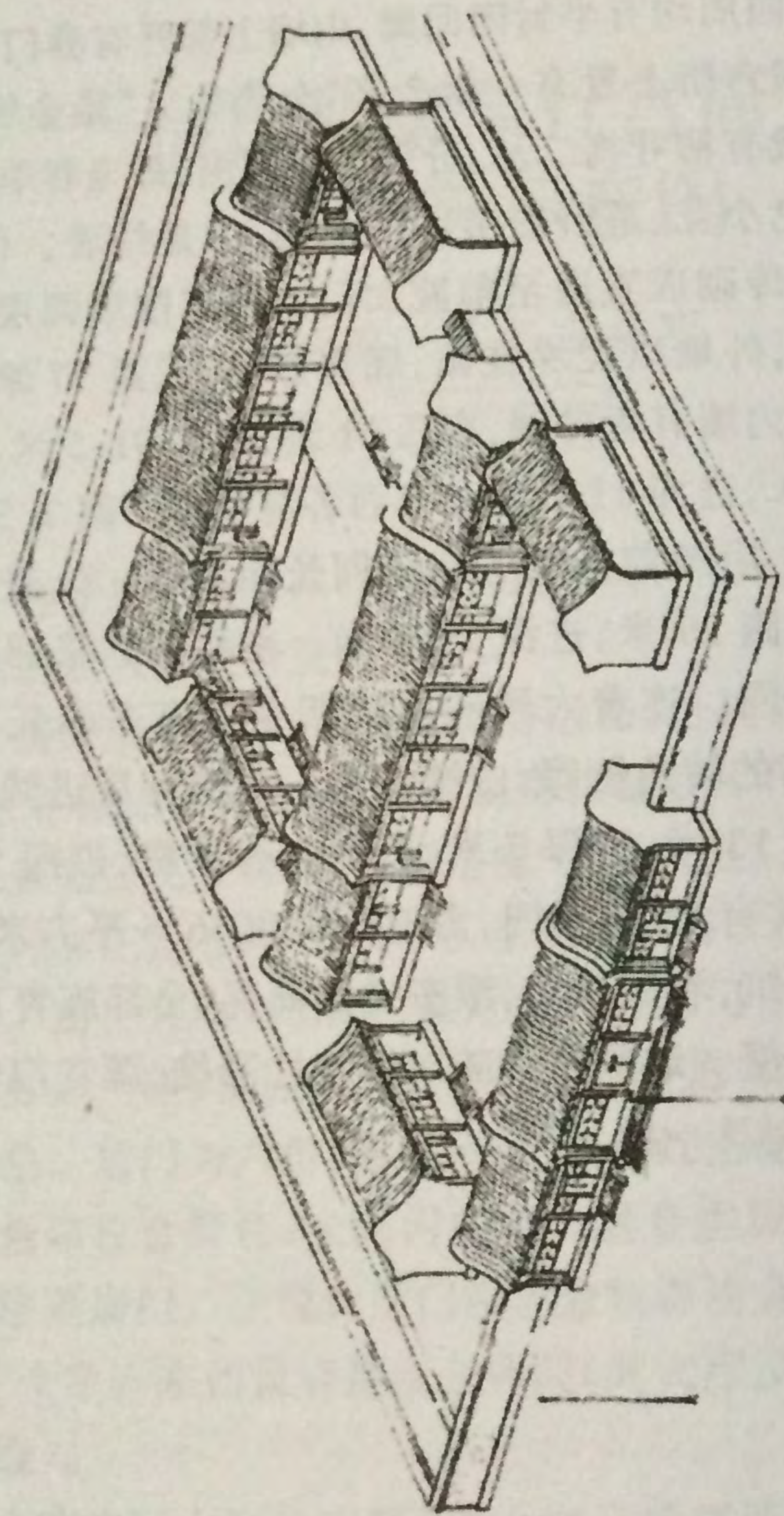
行宫正殿五楹三明两暗,东西掖室各二间,东西配厢各三间。前正大厅为七间。正厅屋内北正门立有硬木深蓝底雕花屏风一座,在屏风上雕绘有五条金龙戏珠图案,龙头悬空舞角。后门为六角,通过抱厦,系用红抱柱,东北、西北厦檐角悬两枚金黄色、光闪闪的斗大鎏金垂珠。西、北、东围以蓝漆隔扇门。据说此厅门额上悬块棕漆金匾,上书“议政厅”三个字。东西设有掖室各两间(此大厅及耳室日伪败降前焚毁)。

前院东西山室各三间(西山室日伪败降前焚毁),东山室一九七四年被拆除。

大门三间,东西各设有掖室两间,七级石条台阶(1972年改修旗招待所时,被拆除)。

后殿庭院四周均有半封闭回廊,山墙上都开有券门,环绕全院,后大殿台阶上置有一米余高“金鸡独立”鎏金铜质仙鹤一对,并栽有柳叶梅二丛,分别甬路两侧,每逢春季,枝叶茂密,浅粉色小花,盛开时节团花似锦,煞是好看。甬路是用石条及方砖砌成直通至前院大门。行宫围墙两层,内墙以青砖砌垒,外墙以泥垛挂帽,底宽五尺,东西77米,南北104.5米。内墙有青砖墙,东西51米,南北91.5米。后大殿面阔21米,进深11.5米。东西各有掖室面阔7.5米,进深10.5米。后殿前东西各有陪厢长面阔13米,进深8米。前大殿面阔29米,进深11.5米。东西掖室陪厢同后殿面阔进深相同。连着大殿和陪厢四角各有7米长、2.4米宽、3.3米高的转角游廊,由游廊进入廊檐环后进院落一周。门房面阔13米,进深7米,两侧各有耳房,进深5米,面阔10米。共有房屋77间,占地面积8046.5平方米。

这组古建筑,卷棚单檐,滚垄脊圆筒瓦,全部施青灰瓦,前出廊檐后出厦。墙壁是磨砖对缝漆柱彩檐,雕花门窗,显得端庄素雅,别具一格。



巴林右旗大板康熙行宫建筑图

清巴林右翼旗札萨克府邸

——沙巴尔台王府简介及建筑示意图

绘图 道尔吉桑布

简介 恩和巴图

清顺治五年(1648年),根据清朝组织体制和行政区划把原来的蒙古巴林部分割为左右翼两个旗,各旗中派札萨克掌管旗政。两个旗的札萨克在各自的旗内选定驻地,安营扎寨,修筑王府和札萨克衙门。巴林左翼旗札萨克色布腾驻阿钦套勒盖山南麓,巴林右翼旗札萨克色布腾驻套白山南麓。不久在大板建造王府,当时根据地形和村落聚集情况将大板分为上中下三个拜升,王府建在上拜升。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王府迁至旗北50华里水草相连、风景优美的沙巴尔台河畔。在那里建造了王府和札萨克衙门,这就是如今的沙巴尔台王府。沙巴尔台王府有前后两个殿堂组成。整个府邸占地面积14080平方米。东西宽88米,南北长160米。用大青砖砌成两米高的院墙,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大门。南侧是正门,门前有两个旗杆,旗杆前有一高2米、长9米的影壁墙。王府东侧隔一胡同是札萨克衙门。衙门北侧有一个较大的马圈。

王府由前后两个庭院组成,前殿庭院南侧是王府的正门,正门三间,中间是通往前殿的门,两侧为门卫,正门两侧各有两间掖室,均为卫兵的住处。

由正门进入前殿庭院,前正殿为五间,是王府的议政殿,西侧各有三间配殿。议政殿两侧各有通往后殿庭院的一个小红门,由小红门进后殿庭院最前面东西两侧各有三间正房,均为王爷侍卫和仆人的住处,两栋房中间有较大的莲花池,后大殿为五间、配有两个掖室,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三间配殿。正殿两侧室为札萨克旗印堂,正殿为王爷的办公地方,东侧掖室为王爷的寝室,东西两侧配殿为客厅。正殿前有两座十个“哈那”的大蒙古包。后殿庭院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小院,各有通往两个小院的小门,由西门进入西院两侧配有两间耳房的三间正房,是福晋的寝室。由东侧门进入东小院,两侧配有两间耳房的三间正房,均为王府的食堂。

沙巴尔台王府在民国初年(1913年)在战乱中被毅军烧毁,后院全部被烧净、前院也遭到了严重破坏。现在仅存残缺的前殿和东西两个配殿,是旗级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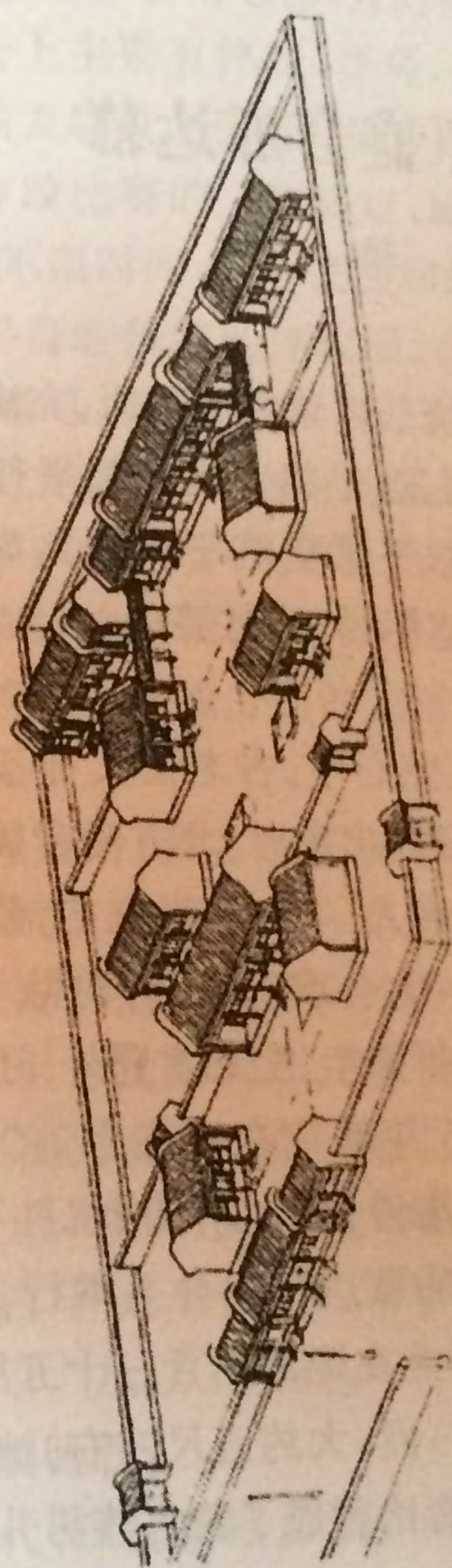


图
巴林右旗沙巴尔台王府建筑图

草原盛会那达慕

穆松

广阔无垠、美丽富饶的内蒙古大草原，充满诗情画意和欢乐。早在七百多年前，这里的人们就曾举行富有民族风情的那达慕大会。届时，平素空旷宁静的大草原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彩旗飘扬，欢歌笑语，人头攒动，万马奔腾。

那达慕在蒙古族人民心中，古老而又神圣。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传汉代王昭君出塞时，北方马背民族就举行了盛大的那达慕迎接这位名人。在13世纪初，蒙古族的首领们每当举行“大呼拉尔”（大会或大聚会）时除了制定法规、任免官员、总结过去、安排来年、奖惩赏罚外，还要举行规模宏大的那达慕。据1225年铭刻在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载，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刺子模，为了庆祝胜利，在哈布齐海地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那达慕。会上举行了摔跤、赛马和射箭比赛，他的一个侄儿在距离三百三十五度远（度——成人两臂手体的地方为一度，大约五尺左右）地方射中了目标。从此摔跤、赛马、射箭比赛成了蒙古族男儿必须具备的三项技能，也成了草原盛会那达慕的固定形式，蒙古典籍《蒙古秘史》和蒙古族文学巨著《格萨尔》及其它民间史诗对

那达慕盛会都有过描写。蒙古族人民一般在秋高气爽、水草丰茂、牲畜膘肥体壮的七、八月间举行大规模的草原盛会“那达慕”。会上主要有摔跤、赛马、射箭、拔河、蒙古象棋、民族歌舞表演及物资交流等传统项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摔跤比赛。摔跤比赛的规则规定，膝盖以上任何部位着地都算输，比赛不限时间，不分民族和地区，不分体重，一跤定胜败。摔跤手身着传统的摔跤服，在传统的摔跤歌声中跳跃上场、相扑争斗、盘旋相持，观众不断对优胜者喝彩助威。

元明两代文献记载，当时的那达慕祝颂词中说：“得心应手的马头琴声悠扬动听；洁白无瑕的哈达闪闪发光；传统的三项那达慕接连不断；蒙古族力士们整对上场。”14世纪记述的蒙古族风俗习惯方面的文献中详尽地记述当年那达慕的盛况。

那达慕开始时，蒙古族长者举起盛满鲜奶的银碗和哈达，朗诵祝颂词。祝颂词中有那达慕祝词、有射箭祝词、摔跤祝词等多种。射箭祝颂词中说：你擎起万钧弓啊！搭上了金色利箭，引弓犹如满月，“啪”地撒放扣环；你能射倒耸立的高山，你能射穿飞翔的大雁。啊！祝福你啊！生铜熟铁般的大力士。”在那达慕会上，蒙古族牧民穿上节日盛装，骑上最好的骏马，赶着传统的勒勒车，一家一家地聚集到一起来分享欢乐。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那达慕在蒙古族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

到了清代，那达慕逐步演变成了官办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游艺活动。其规模、形式、内容较前均有发展。当时的蒙古王公贵族以盟、旗、苏木为单位每一、二年举行一次那达

慕。对摔跤、射箭、赛马男儿三项竞技优胜者分别给予马、骆驼、羊、砖茶、绸缎等奖励。但当时由于王公贵族的操纵，那达慕大会上经常由王爷的摔跤手、赛马手和射箭手获得冠军，普通人几乎与冠军无缘。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那达慕才真正成为广大牧民自己的盛会。每到七、八月间内蒙古大草原都要举行那达慕盛会。如今的那达慕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变化，除保留传统项目外，又新增加了乌兰牧骑演出，插放电影，插放录相，经济贸易，物资交流洽谈，举办各项展览，表扬劳模等各种内容。

举行盛会那达慕的传统男儿三项竞技搏得了观众阵阵喝彩和掌声；那多姿的民族歌舞表达了草原人民的勤劳勇敢和豪爽热情性格，那范围广泛、经贸洽谈、物资交流，将草原资源优势和发展前景介绍给海内外的宾客。那达慕大会为走向 21 世纪的草原人民描绘出激奋人心的画卷。

当万家灯火齐明，悠扬的马头琴声划破夜空，在草原上飘荡时，各种活动场所不时发生阵阵欢声笑语，青年男女，在马头琴声的伴奏下，互相歌唱着建立起真挚的友谊和爱情，陶醉在美妙的诗情画意之中。

佛教对巴林民俗民情的影响

撰文 穆松

译文 胡·斯钦毕力格

巴林部是同北方蒙古部落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的古老部落。巴林部自古以来在广阔的草原上一年四季选水择草游牧，运销生意、狩猎生产为主的纯朴坦率而勇敢的民族。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深受氏族社会及萨满教的影响，后来在蒙古族统治阶级推行政教并举，以宗教治理蒙古社会的方略之下，巴林蒙古民众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上产生了诸多变化。

佛教传入巴林，史料记载的最早时间是蒙古林丹汗时期。大约是在公元 1592 年至 1634 年间；公元 1618 年从西藏前来蒙古传播佛教（喇嘛教、也叫黄教）的夏日巴呼图格图在察干索博力嘎城内（即今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辽庆州古城）建造“大神变塔”和“天降塔”并刻立经碑；可见夏日巴呼图格图深受蒙古林丹汗的敬佩和厚爱。林丹汗在察干城内举行隆重仪式，迎接夏日巴呼图格图，并授予他“瓦其尔达日呼图格图”之称号。他为了进一步得到林丹汗的信任和重用，在蒙古地区弘扬佛教，专门从五台山请来一尊用

60斤黄金铸成的“玛哈嘎拉佛”像，敬赠给林丹汗。与此同时还请来精通佛经的贡嘎敖斯尔班迪丹古希为首的33名喇嘛，在1628年至1629年间将108卷的《甘珠尔经》译成蒙文，并在汗廷传经。此外，夏日巴呼图格图在察干城内塑造释迦牟尼佛像，刻立经碑（石碑今已无存），为在巴林地区弘扬佛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林丹汗把他的玉石印章，玛哈嘎拉佛像，金质“甘珠尔经”作为他的三大法宝。从此，林丹汗成为在蒙古地区、蒙古民族中传播佛教，信仰佛教的创始人，也是殃害本民族的祸根。

公元1893年6月俄罗斯蒙古学家阿·玛·波德涅耶夫先生前来巴林进行考古时亲眼目睹了刻立经书的石碑，并将碑文记录下来，后来编入他所编著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这是在巴林传入佛教的最原始的记载。

虽然在林丹汗时期佛教传入巴林，开始修寺建庙，蒙古上层建筑逐步创造环境和条件实施以宗教治理蒙古民众的目的。但当时在巴林广大民众中传播佛教的历史条件、社会空间较差，因而他们继续信仰萨满教，坚持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1634年林丹汗逝世后其儿子额尔和洪格尔继纳他家传瑰宝——玉石印章、玛哈嘎拉金佛像，前去盛京（今沈阳市）投奔大清皇帝之后，在蒙古地区基本不存在信仰佛教的环境和条件。

自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在蒙古地区重新兴起佛教活动，作为佛教的一个重要支派——黄教广泛传入了蒙古地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信仰黄教，以其支撑自己的精神支柱，以其支配自己的思维，以其替代本民族的民俗风

情。统治者初步达到了以黄教治理蒙古民众的预期目的。

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清朝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征服了大漠南北蒙古各部以来，清朝统治者为了长久安抚边疆，采取了“南不封王，北不断姻”的策略，将皇廷的不少公主、格格下嫁给蒙古王公贵族、以亲情诱惑他们的心思，以亲近关系消弱他们的意志，与此同时让广大蒙古民众提倡“如这辈子受苦贫穷，下辈子必会富贵；这辈子受穷当奴才，下辈子必当高贵人”的空虚的理念，以此来制约和束缚蒙古民族的智慧的心灵和勇敢的志气，致力拉进空空教徒的死胡同。

清朝统治者本身不信仰黄教，但深知黄教对蒙古民众的影响和约束，便在蒙古地区实施大兴黄教的重要策略。统治者深谙制服蒙古民众的真谛，即以佛教教义束缚蒙古封建主的思想 and 行为。他们意识到蒙古民族很容易接受黄教教义；舍弃今生今世，寄托转世未来，一心一意遵循教规，不顾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于古老而落后的生产（游牧）方式，无言无语顺从统治者。并且察觉到在蒙古民族中大力发展喇嘛僧众是能够减缓或控制蒙古民族人口增长的独一无二的上策绝招。之所以他们在蒙古地区大力修建寺庙、广招喇嘛僧众的同时推行鼓励所有适龄男童进驻寺庙、念经当教徒的恩慈政策，清朝乾隆皇帝对此曾一语道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以不保护之。”

清朝实行以黄教治理蒙古民众的重要策略以来，黄教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其影响力愈来愈广大。

蒙古民族是自古以来以智慧和勇敢征服欧亚两大洲的

“马背民族”，这一历史事实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作为蒙古部落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巴林蒙古民众从不信仰佛教的真正的“哈日巴林”这是具有历史考证，但在清朝统治者的“恩慈、安抚”的谋划之下大兴黄教、广招喇嘛僧众以来，巴林蒙古民众开始放弃“萨满教”的信仰及敬信“大自然”之意，之所以在他们纯真的思维和坦率的性格中产生了诸多的变化。

清顺治五年(1648年)固伦淑慧公主下嫁于巴林右翼旗第一代札萨克辅国公色布腾，从此大清皇帝的“金枝玉叶”在巴林开花结果。按照固伦淑慧公主的旨意派遣专人赴青海，给达赖喇嘛敬赠礼物及敬函，从青海查巴其亚拉寺邀请额尔德尼嘎巴楚罕布喇嘛，到巴林主持佛教事宜。在这期间固伦淑慧公主指派额尔德尼嘎巴楚罕布喇嘛前去北京，动用一千两黄金铸造一尺高释迦牟尼佛像和一尺高的金质塔运来。不久于康熙六年(1667年)在查干沐沦河北岸朝格图敖日格勒地修建三间寺庙，在此祭奠金佛和金塔。并把额尔德尼嘎巴楚喇嘛封为巴林右旗首席札萨克喇嘛，令其全权掌管全旗教务。在查干沐沦河北岸朝格图敖日格勒修建的这座寺庙是在巴林首建的宗教寺庙——“圆荟寺”，俗称西大庙。

清康熙三十年(1691)固伦荣宪公主下嫁巴林郡王乌尔衮(乌是巴林札萨克郡王色布腾，固伦淑慧公主之亲孙子)；乌尔衮在征战噶尔丹期间荣立大功，所以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被封为巴林札萨克郡王。荣宪公主秉承清室的愚民政策，驱使蒙民大量信崇佛教，仿照“圆荟寺”的规模型

式，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在公主府东南修建“荟福寺”；并在荟福寺东南修建大型葛根仓，又在庙四周修建喇嘛住所一百多间，因而崇信佛教之人争先恐后，喇嘛僧众日益增多，从此巴林右旗王府所在地大板成为全旗政治、经济、宗教信仰活动中心。在巴林随着黄教传播力度的加大，全旗各地兴起了修建寺庙的热潮，先后修建的寺庙有圆荟寺，荟福寺，阿贵庙，古里古台庙等四大寺庙，紧接着又修建了洪格尔庙，新庙，会庙，东拉新希里庙，西拉新希里庙，要尔图庙，珠腊沁庙，苏布敦庙，伊马图庙，嘎拉德斯太庙等十五座中小型寺庙。《巴林志》及其它资料俗称巴林十三座寺庙，因为宝日嘎苏台庙和伊马图庙不包括在内。后来在大板先后又修建的娘娘庙、关帝爷庙等汉式寺庙也在出现。随之而来各地寺庙的众多喇嘛僧众们制造名目繁多的佛像，其中有以金银铜铸造的，木材石料雕塑的，布料纸张画的，削的，刻的，五花八门、样样齐全。此外，全旗寺庙的主持喇嘛奔赴遥远的青藏引进“甘珠尔”、“丹珠尔”等精典佛经，填置寺庙设施，发展寺庙苏鲁格牲畜，定期举行法会活动，继而黄教空前盛兴，浩浩荡荡，史无前例。从此，绝无任何信仰的真正的“哈日巴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黄教之徒。巴林诸多寺庙中祭祀的主要佛像有释迦牟尼，美代尔、宗喀瓦、菩萨、拉穆、纳木萨来，纳穆达嘎，德木奇格等。巴林四大寺庙均有三个以上拉桑；寺庙的拉桑越多，说明该寺庙的地位、势力及资产越雄厚。寺庙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扎普喇嘛、拉桑喇嘛、葛布会喇嘛、葛由格喇嘛、德木其喇嘛、敖恩布喇嘛等有职有权的喇嘛来主持完成。每日三次念经会，每月定

期诵经会及信徒民众捐赠贡献的金银财物都由他们来掌管支配。巴林寺庙的诵经会、查玛会等“法日”活动安排的规矩是：大年正月初一各个寺庙都举行诵经团拜会，初二多数寺庙念祭神经。从正月初八至十五旗四大寺庙都举行新年“余热勒”（祝福）大会；正月十五日晚用黄油和面粉制作赛罕山和巴彦罕山“山神”塑像祭供。随着佛教法事活动的盛兴，前来参加法事的人员及观众逐年增多，他们都穿着高档的民族服装、打扮的五彩缤纷，骑着骏马，兴高采烈、云集在一起。从而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相互比阔气、比气派的一种风气和习惯。

从农历三月初八开始各地寺庙都举行“玛尼经会”；在大殿里诸多喇嘛夜以继日轮流念“玛尼经”，持续七昼夜，在这七天之内信徒民众纷纷捐赠奶食等食品。

从农历四月初八至十五旗四大寺庙都举行“弥克索木经会”，经会的议程及形式除三月份的“玛尼经会”基本相同之外，十五日这一天跳弥拉查玛舞；这一弥拉查玛舞会是整个一年法日活动中比较盛大而重要的庙会。所以各地信徒民众们纷纷前来敬供佛像并观赏弥拉查玛舞，也是对前来的观众来说互相拜见远近来的亲朋好友的同时，在众多的观众中探视人家的大姑娘或小伙子，为子女说媳妇、找女婿成家立业打基础的好机会。

每年的农历六月初七至十五旗四大寺庙举行盛大的“余热勒大会”（祝福大会）；“余热勒大会”是整个一年的“法日”活动中规模最大、观众最多、内容诸多、影响深远的一次活动。把过去旗四大寺庙都同时举行“余热勒大会”惯例；

后来改为集中到大板，在“荟福寺”举行。“余热勒大会”的最后一天即十五日这一天锣鼓喧天，香烟缭绕，格外繁华。巴林旗的“余热勒大会”可以说是整个东北、华北地区驰名的。在这一“余热勒会”期间从北京、天津、沈阳、吉林等地前来的商贩进行物资交流商品交易；有的开餐饮饭店，有的开小商品店铺，有的开服装鞋帽、布匹、缎绸门市，有的开活畜交易市场。在这期间文艺活动的内容也相当非凡。巴林王府的歌手、琴手，舞蹈演员给王宫贵族，活佛喇嘛专场演出文艺晚会，此外从北京、天津、沈阳、吉林、通辽等地来的京剧团、马戏团都要演出，随之而来的还有耍猴耍饭的、耍钱赌博的、算卦骗人的、卖淫嫖娼的、贩毒敛财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据资料记载，在这巴林六月“余热勒大会”期间来自乌珠穆沁、克什克腾、阿巴嘎、苏尼特、阿鲁科尔沁、翁牛特等地来的客商进行活畜及畜产品交易的相当非凡，有的年份成交额高达七十万两白银。

在这“余热勒大会”上前来的旗，努图克的官爵们参与大会的整个活动的同时结算上一年度的税费帐单，摊派部署下一年度税费征收任务，裁决处理民间纠纷案件，并向旗衙门汇报上一年度工作情况，领取下一年度税费指标等任务。

在“余热勒大会”上由旗衙门轮流安排诸位官爵主持整个庙会及摔跤、赛马、射箭等蒙古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并奖赏优胜运动员。

农历七月份旗四大庙均举行“亚日乃经”会，每个大庙都由十多名喇嘛念“亚日乃经”四十五天。

从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各大庙都开“经会”念四天经,消除过去一年当中的一切灾难及疾病,祈祷佛爷神仙保佑在新的一年里平安无事、万事如意,由此来圆结一年来的各项“法事”活动。

各地寺庙的这类“法事”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仅巴林四大寺庙之一的古里古台庙的旧帐本中记载,在新年伊始的一天“经会”的后勤伙食上用一头牛肉,五斗粮食、一肚包黄油,一块砖茶,七牛车柴禾。

在能当上喇嘛如同“筑金塔”;“今生享乐,转世成佛”的空空教经的诱惑和不当兵服役,不当奴隶差人,不纳税费等优待“恩仁”之下,广大民众如有两个儿子,其一必当喇嘛,如有三个儿子其二必要当喇嘛,甚至有的将传宗接代的独生子都送进大庙当喇嘛的为数也不少。如查干沐沦珠腊沁艾里有一家七个儿子中六个儿子进驻寺庙当喇嘛。当时有知有识者认为“让儿子当喇嘛如同舍弃一个儿子,多留一头牦牛;如同丢掉一头黄牛”万般无用。所以不愿让儿子当喇嘛,但在整个社会的压力和逼迫之下无奈顺从者多的很。俗话说:“人随王法、草随风”。有的人一心一意信仰佛教,把一切寄托在神仙大佛的“恩赐”和保佑,将儿子不到六、七岁就送进寺庙当喇嘛。有的不顾自己年老,剃掉头发当喇嘛,遵循教法庙规者也多的很。有的遁入空门“修仙得道”,一心一意信黄教,信仰神仙,夜以继日年复一年磕头念经,奔赴遥远的青藏,孟和召,拉巴楞,贡贡等地进修佛经,以空虚的佛经武装头脑成为“空空道人”,荣获至高无上的职称或称号,得不偿失而“得胜回朝”的也不计其数。蒙古族伟

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尹湛纳希曾指出:“我们整个蒙古族导致衰落的主要原因就是追求高贵、追求平安享乐……而走向没落,一心欲成活佛,反而成了混子,且无感觉,欲成佛者则皆能成也?”巴林右旗文教战线的先驱者关布扎布先生曾报道过一篇报道,其中写到“伪满康德五年(1938年)珠腊沁树北艾里有45户,56名喇嘛,其中有的人家把独生子送到寺庙当喇嘛,因无人传宗承接,成为绝户的就有七八户。有资料显示,乾隆二年大巴林的寺庙喇嘛不到500人,而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旗寺庙的喇嘛发展到4000余人。占男性1/4之多。他们是不劳而获者,三个男子汉养活一个喇嘛,这是惊人的数据、惊人的证据。

巴林人自古以来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真正的“哈日巴林”,但由于清朝统治以来在他们致力修建寺庙,极力盛兴佛教,结婚成亲,恩慈治理的诱惑策略之下巴林民众真正成为佛教之信徒,大清之顺从者。从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社会活动中佛教迷信渗透的极为广泛。他们移营搬迁请喇嘛看风水选日子;生孩子请活佛喇嘛起名字;操办红白喜事请喇嘛念经定日子;家人、牲畜患有疾病也请活佛喇嘛念经破绽,连聚会请客,出门远征都请黄教喇嘛来念经祭天祭地,祈祷神仙保佑等行为已成习惯不可弃。

王公贵族、贝勒、贝子等官爵者或富贵人家都有祭奠的专职喇嘛,一般的家庭也每月专程去一次寺庙请喇嘛来完成当月的祭奠事宜。包括念“阿拉坦格日勒”,“查干岫德尔”,“宗迪”,“札东嘎”等法经。平民百姓甚至“缺吃少穿”的微薄之力的贫穷百姓也都在家里供祀两三个佛像,有必

要时还克服一切困难,请喇嘛来念经,供祀神仙保佑的也有之。此外在巴林还出现杀鸡祭奠“额吉德九神”的;拿猪头祭奠“关帝庙神”的;以布鞋供祭“娘娘庙神”的;以粘糕祭奠“火神”堵嘴的等等佛教活动的产生都格外有趣。从而习以为常地认为“佛神随时随地能够保佑他们”;只要遇到意外甚至惊吓恐慌都很自然地念叨“佛神保佑”,“喇嘛”保佑等口头语;连儿孙在玩耍当中恐慌惊吓时都念“玛呢经”,祈祷佛神来保佑。

巴林蒙古民众是自古以来从无任何信仰的天真坦率、气势勇敢的蒙古部落之一。但在大清朝的统治之下,顺从他们的以“佛教治理蒙古民众”的执政宗旨,接受他们的“恩慈安抚”的诱惑,成为忠诚的教徒,把一切寄托在神仙保佑,弃掉今生今世,期盼转世享乐,忠于皇上,祈祷佛神的喇嘛僧众,平民奴才。从而失去了精神支柱,心神不定,心绪紊乱,沉浸在空空没落的死海之中,挣扎在贫穷绝望的环境当中受尽饥饿、疾病的极度折磨,渡过了大清朝统治的几个世纪。对此大清朝乾隆皇帝弘历曾兴致高谈道“丧失主权,失去主见,无知无觉,安然无欲的活塑像”。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为何痛定思痛也;因为这是受欺的历史、痛苦的历史;所以有知者返思内疚,有志者有意弥补昔日失去的一切。

蒙古民族服饰的形成和演变

穆松

衣冠服饰,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反映,是人类不断认识物质世界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四要素中,总把“衣”放在首位。

蒙古民族服饰是反映蒙古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标志。它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一直为蒙古族人所喜爱和沿用。

蒙古服饰以自己的独特的款式、风格和精美的工艺特色,立于我国乃至世界服饰之林而经久不衰。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对蒙古民族服饰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进行研究和仿制,甚至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以穿着蒙古民族服装为荣。这一切都说明蒙古民族服饰有着历代文明的影响和传统的高超技艺。

蒙古民族是在历史上留下深刻足迹的亚洲古老民族。它曾在我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对世界历史也产生过巨大影响。蒙古民族服饰的起源、形成和它的演变与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以及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蒙古民族服饰是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的部

分。从上古至蒙古大帝国,从元、明、清到现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蒙古族人在长期的生活积累和生产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不断吸收兄弟民族服饰之精华,逐步完善和丰富自己传统服饰,从款式风格、面料色彩、制做工艺等,创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精品,为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公元13世纪初,当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结束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蒙古汗国之后,蒙古高原毡帐诸部在为民族整体和政权整体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同时,使蒙古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尤其是在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今北京),建立元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作出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蒙古民族服饰作为当时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标志,在服饰种类、款式、面料、色彩、缝制工艺以及服饰制度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

元初,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和版图的扩展,欧亚两洲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云集蒙古地区,对蒙古民族服饰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贵族们讲究起华贵的服饰,用北方草原的稀有珍贵的皮毛和南方的绫罗绸缎以及所获取的金银珠宝,制作起各种华贵的服饰。其种类主要以栖鹰冠、卷云冠、立领式长袍、交领式长袍、革靴为主,在面料、色彩等方面主要以稀有珍贵皮毛,青、红、蓝、白色织锦为主,其中各种皮制衣物占多数。元代以后蒙古族服饰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前檐帽、钹笠帽、立领大襟袍、短披肩、马褂、络缝靴子等都是在吸收兄弟民族服饰之优点的基

础上发明创造的,在面料、色彩、纹样等方面又有了黄色金锦、褐色毛呢等,衣物绣纹有日、月、龙、凤纹等。

元末明初,在广阔的漠南漠北依然保留成吉思汗黄金贵族政权,史称北元。北元初由于蒙古封建君主与明王朝长期对峙,加之蒙古封建贵族内部相继出现了争权夺位的动乱局面,从而使蒙古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后来由于达延罕巴图蒙克统一蒙古诸部。蒙古地区的政局才有了稳定的局面。继而由于其后的阿拉坦罕与明王朝订立贸易关系,以及蒙古族与维吾尔族、藏族、女真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为蒙古民族服饰的继续发展带来有利条件。这时的蒙古族服饰,除了原有的款式外,还增添了不少新款式,如扎达盖、车得格、拉布西格、温吉拉嘎等都是元代没有的新款式。当时的蒙古族妇女不但缝制以皮毛、布绵为原料的多种服饰,而且善于刺绣。所绣、贴、抠的花叶和各种图案辉映在她们所缝制的各种服饰上。这个时期与元代相比,在保留和发展传统款式的前提下,各部落的服饰出现了各显其能、各行其式的趋向。

16世纪末,漠南漠北和漠西的蒙古封建势力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正当蒙古封建领主们相互争斗而衰惫的时候,在他们的东部崛起的女真族新兴政权,对整个蒙古封建势力构成了严重威胁。满族皇帝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首先收服了科尔沁部,继而征服了漠南蒙古各部,接着利用漠南蒙古封建势力又征服了漠北喀日喀蒙古。从此,蒙古民族结束了长期封建割据的局面,走上了又一个历史发展时期。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蒙古民族的控制,对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和八旗制。清政府为了利用蒙古封建势力,确保北部边境的安全,根据不同的行政体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这就是根据蒙古封建主原有的地位的高低和对清廷效忠程度以及功劳的大小,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和一、二、三、四等台吉等爵位,并按清朝服制,指定品官冠服。除此之外,清廷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满蒙上层的联系,除了大封王公贵族之外还采用和亲的方法,娶蒙古贵族女子为皇后,并把满族的公主下嫁蒙古王公贵族,从而出现了满蒙服饰混杂的繁琐服饰变化,如文武品官服饰,有朝冠、吉服、端罩、补服、朝服和蟒袍等,其服制等差,视其冠帽顶子、蟒袍以及补服纹饰而区别。

在巴林,平民的衣着款式过去是袖瘦长下摆肥大不开歧,腰带宽厚,穿上为衣,脱下为被。到了清代巴林人的衣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是清廷服饰的严格款式和清廷两个公主下嫁巴林时带来 540 户,以及巴林旗的王、公、台吉每年轮班进京朝觐等有关。清代在巴林首先是从王公贵族开始脱掉了传统的蒙古袍,穿上了清朝制服,戴上了朝冠。接着贵族妇女们脱掉了宽大的蒙古袍,换上了挽袖长袍和坎肩,款式为短袖、宽肥、镶红边。头发盘结、插簪,挂耳坠子,冬季胳膊套有纳着花边的缎布羔皮套袖,头带五彩飘带的缎面皮里绣花护耳,足着绣花靴子。巴林男子也开始穿上了开歧的蒙古袍,外套短袖马褂,发绦系黑丝绒带穗头绳,头带顶红缨、出帽檐的园筒帽等。

清代蒙古服饰在种类、款式、面料、色彩等方面出现新的发展变化的同时,在缝制工艺方面已有了独立的裁剪工艺、缝纫工艺、刺绣工艺、镶边工艺和图案工艺,基本上定型。立领长短坎肩取代了蒙古汗国和元明时期的高领式长袍和半袖长袍,富有地区特色的长袍,长短坎肩和帽靴的式样越来越丰富起来了。

近代,蒙古民族服饰出现了三种变化。其一,随着农业经济在蒙古地区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地出现,蒙古民族服饰有了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的区别。其二,随着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出现,蒙古民族服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如:戴礼帽、穿西服、马靴等都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至。其三,随着时代的发展清帝退位和蒙古封建势力的削弱,清朝服饰等级逐渐趋于消亡。贵族和庶民的服饰基本接近,庶民只要有钱也可以穿戴华丽的服饰,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跨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蒙古民族服饰消除了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种种不平等的印迹,现代民间服饰以崭新的面貌,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蒙古大地上,为广大蒙古族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增添了时代所赋予的风采。这一时期,随着蒙古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艺术事业地发展,各地区蒙古服饰出现了具有实用和审美相统一的新的发展变化。各地区的服饰,不但承袭各处的传统特点,而且在服饰种类、款式风格、面料色彩、缝制工艺等方面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吸收新式服饰的可取之处,从而形成了现代蒙古民族服饰的典型款式。其中长袍类、

帽子头巾类、裤子靴子类、装饰类和发型出现了相互统一的趋势。同时,过去盛行已久的男女冠饰、头饰、套装和佩带物等,日趋简便适体,有的已被新式服饰所取代。近年来,内蒙古各地举办的蒙古民族服饰展览,也起到了沟通信息,进行审美教育的作用。人们通过展览和服装模特儿的表演,进一步了解到各地蒙古民族服饰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对设计制作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服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蒙古民族服饰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沿革是与蒙古民族本身走过的历史、所处的自然环境、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他们的心理素质、审美观念密切相关。

蒙古民族服饰作为蒙古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它有着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独特款式风格和代代相传的生命力;二是蒙古民族服饰千百年来始终与蒙古族人相依为命,从不间断地延续着、发展着……所以,蒙古民族服饰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必将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普及兴盛。

简述释教在昭乌达草原的传播与影响

王兴贵

一、蒙元时期的释教与其它教派

蒙古国时期和元朝初年,原始宗教萨满教十分盛行。蒙古族古代先民早有自然崇拜之俗,多桑《蒙古史》云,“靶鞑民族……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敬天畏雷,尚至巫鬼”,“有拜天之礼”。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萨满教正是体现了他们的崇物心里和灵魂不灭的观念。萨满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师为一身。他们认为主宰人间的万事万物都在于天,人必须唯天命是从,将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祖孛儿帖赤那说是“天生”,将其十世祖勃端察尔说成是“天的儿子”。成吉思汗本人也说,“长生天的圣旨……教铁木真管百姓”,“天命众百姓都属我管”。巴林氏的族长豁儿赤在当时就是萨满,人称萨满豁儿赤。他在推举成吉思汗即汗位时,说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铁木真做。萨满阔阔出也对成吉思汗说,“神命你为普事之真主”。萨满教的首领称“别乞”,在蒙古国成立

时,成吉思汗任命别乞为大臣,专门管理萨满教事务,让他们穿白衣骑白马,聚会时位于众人之上,备受敬重,每出行必有萨满跟随。有元一代,皇帝祭祖祭太庙、驾幸上都等,都以萨满主持祭祀。《元史》载“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以蒙古巫致祝词,盖国俗也。”“每岁,太庙四祭,用司祈监管一员及各蒙古巫覡”。“每岁驾幸上都,以六月二十日祭祀,谓之酒马奶子……命蒙古巫覡……领其事。”“每岁……于烧饭院中……命蒙古达官一人……偕蒙古巫覡。”“每岁,十二月十六日以后,选日……蒙古巫覡念咒语……谓之脱旧实,迎新福。”“凡宫中车晏驾……用蒙古巫媪一人”。在蒙古诸罕和后妃中有许多人笃信巫术,多桑《蒙古史》记载,贵由罕之皇后,“斡兀立海速失嗜巫术,终日与珊蛮(萨满)艺”。宪宗时的贵族蓄养萨满和巫师。文宗还为蒙古巫师立祠。蒙古巫者所奉神“灵感昭应护国顺王”,信巫者卜。占卜在元代蒙古社会中广为流行。《黑鞑事略》载,蒙古族凡“占巫则灼羊之枚子骨,验其文理之逆顺,而辨其吉凶,天弃天子一决于此。信之甚笃,谓之烧瑟琶,事无纤粟必占”。这种祭天地山河日月五行和占卜的习俗在蒙古地区久为流传。在昭乌达草原每岁必祭天祭山祭火。所命名的五大海日罕是有名的弘吉剌剔部人祭祀之处。五大海日罕为赛罕海日罕、陶音海日罕、嘎拉海日罕、土子海日罕、巴彦海日罕,都在克什克腾旗境内。即使是平时酌酒,也以右手食指奠天奠地。每岁祭敖包谓之祭山。占卜之俗袭古习,占瑟琶骨。《巴林右旗志》对祭祀和占卜有详细的记载。这些古代萨满教由于有元一代朝廷的提倡和引导,渐入民间,世代

相传,久以为习。

天主教又称景教,也称也里可温。据史料记载,蒙古部落时期就有一些部落信仰景教。《蒙古儿史记》记载,“乃蛮种人本信景教”,客列亦惕部(克烈部)……信仰景教”。《元史译文补正》载,“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也里可温为元之天主教……当即景教之遗绪”。景教在蒙古统一以前一二百年就已传入。多桑《蒙古史》记载,“克烈部……奉基督教,十一世纪初年时,思脱里派之教师曾传教于此部”。《蒙古史略》记载,“克烈部人……曾在1007年1009年间,经马鲁城的景教主教所化,自是以后改为景教”。“十二世纪时的克烈部王,曾用基督教名”。古巴林部于成吉思汗时迁居于旧克烈乃蛮部地。温教在巴林部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到了成吉思汗时代,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蒙古本部也传入基督教。《马可波罗行纪》载“成吉思汗召基督教……之星者前来,命卜占之胜败”。

释教又称佛教,在元世宗忽必烈时,各种宗教虽继续奉行先朝的政策,但偏重于佛教。1242年忽必烈召佛教僧人海云来漠北,不久佛教僧人禅宗和尚至温也被召到漠北,在忽必烈府下留居三年。1247年海云又到和林,住太平兴国寺。贵由也将嵩山少林寺名僧福裕请到和林。在此之前克什米尔僧人那摩在蒙古罕庭极受礼遇。宪宗蒙哥即位时,尊之为国师领天下佛教。蒙哥在和林大建佛寺,以福裕主其事。1256年兴建的和林大佛阁高达300尺,规模宏大,元惠宗时重修。1257年所立的释迦院碑记所记史事说明,

佛教已经传播到岭北偏远地区的外刺(瓦刺)部,可见佛教传播很广。元贵由时期,藏传佛教已经传入蒙古。1244年吐蕃藏传佛教首领萨迦、班底来蒙古。蒙哥时期,佛教葛哩麻派名僧葛哩麻八哈失应蒙哥之请来到和林,被封为国师。先期来到蒙古的萨迦班底去世后,八思巴继为法主,在忽必烈时代备受崇敬。忽必烈即帝位时,封八思巴为国师,领天下佛教,进而又封他为帝师。此后,元代历朝皇帝都从西藏请帝师。并由帝师主持皇帝皇后和皇族成员受佛戒的仪式。皇帝每年到上都去,在庞大的扈从队伍中,佛教僧人最受宠信。元朝建了许多佛教寺院,在上都建有朝元寺、华严寺、开元寺、八思巴帝师寺等寺院。

元代,昭乌达地区北部为蒙古弘吉剌剔的封地。蒙古贵族崇信佛教风靡岭南草原。当时弘吉剌剔部首领按陈以答儿脑儿(今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为营慕中心,在那里建立了公主离宫,后来建为应昌城,至元二十二年改为路,领应昌县。元朝鲁王领主在应昌城内先后建有许多佛教寺庙,有罔极寺、报恩寺、龙兴寺。在弘吉剌惕又一领地全宁路全宁城出土的一些文物如祭器上都刻印有佛教的内容。此外在赤峰郊区三眼井发现的元代壁画墓,在庵门内画有两幅门神,伏剑持斧怒目而立,正是佛教传播到西拉沐沦河南北的见证。现存的汉白玉螭首文篆字《应昌路曼陀山新建龙兴寺记》碑,碑文刻有“世祖皇帝职御六师祖征佛庭,时驻蹕应昌,至夕一佛飞空现金身,如影如幻,次日谕曰,是曼陀山石洞佛殊寿现身。公主尊帝命建龙兴寺,塑如来佛像,“一佛示现百亿身”,“百亿身各现一佛以寿如来”。在应昌

路古城的西山岗上,有一藏式佛塔,塔高10米,通体白色,四角有立雕狮首,塔顶砖砌,并立有铜刹。可见藏传佛教在这里有很深的影响。除了弘吉剌惕部属地外,其它地区也有佛教遗迹。在今喀喇沁旗西北群山环绕之中,背靠海拔千米以上的狮子峰前,有一座寺庙依山而建,高低层迭,呈三进三阶院落,布局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前有山门,中有天王和东西两侧配殿,其后为三间殿厦。殿前有石狮子一尊,缘山石而雕成,呈卧式,昂首向西南,身长4.5米,头高1.1米,形态生态逼真。寺内有西方古碑,从碑文上辨识乃是元代古碑。其一方小碑立于狮背,上刻“大元国上都路松州南阴凉河川狮子崖龙泉寺常住山林地土周围四至碑”,为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重修寺院时所刻。一方大碑立于殿前,为元顺帝孛儿只斤帖木尔至正元年(1341年)立,其碑文记载西安咸宁张智然大师到此,在前寺之上除瓦砾,剪荆榛,修山门佛殿、厨房僧舍之事,以及这里山明水秀,信徒沓至的盛况。此碑虽已600余年,至今保留完整。螭首、龟趺俱全,雕刻精巧细腻,花纹别具匠心。碑文共1250字。寺后山岩上有一小石窟内有石佛两尊,寺后西侧有古井一眼,春夏秋冬井水外溢,常年不涸,大约龙泉寺由此而名。在敖汉旗金厂沟梁小四家村,还建有一元代经成寺。此寺建于1522年至1566年间,从寺址上看,占地面积6亩,寺舍9间,砖石结构。由此看来,元时佛教在昭乌达地区影响且深又广,进而影响到卓索图盟。

13世纪初,道教开始传入漠北地区,与释教并存。

1221年,全真道首领丘处机应召谒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令其掌管道教,又为丘处机弟子等9人修建了栖霞观。1235年窝阔台时建和林城,城内有道观,命全真道尹志平住持。有元一代,有许多道士在岭北王庭。在昭乌达弘吉剌惕部领地应昌城就建有三皇道观。在全宁路全宁城出土的一批元代文物中,就铸有“皇姊大长公主施财铸造祭器充全宁路三皇庙使用”。公主即信释教又信道教,支持道教传播。

二、明代萨满教封禁与释教的传播

昭乌达地区在蒙元时期曾存在过萨满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佛教还一度兴盛过。但原始宗教萨满教仍旧为大多数蒙古人所信仰。至元末,佛教红教派,不为人们所尊崇。元亡以后,由于连年的封建战争,蒙古同西藏和中原的交通隔断,往来日趋减少,佛教影响日渐减弱,只能略见其踪迹而已。西域各地的蒙古人原信佛教,从15世纪起逐渐改信基督教,有的蒙古部落首领的名字都以基督教起名。其它道教等也都消之殆尽。此时萨满又抬头,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及政治军事行动上仍有着重要的作用。达延汗时期的东部蒙古敬信“天命”,遇事向天祈祷,以占卜决事。萨满教势力逐渐强大,使人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用毡皮布片制成“翁根”挂于壁或悬于竿上招神保佑。萨满教的巫师称为大神,言能役使鬼神。巫师占卜的方法样式更多,除了烧羊骨、系马尾而定吉凶,还以口喷音之清

浊,手持弓弦之动止来辨其休咎。现今在昭乌达的一些牧区,仍有祭翁根之习俗,保留着翁根毛都、翁根塔拉、翁根高勒等地名,这应该说是萨满教的遗俗。甚至就连后来笃信黄教的俺答汗最初也是信奉萨满教的。

释教中的黄教是宗喀巴创立的,因这一教派着黄色衣袍。14世纪中叶,明洪武年间,青海藏族喇嘛宗喀巴决心改革教派。他在西藏一些农奴主的支持下,创立了黄教格鲁派。黄教初建立时,一度力量十分弱小。为了取得统治地位,宗喀巴的弟子们寻找其它民族的统治者,如寻求明朝和蒙古封建主在政治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其时蒙古俺答汗的势力占据青海、西藏一些地方。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俺答汗出征撒里畏兀儿,在途中遇见一千多黄教喇嘛。这些喇嘛后来帮助俺答汗占领了一些地区,收服部落图伯特(《蒙古源流浅证》)。1571年俺答汗接待西藏喇嘛阿兴,听从他的劝服皈依佛教。实际上俺答汗也有自己的打算,他要以忽必烈和八思巴建立佛教经朝之事和统一蒙古诸部的思想,以邀请西藏高僧来蒙古传教。1578年他与黄教首领李南嘉错在青海仰华寺会面,召开法会,举行了隆重的人教仪式。俺答汗将李南嘉错尊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李南嘉错也给俺答上了“转千金法轮咱克拉瓦尔彻辰汗”的封号。此后为喇嘛教建庙传经。明万历九年俺答汗去世时,俺答汗的后裔们与李南嘉错达赖喇嘛会葬之。达赖喇嘛利用这个机会向蒙古各部宣传黄教,使蒙古各部首领一一皈依。从此黄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风靡全蒙古,魏源《圣武记》上

说,“蒙古敬信黄教,实始于俺答”。为了确立黄教在蒙古宗教的位置,通过《俺答汗法典》、《蒙古卫拉特法典》把崇信喇嘛教以法律的名义固定下来。宣布佛教是蒙古人的唯一信仰,萨满教应予取缔,必须烧毁翁根(翁衮),不许宰杀牲畜以为血祭,翁衮要用神佛来代替,翁根要写六字真言;蒙古人要遵守佛教戒律,颂读佛教经典,要尊敬喇嘛,给喇嘛以相当于洪台吉、台吉一类的社会地位。如不尊重喇嘛则给以重刑。还规定“十人中必须有一人献身于佛。贵族与平民要向喇嘛施舍,喇嘛可以不从事生产,免除赋税、兵役及其它差役。这样一来,喇嘛人数大增。人们的精神深受喇嘛教的影响,渴望灵魂的解脱,家家供奉佛像,饮食必祭,出入必拜,人人手持念珠,焚香诵经。

其时蒙古封建主之间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达延汗曾孙领察哈尔大部时,辖敖汉、奈曼、翁牛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和苏尼特等部。他迫于俺答汗的势力,率部从宣府、大同塞外的察哈尔部旧地,东迁到兴安岭以西的哈拉河河流域,吞并了泰宁、福余二卫。延之其子土蛮即位时,土蛮力图用和平的方法统一漠南各部,任命漠南蒙古包括领有内喀尔喀五部在内的苏巴海(速巴亥)5人为执政理事。这5人也以土蛮为共主。明万历(1526年)年间,巴林部首领苏巴海率众参加了土门台吉召集的宣政大会。此间土蛮台吉诏见了格尔玛喇嘛,带领大家入了教门。苏巴海死去,其弟炒花领有巴林部,乃归属于察哈尔大部林丹汗。林丹汗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会见萨斯嘉、班禅、夏尔巴希刺卜胡图格图,受到了精深密乘之灌顶,于是在他的领

地里广建佛寺。在昭乌达草原巴林右翼旗索博日嘎出土的石碑,其碑文就是佐证。碑文记载着:1617年从西藏来到林丹汗身边弘扬佛法的夏尔巴胡图格图,“他(林丹汗)以自己的信仰和虔诚为这个国家请来了天之瑰宝——受到古代君主法王尊崇的喇嘛,在知识慈悲和力量方面具有一千道毫光的曼殊师利的呼毕勒罕,即普遍被称为阿难陀师利波陀罗的教主夏尔巴”;也记载1626年在此地修建的“大神变塔”和“天降塔”。大神变塔和天降塔是释迦如来法身善终者的八座宝塔之一,为释迦如来大显神通时建造的两座塔。碑文还载“为了纪念高贵的教主们功绩,并把曾祖们扎萨克图汗的遗体举行火化,他建成了法身崇拜的对象——大神变塔。又为了实现母后的愿望,建造了天降塔”。“以美丽的结构、宏伟的建筑形式,并在周围布满了祥云”等等,最后在“我佛升天以后的三千七百五十九年的丙寅年沙拉帮月初三完成了”。在这个碑文里还颂扬了佛教的功德,“我以对之异常恭敬的礼仪向我至高无上的喇嘛跪拜。他的法力无边,甚至他的脚扬起的尘埃也可以作为许多智者前额上的装饰”。“他仪态万千,足以与朝霞的壮观比美;他以六十种不同的象龙所发出的声音,传播悦耳的音乐,使乾闥婆的歌声相形见拙;他无所不知,明察一切;他手中托着神奇的水和欣欣向荣的万物融洽无间;他背负着起死回生的仙水,一切愚昧和苦难只要被他听到,就能消除净尽;他的名字叫曼殊师利,具有尽善尽美的容貌”。由此可见,明朝末年,喇嘛教已传入昭乌达地区的蒙古族中,而且使萨满教的一些活动注入了喇嘛教内,如萨满教祭山祭火的祭词中注进了

佛教的教义,又迎合蒙古人的心里,使他们接受喇嘛教的宣传,这样使佛教世代流传。

三、清代释教之盛行

清廷征服蒙古以后,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1636年(崇德元年)设置蒙古衙门,1638年(崇德三年)升为理藩院蒙古衙门。理藩院统管的事物当中就包括宗教,理藩院中的旗籍司和柔远司掌管内外旗的扎萨克官吏俸禄、年班、朝贡、赏赐及喇嘛事物。清统治者对蒙古的统治策略除了设置将军、都统、大臣分地控制,在蒙古地区分疆划旗实行监控和利用联姻羁縻蒙古外,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兴黄教。黄教在明代于蒙古地区广为传播,俺答汗时期曾利用黄教来作为一种新的力量统治属民的意志,巩固自己的政权。同时也利用喇嘛教宣称的,“所有富裕显贵的人们,他现世的荣誉地位都是本人前世修行的善果。可汗则是古印度传说中的大皇帝和元世祖忽必烈的转世,生来就有统治全蒙古的权力”,来实现大汗对全蒙古的统治;而对平民,则用其所宣称的,“他们受苦受难处于无权地位,都是他们前世的罪孽造成的,今生今世要听天由命,放弃追求放弃斗争,忍受一切苦难,以偿清前世的孽债,换取美好富裕的生活”,使之成为汗主和富裕显贵人们的工具。在黄教传播蒙古的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们还知道,当时明朝对黄教传入蒙古亦实行扶植的政策,所以对此报以积极的态度。因为清朝统治者知道,佛教教义可以束缚蒙古封建主的思想 and 行为,这样

可以免除北部蒙古侵扰之苦。同时满族统治者们也看到蒙古地区由于实行喇嘛教,在蒙古社会中增加一个新的阶层,即不劳而获的喇嘛阶层,这样使社会生产逐年低下,整个社会的负担都压在平民身上。生活越来越贫困的平民为了摆脱重压,求及来世平安富贵,男子都投奔寺庙去当喇嘛。由于喇嘛不准婚配,遂使蒙古人口逐年下降,反抗力量越来越弱。清廷一面告诫满族上层要以蒙古诸部“俱学喇嘛,致衰国势”的教训为戒,不允许满人信奉喇嘛教;一面在蒙古族部旗内大力推行喇嘛教,使之“谨守国典,妄敢陨越,不识不和,太和有象”。乾隆皇帝对此曾一语道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以不保护之”。清代在蒙古地区推行黄教主要实行两种策略,即扩大喇嘛上层的特权、广建寺庙。

扩大上层喇嘛特权方面,清政府采用元代的国师办法、明代的俺答汗和孛南嘉措共同商定的办法,给各级僧侣以政治地位,绰尔济等于洪台吉,喇木扎木巴、噶木楚等于台吉,格隆等于塔布囊,欢津太师和宰桑,托音、齐巴噶察、乌巴升、乌巴之察等于官员。在皇都设国师和禅师,授于他们各种尊贵的名号、职衔和特权,使之享受与蒙古王公的同等待遇。清朝初年封的喇嘛名号有呼图克图,转世者称呼毕勒罕。在其中位之高贵影响大者称国师、禅师,次称扎萨克达喇嘛、副扎萨克达喇嘛、扎萨克喇嘛;再次称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其弟子分为德木齐喇嘛、格思贵喇嘛、格隆、班第喇嘛等。

在昭乌达地区,清代被称为上层喇嘛的有呼图克图、诺

们汗、达尔罕、班弟达、扎萨克达喇嘛、达喇嘛，朱弟达喇嘛、尚斯德、德木齐、格思贵、格楞等名号和职衔，其它喇嘛有绥本、尼拉布、索瑞、翁斯德、格比格、果尼尔、都依格、翁布、笔切其。

清朝封建统治者除了给喇嘛封以名号职衔，还给喇嘛以特权。其一，朝廷安排上层喇嘛年班觐见，享受与蒙古王公的同等待遇。清朝顺治年间规定喇嘛穿着服饰非奉上赐，不许用五爪团龙，但是“会蒙恩赏赐者，各色均准服用”。嘉庆十五年(1810年)规定，“驻京之呼图克图呼毕力罕等，转世多次，来京三次以上者，坐褥冬用狼皮，夏用红褐，乘坐绿围车；转世次数较少，来京一二次者，坐褥各用獾皮，夏用褐绿褐青，乘坐青帔车”。上层喇嘛进京赏赐等事亦有规定。

其二是从清初就规定喇嘛驻京优待以钱粮。从扎萨克达喇嘛、达喇嘛以至德木齐喇嘛、格隆班弟都由朝廷给以钱粮，以职供给。钱由每日银一钱五分一厘一丝一毫一忽到二分八厘八毫四丝二忽四微，米由二升五合到一丝二忽三微四撮不等。对于喇嘛赏赐亦有优待之规定。来京喇嘛从呼图克图扎萨克达喇嘛到格思贵、格隆以一定数量的钱粮肉马匹分等。其它如对喇嘛的服色、车骑等都按等级区别优待。这样一来上层喇嘛自然而然产生优越感。他们更加热心于对朝廷效忠。

其三是规定呼图克图(活佛)喇嘛可以转世。转世的方法实行金瓶(奔巴)制度。这样就把黄教领袖人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西拉沐沦河以北各旗都有转世活佛。阿鲁科

尔沁有转世活佛2人，即察汗达尔罕呼图克图转9世和杨松葛根转6世；巴林左旗有海力根台庙的老布仓却吉尔转5世；善庆寺(查干白其庙)的呼图克图(未转世)；昭恩寺转6世，阿鬼庙呼毕力罕转4世；巴林右翼旗荟福寺有3葛根，重庆寺有1葛根2呼毕勒干，隆福寺有1呼毕勒干，嘉佑寺有1呼毕勒干，阐化寺有2葛根1呼毕勒罕，宣教寺有2呼毕勒干，东拉新其勒庙岗根庙要尔吐庙各有1呼毕勒干。这些葛根呼毕勒干最多传13世，最少二三世；克什克腾旗庆宁寺1葛根传14世。其转世实行奔巴制度。以阿鲁科尔沁旗察汉达尔罕呼图克图为例，其一世由西藏请来。其二世名罗卜桑丹毕扎拉森，转世于土默特旗；其三世罗卜桑扎木苏转世于西藏；其四世阿嘎旺丹森达尔吉转世于西藏；其五世叶西普日来拉布吉转世于阿鲁科尔沁旗；其六世阿嘎旺关楚克普日来扎木苏，其七世扎木彦丹参元丹普日来，其八世阿旺西拉嘎巴森格，其九世罗卜桑格力格日葛鲁日达尔吉都转世于阿鲁科尔沁旗。

其四是清朝对蒙古上层喇嘛给予许多特殊的待遇。清政府规定各庙都有规模不等的庙产、牲畜、领地和庙丁。各庙的主持达喇嘛由清政府及扎萨克王府发给钱粮拨给庙产，持有度牒的喇嘛按月拨给钱粮，各笃信喇嘛教的诺颜给以资助，有的给以牲畜和土地。封建主还把自己的牧奴连同土地和牲畜捐献给庙主，这些奴隶称为庙丁，称沙那比尔。他们实际上是喇嘛封建主的牧农。清代由于封建主的残酷剥削或因天灾，有的牧民自动做沙那比尔为庙里做杂役放牲畜，因此有的庙庙丁很多。庙丁生活在封建社会被

剥削阶级的最底层。他们终生为寺庙服役而且世代为庙丁。大的庙仓有土地数百顷,牲畜上万头,这些财产集中在庙仓,有的寺庙的主持有几个仓。阿鲁科尔沁旗罕庙的葛根仓有庙丁60户。庙丁户除了担负放牧牲畜,拉脚运输,割柴打草等差役外,每年庙里念3次大经,每户都要给1头大牛,其它庙里要的东西,都必须随要随到,不能怠慢。庙内如办上层喇嘛的丧事,其费用也要按其家庭情况摊派,少则1牛1马10只羊,多则数马数牛。除此而外,有外旗来者,也到庙葛根处当庙丁。清朝末年,在罕庙就有50余户。除此而外,庙产多者还有苏鲁克畜群,庙仓从中取利。

其五是清廷除给上层喇嘛以剥削权,还给他们行政司法权力。他们把寺内喇嘛分成若干工种,有的专管衣食住行和杂物(绥本),有的专管颂经(翁斯达),有的负责整理法物、法器、经卷、跳鬼用的衣服(果尼尔),有的受庙仓喇嘛的指挥,掌管庙仓的牛羊土地等(翁布)等。清廷规定喇嘛班弟等私自逃走,自行投回者,初次鞭六十,二次鞭八十,三次鞭一百,革退,拿获者鞭一百革退。各庙喇嘛若不守清规,便呈请驱逐(《清代边政通考》)。上层喇嘛参与俗界政治事务。晚清时期有的上层喇嘛还兼有行政职务,有行政处理权。

清廷极力推崇喇嘛教,使蒙古人都信仰喇嘛教,使之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上层喇嘛利用人们笃信喇嘛教,每年都要举办数次大型庙会,庙会期间诵经跳鬼。这些庙会的靡费均向旗民摊派。如巴林右翼旗东西两大庙每年正月十五嘛恩经会,六月十五愚勒经会,及十一月十二月的经会

等。共用牛82头,羊238只,炒米403石,黄油2325斤,奶豆腐1910块,米面1.6石,白面240斤,小米1.2石,此外糖15斤,点心101斤,哈达140块,其它还有线、纸、颜料等。请外地喇嘛来诵经,每个喇嘛每天诵经费150钱,这些费用均向旗民摊派,集中起来供法会使用。这样的法会活动非一旗一庙如此,旗旗庙庙都是这样,最少的每旗每年要花费万两白银。庙会期间旗民向庙内施舍,都为庙仓和葛根仓所有,使庙仓或葛根仓的财产进一步扩大。在阿鲁科尔沁旗的罕庙,每当庙会,喇嘛信徒们都去添油,谓生子添孙。一年中,庙里能得5000斤黄油。笃信喇嘛教的旗民即使受到剥削和压迫也不反抗,除庙会施舍外,每遇家中婚丧、疾病、灾害等事都要请喇嘛占卜诵经,一些人家无事也请喇嘛诵太平经招福经。“喔!喇嘛,博日罕佛爷”,成了人们表示喜悲哀乐的语气助词,即使遇到极不遂心的事,只要频念“博日罕”,便心安理得。其中虔诚者,去五台山朝圣,一步一磕头。

广建寺庙是清廷在蒙古地区提倡黄教的措施之一。为了在蒙古地区大量建造寺庙,从清朝皇帝那里开始建庙。康熙皇帝在多伦诺尔建纪宗寺,雍正皇帝在库伦建汇宗寺。这些都是蒙古地区的黄教大寺。皇帝带了头各旗王公及从清廷下嫁的公主极力仿效。远嫁到巴林草原的固伦淑慧公主于康熙六年首建圆会寺,继而下嫁到巴林草原固伦荣宪公主建荟福寺,都是西拉沐沦河以北的大寺庙。

昭乌达地区的喇嘛庙建筑分藏式和宫殿式两种,以宫殿式为多。藏式庙宇多集中在阿鲁科尔沁旗。有阿鲁科尔

沁旗的根皮庙、巴林右旗的平顶子庙和索博日嘎庙等。其它各旗所建喇嘛庙宇绝大多数是宫殿式。建造时间为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乾隆年间，昭乌达地区的喇嘛庙最多。今克什克腾旗境内有荟祥寺、庆宁寺、普安寺、永保寺、弥僧寺、甘珠庙、荟宁寺、布阁台庙、塔根那尔庙、铁匠炉子庙、达王庙、青龙寺。其中庆宁寺为旗之名庙之一。庆宁寺初建于康熙三年(1664年)，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扩建，大殿二进，有房50余间，喇嘛最多时三四百人，后来有喇嘛80余人，寺内主持为葛根喇嘛，凡传14世。每年五月十三日为庆宁庙会，全旗各寺庙喇嘛都来诵经，僧俗两众成千上万热闹非凡。巴林左旗原有喇嘛寺庙14座，1952年行政区划变更，随区域划到巴林右旗7座。为衙门庙(乌兰白其庙)、海力根台庙、查干白其庙(新贝子庙)、善福寺(格力比尔召)、隆善寺(前召庙)、昭恩寺(强木恩林寺)。其中远近闻名的是善福寺。此寺建于唐时真寂之寺石窟前，因是洞窟之庙，蒙古名“阿贵图庙”。建庙之后，佛家曾喻信徒，此地出现过霞光圣兆，遂称为格力比尔召，又因庙内供奉的是石雕释迦牟尼卧佛，又称和布特召。寺庙殿宇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盛时有喇嘛217人，寺内主持呼毕勒干，历4世。每年五月十三是善福寺的庙会。巴林右翼旗有庙24座(包括原巴林左翼旗7座，今林西境内3座)，有圆会寺、荟福寺、阐化寺、嘉佑寺、重庆寺、隆福寺、西拉新其勒庙、东拉新其勒庙、宣教寺、珠尔沁庙、苏布敦庙、要尔吐庙、查干宝力格庙，其余庙宇宣，太平庙(平顶庙)、贝子庙、岗根庙、床金庙、乌牛台庙、索博日嘎庙、北太本庙、陈

板庙、雅玛图庙。旗内较兴盛的寺庙是荟福寺。此寺建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为康熙帝次女固仪荣宪公主聚资修建。寺院两进，前有山门，会经殿，后有供佛殿，占地10余亩，有房百余间，整个殿宇宏伟壮丽、庄严肃穆。寺内主持有三个葛根，称东葛根、南葛根、巴格喜格根，凡传13世。从1730年起每年六月是荟福寺庙会，全旗喇嘛都集中到荟福寺颂经，主要为皇帝祈福诵长寿经。昭乌达盟曾规定，每逢荟福寺庙会时，全盟各庙，每年轮流出50喇嘛来这里诵甘珠尔经，事毕还要上报朝廷理藩院。庙会十分热闹，在东蒙古很有名气。阿鲁科尔沁旗从清康熙二年(1663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兴建庙宇22座，多为藏式建筑，有隆安寺、成达寺、戴恩寺、平盈寺、宝善寺、奇救寺、长寿寺、兴法寺、普善寺、护法寺、兴法寺、崇化寺、普济寺、福寿寺、广佑寺、普救寺、广化寺、兴福寺、福盛寺、寿宁寺、台本庙、浩力吐庙。旗内较兴盛的寺庙为戴恩寺，在罕苏木境内，民间称罕庙，建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有人将其称为清朝黄教内蒙古境内8大胡图克图庙之一。盛时有喇嘛500余，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曾来此庙传经。每年庙会盛大，聚众万余。昭乌达地区的寺庙建筑始于清顺治康熙年间，盛于清雍正乾隆年间。最盛时期不仅寺庙多，喇嘛人数也很多。以巴林右翼旗为例，乾隆二年全旗喇嘛不足500，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喇嘛总数已达4053，占当时全旗男性人口15100人的四分之一。克什克腾旗喇嘛人数占人旗总人口的11%，占成年男性人口的三分之一。

喇嘛教的兴起与发展，使整个蒙古族人口悉数信仰。

喇嘛统治者为了报答清廷对他们的崇信,极力劝导蒙古人安于命运,接受封建统治和压迫,甘于忍受剥削,起到了世俗王公起不到的作用。喇嘛教的传播,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腐朽的封建势力得以横行。社会形成不劳而获的喇嘛阶层,众多的男子当喇嘛而不从事生产劳动,阻碍了生产力地发展,使民族地区日益贫穷落后。

但是喇嘛教在蒙古的传播带来了宗教文化和医学、天文、数学等。在清代一些大的寺庙中都有学部。比如在克什克腾旗达王庙的喇嘛机构中就设置政务和教务两部,教务部设有丁唯尔拉桑(天文、数理)、玛纳巴桑(医学)、确热拉桑(教务管理)等。

这些组织机构的建立,对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对蒙古草原的天文、数理、医学研究和民间医疗起到一定的作用,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克什克腾旗入教喇嘛从七八岁就要学藏文,待13岁时要受“格斯勒”,通过考核可以成为预备喇嘛。此后要学诵经,20岁时受格隆戒,其中优秀者可以获得学位,被送到更大的寺庙内学习蒙、藏、梵、汉文字,进而分科进修,其中聪颖者能达到很高的造诣。如巴林右翼旗阐化寺一世葛根格鲁坚赞于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多次到青海西藏等大寺学经,曾在哲蚌寺习经9年,获得“热绛巴”学位,先后拜见了七世达赖和六世班禅。他一生多次往返于青藏于蒙古之间,为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到巴林草原几乎奔波一生。他于修习经典、宏伟佛法的同时,还利用掌握的医学知识为民治病。清代史学家拉希朋斯克曾为他立传。《巴林右旗志》

记载说:“格鲁坚赞一生潜心于佛教,先后两次进藏。他以宗教为桥梁,沟通了巴林草原与雪山圣地的往来,促进了文化交流,对巴林右翼旗的蒙医蒙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巴林左翼旗达日玛达来1672年到内蒙古西部地区深造,获“拉仁巴”学位。他用所学的知识以藏文写了《浩尔创金》一书。此书汉译为《佛教在内蒙古的传播》,主要内容为成吉思汗家族及其后裔们,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具体名称,清朝对蒙古的管理和黄教在蒙古的传播。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叙述精细透彻,成一家之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旗另一位奔波于西藏于内蒙古之间的喇嘛岭·吉克梅特罗古罗思嘉木措,在西藏哲蚌寺学经时博学多思,颖悟力强,被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土登嘉措封为“法王堪布”,并带回达赖所赐的120卷《甘珠尔》经,使藏传佛教文化在昭乌达草原传播。

清末,随着清政府逐步解除对蒙古地区的封禁,昭乌达草原被大规模的开垦,汉民和回民和其它民族涌进,外来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关内道教和印传佛教也进入蒙古地区。这些宗教强烈地冲击着有清以来的在蒙古草原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黄教,使黄教的势力圈越来越小。加之清王朝实行新政以后,对蒙古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古的骑兵不像清初那样帮助满族军队打天下,如今也对付不了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者和义和团,因而蒙古对稳固清廷统治地位已经不那么重要,朝廷对蒙古政治、军事、宗教的管理日渐松弛,蒙古地区喇嘛教逐渐衰弱。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规定,蒙古各部落呼毕勒罕绰文济喇嘛等

系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设立金奔巴瓶以前出世,奏准有案者准其报院,代奏请安;如在设立金奔巴瓶以后出世,不准请安。可见清政府对上层喇嘛的重视程度减弱。另外喇嘛上层越来越腐败,对平民的剥削和对下层喇嘛的欺诈日甚,引起蒙古民众的不满。加之在蒙古民族头脑中的新的进步的民主思想渐渐传播,使数百年来人们深信不疑的喇嘛教开始动摇,这些都是清末蒙古地区喇嘛教逐渐衰弱的原因。在巴林右翼旗就出现下层喇嘛反对上层喇嘛的沙格德尔。沙格德尔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出生巴林草原的查干沐沦河畔,7岁时波父亲送到巴林左翼旗善福寺(格力比尔召)当喇嘛。青年以后,沙格德尔的出色才华和疾恶如仇的性格使他厌恶活佛达喇嘛们的贪婪与伪善,更怜悯穷苦蒙古人的苦难和不幸。他对那些有权有势的喇嘛嘴里讲的什么“救死助生,修身行善”,背后干的欺压百姓,压诈贫弱、贪污盗窃等无耻勾当十分仇恨。他勇敢地站出来抨击上层喇嘛,揭露寺庙里的黑暗。他以“好来宝”为武器,唱道:

满身一股臭屎味/偏愿意坐高楼/连高瓦(藏经)都念不通/却喜欢戴高顶帽/一本“扎雅嘎”(喇嘛教规)都背不熟/硬巴结着要当“扎胡”(达喇嘛)/连个“扎普”(藏经)都看不懂/却披上“幛其”(法衣)来硬装神/好在召庙是用岩石砌成/才勉强保留到如今/如果它是用面捏成/早被这些佛爷们吞尽。

沙格德尔的这种反抗当然为寺庙当权者所不能容忍。他多次被押进佛堂,无情的法棍落在他的身上。他身体虽

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反抗的烈火越燃越旺,他唱道:

圣洁殿堂啊/已经变成了衙门的审问堂/修身的喇嘛啊/已经变成了人间的活阎王/只因我沙格德尔/揭露了他们肮脏的勾当/在这“仁慈”的佛面前/饱受了一顿血染的棍棒。

沙格德尔被赶出庙门之后,成了游僧。他仍然对王公、诺颜、巨贾、军阀互相勾结的黑暗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抗争:

苍天他没有了恩典/大地他失去了爱怜/神佛他不再仁慈/掌权的僧俗诺颜们已经无法无天/黄金和丑恶结合在一起/遮盖了人间的真理/诺颜和达喇嘛串通一气/摆设下血宴和肉席。

沙拉德尔的这些民间诗句,至今还在昭乌达草原上流传。

四、民国时期的释教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推翻了清朝帝制。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统治中国。袁世凯为了巩固其统治,一方面标榜“共和”,以结帝国主义之欢心,另一方面维护中国的封建主义,极力扶持清朝皇室和包括蒙古王公在内的封建势力。袁世凯上台后,在统治蒙古上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对帝俄策动下的外蒙古“独立”。北洋政府的对策首先是稳住内蒙,满足内蒙古一些封建王公和上层喇嘛的封建统治权,宣布极意优待效顺之王公喇嘛,以坚其向。1912年8月19日公布了《蒙古待遇条例》,

在封赏赞助共和的蒙古王公同时,首先将内蒙古喇嘛教首领章嘉呼图克图封为“宏济光明”的名号,赐银万两。随后对在北京和内蒙古各地的胡图克图 240 人都给以册封。为了维护喇嘛教在蒙古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袁世凯还以大总统的名义给一些寺庙赐匾。这样一来,蒙古地区的喇嘛教又活跃一时,有些寺庙的活动又兴盛起来。如巴林左翼旗的召庙,以其自然风光和历史久远而颇有影响,每年四月中旬的大型玛恩庙会,仍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就连乌珠穆沁旗,热河、哲里木盟、呼伦贝尔盟等地的善男信女也纷纷赶来参加庙会。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蒙旗土地相继大量放垦,汉人大量涌入,许多庙宇被拆迁,如巴林右翼旗西部放垦,垦地内的苏本敦庙、嘎拉达苏台庙、岗根庙、新庙等都被拆迁,有的在他处另建,但规模缩小,有的没有再建立能力。在清代,每一个庙宇就是周围的蒙古群众信仰的中心。由于草原大量放垦,原垦地的牧民被迫迁往它处。庙宇即使不迁,也失去了信仰的蒙众,香火不继,自然而然就冷落下来。民国初年,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对昭乌达地区的进攻,以及后来的直奉军阀之战,使许多庙宇被烧毁。如巴林右翼旗的珠尔沁庙、岗根庙、乌牛台庙等,在驻林西的毅军追击外蒙古军时烧毁。以巴林右翼旗为例。清代喇嘛教兴盛之时,全旗有喇嘛 5000 余人,清朝末年,光绪三十年(1904 年)统计,全旗有喇嘛 4053 人,但到了民国十二年(1923 年),喇嘛人数降到 1570 人。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侵占东三省,

1933 年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内蒙古草原,昭乌达地区沦陷,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伪统治者利用喇嘛教作为麻痹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伪满洲政府在《整顿喇嘛教》一文中露骨地提出:“蒙古人笃信喇嘛教,故对外来各宗教及欧美势力,尤其对共产主义之进入均能防止。”他们不但不反对喇嘛教的存在,反而利用喇嘛教的宗教活动,进行殖民主义宣传,以潜移默化的手段摧毁民众的民族意识,实现他们殖民统治的目的。日伪《满洲国各县事情》一书载:巴林右翼旗大板上庙会十分兴盛,殿宇雄伟壮观,堂塔加蓝,每逢庙会数千名喇嘛前来聚会,人们称之为北方“甘珠尔庙会”。庙会期间,还有庞大的市场,锡林郭勒、察哈尔、乌兰察布等地的蒙古人,锦、热两省,多伦、张家口来的商人都聚在这里。日伪利用这个机会,“以巴林右翼旗公署为中心,与兴安局、弘报处、省公署、协合会、满铁、邮电等各上级机关取得联络,宣传日满不可分的关系及满洲建国等事。另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地削弱和降低喇嘛教的超越地位,为了征兵收税等控制喇嘛人数,规定受过日伪奴化教育的学生不准当喇嘛,这样使喇嘛的人数减少。为了取代蒙古人对喇嘛教的信仰,他们搬出日本的“天照大神”,在各地建立神社企图以“天照大神”取代释迦牟尼,以日本人的信仰取代蒙古人对黄教的信仰。1940 年以后,日伪为了牢牢控制喇嘛教,成立了“满洲帝国喇嘛教宗团”。1941 年在科尔沁右翼前旗的葛根庙设“喇嘛教务总部”,在各省设立喇嘛教务所,每旗设立喇嘛教务分所。各旗建立分所都要召开大会,一般由伪旗长和参事官主持。喇嘛教务分所设置所

长 1 人,一般由各族主持的葛根喇嘛充任;顾问 2 人,由伪旗长和参事官充任;教务所还设书记员,书记员长期驻庙,窥探庙喇嘛们的思想动态,以便随时向日伪当局报告,实际充当特务角色,一般由日本人和到日本留过学的喇嘛充任。除此而外,日伪还利用各种机会利用喇嘛教务所这个机构对喇嘛进行殖民宣传。1942 年伪满洲国兴安省公署派一个叫内岛的日本人到巴林右翼旗主持召开喇嘛教务会议,要求居住在“国境”地区的蒙古人都有责任参加扩军备战,喇嘛在诵经时祷告圣战必胜,喇嘛应知道“友帮”的帮助和“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离”的关系。要求喇嘛们既要崇拜释迦牟尼,又要崇拜“天照大神”,要信仰日本宗教。

日伪统治者除了用喇嘛教务所这样的机构将喇嘛教牢牢地握在手里外,还利用选派喇嘛到日本留学,到殖民化的满铁学校学习,办喇嘛学校等进行奴化教育。在昭乌达各旗都有派到日本或本国大连等地学习的喇嘛。喇嘛教务分所还办了喇嘛学校,对青年喇嘛进行奴化教育,从 1942 年开始到日伪垮台统计,前后有 130 名喇嘛入校。由于日伪对喇嘛教的控制和利用,喇嘛庙和喇嘛人数逐年减少,以巴林右翼旗为例,到 1945 年全旗喇嘛总数为 1042 人,比光绪年间 4053 人减少 3000 多人。

“八一五”光复以后,昭乌达地区成为大后方。党领导蒙汉各族人民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庙财产,保证寺庙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的政策。

1946 年 12 月,冀热辽中央分局专门研究了蒙民问题,

发出《关于热河蒙民工作的指示》。“内蒙古的成吉思汗子孙——包括王公喇嘛在内——团结起来反对内蒙古民族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为内蒙民族自治与自决而斗争”。明确提出团结喇嘛的问题,还提出对喇嘛的财产和土地给以保护的原则。党的宗教政策十分注意团结、启发与动员喇嘛学习时事政治,允许他们参加各种训练班学习,根据自愿的原则,在内蒙古自治学院举办的培训班中,各地就推荐了 18 名喇嘛参加。1946 年秋季,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的领导人到基层参加庙会活动时,见许多蒙古群众来给庙活佛磕头,因有分会的人在,活佛不敢出来面见群众。分会的同志就向其讲述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习惯的政策,动员活佛出来与蒙古族群众见面。活佛对党的政策很感激,后来还订了我党出版的有关自治运动的报纸和刊物。此外,各地民主政权还发动喇嘛们贡献一技之长。巴林右翼旗阐化寺活佛嘎拉僧普日来扎木苏解放前经常给蒙古族群众治病。他贡献了自己的医疗技术。嘎葛根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 1946 年减租减息运动中,亲自到全旗各苏木募化资金。把所募来的钱建诊疗所。虔诚的佛教徒闻风而动,积极为办诊疗所施舍。嘎葛根在很短的时间内募集到 700 余只羊,80 多匹马,70 余头牛,终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帮助下,于 1947 年 1 月在巴林右翼旗大板开办了昭乌达草原第一个蒙古族医疗机构——巴林右旗喇嘛诊疗所。喇嘛诊疗所很受群众的欢迎,嘎葛根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赖。此后,他为牧区民主改革作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有一些上层喇嘛在党和政府

的帮助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巴林左翼旗床金庙的葛根元旦扎木苏接受革命道理后,主动把自己的葛根仓让给旗政府作为办公地址,还动员该庙的青年喇嘛走出庙门,参加革命队伍。他还亲自带领5名喇嘛参加减租减息工作队。元旦扎木苏本人和一些进步喇嘛参加了革命队伍。

巴林文史丛书

巴林右旗文史资料(第五辑)

穆松 编

政协巴林右旗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印刷装订 巴林右旗鑫源印刷厂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数 195 千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 - 2000 册

内新图准字(2002)89 号

1 - 8 册(全套)定价:280.00 元